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阎国栋 著

學苑出版社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阎国栋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汉学三百年/阎国栋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8

(列国汉学史书系)

ISBN 978-7-5077-2908-5

Ⅰ. 俄… Ⅱ. 阎… Ⅲ. 汉学—历史—俄罗斯 Ⅳ.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429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yg@sina.com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4055、67675512、67678944

印 刷 厂: 河北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5×960 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5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列国汉学史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季羡林　李学勤　汤一介　王路江

主　任：崔希亮

副主任：韩经太

主　编：阎纯德　吴志良

编　委：乐黛云　安平秋　许光华　刘顺利　吴志良
张国刚　严绍璗　李明滨　李海绩　陈开科
侯且岸　柴剑红　钱林森　耿　昇　阎纯德
阎国栋　熊文华

序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

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　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 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 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 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

① 严绍璗：《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载 2006 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② ［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1998 年。

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系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 ~ 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 ~ 1978),他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

① 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中华书局,2003 年。

词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 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认识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 1921 年 10 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 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他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掏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之前，本质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 19 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

① 《章太炎全集·〈訄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

物。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 和 Serice 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 Serikon、Sericum 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 139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 10 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 522 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三页，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版。

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 7 次，历经 28 年，到过 30 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 851 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

和《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到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在此后的许多世纪里,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神秘感就从那时开始。

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信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

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540年罗耀拉(S. Ignatin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i)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

等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洲。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耶稣会士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开垦”，不仅著书立说，还把《四书》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与其先后到达中国的著名的传教士，都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对推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汉学史上，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许多汉学家的名字十分响亮，诸如曾德照、柏应理、卫匡国、殷铎泽、南怀仁、汤若望、龙华民、金尼阁、罗如望、熊三拔、李明、张诚、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翟理斯、安特生、雷慕沙、儒莲、德理文、安东尼·巴赞、蒙田、冯秉正、尼·雅·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斯文赫定、马礼逊、斯坦因、理雅各、翟里斯、李约瑟、韦利、霍克斯、卫礼贤、福兰阁、孔拉迪、高本汉、卫三畏、费正清、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欧文等和东方日本、朝鲜半岛的富有建树的汉学家等，以及当今散布在各国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铸造成汉学史上的思想学术之碑，开垦了汉学成长的沃土。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在欧洲全面研究中国文明的问题上，“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①] 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誉为汉学的先锋，“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的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真正建立起作为学术的汉学传统。就传统汉学而言，法国是汉学家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汉学界的学术巨擘，不断为汉学的崇高而添砖加瓦。

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内化”的接受。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也是人类和谐与进步的推动者。

汉学诞生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流和相互浸淫之中。这个结果无异于一枚果子的成熟，只有“风调雨顺”才生长得好。和谐、宽容、理解与尊重，是异质文化彼此借鉴的保证。作为文化形态的汉学，其成长和生存离不开

---

①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良好的国际语境。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凡是开放的时代,文化交流多,汉学就发展;反之,汉学就停滞,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作为学术公器的汉学,文化上有其自己的成长过程。汉学是发展的,这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同样深受不同时代语境的极大影响。这里所说的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的历史变化。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换句话说,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他者社会的变化。这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而现代汉学兴显于美国,20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很繁荣。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现代汉学在世界有了显著的发展。

虽然 20 世纪的后 50 多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但就整体而言,1949 年后约有 30 多年是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时期。公正地讲,这道意识形态的"长城"也并非就是中国的政策,是那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我国全面封锁的结果。这个时期的"汉学"涂满了政治色彩,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较多地保持着传统汉学的学术精神,而美国的"中国学"却成了充满政治意识的现代汉学的代表。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这种政治特征,是那个时期美国汉学的基础,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他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由于西方与中国少有交流,因此汉学家不了解中国最新的文化进展(比如新的考古发现),致使汉学处于断炊或"无米之炊"的状态,没有中国文化的支持,西方汉学要想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也很困难。陌生感和神秘感困扰着汉学家,这不仅是文化的尴尬,也是汉学家的难堪。

人类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等。物质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又极易变化的"具象"文化,即如饮食、服

饰、住房、音乐、舞蹈等;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表现在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宗教观等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经过高度抽象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它通过文化灵魂——哲学、文学、语言、宗教、历史等来表达。[①] 观念文化,一俟进入外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深层研究。

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 (汉学)和 Chinese Studies (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

时至今日,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这两种汉学形态不仅同时存在着、共荣着,而且还互相浸透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汉学悄然嬗变为中国学,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特点和极强的生命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汉学始自 1830 年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建立,这个学会虽然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文学的兴趣,但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②] 这个特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可见,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8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点,与欧洲具有人文科学特征的汉学颇有差异,但它依然属于 Sinology 的范畴。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走向强大,加入强国之列。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列强联合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承担着相当"政治"角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真正美国式"汉学"——中国学,就从那时开始,而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之后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对其他国家

---

①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载《中华读书报》2001 年 9 月 19 日。

②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都有强烈的影响。

在西方，费正清的魅力在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以更清晰、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来表述中国。“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安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他那样大。”费正清等一批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参与过战时情报工作，在战后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而直接为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充满了实用和功利色彩，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辉。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蔑视学问，更为强调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① 这就是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心态，他们讲究功利和实用，不理会学术上的理智倾向，这与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心态、学术个性与学术传统几乎大相径庭。

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但是，汉学发展到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特点。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可以说世界各国汉学家的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

汉学（Sinology）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被尘封得太久，所以它的空白很多，浩如烟海的资源还有待于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可以收获汉学，还可以无意中发现被历史“放逐”和“遗失”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文化。编撰“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目的和宗旨，不仅是为了梳理已有的汉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追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历史状况、经验及影响，同时探究汉学的产生、成长、发展与繁荣，还要尽可能厘清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文化的作用。当然，“列国汉学史书系”还期望对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有所裨益。

---

① ［美］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比拟。严绍璗教授谈到 Sinology 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一、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二、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三、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四、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写作“列国汉学史”艰难，而出版可谓难上加难。1995 年曾经“落实”的出版经费，因故而一风吹。人间的事好像天上的云地上的风，飘忽不定没有根，铁板钉钉是没有的，因为钉子可以用“权力”拔出来，一切承诺和协议，都可以化为乌有。虽然“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生长不断受到寒风的袭击，但它终没有自毙于摇篮之中，冬天之后是春天，接着便是收获的季节。这套富有创意和价值的书系，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的发展及其比较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说到这里，“书系”编辑委员会同仁和作者，要感谢学苑出版社所给与的支持，尤其要感谢社长兼总编孟白先生和不久前病逝的总编辑助理郭强副编审，由于他们慧眼识金才使这一书系得以面世。

有人认为“汉学史中国人写不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立论”。日本人石田幹之助写了《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莫东寅写了《汉学发达史》（1949），接下来又有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1991），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1995），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2002），刘正的《图说汉学史》（2005）和李庆的《日本汉学史》（2005）相继面世。在人类的文化长廊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各种史书琳琅满目，这其中有外国人写中国的各类历史，也有中国人写外国的各类历史。历史，是往事，是记录，是选择，并有相对独立的评论和褒贬。但是，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不是最后的历史，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演进，修史很难一步到位，它需要一代代学者“积跬步”才能“至千里”，只有“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方能“风雨兴”、“蛟龙生”。学问之事非一夕之功，非得有前赴后继者敢于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才会达至光明顶峰。

开拓者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将自己的真诚劳作化为欢乐，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定会有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或是踩着自己的鼻子和头顶攀上高峰，

以鸟瞰美丽风光。21 世纪是经济的大空间，对汉学来说也是一个“大空间”。但是，要探索这个“大空间”，需要有个和谐的“太空站”，需要大家联袂共建；当然世界上需要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历史语境，共同创造彼此接近、认识、理解、尊重、沟通、借鉴与融合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学研究发展的机会。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没有最后的历史。汉学有历史，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汉学及其研究将以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放出异彩。

阎纯德

2006 年 12 月 5 日于北京半亩春

前　言

中俄两国间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历史上官方及民间的交流密切而频繁。俄罗斯汉学自18世纪始，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学者辈出，著作充栋，是国际汉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对俄罗斯汉学历史进行梳理与总结，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中俄关系，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汉学的研究。

俄罗斯汉学史经历了帝俄、苏联及当代俄罗斯三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历史阶段。18世纪，俄国"中国风"为俄国汉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而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引进西方汉学、通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培养满汉语翻译等举措成为俄国汉学创立的重要条件。早期汉学家罗索欣、列昂季耶夫等翻译满、汉文本，尝试满、汉语教学，谱写了俄罗斯汉学史的第一章。19世纪上半期，比丘林顺应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利用丰富汉籍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尽显俄罗斯汉学民族特征，俄国从此跻身汉学大国之列。卡缅斯基、列昂季耶夫斯基各有千秋的汉学探索成为比丘林学术的可贵补充。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成为欧洲第二个拥有汉语高等教育基地的国家。19世纪下半期，俄国汉学依托圣彼得堡大学、驻北京传教团、海参崴东方学院几个基地，王西里、巴拉第和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等汉学家通过自己的著述推动俄国汉学向前发展。十月革命以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确立以及中国革命的现实对苏联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阿理克顺应时代要求，在发扬帝俄汉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借鉴近代欧洲汉学的科学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上为苏联汉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大清洗运动以及卫国战争给以阿理克弟子为生力军的苏联汉学带来了严重冲击，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恢复元气。中苏蜜月时期，苏联汉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汉学研究机构得以创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这种局面很快便为中苏论战所取代，许多苏联汉学家成为苏联官方的御用文人，学术研究价值受到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当代俄罗

斯汉学重现生机，汉学家获得了较以往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研究选题和方法异彩纷呈，越来越为中国学者和国际汉学界所瞩目。

虽说笔者这几年做俄国汉学研究，却从未想到要写一本纵贯300年的俄罗斯汉学简史。承蒙阎纯德和柴剑虹两位前辈错爱，这项工作被当作任务交代下来。阎纯德老师多年来为我国国际汉学研究和扶助后学付出了许多辛劳，正是在他的操持和奔波之下，拙著才得以问世，对此，我谨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汉学在我即将出版的《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中有详细的总结，本书只从中选取了帝俄时期最重要的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加以介绍。限于篇幅，其他汉学家、研究机构、图书收藏以及蒙古学、满学、藏学、敦煌学和西夏学等内容略去未述。由于我的研究重点是帝俄时期，自觉无力在短时间内把握汉学学科分化之后规模宏大、内容复杂的苏联及当代俄罗斯汉学，只能就其历史发展脉络和最重要的学者及其成就做一概述。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赐正。

阎国栋

2006年6月18日

目　录

前　言……（1）

第一章　俄国汉学的创立……（1）
一、俄国汉学摇篮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1）
二、拜耶尔与欧洲早期汉学的引入……（6）
三、吹生俄国汉学的“中国风”……（11）
四、罗索欣与俄国汉学肇端……（18）
五、18 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列昂季耶夫……（25）

第二章　俄国汉学的崛起……（36）
一、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37）
二、汉学人才培养的出色组织者卡缅斯基……（53）
三、俄书汉译第一人列昂季耶夫斯基……（58）
四、服务中俄贸易的恰克图华文馆……（62）
五、欧洲第二所设立汉语专业的喀山大学……（64）

第三章　俄国汉学的发展……（73）
一、圣彼得堡汉学宗师王西里……（74）
二、国际汉学名家巴拉第……（90）
三、笃信孔孟的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00）
四、汉学重镇圣彼得堡大学……（107）
五、远东汉学基地海参崴东方学院……（116）

第四章　阿理克与苏联汉学的创建 …… (121)
一、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 (123)
二、中国民间文化研究 …… (131)
三、建构苏联汉学研究方法论 …… (135)
四、阿理克学派 …… (137)

第五章　苏联及当代俄罗斯汉学的繁荣 …… (140)
一、中国文学研究 …… (141)
二、中国历史研究 …… (165)
三、中国哲学宗教研究 …… (178)
四、汉语语言学研究 …… (191)

第六章　当代俄罗斯汉学研究基地 …… (204)
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 (204)
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 (207)
三、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 (209)
四、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 (211)

参考文献 …… (214)

第一章
俄国汉学的创立

18 世纪初的俄罗斯在彼得一世(Петр I)的统治下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打开了面向欧洲的窗口,教育和科学得到空前重视。与此同时,彼得也加强了对东方的经营,希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外交和贸易联系。1715 年,以修士大司祭伊腊离宛(Илларион Лежайский)为首的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到北京,为在 17 世纪 80 年代中俄雅克萨战争后被俘获到北京的俄国战俘提供宗教服务。两国于 1727 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不仅规范了双边贸易秩序,也从法律上确立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合法性。其中随团派遣世俗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语言的条款对于俄国汉学的肇端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俄国人便在北京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汉学基地。1724 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建立,大批西欧学者被俄国政府邀请到俄国工作,其中就包括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拜耶尔(Theophilus Sigfried Bayer)。他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汉学探索为俄国汉学的诞生乃至世界汉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 18 世纪俄国"中国风"的吹拂下,大批欧洲中国题材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俄国,总数超过俄国汉学家著述数倍,在中国知识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为俄国汉学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背景。1741 年 3 月 22 日,由传教团培养的俄国第一批汉学家的代表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进入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担任满汉语翻译,俄国科学汉学自此肇始。

一、俄国汉学摇篮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

由于东正教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我国史称俄罗斯馆)不仅接受圣务院的领导,而且受沙皇政府的直接控制和圣彼得

堡皇家科学院的指导，是一个兼有多重职能的机构。俄国传教团名义上只是一个宗教组织，但事实上却是俄国的驻华外交机构。在中俄关系史上，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传教团曾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俄国侵华政策的得力帮凶。同时，它也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除了收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情报之外，其成员还受命对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等文化领域进行研究。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传教团成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汉学家，如罗索欣（第二届）、列昂季耶夫（第三届）、阿加福诺夫（А. С. Агафонов）（第六届）、弗拉德金（А. Г. Владыкин）（第七届）、利波夫措夫（С. В. Липовцов）（第八届）、格里鲍夫斯基（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第八届）、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第九届）、卡缅斯基（П. И. Каменский）（第八届、第十届）、列昂季耶夫斯基（З. Ф.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第十届）、西维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第十届）、沃伊采霍夫斯基（О. П.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第十届）、克雷姆斯基（К. Г. Крымский）（第十届）、罗佐夫（Г. М. Розов）（第十一届）、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第十一届）、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第十二届）、巴拉第（П. И. Кафаров）（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五届）、杂哈劳（И. И. Захаров）（第十二届）、孔气（К. А. Скачков）（第十三届）和孟第（Д. А. Пещуров）（第十四届）、固礼（Г. П. Карпов）（第十二届、第十四届）、伊萨亚（Исайя Поликин）（第十四届、第十五届）、法剌韦昂（Флавиан Городецкий）（第十五届、第十六届）、英诺肯提乙（Иннокентий Фигуровский）（第十八届）等。其中罗索欣被誉为“俄国汉学第一人”，比丘林是公认的俄国汉学奠基人，巴拉第以其《汉俄合璧韵编》享誉欧洲汉学界，王西里缔造了俄国第一个汉学学派。他们的学术活动在促进俄国汉学发展的同时，也对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两国文化交流发挥了作用。他们的著作曾引起西方汉学界的重视，许多被译成欧洲文字。传教团培养了众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俄国汉学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喀山大学1833年建立的蒙古语教研室、1837年创立的汉语教研室以及1844年开设满语课程的教授都曾是传教团的成员。而后建立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语专业的大部分师资也渊源于此。而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传教团是俄国汉学人才的唯一培养基地，是名副其实的俄国汉学摇篮。

自17世纪开始，随着俄国哥萨克的东进和对西伯利亚的武装占领，俄国东正教势力也逐步侵入黑龙江流域。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清康熙皇帝在17世纪80年代两次出兵雅克萨，收复了失地，拔除或焚毁了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据点、教堂和修道院。清军同时俘虏了近百名俄国军士，其中有45人被押解到北京，被编到八旗军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守在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一位名叫列昂节夫（Максим Леонтьев）的东正教神父随身带来了尼古拉圣像。康熙皇帝对这些俄国俘虏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分别赐授正四品至正七品官衔，并分发给他们土地、房屋和钱粮，刑部还将一些犯人的妻女配给他们成家立业。为了照顾他们的宗教习俗，朝廷将位于东直门的一处关帝庙赐给他们做祈祷之用，北京人称其为“罗刹庙”或“北馆”，俄国人自己称为“圣索菲亚教堂”或“圣尼古拉教堂”。康熙皇帝准许由列昂节夫主持宗教活动，同时还授给他七品官衔。列昂节夫作为东正教第一位来京长驻神父，在北京居住了20多年。

清政府的这些安置措施引起了俄国东正教教会的关注。1695年，俄国东正教教会托博尔斯克教区都主教伊格纳提（Игнатий）委托来华商队给列昂节夫神父送来一份承认北京东正教堂的证书，并指示他今后向中国百姓传授基督的正教信仰，在做弥撒的时候“请求上帝饶恕他的奴仆中国皇帝陛下，祝愿他长寿、子孙繁盛，……因为这样他就能进入天国”。[①] 列昂节夫在北京的活动也引起了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1698年，他在一份有关北京东正教堂的奏折上批示道：“此事甚好，为了上帝，要小心从事，不可鲁莽，以免激怒中国官僚和在当地经营多年的耶稣会士。我们为此需要的不是博学多才，而是熟谙世故人情的神父，避免因傲慢而像在日本那样使我们的事业一败涂地。”[②] 1700年，彼得一世特谕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教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从此以后，每年来华的俄国商队都有东正教传教士随行。1712年，列昂节夫在北京去世，雅克萨战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司祭。他们上书彼得一世，要求派遣司祭来北京主持圣事。彼得一世派代表来中国，希望中国方面准许俄国派遣修士大司祭来北京接替已经去世的列昂节夫。康熙皇帝为了换取俄国同意中国使团假道俄国慰问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准允了俄国沙皇的请求。这样，1715年，第

---

①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Пекин, 1916. С. 15.

② Петров В. П. Россий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Вашингтон. 1968. С. 17.

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到北京，驻足北馆，受到了清朝政府的特别礼遇。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国政府从法律上获得了向中国派出传教团的权利。其中第五条规定："京城之俄罗斯馆，嗣后惟俄罗斯人居住。其使臣萨瓦所欲建造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现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请增遣喇嘛三人之处，著照所请。俟遣来喇嘛三人到时，亦照前来喇嘛之例，给予盘费，令住此庙内。至俄罗斯等依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毋庸禁止。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奴字话之二人，令在此处居住，给予盘费养赡。"① 根据这个条约，清朝政府于1728年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北京东江米巷兴建了一座永久性东正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即著名的俄罗斯南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随之由北馆迁入南馆。至此，俄国政府在北京建立东正教传教基地的愿望实现。

由于俄国东正教依附于国家政权的特性，传教士们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传教和发展教徒方面，而是积极收集中国的各种情报。"它执行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工作内容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实际上是沙皇手中直接掌握的工具，它完全服务于俄罗斯帝国的利益。确切地说，它相当于俄国沙皇政府派驻中国的外交使团。"②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由沙皇政府、西伯利亚总督、圣务院以及科学院共同领导，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俄国外交部。

1818年沙皇政府新指令进一步明确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使命，其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③ 从此，每届传教团在启程前，政府都会为其制定内容极其详细的指令。比如，在给第十届传教团制定的指令中不仅规定了全团的职责，而且对每个成员在中国期间的任务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指令规定领班须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学习一门语言——汉语或者满语。司祭须研究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并寻求反驳它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11页。

② 佟洵：试论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③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们的论据。教堂差役可以不学习汉语，而代之以藏语和梵文。四名学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和满语，还要根据其所接受过的教育、愿望和能力分别学习其他课程。第一个学员学习中国的医学和自然史；第二个学员学习中国的数学、文学和哲学，重点研究儒学；第三个学员学习中国的历史、地理、统计和国家法律；第四个学员收集有关中国农业、农民家庭生活状况、耕作技术以及各种工艺技术情况。四名学员同时也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莫斯科自然学家学会、圣彼得堡矿物学会和自由经济学会的通讯员。此外，传教团还须根据资金情况为俄国图书馆收集中国书籍、地图、矿物以及可以引种到俄国的农作物种子。指令还规定要将中国“最有意思”的书籍翻译成俄语，并把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辞典翻译成汉语、满语和蒙语，尽力为这些语言撰写语法。严厉禁止酗酒以及能够影响清政府对传教团态度的不体面行为发生。随团医生的职责是加强同当地居民的联系，可以为当地人种牛痘。[①] 这份指令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培养汉学家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为学员制订的详细学习计划和在学习科目上的明确分工，对学生深入学习某一汉学学科知识，集中精力从事某一课题的钻研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他成员也能够在指令的约束下学习一定的汉学知识。因此，俄国政府为第十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制定的指令，尽管其目的是为俄国各有关部门收集各种情报，但实际上促成了团内汉学研究气氛的形成，将汉学研究作为每个团员必须从事的工作。

为了使驻北京传教团更好地完成其使命，俄国政府逐步提高派出人员的素质。起初几届传教团成员大都是来自各修道院的修士或传教士学校的学生，文化素质低，没有进取心，许多人有酗酒的恶习，经常滋事，有时甚至还需理藩院协助维持秩序。自 1807 年起，开始从俄国大学或神学院选拔优秀大学生编入传教团。随着中俄交往的日益频繁，俄国对传教团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俄国政府于 1795 年在俄罗斯馆开办了图书馆，并且允许传教团私聘教师，加强对传教团成员的教育。从第十届开始，俄国政府向传教团成员提供了较以前更加优厚的待遇。医生和学员在前往中国之前都被授以官职，其官阶一般要比传教团其他成员高出一级，回国后则在原有官阶的基础上再升迁一级，同时安排相应的工作职位。学生每年可从俄国政府领到 500 卢布的薪金，加上清政府提供的 73.5 卢布，在北京的衣

①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128-129.

食可确保无虑。回国后学生可以得到500卢布恩给金,其中两名成绩突出者可获得圣弗拉基米尔或圣安娜勋章,医生则每年可以得到700卢布的恩给金。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包括学生在内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的后顾之忧。自此,俄国传教团成员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华语言的学习和汉学研究之中,对俄国民族汉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863年11月5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下令改造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传播东正教成为其工作的核心内容。从此,传教团作为俄国汉学人才培养和研究中心的地位开始下降,逐渐为圣彼得堡大学所取代。

二、拜耶尔与欧洲早期汉学的引入

在俄罗斯东方学发展史上,由彼得大帝亲手创办的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院从一开始就设立了人文科学院士席位,其中对东方学研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固然与俄国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沙皇重视东方研究的策略。早在科学院成立之前,彼得就创办了珍宝馆和陛下图书馆,收藏了大量有关东方的文物和抄本。在东方国家之中,他尤其重视对土耳其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研究,曾经派遣德国人梅塞施密特(Д. Г. Мессершмидт)考察西伯利亚,指示将其考察途中发现的抄本寄到巴黎科学院,请法国东方学家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翻译。[①] 后来,珍宝馆和陛下图书馆的藏品都并入了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使科学院成为俄国最早具备汉学研究条件的地方。18世纪20年代末,科学院印刷厂成立,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东方的著作。

在来自西方的院士中就包括德籍汉学家拜耶尔。这位享誉欧洲学术界的古代历史和文物专家,在圣彼得堡生活的岁月中又在汉学领域做出了成就,不仅为俄国汉学的创立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世界早期汉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拜耶尔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第一个院士级别的汉学家,在俄国工作了12个年头,并在那里出版了最重要的汉学论著。

---

① Рафиков А. Х. Изучение Востока в Петровскую эпоху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 Вып. 17. кн. 3. М. ,1975.

1694 年拜耶尔出生于德国柯尼斯堡的一个画家家庭，从小就表现出语言学习天赋和对神学的兴趣。1710 年，16 岁的拜耶尔进入柯尼斯堡大学学习。1713 年他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著作，由此对汉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学习汉语。与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拉克罗兹（Mathurin Veyssiè re de Lacroze）的相识，不仅使他可以就语言学问题当面求教，同时还获得了进入收藏有汉学书籍和手稿的柏林图书馆读书的机会。拜耶尔在对中国历史语言发生兴趣后，曾仔细研究了阿·米勒（Adreas Muller）、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等人的著作和手稿。他结合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于 1718 年出版了第一本汉学著作——《中国日食》。此书主要讨论的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遇难时的太阳无光、大地变黑现象是否就是中国典籍《资治通鉴纲目》中记载的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的那次日食。通过研究，拜耶尔认为耶稣遇难时的场面，与汉代发生在中国的日食在时间上并不吻合，只是由于耶稣会士们对汉语的一知半解以及牵强附会才导致了这个谬误的产生。在书的后面，拜耶尔还谈到了汉语语法，但还很不成熟，科学价值不大。①

1725 年 11 月，拜耶尔收到于 1721 年来到俄国的贝尔芬格（Georg Bernhard Bilfinger）的来信。哥德巴赫（Christian Goldbach）也于 1725 年来圣彼得堡任职，他在影响拜耶尔来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726 年 2 月，拜耶尔举家来到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相对充裕的物质生活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为拜耶尔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在继续研究古代历史的同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学习和研究东方语言，并在最后几年中将汉语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1730 年，他出版了最重要的汉学论著——《中文博览》。《中文博览》包括前言和两卷正文。前言篇幅很长，拜耶尔详细回顾和分析了欧洲汉学所走过的历程，介绍了欧洲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著作。他认为，欧洲汉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元代时期，也称使节时期，代表人物有柏朗嘉宾（Jean Plano de Carpini）、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类似《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出使蒙古记》和《马可·波罗游记》这样的书籍大多描写中国地理和见闻，还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思考和研究，所以属于欧洲汉学的序幕时期。拜耶尔将葡萄

①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3～26 页。

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企图登陆中国而不幸去世的1552年作为欧洲汉学第二个阶段的开端。①

《中文博览》第一卷讲的是中文语法和中国文学。拜耶尔继承了卫匡国(Martin Martini)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的语法研究成果,借鉴了拉丁语的语法模式,对汉语进行了词类分解。拜耶尔对中国文学所知甚少,在这一部分中,他主要介绍了中国文字的书写和印刷方式,指出中国哲学著作语言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同时还收录了《诗经》、《大学》等中国古代典籍的原文和译文。拜耶尔的《大学》"译文受到了德国学术界的肯定,读者面不大。但是,这位圣彼得堡的院士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因为正是他首先将这部作品翻译成了欧洲学者所能理解的文字。"②

在第二卷中包括了他编写的一部由44个表格构成的简单的中文拉丁文字典以及一些中文文本的选读。拜耶尔用以编写字典的材料主要来源于阳玛诺的词汇表、门泽尔的手稿以及大秦景教碑上的文字。在文选部分,他主要辑录了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写的孔子生平以及《小儿论》等文章。他还编写了中国帝王年号和官职名称表,介绍了中国的度量衡和纪年方式。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拜耶尔的中文研究有些零乱,他的这部著作不是一部纯粹的汉语语言学著作,倒更像是一本包括了当时欧洲汉学研究成果的中国文化小百科,因此,拜耶尔称之为《中文博览》也算是名副其实。他称编著《中文博览》的目的在于帮助未来的学者研究中国和汉语。③该著作出版以后,很快就销售一空,但后来随着耶稣会士新的汉语论著的不断问世以及俄国第一批汉学家从驻北京传教团学成归来,拜耶尔的著作就没有机会再版了。

在对汉字的认识方面,拜耶尔基本上坚持了阿·米勒和门泽尔的观点,认为汉字在产生时其内部结构一定存在某种规律,但由于日久天长,人们渐渐地淡忘了,现在该是重新发掘那种古老逻辑的时候了。关于汉字起源问题,他一反卫匡国等人所持的汉字来源于图画的说法,而认为汉字来源于中国古老而神秘的符号,即《易经》中那些连着和断开的线。他设想

---

① Lundbaek, Knud. T. S. Bayer(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Curzon Press, 1986, PP. 39-101.

② Фонвизин Д.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9. С. 675.

③ Пумпян Г. З., Федосеева М. В. Байер и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Готлиб Зигфрид Байер-академик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Пб., 1996.

汉字就是由这些笔画由简单到复杂，一级一级构成的。他在书中一共列举了九个属于第一级的汉字："一"表示数字1，"丨"表示上下联系，"乀"表示潮湿，"亅"表示钩子、联系，"丿"表示最初的热，"丶"表示地位至上、居统治地位，"冂"表示侧面，"乚"也表示方向相反的侧面，"乙"表示一。当拜耶尔继续努力，期望将汉字纳入自己的构想时才发现，汉字的结构远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他的学术背景影响，拜耶尔在汉语研究中试图寻找某种基督教的真理，认为汉字中蕴涵着对创世的记忆。他指出，女娲的"娲"字读音"Gua"与希伯来文中的"夏娃"一词发音相近。他进一步发挥说，"娲"字的右半边的意思是"咬"，估计与夏娃吃禁果表达了同一件事情，换言之，女娲就是夏娃。这样，"他依然陷入了那个时代欧洲东方学家传统的窠臼，总是竭力去找寻解读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个神秘的泥沼后面的规律的那个'万能钥匙'"。①

在欧洲，拜耶尔的新著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同时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1733年，法国《学者报》上刊登了《中文博览》的概要。傅尔蒙在1737年出版的《论中国》中分析了拜耶尔的汉语语法观点，认为他没有指出汉字的读音和声调。其著作尽管篇幅庞大，但对读者而言却没有什么用处。②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在其为恰克图华文馆编写的《汉文启蒙》序言中称拜耶尔"对汉语结构的理解虽然不完整，但相当正确"，而在语法方面，其《中文博览》"作为欧洲的第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无论在规则的总结上，还是在汉字的书写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足"。③ 除了学术意义之外，拜耶尔的《中文启蒙》还是欧洲第一部印刷有汉字、藏文和阿拉伯文的出版物，但当时只能刻板，还不能使用活字技术。④

完成《中文博览》之后，拜耶尔开始实施另一个宏大构想——编写一部大型的中拉词典，并付诸实施。在北京耶稣会士的帮助下，拜耶尔的词典编纂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但可惜生前未能完成。词典手稿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原稿共26卷，现在只留存下23卷，每

---

① 王海龙：汉学的悲剧：西方汉学的回顾与反思，载《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

② Пумпян Г. З. ,Федосеева М. В. Байер и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③ Бичурин Н. Я. Хань-вынь ци-мын.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чиненная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Пекин,1908. С. VIII.

④ Чугуевский Л. И. Из истории издания восточных текстов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ека//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 Вып. 11. М. ,1971.

卷在 110 ~ 376 页之间。如果这部词典当时能够出版,其价值将超过《中文博览》,成为他对俄国以及欧洲汉学做出的最大贡献。拜耶尔编写这部词典时所参考的文献主要有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的《汉语拉丁语词典》,中国辞书《海篇》、《字汇》以及阳玛诺编写的一部字典。[①] 1734 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大会曾讨论过该词典的出版问题,但限于当时的印刷水平,没有能够实现。

此外,拜耶尔利用北京寄来的材料,撰写了《论〈字汇〉》、《论〈春秋〉》等研究文章。[②] 与此同时,拜耶尔对中国的现状也非常关注,他给先后六次前往中国的郎喀(Лоренц Ланг)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中国是否迫害基督徒,中国的新年是儒略历的哪一天等,请求后者解答。这些问题和答案至今还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档案中。此外,拜耶尔的研究还涉及了蒙古学和满学问题,在他未发表的手稿中有这样一些论文,如《满洲与蒙古地理》、《论满文书写——卡尔梅克文成分》和《卡尔梅克地理》等。

同北京的耶稣会士的通信联系对拜耶尔的汉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了能与宋君荣(Antoine Gaubil)、巴多明、戴进贤(Ignace Kögler)、严嘉乐(Karel Slavicek)和徐懋德(André Pereira)等当时一流的汉学家就学术问题进行交流之外,他还可以不断得到他们赠送的中国书籍。1731 年拜耶尔委托俄国商队头领郎喀给北京的耶稣会士带去了第一封信,并向他们赠送了自己的《中文博览》。1733 年末,拜耶尔收到了戴进贤、严嘉乐和徐懋德的集体回信以及汉籍、星象图、文房四宝等物。[③] 到 1738 年拜耶尔去世,他一共给北京耶稣会士写了 14 封信,并收到回信 18 封。在这些信中,拜耶尔与耶稣会士们就汉语语言学、中国历史、天文学、地理学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内容丰富,充分反映了欧洲汉学界最关注的研究对象,代表了欧洲汉学的最高水平。拜耶尔作为第一个与北京耶稣会士通信的

---

① Пан Т. А. ,Шаталов О. 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К изданию работы В. П. Тарановича "Науч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 иезуитами, проживавшими в Пекине в XVIII век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2004. С. 56.

② 郝镇华:《汉学先驱 T. S. 巴耶尔》简介,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 年第 3 期。

③ [捷]卡雷尔·严嘉乐,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 ~ 1735)》,大象出版社,2002 年,第 121 ~ 125 页。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带动了科学院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同耶稣会士建立起通信联系。

为祝贺安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女皇登基，清政府德新使团于1732年4月抵达圣彼得堡。6月6日，使团参观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包括拜耶尔在内的许多院士都参加了接待工作，拜耶尔还用汉语与中国使团进行了交谈，将他的《中文博览》赠送给了中国客人。[①] 这是他对中国文化和汉语苦苦思索了多年之后，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中国人，听到了活生生的汉语，从中国人言谈举止和衣着装饰上体会了中华文明的魅力。他在1734年写给严嘉乐的信中说他曾经就一幅画的内容向中国使团秘书福卢（福禄）咨询。[②] 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对拜耶尔的汉学研究自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18世纪俄罗斯落后的科学教育水平之下，俄罗斯为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而引进西方的著名学者和先进的科学体制，不仅符合俄罗斯的国情，更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尽管他们受到某些俄罗斯学者的指责，但不应抹杀其对俄罗斯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拜耶尔作为当时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利用西方和北欧文献对俄罗斯历史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弥补了俄文文献的不足，为俄罗斯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在引进欧洲汉学成就的同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对汉字构造规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其著作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赢得了世界声誉。他遗留下来的汉语词典手稿已经成为研究世界汉学史和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历史的重要资料。他与北京耶稣会士的通信和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促进了俄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因此，拜耶尔应该在俄国汉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三、吹生俄国汉学的“中国风”

在18世纪的欧洲，各国相继掀起了旨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束缚的启蒙运动，中国圣贤哲学学说与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开明和理性产生了共鸣，大量富有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商品涌进了欧洲宫廷和社会，一股前所

---

① Радовский М. И. Посеще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тайскими гостями в 1732 г. //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 Вып. 2. 1961 г.

② ［捷］卡雷尔·严嘉乐著：《中国来信（1716～1735）》，第136页。

未有的“中国风”席卷而来，对西方社会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稍后，在偏远、落后的俄罗斯也掀起了一阵“中国风”，其程度并不比欧洲逊色。但与欧洲相比，俄国“中国风”在源头和表现方式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首先，欧洲“中国风”是俄国“中国风”的主要源头。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等朝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中国呈现出国富物阜的繁荣景象。丝绸、瓷器、茗茶、园林以及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戏剧小说大规模传入西方。中国瓷器上的图案被欧洲人认为是中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中国人也努力在瓷器图案的选择和绘制上迎合欧洲人的审美情趣。欧洲人为精美绝伦的中国艺术所倾倒，与中国艺术巧妙结合起来的“罗柯柯”艺术风格盛极一时。在当时的语言中还出现了一个词“chinoiserie”，专门用来形容西方艺术中追求中国风格的新气象，翻译成汉语应当是“中国情调”或“中国风格”。

西欧在惊叹中国物质文明的同时，出现了将中国社会和制度理想化的倾向，而促使这种现象产生的推动力则是耶稣会士们的著作。在他们的笔下，中国是一个“圣人的国度”，皇帝通常都是哲学家，大臣们都是学者，官员按照德能升迁。这样，一个在社会、政治和道德等方面都远胜于西方的理想社会展现在欧洲人面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失时机地将其作为同中世纪神学教条斗争的工具，期望借鉴中国的优秀思想在欧洲建立理性社会。他们从儒家典籍中找到了与启蒙运动宗旨相吻合的精神。伏尔泰(Francois Voltair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狄德罗(Denis Dederot)等人在这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8 世纪来自西欧的中国题材作品大量在俄罗斯翻译出版，成为俄国中国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些作品中的内容或者记录作者亲历见闻，或者出自欧洲文人笔下，大都文笔优美，故事生动，成为 18 世纪俄罗斯的畅销书，产生的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早期俄国汉学家的著作。18 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 120 余种，其中汉学家的著作只占约六分之一。不仅如此，汉学家的多数作品只出版过一次，印数有限。与之相比，某些欧洲作品不仅被翻译出版，而且发行数量大，有的甚至同时拥有几个译本。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 18 世纪俄国中国观的形成，还是对于俄国汉学的诞生，欧洲中国题材作品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次，中俄贸易助长了 18 世纪俄国的“中国风”形成。1727 年《恰克图条约》进一步规范了中俄贸易并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清帝国允许

俄国政府每三年派遣一个人数不超过200人的商队来北京贸易，同时在恰克图和祖鲁海图实行免税贸易制度，中俄贸易总额因而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商行、客栈如雨后春笋般在边境建立起来。恰克图也渐渐由一个人烟稀少之处变成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商埠。1730年，对俄贸易的晋商在恰克图的对面建起一座供中国商人驻足的市镇，名叫买卖城。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取消了国家对中俄贸易的垄断，允许私商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这项措施大大刺激了两国贸易的发展，为中国商品在俄国民众中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与中国同西方的贸易相比，18世纪中俄两国贸易商品的种类有很大不同。在俄国的出口商品中毛皮约占18世纪下半期俄国对华出口总额的80%，同时俄国商人在恰克图还用粗呢等商品交换中国货物。中国商人最愿意购买的商品是貂皮，每年大约需要200万到400万张。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棉布，而后是丝绸、茶叶、瓷器、糖和大黄等，但这些商品的数量远远不及棉布。棉布因为价格低廉，工艺先进，广受俄国民众的欢迎。从那时起，俄语中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даба”，是中文“大布”的译音。大布又称土布或粗布，属手工棉纺织品，是中国百姓制作服装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另外一个是“китайка”，直译为“中国货”，但它却并不指称其他物品，而只表示“中国布”的意思。从这两个同义词可以看出，在俄国人的心目中，中国货就是大布，大布就等于中国货，这充分反映了俄国民众对中国棉布的认可程度。由于丝绸价格比较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能力享用，因而只限于在俄国上层社会流行，影响面不及普通的中国土布。俄国革命思想家拉吉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写道：“富裕人每天都穿中国棉布衣服，其他人在节庆时穿。”①

1638年，俄国贵族斯塔尔科夫（Василий Старков）携带大批贵重礼物出使蒙古的阿勒坦汗，后者回赠了沙皇锦缎、毛皮等许多礼品，其中有几包“干树叶”。这是沙皇第一次品尝到中国茶的芬芳。1665年，俄国使节别里菲里耶夫（Иван Перифериев）又一次将茶叶带回俄国。1679年俄国与中国签订了进口茶叶的协议，1689年以后商人们也开始涉足这一利润丰厚的交易。但是，茶叶在17世纪的俄国很长时间都是作为“醒脑”的药物供居住在城市的贵族饮用，普通百姓难得一见，这主要是由于价格昂贵，而

① Радищев А. 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 т. М. -Л. ,1938-1952. Т. 2. С. 12.

且也不知饮用方法。随着《恰克图条约》订立后中俄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茶叶迅速成为俄国民众最喜爱的饮料。人们甚至将运送茶叶商队所走过的道路称为"茶叶之路"。中国商人将茶叶从产地先运至张家口,然后装车经过茫茫戈壁、草原来到恰克图交易,俄国商人再将茶叶运到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出售。"茶叶之路"的贸易额一度仅次于"丝绸之路",饮茶的习俗逐渐从上层贵族中间流传到民间。茶叶贸易额逐年上升,并最终在19世纪超过棉布而成为中国对俄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乾隆十五年(1750)运到恰克图贸易的茶叶有21万公斤,而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数量达到40万公斤。18世纪末,西伯利亚等地的农民"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确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用。"①

瓷器起初是作为装饰房间的艺术品传到欧洲的。早在18世纪以前,德、英等国国王和贵族不惜花费大量金钱,购置各种瓷器。"瓷器热"和"漆器热"成为18世纪欧洲"中国风"的重要内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瓷器进口量大增所刺激,另一方面则是盛行于当时欧洲的'罗柯柯'艺术风格推波助澜。"② 受法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俄国上层社会也在18世纪掀起了收集瓷器和漆器之风。由于中俄之间所进行的主要是国家垄断下的商队贸易,从中国运来的商品自然也就首先落入了皇族成员和贵族手中。俄国普通民众最初得到的瓷器乃是驼队商人用来盛装糖和大黄等物的器皿。这种罐子大量涌进俄国,而且价格便宜,渐渐成为俄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俄国政府为了在国内生产瓷器,在来华商队中安排专人学习中国制瓷技术。随着18世纪俄国逐渐掌握烧瓷技术,产品价格逐渐下降,瓷器餐具才进入普通俄国百姓家中。从中国瓷器之贵重,到俄国政府处心积虑地学习这门技术可以看出瓷器在当时的"热度"。

除棉布、茶叶、瓷器和漆器之外,中国生产的丝绸、糖、大黄同样成为俄国在18世纪大量购买的商品。中国商品充斥俄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了对中国实用艺术的向往和追求,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标准,助长了18世纪俄国的"中国风"形成。

---

① [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7页。

②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37页。

第三，这股席卷俄国宫廷和社会的“中国风”与罗曼诺夫王朝两任君王的西化倾向有直接关系。一位是彼得一世，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进行了大胆的西化改革。另一位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任期间推行“开明专制”。深受西方“中国风”影响的这两位俄国皇帝个人对中国文化的偏爱有力地促进了18世纪俄国“中国风”的形成。

为了将俄国建成可以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帝国，彼得一世于18世纪初曾去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思想、军事和科学，回国后实行欧化政策。他在荷兰时就见到过大量中国和日本的瓷器，曾参观过维也纳和哥本哈根等地的王公贵族的中国房间。彼得大帝正是在从丹麦返回俄国以后产生了要在俄国修建一处中国房间的想法。在彼得宫中，有两个按照中国风格布置的房间，一个叫“中国东厅”，另一个叫“中国西厅”。在他的授意下，画家们在彼得宫里出色地制作了具有中国风情的墙面，将收集到的各种中国物品作为陈设。在夏宫绿色办公室的玻璃柜中摆放着从中国运来的艺术品。可以说，彼得大帝一生都很钟情中国的风物。郎喀作为彼得一世的特使几次前来中国，将中国皇帝的礼物以及其他各种中国风物运回俄国帝京。这些东西后来构成了珍宝馆的主要藏品。同时，彼得通过东印度公司为莫斯科大药房从中国定制了专用的药罐，这种特殊器皿现在俄罗斯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药罐呈圆柱形，上面绘有俄罗斯帝国的标志——双头鹰。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立以后，他还为自己从中国定制了一套紫砂茶具。此外，他的近臣缅希科夫（А. Д. Меньшиков）、戈洛文（Ф. А. Головин）、沙菲罗夫（П. П. Шафиров）和阿普拉斯金（Ф. М. Апраскин）也醉心于中国文物的收集和珍藏。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中国格调”已经成为俄国艺术中的显著现象。

与彼得大帝相比，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崇尚中国文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在未登基之前就喜欢阅读法国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的著作，一度非常推崇共和制度。后来，她又对伏尔泰的思想着了迷，称后者为自己的老师。登基以后，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她宣称将实行“开明专制”，得到了伏尔泰等人的肯定和赞赏。她在与伏尔泰的通信中多次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从1764年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圣彼得堡建造博物馆，广泛收集世界各国文物，其中有许多是当时“中国风”的产物。18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同时仿建了中国剧院、中国桥以及其他亭台楼阁。除中国剧院在

一次大火后仅存残垣外，其他景物都留存至今。后人评价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文化的‘崇尚之情’不过是她标榜自己实行‘开明专制’的表演的一部分”，“把自彼得一世以来历代沙皇的‘中国嗜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① 喜欢附庸风雅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甚至用俄文创作了一部小说《费维王子的故事》，于178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书中讲述了一位中国古代贤明皇帝如何教子有方，使太子成长为仁慈高尚之人。此作虽然在结构和风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但在故事情节方面很有特色。由于是沙皇亲撰，因此在俄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1784年和1790年，《费维王子的故事》先后在德国和法国被翻译出版。

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并非盲目迷恋中国，而是始终念念不忘向东方的扩张。杰尔查文（Г. Р. Державин）曾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在没有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没有驯服中国人的傲慢，没有和印度建立起贸易关系以前，我死不瞑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扩张思想促使杰尔查文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抵达世界中心，从恒河中打捞黄金，制服中国人的傲慢，好似雪松深深扎根。”就连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也曾给沙皇写过类似带有侵略意味的颂歌：“让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都在我们的法律前俯首称臣。”② 从中可以看出，在18世纪俄国宫廷崇尚“中国风”的同时，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代表的一些人将中国视为侵略的对象。

第四，中国使团访俄将一个直观、鲜明的“中国形象”带到了俄国民众面前。无论是来自西方的中国信息，还是来自东方的中国商品，中俄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方式始终是间接地进行，这样难免在认识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偏差，而俄国商队和使团来华以及中国使团出访俄国，实现了两国人民面对面的交流。特别是清朝政府18世纪派往俄国的三个使团，在俄国的土地上展示了天朝大国的风范，使“书本上的中国”和“商品上的中国”的虚幻景象变得清晰，在俄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712年，康熙派出以殷扎纳为首的使团，慰问驻扎在俄国境内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内阁侍读图理琛作为史官同行，来去共用了三

---

① 宿丰林：18世纪俄国的“中国热”，载《黑河学刊》，1999年第2期。

② Maggs, Barbara Widenor. Russia and “Le Reve Chinois”: China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at the Taylor Institution, 1984, PP. 108-109.

年时间，行程约三万里，顺利完成使命。图理琛将所经过之地的风土民情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国后写成一部翔实生动的游记作品——《异域录》。使团虽然没有去俄国首都，所经之地大都是俄国的乡村城镇，但有俄国地方官迎来送往，“排兵列帜，鸣枪放炮，鼓吹迎接”，其声势自不待言。在深刻全面了解俄国国情的同时，使团也自觉宣传中国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将中国的历史、地理、官制、典章、物产和民族风情等信息传递给俄国人民。图理琛以其丰富的学识在这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以至于俄国官员向沙皇报告称图理琛为‘天朝使者’，‘知识高明’”。①

1729 年，由托时和满泰率领的代表团出使俄国，1731 年 1 月到达莫斯科，新女皇安娜（1730 年登基）接见了中国使团。托时乘坐女皇的车辇，使团成员另乘坐轿式马车，浩浩荡荡进入克里姆林宫，雍正皇帝赠送给俄皇的礼品装在 18 个漆木箱子里，由士兵抬着走在马车前面。俄女皇为使团举行了三次欢迎仪式，场面宏大。随后，满泰率领一部分团员由莫斯科前往慰问土尔扈特部，最后在托博尔斯克与托时部会合，于 1732 年 2 月回到恰克图。

在托时和满泰代表团还没有回到北京的时候，清朝政府又于 1731 年派出了德新使团，为的是回应俄国政府的咨文，前往祝贺新女皇安娜登基。次年使团到达圣彼得堡。俄国方面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步兵团击鼓奏乐，鸣放 31 响礼炮。女皇接见了清朝使臣，而后赐宴款待，晚上又邀请使团出席舞会并观看烟火。使团向女皇赠送了雍正皇帝的礼物，有玉石、瓷器、漆器、玻璃器皿、书房木器、首饰匣、香袋和各色锦缎等。使团还参观了声名显赫的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观看了科学家们的实验演示。据说使团成员曾对德国人当年赠送给彼得大帝的一个直径超过三米并可以自转的地球仪很感兴趣。此外，他们看到了彼得一世当年亲自用车床制造的物品。包括拜耶尔在内的许多院士都参加了接待工作，拜耶尔还尝试用汉语与中国使团进行了交谈。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向中国使团赠送了科学院的学术刊物以及拜耶尔的《中文博览》。② 科学院印刷厂专门为中国使团访问科学院印制了精美的签名纸，特别用汉字印刷“大清雍正皇帝”几个

① 李明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3 页。

② Радовский М. И. Посеще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тайскими гостями в 1732 г.

汉字，有俄、满、拉丁文对照，德新、巴延泰和福卢在上面签名致谢，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中至今保存着这份文件。[①] 使团后来又到莫斯科访问，参观了那里的若干工厂，并乘坐大车前往下新城、喀山等地，最后经托博尔斯克和恰克图回国。俄国为接待托时和德新使团支付了大量的车船食膳费用，接待规格高，声势宏大，在俄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俄国是中国使团出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18 世纪清朝政府派往俄国的三个使团，作为中俄文化交流的早期使者，经过长途跋涉，不仅深入细致地观察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将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和风俗介绍给中国人民，同时，通过与俄国各阶层人士的直接交往，特别是与俄国知识分子的接触，进一步激发了俄国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将一个直观、鲜明的“中国形象”带到了俄国民众面前。

在这一时期，许多优秀的中华文明成果传播到了俄国，在俄罗斯民众中树立起优美而高大的中国形象。俄国“中国风”是中国文化向俄国的一次大输出，是俄国汉学诞生的有利背景，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四、罗索欣与俄国汉学肇端

罗索欣是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培养的第一位汉学家，其丰富的译作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但由于大都是手稿，其成就长期未受到后人的重视，就连著名东方学家巴尔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院士在其著名的《欧洲与俄国的东方研究史》中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在著名的《布罗克豪斯—艾弗隆百科辞典》中也只记载了寥寥数笔。尽管法国汉学巨匠伯希和（Paul Pelliot）早在 1925 年就提出了应该研究罗索欣的想法，但一直到 1945 年，由苏联学者塔拉诺维奇（В. П. Таранович）撰写的《伊拉里昂·罗索欣及其汉学著作》一文才在《苏联东方学》杂志上发表，勾勒了罗索欣一生的活动情况。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以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为代表的俄国汉学史研究专家通过发掘 18 世纪的历史档案资料，基本上梳理清楚了罗索欣的汉学成就，最终确立了其在俄国汉学史上的地位。

---

① Радовский М. И. Первая веха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научных связей //Вест. АН СССР. 1959. №9.

(一)学术活动

罗索欣,1717 年出生在色楞戈斯克附近的希洛克村的一个神父家庭。1726 年进入主升天修道院附属学校读书。1728 年,修道院大司祭普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被任命为第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领班,罗索欣与其他两位同学舒利金(Г. Шульгин)和波诺马廖夫(М. А. Пономарев)由于学习出色而被指定为第二届传教团学员赴北京学习。在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至今还保存着罗索欣在北京学习时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满语和汉语学习簿"以及"1730 年"。这表明罗索欣是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年开始使用这个笔记本学习满汉语言的。笔记本实际上是一个会话手册,共有 52 篇课文、182 页,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每页竖着分成三栏,分别写着俄语、汉语和满语的对应语句。从笔迹判断,其中汉语和满语是由一个中国人代写的,很可能出自国子监的满汉助教之手。这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学员流传于世的第一本学习材料。事实上,罗索欣这个学习簿乃是舞格寿平于雍正八年(1730)出版的《满汉字清文启蒙》译本。三槐堂刊行本中有程远明题序,曰:"《清文启蒙》一书,乃吾友寿平先生著述,以课家熟者也。其所注释汉语,虽甚浅近,然开蒙循序,由浅入深,行远自迩之寓意焉。况牖迪之初,非此晓畅之文,亦难领会。诚幼学之初筏,入门之捷径也……"① 罗索欣将这段前言也翻译了出来,但斯卡奇科夫误以为这是罗索欣自己所撰,因而将文中的"吾友寿平先生"当作是罗索欣的朋友。②

1735 年,18 岁的罗索欣被清政府聘为理藩院通译,从 1738 年起为内阁俄罗斯文馆教习。他与文馆培养的优秀学生富勒赫共同致力于将斯莫特利茨基(Мелитий Смотрицкий)的《俄语语法》翻译成满语,称作《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罗索欣回国后,阿·弗拉德金和富勒赫继续翻译,终于在 18 世纪上半期为中国学生编就了第一本俄语教科书。1925 年,伯希和曾前往苏联调查那里的汉籍收藏情况,在列宁格勒发现了这部书的手稿并撰文介绍。伯希和意识到罗索欣虽名不见经传,但却是俄国汉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甚至产生了有朝一日为其立传的想法。他写道:"列宁格拉德古代

① 舞格寿平:《满汉字清文启蒙》,三槐堂刻本,雍正八年。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42.

文字博物院[①](Likhačëv[②] 旧藏)藏抄本,十四本(序一本,文十三本),题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写以满汉俄三种文字。前有 Fulohe 序,此人就是译此俄语文法的人,可以说是汉译第一部俄语文法本。他同拉里婉(Hilarion, Larion Rossokhin)[③]译前十本,同阿列克写(Alekséĭ)译后三本。Rossokhin 未尝以东方学者名,我拟有一日为作一传。他出生于西伯利亚,在一七四〇年左右离北京,而在一七六一年殁于圣彼得堡。阿列克写就是 Alekséĭ Leont'evi č Leont'ev 曾在一七四二年赴北京,留居约十年左右。如此看来,Fulohe 译俄语文法为满汉文时,应在一七三五年至一七四五年间。"[④] 1963 年,苏联学者撰文介绍了这部教材的手稿。[⑤] 作为中国俄语教学历史上的第一部教科书,此书对于研究中国俄语教学与研究史以及中俄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罗索欣北京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几部译作。《1730 年京报摘抄》记录了当年发生在中国的两次日食,9 月 19 日的北京大地震,以及黄河决堤泛滥等消息。《1735 年中国钱粮交纳情况》记录了中国的地皮税和人头税等情况。在北京期间,罗索欣得到了一份《皇舆图》,将所有的地理名称用俄语标出,1737 年由郎喀带回俄国并呈献给沙皇,罗索欣为此获得了准尉军衔,年俸从 130 卢布提高到 150 卢布。有学者认为这是罗索欣的"第一部学术著作"。[⑥] 当罗索欣 1740 年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满语和汉语,对中国文化及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获得了一大批珍贵的中国图书。

1741 年,24 岁的罗索欣返回俄国,被外务院派往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担任通译,并负责汉语和满语的教学工作。这一年的 3 月 22 日,是俄国汉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罗索欣在这一天正式成

---

① 即列宁格勒古代文献博物院——笔者注。

② 利哈乔夫,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古代文献博物院创办者兼馆长——笔者注。

③ 即罗索欣——笔者注。

④ [法]伯希和:俄国收藏之若干汉籍写本,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六编,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189 ~ 190 页。

⑤ Волкова М. П. Первый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ащихся//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Н СССР. Т. 61. М. ,1963.

⑥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 1997. С. 77.

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一名成员，开始了他的汉满语教学和翻译生涯。一直到1761年逝世，罗索欣再没有离开过科学院，把毕生都献给了汉学事业。

自从罗索欣进入科学院的那一天起，翻译就成为他生命的主要旋律。1747年，罗索欣根据中国的各种历史典籍，编译完成了一部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国历史》，书后有中国度量衡表、中国古代都城、中国各省名称及蒙古地区行政区划等附录。罗索欣曾要求将其出版，但没有成功。1748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历史学家格·米勒（Г. Ф. Миллер）提议罗索欣从法文翻译杜赫德（J. B.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然后再进行详细的注释。罗索欣完成了格·米勒交派的任务，但手稿又被存入了科学院的图书馆。该书只有有关中国丝绸织造一章于1757年刊登在《学术趣谈月刊》，其中关于中国帝王谥号的注释为罗索欣所为。

1750年罗索欣完成了从1745年就开始翻译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由温达等撰，记事自康熙十六年（1677）六月至三十七年（1698）十月，记述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始末。罗索欣为这部著作的翻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提交译稿时所写的报告中他对作品的性质进行了评价，指出其中汇集了中国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折和各种法令等重要史料，有很大的出版价值。尽管如此，罗索欣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列昂季耶夫在翻译《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俄译本名为《1677到1689年中国人与准噶尔人战争报道》）时参考了罗索欣的遗稿。苏联学者沙斯基娜（Н. П. Шастина）在研究了这部手稿后认为罗索欣的译文质量非常高。[①] 苏联突厥史学家兹拉特金（И. Я. Златкин）在撰写其《准噶尔汗国史》时使用了罗索欣的译文。

早在北京时期，罗索欣就开始翻译《元史》，但他很快意识到，翻译纪传体的断代史尽管有益，但卷帙浩繁，颇耗时日，因而决定翻译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最后在1756年完成。现在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2900页的译稿是这部重要中国历史著作的第一个

① Шастина Н. П. Перевод И. Россохи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 по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ов конца XVII в.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и ИВ. 1953. Т. 6.

欧洲语言译本。[1] 但这部译作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被放入科学院图书馆的档案中。斯卡奇科夫写道："《资治通鉴纲目》译作中叙述的历史虽然截止到1225年，但如果能及时出版，一定能促进我国汉学的发展。因为冯秉正译自汉语的法译本直到1777年至1785年间才在巴黎出版。"[2] 从罗索欣开始，《资治通鉴纲目》成为俄国传教团学习中国历史的首选书籍，后来比丘林和卡缅斯基都曾翻译过此书。

从1750年开始，罗索欣在翻译书目的选择上接受格·米勒的指导。格·米勒对罗索欣的学识和勤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自己有关西伯利亚的著作中大量使用罗索欣的译作。1764年，即罗索欣去世三年后，格·米勒在《学术月刊》上连载了罗索欣生前完成的译自满文图理琛《异域录》的《1714年前往伏尔加地区晋见卡尔梅克汗阿玉奇的中国使团旅俄记》。格·米勒作为罗索欣的学术指导肯定了他的功绩，但却没有为出版他的其他著作尽力。因为当时在科学院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科学家始终把罗索欣当作是提供资料的翻译，在自己著作中大量使用他的手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枢密院于1756年责令罗索欣将《八旗通志》译成俄语。遗憾的是，1761年罗索欣不幸去世，生前只翻译了第1、2、3、6、7卷。其余各卷由列昂季耶夫译出。第17卷是译者注释，是全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也是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对中国历史、地理、民族的研究成果。此卷共323页，其中256页出自罗索欣之笔。罗索欣的注释极其详细，至今不失科学价值。《八旗通志》俄译本是罗索欣同列昂季耶夫共同努力的结晶，同时成为两人规模最大的一部译作。在翻译《八旗通志》的过程中，时任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长的罗蒙诺索夫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人在他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由他签名的送呈枢密院的报告，其中详述了科学院对翻译《八旗通志》的意见。

从罗索欣流传于世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兴趣相当广泛，中国的一切都是他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据斯卡奇科夫和塔拉诺维奇研究，罗索欣留给后世的译稿包括《名贤集》、《三字经》、《简明赋役全书》、《亲征平定朔

---

① Maggs, Barbara Widenor. Russia and "Le Reve Chinois": China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P. 118.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50.

漠方略》、《乾隆帝即位诏书》、《清文启蒙》、《小儿论》、《二十四孝》、《时宪历》、《薛清文公要语》、《两小儿辩日》、《译自〈一统志〉的日本简史》以及待考原典的《中国花炮制作法》[①]、《中国帝王年表》、《历代年表》、《清朝皇帝、军队及京城情况》、《哲学问答》和《教学用课本、对话及词汇》等。[②]

罗索欣一生翻译汉语和满语著作30多种，生前和身后一共发表仅5种。[③] 他为俄国汉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其生活一直很窘迫，经常入不敷出，有时不得不出售自己的藏书。他在回到圣彼得堡后不久就向科学院出售了自己从中国带回的书籍，共计52本，科学院的中国图书数量由此增加了许多。罗索欣为这批书编写了原文和俄文的书目。从这批书的清单中可以体会出罗索欣的治学兴趣。第一类是语言文学书籍，有辞书、文法、谚语、民歌以及文学作品。第二类是历史、地理书籍和游记，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三类是自然科学书籍，主要为医书。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书中包括《御制天下一统志》、《大清律例》、《金瓶梅》和《水浒传》。[④] 1761年，罗索欣在久病之后去世，其遗孀将丈夫留下的55本汉、满文书籍和两幅中国地图（一幅用汉语标注地名，另一幅为满语）卖给科学院，以解生活急用。这批书包括哲学、天文学以及实用科学，还有一本他翻译的中国象棋竞技手册。这些图书进一步充实了科学院图书馆的汉学藏书，为俄国汉学的建立奠定了文献基础。

（二）教学活动

1741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满汉语班成立，罗索欣成为第一个讲授满汉语的俄国人。关于这个班的活动情况，没有直接的记载保留下来，罗索欣当时为各种事情向上司提交的报告成为重要的研究素材。1741年8月，从圣彼得堡卫戍学校选拔的四名学生来到科学院，开始跟随罗索欣学

---

① 1961年斯塔利科夫（1919～1987）撰专文介绍了罗索欣的这部手稿。参见 Стариков В. С. Ларион Россохин и начало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ротехники в России//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 Вып. 2. М. ,1961.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47-48. Таранович В. П. И. -Россохин и его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ю//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45. Т. 3.

③ Таранович В. П. И. Россохин и его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ю.

④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С. 85.

习汉语和满语。这四名学生是:沃尔科夫(Яков Волков)、萨维尔耶夫(Леонтий Савельев)、切克马列夫(Степан Чекмарев)和科列林(Семен Корелин)。[①] 在教学方法上,罗索欣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先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他在教学中使用了亲自翻译的《三字经》和《千字文》俄文手稿,帮助学生理解汉语原文。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汉语语音,他编写了一本《用俄文字母标注的汉语发音》,创造了俄国第一个汉俄译音方案。尽管后人指出罗索欣的汉俄译音方案不标准,掺杂了满语的发音,但作为俄国第一个汉语标音方案,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②]

从罗索欣给上司写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比较满意。沃尔科夫还翻译了四书,手稿保存至今。他因此成为四书的第一个俄译者。显然,沃尔科夫不大可能独立翻译这样艰深的古汉语文献,一定受到了罗索欣的直接指导。罗索欣希望把这几个学生派到中国去继续学习,巩固和扩大汉学知识。但遗憾的是,1755 年派往中国的第五届传教团学员名单中并没有罗索欣的学生。在以后的俄国汉学史上也再没有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很可能没有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只好另就他职了。罗索欣领导的满汉语班从 1741 年建立,到 1751 年关闭,存在了十年的时间,培养了四名学生。俄国第一次在本土依靠自己的教师培养了自己的汉学人才。

俄罗斯汉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罗索欣在俄国汉学史上的地位,对他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苏联汉学家斯特列尼娜(A. B. Стренина)评价道:"18 世纪俄国科学的所有领域都获得了发展。而当谈到世界东方学的最初发展时,一般都会提起一批西欧的学者,他们将中国形诸笔墨,翻译了中国的典籍。大家公认比丘林的著作是俄国东方学的奠基之作。但是,世人特别不应当忘记两位东方学巨匠——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他们是汉语大家,将毕生都献给了汉学研究"。"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创作了许多惊世作品,为俄国东方学做出了巨大贡献。"[③] 拉多夫斯基(M. И. Радовс-

---

① Куликова А. М.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актах(конец XVII в. - 1917г.). СПб. ,1994. С. 16.

② Дацышен В. Г.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расноярск,2002. С. 20.

③ Стренина А. В. У истоков русского и миров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50. № 1.

кий)认为“罗索欣是俄国汉学的先锋,是俄国第一个汉学家。他在圣彼得堡科学院20年的工作以及在此之前的活动使他无愧于这一评价”。[①] 罗索欣创造了俄国汉学史上的许多第一:他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第一个满汉语通译,第一个从事了大规模的中国典籍翻译,第一个从事满汉语教学的俄国人,第一次编写了满汉语教材,同时也是第一个以汉学为终身职业的俄国人。自罗索欣开始,俄国汉学告别了使节报告时期,进入了一个科学的发展阶段。

五、18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列昂季耶夫

列昂季耶夫1716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征兵办公厅书吏家庭,先在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校学习,后入舒哥(Чжоу Ге)开办的满汉语班,1741年到外务院工作。1742年自愿参加第三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北京时期,他取代回国的罗索欣担任清朝理藩院的通译,并在俄罗斯文馆教授俄语。1755年随同俄第四届传教团回国,次年被任命为外务院翻译。与罗索欣不同的是,列昂季耶夫的20多种译作和著作有幸出版。18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120余种,他的作品即占其中六分之一,许多是欧洲的第一译本,并有详尽注释。[②] 此外,他身后留有大量手稿,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政策、制度和哲学等。

(一)儒家典籍翻译

由于18世纪俄国在文化思想上深受法国的影响,加之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与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保持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因此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崇尚中国文化的倾向对俄国一部分上层人士产生了感染作用,俄国读者开始对中国孔子以及其他哲学家们的思想发生兴趣,从西方传教士著作中编译的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文章和书籍在俄国传播开来。俄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尼·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强烈反对

---

① Радовский М. И.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И. К. Россохин//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 Вып 2. 1961.

② 列昂季耶夫著述目录参见 Лебедева Е. П. К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трудов китаеведа А. Л. Леонтьева(1716-1786) //XVII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Ч. 3. М., 1987.

俄国的农奴制度，抨击统治阶层的贪污腐败和落后保守，在其出版的讽刺杂志《雄蜂》和《饶舌者》上发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章。为避开官方的审查，尼·诺维科夫采取各种巧妙的手法影射当局甚至沙皇，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刊载译自国外的"赞颂"皇权的文章。列昂季耶夫、阿加福诺夫和弗拉德金等俄国早期汉学家在俄国社会思想的熏染下，翻译和发表了不少宣扬儒家思想的作品，自主或不自主地成为俄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同道"。其中，列昂季耶夫是俄国第一个大量翻译中国古代思想典籍的汉学家。

列昂季耶夫首次将《易经》摘译为俄文。在中国与西欧文化交流史上，《易经》曾经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flm von Leibnis）与久居中国的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建立了书信往来，并从后者介绍的《易经》八卦排列方式中获得了灵感，发明了如今应用于计算机科学的二进制。1722 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宋君荣也对《周易》做了深入研究，将之译成法文，并于 1750 年出版。列昂季耶夫与法国汉学家宋君荣曾在圣彼得堡见过面。在宋的建议下，他第一个用俄语摘译了《易经》，文章名为《中国书〈易经〉中的阴阳》。1782 年，他将译文作为《大清会典》附录出版。列昂季耶夫对《易经》的评价非常高。他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本书非常重要，位列所有古代典籍之首。中国人将这部书奉为世界上一切科学的基础。学者们非常盼望能够看到这部书的欧洲文字译本。为了能对学者们有所裨益，我斗胆将此书翻译成俄文，但是，由于能力所限，我只翻译了开始的部分，而后面的部分包含着大量线条和术语，所以无能为力。""……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二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阴阳是万物产生和完善的根源"。[①]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 18 世纪就能对《易经》有如此准确的理解，不能不让人信服他的满汉语水平。在俄罗斯，《易经》全文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由楚紫气（Ю. К. Щуцкий）翻译成俄文出版。

列昂季耶夫还是《大学》和《中庸》的第一个从满汉语直接翻译的俄译者，并作了详细的注释。列昂季耶夫从《四书解义》中翻译了这两部儒家经典，同时还翻译了康熙御批。《大学》俄译本发表于 1780 年，名为《四书解义译注》，《中庸》俄译本出版于 1784 年，均由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

①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М. ,1990. С. 85.

刷。在列昂季耶夫《大学》译本问世的前一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刚刚出版了俄国剧作家冯维辛（Д. И. Фонвизин）译自韩国英（Pierre Marti Cibot）法文译本的版本，但列昂季耶夫认为自己的译本质量更好，呼吁有兴趣的读者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大学》中蕴涵的思想同18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共鸣。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希望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从而在俄国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列昂季耶夫翻译的另一部儒家典籍《中庸》中的某些内容与俄国沙皇极力标榜的开明君主专制统治思想有一定相通之处。对于俄国汉学史而言，列昂季耶夫功绩在于他第一个全文翻译了《大学》和《中庸》。尽管列昂季耶夫的译文现在看来有些陈旧，一些用语也未必准确，但他向俄国民众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却是值得敬佩的。在他的汉学译著中，"《大学》和《中庸》这些儒家经典的翻译无疑是列昂季耶夫翻译活动的巅峰之作。"① 他的儒家经典译本激发了部分俄国学人对中国哲学的兴趣。

1770年，他在《雄蜂》杂志发表了他摘译的满文本《名臣奏议》中的《上英宗应诏论水灾》。列昂季耶夫将这篇奏折的名称译为《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这篇奏折实际上是北宋时期理学家程颐于1065年代父程珦而作，原文近5000字，列昂季耶夫仅节译了后半部分，从"臣所以为尤先者有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开始。程颐有关"立志"的论述是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政策夭折的讽刺，同时也是对她在制定新法典方面"始锐而不克其终"的谴责。为了使读者更好地明白列昂季耶夫译作的寓意，尼·诺维科夫特意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看似颂扬女皇，实则是一种极其辛辣的讽刺："由于我们伟大女皇的圣明治理、她对臣民的关怀备至和不倦的辛劳，由于她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提倡科学艺术，更由于她知人善任、执法如山，她的恩情真如江河经地、无所不在。总之，由于她所有的不朽业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这位中国哲学家活到现在的话，他就不必写这篇劝告给皇上，他只要劝告皇帝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后尘就可以进入永恒之宫了。"②

---

①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 86.

② 宋昌中：诺维科夫与程颐和雍正的两篇俄文译文，载《国外文学》，1985年第1期。

列昂季耶夫另外一篇译作名为《雍正传子遗诏》,1770 年发表在《饶舌者》杂志上。公元 1735 年 8 月 23 日,雍正驾崩,其子弘历于当日根据遗诏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改年号为乾隆,这就是历史上的乾隆皇帝。《雍正遗诏》是雍正皇帝的遗嘱,文中将雍正皇帝治理下的中国描写成理想世界。在这里皇帝"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而"宝亲王皇四子御名,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① 许多学者以为,列昂季耶夫选择翻译并发表此文旨在奉劝叶卡捷琳娜二世应将皇位禅让给已经年满 16 岁的保罗一世(Павел I)。苏联汉学家费什曼(О. Л. Фишман)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尼·诺维科夫刊登列昂季耶夫这篇译文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宠臣和谄媚者进行隐蔽的批评,二是向读者介绍雍正这位创造了理想国度的中国皇帝。她指出,《雄蜂》和《饶舌者》很快被勒令停刊也与列昂季耶夫无关。② 斯卡奇科夫也持此观点,原因是《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和《雍正传子遗诏》两译文 1772 年又通过了俄国政府的书报检查,被列昂季耶夫收入了《中国思想》一书,并且再版了两次。③ 此外,列昂季耶夫非但丝毫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反而后来又受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命翻译《大清会典》。由于尼·诺维科夫不断在自己所办的杂志上利用早期汉学家的译作讽喻时事,矛头直指叶卡捷琳娜二世,《雄蜂》和《饶舌者》很快就被勒令停刊了。

《德沛是汉人》一书出版于 1771 年。长期以来,中俄学术界始终无法确定这部译著的汉籍原典和作者。俄罗斯汉学界认为这是列昂季耶夫根据一位中国注疏家对儒家典籍的阐释翻译编纂而成,主要内容源自《孟子》。这部译作在选材上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要想读懂《德沛是汉人》,必须要对儒家哲学的基本思想有大致的了解。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卡缅斯基档案中存有一册《德沛是汉人》,在书的末尾处有卡缅斯基亲手写的评语:"此书难以理解之原因有三:其一,原作科学性值得怀疑;其二,过于言简意赅;其三,不像是哲学著作,因而那里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集部/别集类/清代/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四。

② Фишман О. Л. Китай в Европе: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XIII-XVIII вв.). СПб., 2003. С. 375.

③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73.

(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图书馆——笔者注)没有收藏。"① 可以看出,卡缅斯基认为列昂季耶夫错误地选择了原著,没有充分考虑到俄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事实上此书所依原典为《实践录》,作者是清代著名满族理学家德沛。德沛,清宗室,字济斋。列昂季耶夫选择翻译《实践录》最主要的原因显然是这部著作本身是宣扬儒家义理的重要著作,同时,由于德沛是清宗室当中有名的基督徒,有可能与曾在俄罗斯文馆担任教习的列昂季耶夫相识。因为此书通篇引经据典,义理深奥,即使是中国人也不易理解,将之翻译为俄文更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汉学知识。对于这一点,列昂季耶夫也有充分的估计,他在译者序中写道:"我所翻译的这部书中蕴涵了睿智的思想,只有优秀的哲学家才能够翻译明白,而非像我这样不懂哲学术语的普通人。因此,在我的翻译中有不少生硬晦涩、语焉不详之处。我译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你们介绍中国人,介绍中国的学者如何阐释书中所讨论的问题。"② 除附录《风云雷雨说》外,列昂季耶夫几乎全文翻译了《实践录》一书。在翻译风格上,列昂季耶夫采取了逐句直译的方法,并按照原文思想层次重新排列段落。列昂季耶夫将原书名《实践录》翻译成《德沛是汉人》容易使读者误认为是一个中国人的传记,无疑增加了作品的理解难度。

列昂季耶夫于1772年出版了《中国思想》。这本书问世后广受欢迎,1775年和1786年又出版了两次。1775年的版本与1772年相同。这本书中包含了清朝皇帝和历代大臣的治国专论。引人注目的是,列昂季耶夫对雍正的治国思想非常重视,这从《中国思想》的内容编排上得到印证。1786年版《中国思想》一共收录译文28篇,其中从《上谕八旗》、《大义觉迷录》等作品中翻译雍正言论八篇,其余选自《古文渊鉴》、《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汉书》和《名臣奏议》等。列昂季耶夫将此前出版的《格言》和《德沛是汉人》收入了《中国思想》,并分别改名为《中国文人格言》及《汉人本性的大臣德沛》,使此书成为中国皇帝和大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言论总集。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所翻译的中国著作,包括一位中国皇帝的道德训诫和许多中国文人就各种问题阐发的建议和论断,讨论对百姓和

①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 87.

② К любопытному читателю. Депей китаец. Перев. с кит. на росс. яз. А. Леонтиевым. СПб. ,1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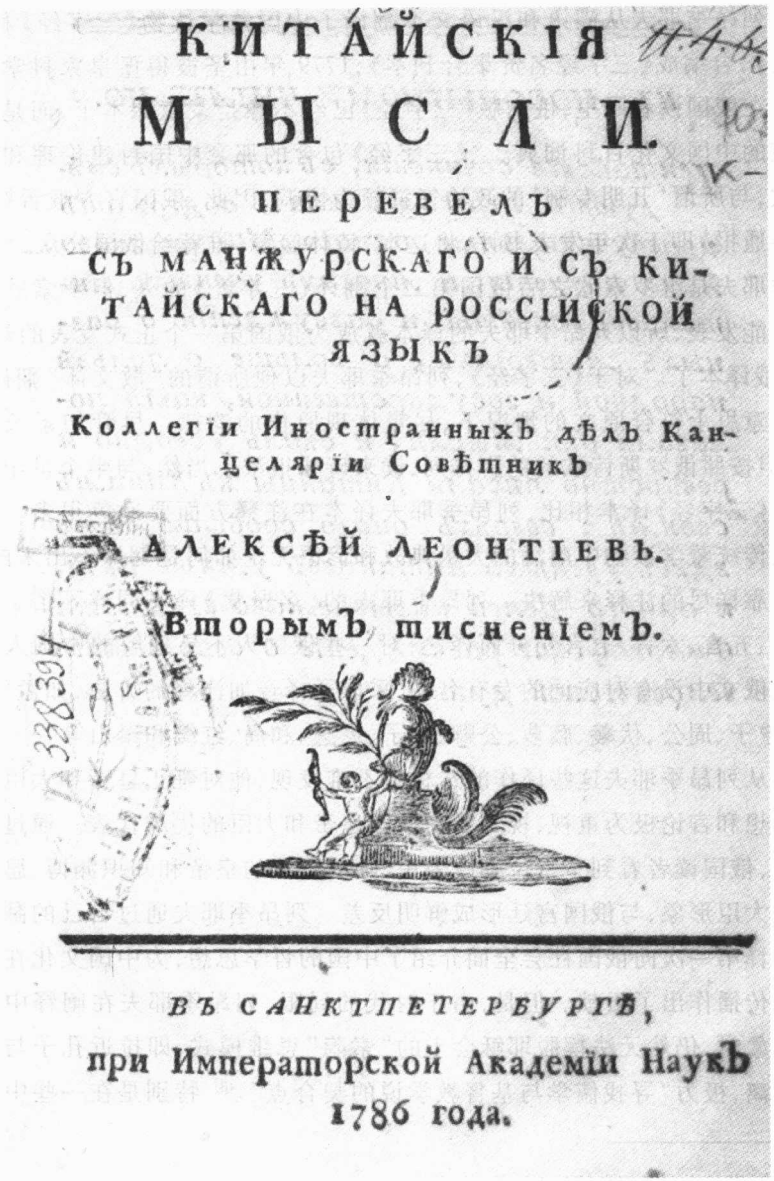
国家的益处。……此外,我还将介绍中国文人的格言警句,以及一位名叫德沛的大官的关于灵魂不灭的哲学思想。"① 列昂季耶夫还将《孙子》的部分译文收入其中,标题译为《一位中国先生关于战争的论述》,是为《孙子兵法》的首次俄译,与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 J. M. Amiot)的译文同一年问世,因而与后者一同成为世界上最早将《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的人。他显然不只对孙子的兵书感兴趣,因为他同时还翻译了晁错的《言兵事书》,俄译名为《太子家令晁错向皇帝言兵事》。

列昂季耶夫还将《上英宗应诏论水灾》和《雍正遗诏》译文收录到《中国思想》中。但前后两个版本的译文间存在很大差别。1770 年刊登在《雄蜂》杂志上的《上英宗应诏论水灾》译文标题为《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而在《中国思想》中是《程子治国论断》。《雍正遗诏》在《饶舌者》杂志上的标题为《雍正传子遗诏》,而在《中国思想》中则为《雍正给大臣们的遗嘱》。此外,《中国思想》中的译文简洁凝练,应是从文言直译而来,有时不免影响读者透彻理解文本思想,而在《雄蜂》和《饶舌者》杂志中的译文行文流畅,阐述明晰,似编译而来,更适合大众阅读口味。因此,有苏联学者认为是尼·诺维科夫修改了列昂季耶夫的译文,将原来显得有些生硬的奏折文体代之以生动活泼的报刊文风,甚至在需要的地方增加了许多文字,有时甚至增加一些段落。② 《中国思想》同时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1778 年和 1807 年分别在德国的魏玛和德雷斯顿出版了德文和法文译本。列昂季耶夫内容丰富的译文,至今仍是俄罗斯汉学家们研究和学习的参考资料。

1778 年,列昂季耶夫出版了他翻译的《圣谕广训》。《圣谕广训》是雍正对康熙十六条圣谕的阐述和发挥。从吃饭穿衣的小事,到统兵治国的大计,雍正把一个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圣贤皇帝的人生和治国经验全部囊括其中,欲为后人提供宝贵的统治指南。雍正皇帝将此书颁发天下学宫,使其成为入学士子必读的功课。由于社会影响大,《圣谕广训》从刊行之日起就受到欧洲人的青睐。现在知道的有苏格兰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817 年在伦敦出版的译本。此外,还有伯多禄(Pedro Nolasco da Silva)的

① К любопытному читателю. Китайские мысли. Перев. с манж. на росс. яз. А. Леонтьев. СПб. ,1786.

② Фишман О. Л. Китай в Европе: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XIII-XVIII вв.). С. 374.


КИТАЙСКІЯ
МЫСЛИ.
ПЕРЕВЕЛЪ
СЪ МАНЖУРСКАГО И СЪ КИТАЙСКАГО НА РОССІЙСКОЙ ЯЗЫКЪ
Коллегі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ъ дѣлъ Канцеляріи Совѣтникъ
АЛЕКСѢЙ ЛЕОНТІЕВЪ.
Вторымъ тисненіемъ.
ВЪ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Ѣ,
пр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іи Наукъ
1786 года.

列昂季耶夫《中国思想》1786 年版

葡译本，1996 年由澳门基金会出版。这样看来，列昂季耶夫的《圣谕广训》是出版最早的欧洲语言译本。列昂季耶夫将此书译为俄文，有助于全面地向俄国人介绍了中国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治国经验。

列昂季耶夫从满语和汉语文本翻译了中国蒙学读物《三字经》和《名贤集》,合编成《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1779 年由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在俄国读者眼里,俄文版《三字经》已经不像是蒙童课本了,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百科词典。"《三字经》包含的那套中国封建伦理和道德说教,与所谓'开明专制'的政治气氛颇为协调,因此,俄国官方喉舌《圣彼得堡通报》即于次年发表书评,将这本'诗体箴言'推荐给俄国公众。"① 列昂季耶夫是继罗索欣之后俄国第二个翻译《三字经》的人,但罗索欣的译文未能发表,所以列昂季耶夫的译本就成为俄国第一个正式发表的《三字经》俄译本了。对于《三字经》,列昂季耶夫以他所谓的"散文体"翻译,力求在意思上符合原文的情况下,尽量体现原作的韵律。尽管句子长短不一,但按照俄罗斯诗歌的韵脚排列,读来诗味很浓。当然,与半个世纪后比丘林《三字经》译本相比,列昂季耶夫译本在注释方面要逊色很多。这部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中蕴涵的大量典故和谚语无论如何是翻译不出来的,必须依靠详尽的注释来解决。列昂季耶夫的《名贤集》译文同样不俗。他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句分而译之,对一些俄国人不易理解的中国人名及其他俄文中没有对应词的专有名词,采取了译音加注释的方法,如孟子、四书、曾子、周公、伏羲、藤萝、公卿、夫子、灵芝、和尚、红缨和泰山等。②

从列昂季耶夫这些译作的选材上不难发现,他对雍正皇帝和大臣德沛的思想和言论极为重视,视二者为中国皇帝和大臣的优秀代表。通过他的译文,俄国读者看到了一位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皇帝和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大臣形象,与俄国宫廷形成鲜明反差。列昂季耶夫通过自己的翻译以及注释第一次向俄国社会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列昂季耶夫在阐释中国文化现象时,仍然无法摆脱耶稣会士的"索隐"思维模式,即拉近孔子与上帝的距离,极力"寻找儒学与基督教学说的契合点"。③ 特别是在一些中国哲

①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 92 页。

② Букварь китайской состоящей из дву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жек, служит у китайцев для начальнаго обучения малолетных детей основанием. Писан на стихах, и содержит в себе много китайских пословиц. Перевел с китайскаго и манжурскаго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язык прозою надворный советник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иев. СПб. ,1779. С. 5-49.

③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Гл. ред.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 1994. С. 166.

学术语的翻译上借用了基督教的概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的准确性。但对于生活在18世纪的列昂季耶夫来说，要解决至今尚未找到完备答案的中国文化词汇外译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他一方面想准确地传达原文，同时又希望自己所翻译的深奥的中国哲学著作能为读者所理解，这或许就是他总在每一部译作的“译者序”中特别要表达“无奈”的原因所在。

（二）大清律法翻译

18世纪的俄国社会一方面崇尚中国的传统思想，同时也对中国国家管理制度抱有浓厚兴趣。俄国政府特别希望了解中国的法律，以期对完善俄国的君主统治有所裨益。列昂季耶夫受政府之命，翻译了两部中国律法。

第一部是《大清律》。《大清律》即《大清律例》，是清朝具有代表性的法典。1778～1779年间，列昂季耶夫出版了译自满文的两卷集《大清律》节译本，引起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重视。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翻译出版《大清律》，因为曾经随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来华的英国人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的《大清律例》英译本《大清律例：中国刑法典的基本法律和部分补充法规》直到1810年才在伦敦出版。1924年布莱斯（Gui Boulais）在上海出版了更为完整的法文译本。

第二部是《大清会典》。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大清律》节译本并不满足，命令列昂季耶夫全文翻译《大清会典》。《大清会典》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又名《清会典》。1781～1783年，列昂季耶夫译自满文康熙朝《大清会典》的译本由俄国政府出资印刷，成为俄国汉学史上的一部汉学翻译力作，对于俄国的清代法律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耶稣会士们更多关注中国哲学思想的同时，俄国的汉学家在欧洲率先大量翻译中国的律法，而且多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这种情况说明俄国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从一开始就更多地考虑实际利益。正如玛格斯（Barbara Widenor Maggs）所言：“根据高迪爱的《西人论中国书目》，18世纪西欧谈到中国法律体制的只有1783年问世的《百科全书》中的‘法理’那一部分，另外钱德明所著《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谈到了中国的医学制度著作和法律文献。而在俄国，通过列昂季耶夫翻译《大清律》和《大清会典》，中华帝国的许多法律制度得以为俄罗斯民

众所了解，而且，这种翻译活动还得到了俄国政府的支持。"①

（三）中国史地著作翻译

与罗索欣合作完成翻译的《八旗通志》是列昂季耶夫最著名的史学译著之一，也是18世纪俄国汉学最杰出的成就。尽管俄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并计划在完成翻译后立刻付印，但其出版仍然颇费周折。1762年，列昂季耶夫完成了《八旗通志》的翻译工作。《八旗通志》的出版工作持续了23年，直到1784年才出版了最后两卷。

《大清一统志简编》是列昂季耶夫的又一部译著，出版于1778年，内容来自《大清一统志》。列昂季耶夫避冗就简，将有关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和经济信息翻译出来并汇集成书。他就书中有关东正教堂的记载做了这样的说明："一处在俄罗斯馆，俄国来人在那里落脚并居住，另一处在俄人街区，那里居住着阿尔巴津人的后裔。阿尔巴津人是被中国人俘虏到北京的，1689年戈洛文使节将他们留在了中国。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兵营，被称之为俄罗斯佐领，即俄罗斯兵营，现在依然被这样称呼。那里的教堂位于官地之上，同时收取地租。"② 这些信息无疑对中俄关系史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列昂季耶夫也对图理琛的《异域录》产生了兴趣。继罗索欣之后，他再次将其翻译成俄文，冠名曰《中国使臣出使卡尔梅克阿玉奇汗（附对俄国领土与风俗的描述）》，于178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单行本。但是，这部译稿或许不太成功，被加恩（Cahen Gaston）认为"毫无科学价值"，原因是译者"将一些地理资料按系统排列，将一些谈话改成人物对话，数字往往弄错，困难的段落漏而不译，而且没有全译本所具有的序言和跋。"③ 这说明列昂季耶夫的编译方式没有得到后世某些学者的认可。

列昂季耶夫是俄国18世纪最出色的汉学家和满学家，是俄国汉学的先驱。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得以出版，一部分作品还不断再版，甚至被译成了欧洲文字，反映了俄国以及欧洲对中国兴趣的升温。俄罗斯汉学史专家

---

① Maggs, Barbara Widenor. Russia and "Le Reve Chinois": China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PP. 136-137.

②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 89.

③ ［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4页。

都给予列昂季耶夫很高的评价。斯卡奇科夫认为“列昂季耶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18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①] 库利科娃(А. М. Куликова)和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写道,“列昂季耶夫的著作为18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精神生活做出重要贡献”[②],并认为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汉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①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76.

②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 90.

第二章
俄国汉学的崛起

经过18世纪俄国早期满汉学家的开拓，俄国在满汉经典翻译以及满汉语学习和教学上积累了一定经验，为实现19世纪上半期俄国汉学的崛起在学术上进行了准备。被誉为“自由思想僧侣”的比丘林不仅是这一时期俄国汉学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是这门学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兴趣广泛，笔耕不辍，共发表60多种著作，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介绍和研究。比丘林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利用汉语典籍编译而成，即突破了18世纪俄国汉学家忠实翻译原典的汉学研究模式，顺应俄国学术界和读者的需求，有选择地转述其中内容，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想重新排列。俄国汉学著作从比丘林开始为文化界和学术界所认可。比丘林创建了恰克图华文馆，所编《汉文启蒙》在整个19世纪都是俄国大学汉语教育的主要教材。在比丘林时期，俄国汉学在研究对象上更加明确了，研究内容上更加系统了，研究方法上更加成熟了，汉学作为学科的特征更加明显。大量事实说明，比丘林无愧于“俄国汉学奠基人”的称号。

除比丘林之外，卡缅斯基和列昂季耶夫斯基也在中国历史、语言等领域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汉学的腾飞做出了贡献。喀山大学相继设立的蒙古语教研室、汉语教研室以及开始的满语教学，昭示了俄国汉学开始从“传教士时期”向“大学时期”过渡以及创建独具特色的俄国汉学大学教育体系进程的开始。喀山大学校长、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创始人洛巴切夫斯基（Н. Лобачевский）为喀山大学东方学科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喀山成为俄国本土第一个汉学研究中心。

总之，19世纪上半叶，在以比丘林为代表的俄国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俄国一跃而成为继法国之后欧洲第二个汉学大国。俄国汉学自此达到了与西方汉学相当的发展水平。

一、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

比丘林

1808 年，第九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到达北京，领班就是后来成为俄国汉学奠基人的比丘林（又称亚金甫神父）。比丘林原名尼基塔·亚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斯基，1777 年出生于喀山省齐维利斯克县阿库列沃村楚瓦什族的一个神父家庭，1786 年被家人送入喀山传教士学校学习。1799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任语法教师，后教授修辞学。次年成为修道士，法号亚金甫。1801 年比丘林被任命为喀山约阿诺夫斯基修道院院长，1802 年晋升为修士大司祭，出任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院长和传教士学校住持。1803 年，比丘林因在修道院收留一个随他从喀山而来、假扮成见习修道士的女人而被削职，调到托博尔斯克修道院，由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监督反省。1807 年担任第九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领班。

在来华后的一段时间内，比丘林集中精力整顿教务。为严明纪律，他对下属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由于传教团中的问题积重难返，他的措施非但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反而招致属下的极大不满。1811 年沙皇政府忙于同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作战，停止向传教团提供经费，比丘林不得不出卖或典当传教团的财产，以维持团员生活。比丘林曾试图保持阿尔巴津人的东正教信仰，但收效甚微。他发现阿尔巴津人信仰东正教不是为了耶稣，而是为了得到面包。自此，他对传教失去了信心，开始轻视所承担的宗教使命，而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对汉语的学习和对中国的研究。他同北京的耶稣会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光顾南堂（宣武门堂）藏书楼，阅读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冯秉正（Joseph Marie de Mailla）和杜赫德等

人的著作。在语言学习上，比丘林一改此前俄国传教团重视满语学习的做法，而专攻汉语。原因是他发现大量满、蒙语文献都译自汉语。[①] 从《汉文启蒙》前言中可以看出，比丘林对西方传教士编写的汉语语言学著述了如指掌。可以断定，南堂藏书对其汉语学习亦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此外，他聘请的中国先生教他汉语的同时，建议他翻译四书。他以自己的学习经验意识到必须为俄国人编写出汉语学习工具书。他一边学习，一边开始收集汉语词汇，很快就编写出一本汉俄词典。五年以后，比丘林已经掌握了一万多个汉字。

比丘林在北京一共生活了十三年。返回俄国时带走了十二大箱汉满书籍、一箱手稿、一箱颜料和六大卷地图和平面图。这批书中包括四书、十三经、廿二史、《三字经》、《大清一统志》、五本汉语词典、两本满语词典等。

1822 年 1 月，比丘林一回到圣彼得堡，立刻受到俄国圣务院的审查。对他的指控主要有 12 年里没有去过教堂、变卖教堂财产、荒废教务以及对属下管理不善等。1823 年比丘林被判终身监禁在当时作为俄国神职人员监狱的瓦拉姆修道院。1826 年，由于俄国外交部急需汉语译员，经第十届传教团监护官季姆科夫斯基（Е. Ф. Тимковский）推荐，比丘林于 11 月获释。比丘林被允许返回圣彼得堡后，除了神职身份对他的束缚之外，他几乎得到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需要的条件。他被安排住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每年可以从外交部领到 1200 卢布的薪金和 300 卢布的著作补贴。[②]

由于比丘林在监禁时期勤于写作，所以在获释后的较短时间内出版了大量著作。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对比丘林的作品非常重视，于 1828 年推选他为东方文献和古文物通讯院士。1831 年，经多名法国汉学家提名，比丘林成为巴黎亚洲学会会员。同年，比丘林向俄国圣务院提出申请，要求脱离教籍。比丘林的行动得到俄国外交部的支持。圣务院最后同意了比丘林的要求并上书沙皇核准。但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驳回了宗教机构的呈文，命令比丘林继续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供职，不准脱离教籍。沙皇反对比丘林还俗的主要原因是后者与十二月党人关系密切，而这恰恰又是沙皇最为反感的事情。

---

①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91-93.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97-99.

19世纪40年代，比丘林科研进入第二个时期，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多次获得科学院杰米多夫奖金。[①] 他的著作在俄国乃至西方汉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对比丘林的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在看了比丘林的书后萌生了前往中国的想法。比丘林的最后一部著作是1851年出版的《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同样获得了科学院的杰米多夫奖金。

比丘林出版的大量汉学著作，对提升俄国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俄国汉学奠定了基础。他在编写汉语词典和汉语教科书，翻译和撰写中国儒学、历史、地理、政治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史地著作方面均有建树。

（一）汉语研究

在北京时期，比丘林在汉语学习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教材。尽管在此之前西方传教士已经编写出版了一些汉外词典，但对于俄国传教团而言，最需要的还是汉俄词典。比丘林一到北京就开始词典编写工作。与他人不同的是，比丘林力求使自己的词典既包括文言词汇，又收入汉语中最积极的词汇，将活生生的口语作为词汇的主要来源。因此，他在阅读和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不断摘录所需词汇，与此同时，他穿上中国人的服装，自称“何先生”[②]，走街串巷，出入集市店铺，用手指着感兴趣的物品，请人用汉字写出名称，并记录下发音，然后将记录下来的字词向自己的汉语老师逐一加以验证。[③] 他曾这样描写他编写词典的目的和过程：“我们至今没有一本像样的满汉语词典。我决定用这样的方法编写一部汉语词典。购买所有矿物、植物和动物，所有不熟悉的东西都要看到实物和样子。然后学习或简单了解所有的手艺，一定要亲眼所见，准确理解同一汉字在不同情况下的含义，对各种事物有所认识。去年我收集了很多禽鸟、树木和花草，并在我的僧房旁种了一园子树木花草。除此之外，我还收集中国

---

① 1832～1865年圣彼得堡科学院用俄国贵族杰米多夫的捐款颁发给发表科学、技术和艺术著作者的奖金，是俄国最高科学荣誉奖。

② “何先生”中的“何”字可能是比丘林法号“亚金甫”的希腊文写法“Hyakonthos”第一个音节译音。Чугуевский Л. И. Бичуринский фонд в Архив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59. № 5.

③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93.

的词典和书籍。在我的词典中,在解析词义的同时,还要描述具有特殊外表和性质的东西,介绍各种宗教和礼仪、习惯和风俗、手艺和工具。"①比丘林在来京四年后便编出了一本汉俄词典。在北京居留的十几年间,编写词典一直是比丘林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俄罗斯的主要图书馆中,都收藏有比丘林编写的词典。他一生到底编写了多少词典,至今还没有定论。据俄罗斯学者数十年来的研究,现在可以确定比丘林编写了下列词典:《汉俄字典俄文韵编》、《简明汉俄字典俄文韵编》②、《满汉俄词典》(译自《清文鉴》)、《满汉俄分类词典》、《蒙汉俄词典》(译自一部蒙俄词典)、《满汉俄钟表术语词典》(分为"钟表类"和"修理钟表家伙类"两部分)、《汉语拉丁语字典》、《汉俄音韵合璧字典》以及一部名为《三合语录》的会话词典等。③

《汉文启蒙》是比丘林最重要的汉语语言学著作。编写此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给他亲自创办的恰克图华文馆提供实用的汉语教材。《汉文启蒙》经比丘林数年修改、补充、完善,成为一本经典的汉语教科书。第一个版本写成于1830年以前,名为《汉语语法基础》,在圣彼得堡石印出版,印数很少。后来,比丘林在恰克图华文馆的教学中对教材进行了试用。从1832年开始,比丘林对全书进行重新编写,1835年出版了新版本,称为《汉文启蒙或汉语语法》,并带到恰克图。1836年他完成《汉文启蒙》第二部分的编写工作,将新的内容融进以前的版本,于1838年出版了第三个版本。科波季洛娃(В. В. Колотилова)提出"比丘林《汉文启蒙》于1828~1829年、1835年、1838年在圣彼得堡三次出版,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俄国一改以往对中国文化的狭隘兴趣,转而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显然,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形成。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兴趣

---

①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 Пескова Г. Н. Выдающийся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Н. Я. Бичурин//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77. №5.

② 比丘林手稿上有"Цзы-вэй цзянь люэ"字样,疑此作中文名称为《字汇简略》。

③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416 ;Чугуевский Л. И. Бичуринский фонд в Архив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Горбачева З. И. Рукопис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Иакинфа Бичурина//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179. Сер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ческих наук. Вып. 4. История и филология стран Востока. Л. , 1954; Петров Н. А. К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и (Рукописные словари,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Архиве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НА АН СССР)//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 1961.

和知识范围扩大了。"[1] 70 年以后的 1908 年，俄罗斯馆印字房将比丘林的《汉文启蒙》作为最好的汉语学习参考书在北京再次印行。

比丘林编写《汉文启蒙》时参考了西欧汉学家的著作。他在《汉文启蒙》的序言中回顾了欧洲的汉语研究历史，对欧洲传教士和学者的八种汉语语法论著进行了简要而精到的评价。比丘林最看重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雷慕沙（A. Remusat）和公神甫（J. A. Goncalves）的著作。但他同时又指出："如果将这三部著作放在一起比较，则马若瑟和公神甫的语法中的范例比雷慕沙的书中多，但后者在汉语规则的清晰阐释方面（尽管还不完整）超过前面那两部。头两部适合在中国学习汉语，而使用雷慕沙的著作可以在欧洲获得足够的汉语知识。"[2]

比丘林认为自己在编写汉语语法方面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弥补前人的不足，优化内容和结构。他将《汉文启蒙》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有关汉语文字和书写的基本知识，共 12 章，主要内容包括汉语、音韵、汉字、汉字的构成、汉字的书写、书写六体、正字与标点、发音、声调、部首、书法、相似字。其中特别强调了汉字的多义性、声调、书写及方言问题。第二部分阐释汉语的语法规则，主要内容为词类，如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前置词、连接词、感叹词以及实字和虚字的使用。在正文后面是附录，分别是笔顺表、六体表、讹误字表、异写字表、新旧字型对照表、偏旁部首表、异形偏旁表、汉语量词表、天干地支表、敬语表。为了方便俄国读者阅读欧洲汉学家的著作，比丘林编写了俄语、法语、葡萄牙语、英语译音与汉语译音对照表。为了适应恰克图商人对华贸易的需要，比丘林专门编写了包括 241 种货物名称的"恰克图俄国商品名录"和包括 118 种货物名称的"恰克图中国商品名录"作为附录（1908 年北京重印时这两个附录被略去）。与前人所编语法相比，比丘林的《汉文启蒙》在内容编排上力求重点突出，简洁实用。同时使用文言与口语范例来说明同一语法现象，使学生在学习中通过对比深刻认识汉语特性。比丘林称他在编写第二部分时主要参考了中国的辞书和教科书，清唐彪所辑撰之《读书作文谱》就是其中

---

① Колотилова В. В. Изд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конец XVIII-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в.）//Вестник 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 Вып. 2.

② Бичурин Н. Я. Хань-ынь ци-мын.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сочиненная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С. XIII.

之一。而比丘林有关“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的论述，无论概念还是范例都来自这部实用性很强的专论读书作文之法的著作。[①] 此外，《康熙字典》和《清文鉴》也是比丘林在书中经常提到的中国典籍。

比丘林的《汉文启蒙》在俄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19世纪下半期俄国人才编写出另外一本汉语语法，这就是伊萨亚的《简明汉语语法》。谢缅纳斯（А. Л. Семенас）指出：“比丘林的著作是第一部科学的汉语语法。其中对汉语语法所发表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②]《汉文启蒙》虽然是比丘林为恰克图华文馆而编写，后来却成为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唯一的汉语语法教材。王西里显然充分肯定比丘林语法的价值，没有继续编写语法教材，而是将精力集中于提高学生的汉字学习效率上。这样比丘林的语法加上王西里的笔画体系使得俄国的汉语教学跻身欧洲前列。此外，这本书还被作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来华前的语言培训教材，为培养俄国汉学家产生了促进作用。

（二）儒家典籍翻译与研究

比丘林在掌握了足够的汉字之后，开始翻译儒家经典四书。在比丘林的手稿中有几个四书译本，其中一个经过了细心的核定并有译者的注释，现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学者档案中。这表明比丘林翻译这部儒家经典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汉语，同时也准备将其介绍给俄国读者，但他的想法最后未能实现。戈尔巴乔娃（З. И. Горбачева）认为，包括王西里和柏百福（П. С. Попов）译本在内的所有现存译本都未必能够超越比丘林的译本。[③] 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和波波娃（И. Ф. Попова）认为：“比丘林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注疏文献对于领悟

---

① 唐彪：《读书作文谱》，岳麓书社，1989年，第97～104页。实际上，这些概念早在宋朝时就由王鸣昌在其《辨字诀》中提出了。

② Семенас А. 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Иакинфа（Н. Я. Бичурина）//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Ч1. М.，1977.

③ Денисов П. В.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ченого-востоковеда.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С. 51.

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意义，第一个尝试将能够反映孔子和朱熹这些著名注疏家思想体系的对四书的多层次注疏翻译出来以飨读者。"[①] 俄罗斯汉学家正在对比丘林的译本进行整理，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版。

1829 年，比丘林石印出版了他翻译的《三字经》。全书共 83 页，除俄文译文外，收录了汉语原文，三分之二篇幅为注释所占。在前言中比丘林简要介绍了《三字经》的内容，指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要使其成为"阅读汉语译著的参考手册"[②]，并感谢希林格（П. Л. Шиллинг）发明的汉字字模，使他得以刊印《三字经》的汉语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比丘林在准确传达原意的同时，尽力使译文在形式上最大限度的接近原文。[③]《三字经》三字一句，句句押韵，思想凝练，寓意深刻，将意思翻译到位已属不易，要想使译文在意、声、形上都达到完美，谈何容易。无论如何，比丘林确实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工夫，他尽量使用俄语中的三个词来对应翻译汉语文本中三个字。但是，简洁的译语显然无法全面反映原文的深刻寓意，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很难为俄国读者所理解。比丘林在翻译这一千余字的过程中，做了 103 条注释。他的注释并非简单的说明，而是引经据典，努力发掘其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思想。

同 18 世纪俄国汉学家译介儒家经典多依据满文本不同，比丘林的儒学译作和著述直接以汉文原典为基础，从而保障了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同时，他反对节译或改编，坚持全文翻译原典，甚至包括注疏家的解释。

比丘林在其《中华帝国详志》中阐述了对儒学的理解，将儒学和儒教区分看待是其重要特色。他在书中专辟一节论述"儒教"，介绍内容集中于儒家礼仪和祭祀活动，而对儒家思想着墨不多。当代俄罗斯汉学家科布泽夫（А. И. Кобзев）对比丘林所说的"儒教"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在比丘林的意识中，儒学的宗教特性非常模糊。对于儒学中是否有神存在，他的观点远没有王西里鲜明。王西里在其《东方的宗

---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пова И. Ф. О вкладе Н. Я. Бичурина(1777-1853)в развит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мировой синологии//Вестник РАН. 2002. № 12.

② Белкин Д. И. А. С. Пушкин и китаевед о. Иакинф（Н. Я. Бичурин）//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4. № 6.

③ 俄罗斯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点，但未详细分析："比丘林在译文中避免使用阐释性语言，极力保持汉语文言的节奏。"参见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пова И. Ф. О вкладе Н. Я. Бичурина(1777-1853)в развит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мировой синологии.

教:儒、释、道》中明确提出"儒学中不存在神。"①

1844年,他还完成了一部介绍儒教的专论《儒教》,但由于资金不足而未能出版。1906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印字房出版了该书,作为俄国侨民了解中国文化的读本。《儒教》一书分12个部分,分别是"儒教起源"、"崇拜之人"、"祭服"、"祭器"、"祭坛与庙宇"、"准备祭祀"、"祭礼官"、"京城祭祀日"、"地方各省祭祀及私人祭祀"以及"祭祀图例"等。书后附有"国子监"一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出版此书时对比丘林的原稿进行了一点调整,略去了原来的《丰泽园演耕》,增加了一幅国子监图。② 在开篇"儒教起源"部分,比丘林认为,中国有六种宗教,即儒教、释教、道教、黄教(喇嘛教)、跳神(萨满教)、回回教(伊斯兰教)。对于儒教的概念,比丘林写道,"可以说,这是政府的宗教,全中国人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满人和蒙古人的宗教,因为中国所有为官者必须执行国家法律的规定。"同时,他指出了中国人对于宗教的特殊态度:"中国人同样认为宗教的起源是神圣的,但与其他民族相比,他们对神性的理解完全不同。他们将宗教的产生根源归结为人本性的需要。"③ 显然,比丘林所说的儒教仅仅是儒家属于"礼"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儒学全部。他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介绍孔子及古代圣贤的祭祀礼仪上面,并用大量的插图加以说明。在介绍北京的国子监时,重点讲述了"辟雍"的设置及用途。比丘林撰写《儒教》一书所依据的中国文献主要是《大清会典》,其中的图例大都来自《大清会典图》。

(三)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翻译与研究

在中国史地和法律典籍翻译方面,比丘林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遗有三种大部头著作的译稿,现收藏在俄罗斯的各图书馆中。

第一种是《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本)。这是比丘林规模最大的一部译作,完成于驻北京期间,全书共8000页,俄文译名为《中华帝国历

---

①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Пб., 1873. С. 160.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 рукописном наследии Н. Я. Бичурин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им.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ып. 2. М., 1956.

③ Бичурин Н. Я. Описание религии ученых//Конфуций:"Я верю в древность"/Сост., перевод и коммент. И. И. Семененко. М., 1995.

史》,又称《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季姆科夫斯基对比丘林及其《资治通鉴纲目》译稿大加赞赏:"前任传教团领班称他将一部中国历史和地理全志翻译成了俄语。皇皇巨著,大有益处。他表示回国以后首先将完成这些译作的整理工作。"① 不能排除季姆科夫斯基是为了抢救比丘林汉学著作而帮助比丘林脱离监禁的。这部手稿现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比丘林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其中国先生的指导,这对他理解和把握原文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传教团学员西帕科夫(М. Д. Сипаков)对比丘林的翻译工作也提供了帮助。② 比丘林曾经申请继续在北京工作十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彻底完成包括《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译作。潘克福(Б. И. Панкратов)认为这一点体现了比丘林对汉学研究的执著态度,而且,他显然认为自己的译稿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便放弃了出版的念头,而将其作为研究素材。③ 苏联汉学界对比丘林这部巨著未能发表感到惋惜,曾经组织一流专家对其进行整理。然而,译稿最终还是未能问世,其中原因也许是比丘林的译本并非百分之百的"足本"。④

第二种是《大清一统志》。在北京的最后几年里,比丘林进行了《大清一统志》的翻译,俄文稿译名为《大清帝国属地地理》,手稿现存在鞑靼斯坦中央档案馆。作为清代官修的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详细记述了全国各省的地理、历史、风土和物产。在这部手稿上标有"1825 年"字样,而这正是比丘林在瓦拉姆修道院的时候,所以后人断定比丘林是在被关押期间最终完成这部译著的。比丘林后来根据这部译稿完成了《中华帝国详志》。

最后一种是《大清会典》。在恰克图华文馆任教期间,比丘林翻译了《大清会典》。在比丘林撰写有关中国现实情势著作的过程中,《大清会典》始终是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他利用《大清会典》译稿,"于 1838 ~ 1848 年间发表了十篇长文,出版了三部著作","如果将比丘林的译稿与其有关当代中国的著作、文章和评论进行对比,可以确信《大清会典》几乎是

---

① Тимковский Е. 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г. Ч. 2. СПб., 1824. С. 22-23.

②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Валаамская ссылка Н. Я. Бичурин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6. №1.

③ Панкратов Б. И. Н. Я. Бичурин как переводчик//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2. №4.

④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пова И. Ф. О вкладе Н. Я. Бичурина(1777-1853)в развит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мировой синологии.

这位俄国学者唯一的资料来源。"①

以上三部未曾发表的译作为比丘林的汉学著作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且,通过翻译这些文献,比丘林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汉学家。他是第一个批评西方汉学家曲解中国文献的俄国汉学家。而且他一直在努力准确地转达中国典籍中包含的丰富信息。正如潘克福评价的:"在比丘林看来,绝不允许让事实去适应预先选定的理念。只有准确了解事实的真相之后才能做出结论和判断。比丘林翻译的目的就是要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准备高质量的素材。"②

比丘林为完成译著《北京志》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在此书中,比丘林详细介绍了紫禁城、皇城、内城、长安门外的名胜古迹、安定门、西直门、外城,书后附有他于1817年绘制的北京地图。相传比丘林为了绘制此图,走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徒步测量距离。他还专门请了一位中国画匠帮他绘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一位中国画家已经为我绘了四年地图。重新绘制北京地图占用了他一年时间。"③ 他对书中的北京地图异常满意,在前言中做了特别说明:"我想让读者相信的是,这幅平面图不同于在北京铺子中可以随便买到的地图,而是1817年的新图,经过仔细的绘制。"④ 此书于182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立刻引起俄国以及国外出版界的关注。几乎与俄文本同时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法文本。柯恒儒(J. Klaproth)写了书评,给予了较高评价,但同时也批评作者没有列举汉语参考书目。比丘林这部译作所依据的汉语文献是清人吴长元编著的《宸垣识略》。⑤ 王西里在《中国文学史资料》介绍《宸垣识略》时说"亚金甫根据这部著作编写了《北京志》(1829年由一个叫 Ferry de Pigny 的人翻译成了法文)"。⑥《宸

---

① Хохлов А. Н. 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труды о Монголии и Китае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Ч. 1. М. ,1977.

② Панкратов Б. И. Н. Я. Бичурин как переводчик.

③ Хохлов А. Н. 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труды о Монголии и Китае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④ Бичурин Н. Я. Описание Пекина, СПб. ,1828. С. I.

⑤ 《俄苏中国学手册》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称比丘林《北京志》译作依据《镇元史略》译出,笔者在以前文章中也因袭此说,特在此更正并致歉。

⑥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заслуженным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П. Васильевым. СПб. ,1887. Приложения. С. 302.

垣识略》是一部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的书，包括大内、皇城、内城、外城、苑囿、郊坰等16卷。比丘林依据的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池北草堂刻本。比丘林到北京后第七年开始翻译此书，他没有将原书全部译出，而是根据欧洲人的兴趣删繁就简，并结合自己的亲历观察，增补注释而成书。

1840年，比丘林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介绍了许多中国文化知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俗以及清朝的国家管理体制。该书所用资料几乎全部来自《大清会典》，而且相当部分章节内容都曾经以单篇文章发表过，其中包括1827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国问题释疑》。该书出版后，先科夫斯基(О. И. Сенковский)批评其中信息难以满足读者需求，过分迷信中国文献，缺乏独立判断。各种评论促使比丘林重新审视自己这部著作的得失，他决定撰写另一部全新内容的著作《中华帝国详志》。

《中华帝国详志》于184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此书实际上是在《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来。比丘林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为欧洲撰写一部最正确、最全面的中国概述。他认为欧洲最好的两部中国概述性著作是格鲁贤(Abbé Grosier)1818年出版的《中国概况》和德庇时(Jonh Francis Davis)1836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但在论述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有不少缺陷。[①] 因此，他决心利用中国文献写出一部准确而全面的综合性中国著作。据霍赫洛夫(А. Н. Хохлов)考证，比丘林写作《中华帝国详志》一书的主要素材来源于他完成翻译的《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②]

1844年11月，比丘林完成了《中国的民情和风尚》一书的撰写，但直到1848年此书才问世，其中许多内容曾作为单独的文章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该书绝大部分内容来自《大清会典》。在该书的前言中，比丘林再次批评西欧汉学家对中国片面而不完整的描述，从而使欧洲学术界陷入迷途。他认为，《中华帝国详志》尽管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但却没有解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而《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虽然涉及了中国的宗教和风俗等问题，但内容编排零散，存在许多疏漏。他撰写《中国的民情和风尚》一书就是要弥补以往著作的遗漏和缺憾。[③]

---

① Бичурин Н. Я.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2002. С. 31-33.

② Бичурин Н. Я.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21.

③ Бичурин Н. Я. Китай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М. ,2002. С. 29-32.

该书出版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共有六篇书评发表。别林斯基在当年的《当代人》杂志第七期上发表文章，在赞扬比丘林新作优点的同时，对那些涉及中国法律的章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比丘林未对这些律法在清王朝的实施情况进行说明，这样使叙述显得有些片面。别林斯基认为清朝的律法乍看上去似乎充满仁爱，可以保障各阶层人士的生活安康，“所有这些保障及法律写在纸上很冠冕堂皇，事实上却有利于受贿者聚敛财富，而行贿者备受排挤。”① 他反对比丘林在书中所表现出的将中国理想化的倾向。他赞赏曾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的科万科（А. И. Кованько）于1841～1842年在《祖国纪事》上以“德明”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剖析了清帝国的社会现实。他说《中国的民情和风尚》描绘的中国“身穿制服，彬彬有礼”，他表示更希望看到中国“袒胸露背”真实的一面。

1844年，比丘林根据《授时通考》编写出版了《中国农业》一书。比丘林这本书的问世与当时俄国发展状况有一定联系。19世纪40年代，俄国对粮食的需求增大，迫使地主们寻求更加先进的耕作方法，提高粮食产量。比丘林的《中国农业》应运而生。该书问世后立刻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一位匿名作者在《当代人》杂志发表文章，感谢比丘林在书中介绍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当然也有人批评比丘林没有论及中国粮食的价格以及农业生产费用问题，没能深刻分析造成中国人贫困的原因。② 然据霍赫洛夫研究，此作原稿并非比丘林所译，而是出自第十届传教团修士司祭、第十一届传教团领班魏若明（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之手。魏若明在完成《授时通考》翻译后将手稿赠送给了比丘林。③ 这种说法现在还无法确定。

1838年，比丘林完成了一部中国钱币学著作的翻译，译稿名为《中国钱币描述》。与其他译作不同的是，此书是比丘林从日语翻译而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钱币历史的书籍。据俄罗斯艾尔米塔日博物馆工作人员伊沃奇金娜（И. В. Ивочкина）研究，比丘林此书译自日本著名钱币学家朽木龙桥的《新撰钱谱》。这部著作成书于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元年，在欧洲钱币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比丘林在将此作手稿

① Хохлов А. Н. Об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ческой базе работ Н. Я. Бичурина о цинском Китае//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8. №1.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118-119.

③ Хохлов А. Н. 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труды о Монголии и Китае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提交给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之后即得到了包括俄国国民教育部部长兼科学院院长乌瓦罗夫(С. С. Уваров)在内的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但由于该书为纯粹的学术著作,而且附有大量钱币图案,有关部门担心难以收回印刷成本,最后决定将手稿收藏于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①

(四)中国边疆史地典籍翻译与研究

《西藏志》出版于1828年,是比丘林回到圣彼得堡后出版的第一部汉学译作。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女诗人沃尔孔斯卡娅(Зинаида Волконская)的资助。② 因此比丘林在扉页上题字,将此书献给沃尔孔斯卡娅。《西藏志》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卫藏图识》译文,二是作者利用各种渠道,包括与来京藏人交往获得的有关西藏的历史文化知识。此外,比丘林在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附录了从成都到拉萨的道路图。这是俄国第一本介绍中国西藏的书,立刻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公认匈牙利藏学家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Csoma de Koros Alexander)的著作为西方藏学的滥觞,标志着西方人开始具有对西藏的理性认识。而在乔玛1834年完成《藏英词典》和《藏语语法》之前,比丘林的《西藏志》已在圣彼得堡出版,"比丘林实际上是他们③的先驱"④,"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⑤

1833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公元1227)》(简称《西藏青海史》)。书中内容主要译自廿三史和《资治通鉴纲目》。此书分两部分,分别介绍了西夏国和西藏的历史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书后附有一个补充说明,着重介绍了中国的纪年方法、中国历史朝代次序、度量衡等,另有《唐蕃会盟碑》译文、《黄河源记》等文章。最后是一个西北地区古今地名对照列表,不仅介绍每个地名的起源,而且提供了古今演变形式,对于一些同音地名还加注了汉字以示区别,如"悉洲"、"熙洲"、"西

---

① Ивочкина. Н. В. Рукопись Н. Я. Бичурина "Описание киатйских монет" и ее место в нумизматике//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Ч. 1. М. ,1977.

② Бичурин и Зинаида Волконская(очерк"Царица муз и красоты. . . ")/http://www. myvmeste. h10. ru/volkonskaya. html(2006-0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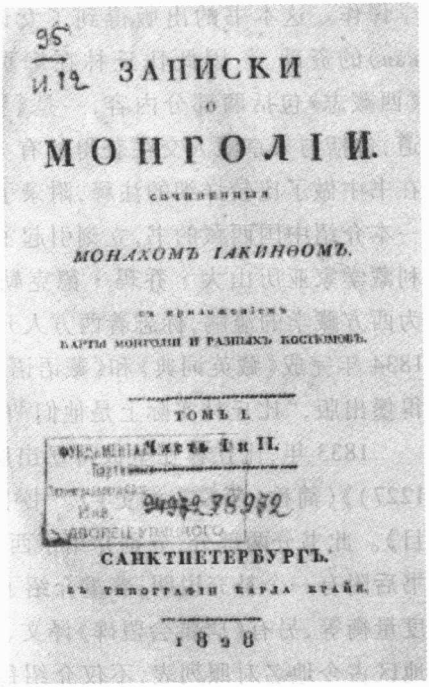
③ 指乔玛与俄国藏学家齐比科夫——笔者注。

④ Кореняко В. А. Лицом к Востоку. Научный подвиг Никиты Яковлевича Бичурина // Встречи с историей. Вып. 2. М. ,1988.

⑤ Зейнуллин М. Непревзойденный Бичурин//Татарский мир. 2003. №4.

洲”,“扶洲”、“府洲”、“鄜洲”等。① 如果说正文部分只是对汉籍的摘译,那么对于地名的考释则是比丘林的倾力研究了。同先前出版的《西藏志》相比,此书问世后引起了东方学家们更大的关注。②

1828 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蒙古纪事》。《蒙古纪事》是比丘林重要的蒙古学著作,全书共分四章。在第一章中收录了他 1821 年 5 月 15 日至 8 月 1 日从北京返回恰克图时所做的日记。第二章介绍了蒙古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自然条件、管理机制、风俗习惯、文化教育、与中原的关系以及鞑靼人的来历等问题。在第三章中比丘林根据中国史料叙述了蒙古民族自远古时期到 1653 年的历史。第四章是《理藩院则例》摘译。比丘林由此成为第一个关注并翻译汉文《理藩院则例》的欧洲学者。③ 内容翔实、取材多样是此书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既有日记,也有历史、律法,并对蒙古的现实、历史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详尽的阐释。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比丘林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在前言中称果断放弃了来华途中信息欠准的日记,而在回国途中重新加以记录。④ 在该书出版的同时,其中的个别章节在俄国的几个刊物上发表。在《蒙古纪


ЗАПИСКИ
О
МОНГОЛІИ.
сочиненныя
МОНАХОМЪ ІАКИНѲОМЪ.
съ приложеніемъ
КАРТЫ МОНГОЛІИ И РАЗНЫХЪ КОСТЮМОВЪ.
ТОМЪ I.
Часть I и II.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ВЪ ТИПОГРАФІИ КАРЛА КРАЙЯ.
1828

比丘林《蒙古纪事》1828 年版

① Бичурин Н. Я. 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 2282 года до Р. Х. до 1227 года по Р. Х. ,с картой на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сей истории. Ч. 2. СПб. ,1833. С. 221、228-229.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104-105.

③ Хохлов А. Н.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и в Пекине и начал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онголоведения(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труды Н. Я. Бичурина)//Монголовед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я и наследие (1801-1878). Казань,2004.

④ Бичурин Н. Я. Записки о Монголии, сочиненные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Т. 1. Ч. 1-2. СПб. ,1828. С. I-VI.

事》出版的当年，比丘林被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在这部书中，他对当时欧洲汉学界最为关注的蒙古人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蒙古人自古就在中亚地区居住，而“蒙古”这一名称则起源于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时。鞑靼民族的名称来源于汉语中对后期蒙古各民族的统称——“鞑靼”。他认为西方学界在解决蒙古人起源问题时过分注重其语言属性，有失妥当。[①]《蒙古纪事》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法文和德文，在欧洲出版。

比丘林的另一蒙古学成就是从《元史》和《资治通鉴纲目》中翻译了大量有关蒙古历史的资料，最后编写成了《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并于182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他从《元史》中只选择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的章节（即其中的《太祖记》、《太宗记》、《定宗记》和《宪宗记》）译出，而后利用《资治通鉴纲目》的相关内容进行增补，必要时加以说明。比丘林的说明很有价值，在对这两部汉文史籍所述史实进行解释并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对西方汉学界或俄国社会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加以澄清。比丘林注意到了中国史籍中在描述四夷时表达方式的不一致，利用《辽金元三史语解》和《大清一统志》等书加以补正，并在著作后附录了详细的地名、人名索引，同时提供了满语和汉语发音形式。蒙古前四汗历史是元朝历史的第一阶段，至今受到史家的重视。比丘林的这部书对蒙古民族的早期历史进行了详细介绍，对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他的这部译作至今仍是这些中国历史典籍的唯一俄译本，每一个蒙古历史学家以及每一个描写13～15世纪蒙古人的作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参考该书。[②]

1829年，比丘林出版了另一本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作品《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在该书中比丘林以《西域传》、《前汉书》、《西域闻见录》和《西域同文志》等汉语典籍译文为基础，介绍了西域的历史和现状。就是在这部书中，比丘林第一次在世界上提出了“东突厥斯坦”的概念。他认为，对于俄国人而言，中国史籍中的“西域”概念不容易理解，应将欧洲人所谓的“布哈拉突厥斯坦”称作“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突厥斯坦”叫作“东突厥斯坦”。

---

① Шастина Н. П. Значение трудов Н. Я. Бичурина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ып. 2. М. ,1956.

② Шастина Н. П. Значение трудов Н. Я. Бичурина.

1834年出版的《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同样引起俄国科学界的好评,荣获了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杰米多夫奖金。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他在《内务部杂志》第3期发表了同名文章。正如比丘林在此书前言中提出的,这是卡尔梅克人的一部早期编年史。他在撰写过程中利用了《新疆识略》、《西域闻见录》等汉籍,同时广泛参考了历史学家费舍尔(И. Э. Фишер)、雷奇科夫(П. И. Рычков)和汉学家利波夫措夫、列昂季耶夫、罗索欣的著作和译文。[①] 俄国汉学界普遍认为比丘林的这部著作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独立研究的比重加大,翻译的比重减少。随着该书的出版,比丘林翻译和介绍中国边疆史地文献的相对集中的一个阶段结束,他将研究重点转到了中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才重回到这个题目上。

《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是比丘林的最后一部著作。1846年,进入垂暮之年的比丘林忍受病痛的折磨,开始为此书收集资料。经过几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他终于在1851年出版了这部有关中亚各民族历史的集大成之作,为自己的中国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比丘林在书中再次批评了西方汉学家在蒙古人起源问题上的错误结论,可见中亚民族起源问题始终是比丘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据说,为了研究突厥民族起源问题,比丘林甚至暮年开始学习突厥语。[②] 这部书使他再次获得了杰米多夫奖金。苏联汉学家杜曼(Л. И. Думан)认为比丘林此作最大的特点在于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献,他利用的中国史书包括《史记》、《尚书》、《资治通鉴》、《周书》、《隋书》和《魏书》等。另外,此书历史跨度超过一千年,详细概述了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及相互联系。第三个特点是涉及的地域广阔,包括蒙古、东北、朝鲜、日本、新疆、中亚、西伯利亚、阿尔泰等地区。[③] 1950~1953年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再版了该书。

---

① Санчиров В. П. Предисловие//Бичурин Н.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V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2-е издание. Элиста, 1991.

② Денисов П. В.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ченого-востоковеда.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С. 117-119.

③ Думан Л. И. О труде Н. Я. Бичурина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 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Ч. 2. М., 1977.

，比丘林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汉语文献，收集并翻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由于当时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还很落后，不能为他的研究提供辅助材料，所以汉语典籍就成为丰富而又可信的资料来源。他以汉语文献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对俄国满、蒙、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比丘林的汉学论著对澄清18世纪以来俄国人对中国认识上的矛盾与偏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确立了俄罗斯民族汉学的形象，为俄国汉学的崛起作出了贡献。

二、汉学人才培养的出色组织者卡缅斯基

卡缅斯基

卡缅斯基1765年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的神父家庭。1787年毕业于当地的一所传教士学校，1791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1793年，卡缅斯基自愿作为学员随第八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前往中国。在北京期间，他努力学习汉满语言，主要从满文翻译了大量书籍，成为中国通，同时帮助理藩院翻译来自欧洲的拉丁文信函。1808年，卡缅斯基离开北京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八等文官，继续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和词典编纂工作，逐步成为著名的满、汉学家。1819年当选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东方文献和古文物通讯院士，随之成为巴黎亚洲学会会员、哥本哈根北方古物学会会员、俄国科学艺术爱好者自由协会会员。同年出家，取法号彼得，晋升为修士大司祭。1820年，卡缅斯基被任命为第十届传教团领班，开官员担任领班之先。同年底到达北京，一直到1831年回国。期间完成了一些译作和日记，同时在

传教团内营造了较好的汉满语言学习环境。他所领导的传教团成为有史以来培养汉学家最多的一届，为俄国汉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俄罗斯学者对卡缅斯基汉学成就的研究不太充分，甚至有些片面，这或许与“比丘林神父事件”有关。1822 年，第九届传教团领班比丘林回到俄都，受到圣务院法庭审判。接替比丘林的卡缅斯基从北京写信回国，历数比丘林在北京期间的种种失职行为，比丘林因而被关押在瓦拉姆修道院三年之久。长期以来，比丘林一直被作为俄国汉学奠基人大受推崇，而卡缅斯基却被视为与比丘林相对立的反面形象。在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及电影剧本中，卡缅斯基被刻画成一个令人厌恶、十恶不赦的造谣中伤者，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王西里院士对卡缅斯基的评价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称“他是一个到处受人尊敬、品德完美、但缺乏远见的老人”。① 克恰诺夫博士等在 1990 年对卡缅斯基的功过进行了反思：“在卡缅斯基的科学活动后面，要么就是一些不光彩的情况，要么就隐藏着某种秘密。有一种传闻，说卡缅斯基不太懂汉语。而这只能是一个传说，这不仅是因为卡缅斯基曾长期居留中国，而且还由于他身后遗有一部俄汉词典以及几本会话手册。正是卡缅斯基领导的传教团培养的学生数量最多，他们从中国回国后都能用这些语言从事实践工作。”紧接着，他们分析了导致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作为比丘林的同时代人，当他率领传教团从中国归来的时候，比丘林已经极其成功地进入俄国科学界，而且享誉国际汉学界。比丘林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卡缅斯基的光辉，同时也掩盖了利波夫措夫、列昂季耶夫斯基的光芒”。②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对于促进卡缅斯基研究有一定指导意义。

卡缅斯基一生都未中断汉学研究，翻译和撰写了许多作品。但遗憾的是，他的译作和著述大都未能发表，手稿分别保存在俄罗斯各档案馆。当代俄罗斯学者通过研究卡缅斯基的手稿，粗线条地勾勒出了他的科学活动情况。③

---

① ［俄］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83 页。

②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 270.

③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123-133; Шаталов О. В.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Петр(Каменский) и десят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Пб. , 2001. Вып. 3.

（一）汉学成就

卡缅斯基第一次以学员身份在北京学习期间在学术上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典籍翻译和辞书编写两个方面。由于他的满语比汉语要好，所以他的译作多译自满语。他翻译的第一部书是《通鉴纲目》（止于明代）。据说，他在翻译这部书前与利波夫措夫有过约定，由后者翻译《明史》。此外，他在北京时期还从满文全文翻译了《元史》中的本纪，冠名为《蒙古成吉思汗世系业绩史》。这本书在选材上与比丘林的《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一样，而在比丘林译作出版后译成，显然已不合时宜。在他赠送给皇家公共图书馆的手稿中包含了《北京使节出使西藏谒见第巴桑结、出使准噶尔谒见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诸汗记》、《明亡清兴，或叛民李自成生平》、皇帝的诏书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史料。另外还遗有《论土尔扈特人逃离萨拉托夫草原》和图里琛《异域录》译文等手稿。尽管卡缅斯基完成了不少历史译作，却鲜有出版者。他在1823年发表有《俄国使节斯帕法里来京纪要》一文。1906年，他写于1831年的《阿尔巴津人札记》在北京印行。此书乃卡缅斯基应监护官拉德仁斯基（М. В. Ладыженский）之命所撰，追述了俄罗斯佐领的历史，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雅克萨战俘后裔的生活现状、正教信仰以及对俄罗斯的意义。然而，对于俄罗斯佐领的早期历史，他只能从《八旗通志》等典籍获取相关信息，将来京的第一位东正教神父的名字错写为“德米特里”。①

卡缅斯基第一次驻京期间开始编写的《汉蒙满俄拉丁词典》五语词典，最后在圣彼得堡完成。由于他被任命为第十届传教团的领班来华，词典出版事宜随之搁浅。他还编写了另外几本辞典：《俄华例句详解大辞典》、《汉满例句详解成语辞典》、《汉语发音词典》（又名《五方元音》）、《按发音或声调排列的汉语词典》、《俄汉神学术语与基督教典籍语句词典》。②他编有一部《俄汉医药辞典》，编写材料主要来源于《本草纲目》等中国医学著作。此外，他受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М. М. Сперанский）之托将

---

① Каменский П. И. Записка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етра о Албазинцах. Пекин, 1906. С. 2.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131; Петров Н. А. К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и (Рукописные словари,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Архиве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НА АН СССР).

第八届传教团学生诺沃肖洛夫(В. С. Новосёлов)按照蒙古字母顺序编排的《三合便览》蒙古文部分加上汉、满对应译文并翻译成俄文。①

出于传教需要,卡缅斯基积极组织传教团成员翻译各种宗教书籍。由于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基督教教义书籍在市面上难以购得,卡缅斯基便要求传教团成员致力于东正教书籍的翻译。在这方面西维洛夫的表现尤为突出。他翻译了俄国罗斯托夫都主教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Дмитрий Ростовский)所著的《东教宗鉴》等东正教神学书籍数种。卡缅斯基在北京将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天主实义》翻译成了俄语。1820年,斯佩兰斯基在伊尔库茨克将自己翻译的金碧士(Thomas a Kampis)的《遵主圣范》以及拉丁文原本赠送给卡缅斯基。卡缅斯基对此书非常推崇,将其翻译成了满语和俄语,作为对《天主实义》的补充。此外,卡缅斯基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期间,翻译了道家名著《太上感应篇》,1812年发表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1824年他翻译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俄译文名为《唐太宗时期建立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碑》,48页手稿现保存在俄罗斯民族图书馆手稿部。

卡缅斯基对俄国汉学图书的收藏作出了贡献。1818年,他与利波夫措夫共同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的汉、日文书编目,出版了《皇家科学院中国日本图籍目录》,将这里收藏的279种汉满典籍分为神学、哲学、道德、蒙学、诗歌、历史、地理、天文、数学、法律、医学、自然、经济、军事、逸闻、故事、杂文、辞书等类,另著录舆图绘画15种。② 在担任第十届传教团领班期间,他积极购买汉满蒙语书籍。1831年他从中国带回了大批图书,将其中的100多本分赠给圣彼得堡神学院、外交部亚洲司、皇家公共图书馆以及伊尔库茨克和尼布楚的学校,将一部《康熙字典》赠给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1832年他一共赠送给伊尔库茨克学校管理局几十种图书。这些书包括《三合便览》、《三合语录》、《抄本初学指南》、《万物真原》、《天神会课》、《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历代帝王年表》以及多种佛典、舆图

① Яхонтов К. С. Китайские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книги в Иркутске. СПб., 1994. С. 8.

② Каталог китайским и японским книгам в Библионек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хранящимся, по предпоручению господин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оной Академии Сергия Семеновича Уварова, вновь сделан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реводчиками Коллежскими асессорами: Павлом Каменским и Степаном Липовцовым, СПб., 1818; Тихонов Д. И. Из истории Азиатского музея//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ып. 2. М., 1956.

等，共计35种，另有拉丁文珍本30种。[①] 在卡缅斯基的努力下，俄国传教团图书馆的藏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由于俄国政府的重视，传教团工作所需经费获得充分保障。卡缅斯基积极组织购买了大量满汉文图书，一些难以购到的书则请人抄写，有复本的书则将复本运回俄罗斯。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罗马传教士对我很有好感，准我抄写各种汉语基督教神学书籍，一部分刊印的书籍有完整的收藏。我抄写了汉语和满语圣经各两份，其中一份留在我们的图书馆，另一份寄回圣务院，交皇家圣经协会使用。"[②] 卡缅斯基对图书积累的重视，使其成为俄罗斯汉籍收藏的奠基人之一。

（二）卡缅斯基主持下的传教团汉学人才培养

19世纪初，俄国政府加强对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管理，对第十届传教团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818年，有关部门为传教团拟订了新的指令，对传教团工作的许多方面做出重大改革。新指令详尽的内容以及相关的精神与物质鼓励政策使得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的汉学研究状况从此得到根本改观。第十届传教团共有团员十人，其中七人学有所成，为俄国汉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修士司祭西维洛夫和医生沃伊采霍夫斯基更是成为俄国大学汉学教育的开山鼻祖。两位教堂差役沃兹涅先斯基（Н. И.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和索斯尼茨基（А. И. Сосницкий）也有著述。沃兹涅先斯基回国后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撰写了《17世纪东突厥斯坦史》，并根据《大清会典》写成《中国经济概览》一书。索斯尼茨基精通汉语口语，回国后经卡缅斯基推荐成为亚洲司职员，自1840年起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口语会话教师。他的主要著作为《中国杂俎》、《中国人口》、《土地庙记闻》和《汉语文选》等。三位学生中的两位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这就是列昂季耶夫斯基和克雷姆斯基。前者将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的《俄罗斯国家史》（三卷本）翻译成汉文，是首次尝试向中国介绍俄国历史。他所编写的《汉满拉丁俄语词典》非常有名，其中所列的参考书目有十余种之多。克雷姆斯基1831年回国途经恰克图时，

---

① Яхонтов К. С. Китайские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книги в Иркутске. С. 20-21.

② Шаталов О. В.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Петр（Каменский）и десят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接替比丘林担任华文馆教员，任教约近30年，为俄国培养了一批商务翻译实践人才，著有《孔学义解》。监护官季姆科夫斯基也是一位汉学家，素有俄国汉学"族长"之称。他所写的《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于1824年出版，后被译成了英、法、德等文字，另外还撰有《俄中关系史略》。

卡缅斯基在第十届传教团领班岗位上取得的成绩远胜于他的汉学成就。在中国20余年的居留经历以及汉学著作使人无法怀疑他在汉学上的修养，俄国学术界对他的学术水平也给予了肯定，推选其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

三、俄书汉译第一人列昂季耶夫斯基

列昂季耶夫斯基于1799年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尔的一个公证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被选送到圣彼得堡大学的前身——圣彼得堡师范总院数学系学习。他上大学的时候正值第十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筹备时期。列昂季耶夫斯基自愿报名加入传教团，于1820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学习了汉语和满语。两年后晋升为十等文官，担任团里的翻译，自1827年起担任总务。与此同时，他还兼任理藩院翻译，帮助翻译中俄政府来往公文。1831年返回俄国后，进入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担任译员，一直到1866年退休。其间，在1838年担任过圣彼得堡圣诞学校的历史和地理老师，50年代曾为圣彼得堡商业学校领取俄美公司助学金的学生讲授汉语。1868年，列昂季耶夫斯基回到故乡雅罗斯拉夫尔，1874年去世。

列昂季耶夫斯基的主要活动集中在19世纪中叶，正是俄国汉学从单纯翻译汉满典籍向以对原始材料进行批评性转述为主要形式的科学研究转变的时期。列昂季耶夫斯基的科研活动同样反映了未分科状态下古典汉学时代的特点。他兴趣非常广泛，精通满汉语言，对文学、历史、地理、经济、民族学、钱币学和考古学等学科均有涉猎，留下很多著述。

（一）编纂词典

列昂季耶夫斯基对汉语、满语的学习非常用功。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在北京的学习过程，其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国子监助教的教学情况。由于俄国没有出版过像样的汉语词典，以往传教团成员编写的词典手稿也都被编者

本人带回国，列昂季耶夫斯基只能借助于西方传教士的作品学习。在这方面，驻节北堂的葡萄牙遣使会士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 da Serra）给予了很大帮助，除为列昂季耶夫斯基介绍满语教师外，还将北堂所藏的满法词典赠送给俄国传教团。与此同时，列昂季耶夫斯基自己开始编写词典。

列昂季耶夫斯基一生编写了三部词典。一部是《汉满拉丁俄语词典》，共十五卷。另外两部分别为《拉丁中国语词典》和《汉满俄语词典》。词典手稿现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列昂季耶夫斯基对《汉满拉丁俄语词典》花了许多心血，最终在他离开北京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当时欧洲最为详尽的汉外语词典的编写。他在1824年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钦天监监正毕学源（Gaetano Pires Pereira）主教"对我由160个本子构成的汉语词典手稿非常感兴趣。"① 回到俄国后，列昂季耶夫斯基对词典进一步加以完善。他所采用的汉字部首排列法后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当今汉外词典最有效、最方便的汉字排列方法。最引人注目的是，编者在词典前言中列举了他在编写过程中使用过的参考书，包括中国最为流行的《康熙字典》、1813年由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在巴黎整理出版的《汉字西译》、柯恒儒1819年在巴黎出版的《汉字西译补》、《清文典要大全》、《清文鉴》、《清文汇书》、《清文补汇》和《清汉文海》等。② 这样，列昂季耶夫斯基利用了19世纪俄国汉学家在编写词典时有可能参考的几乎全部书籍，既包括中国印行的各种汉、满语词典，也有西方传教士编写的西文词典。苏联汉学奠基人阿理克（В. М. Алексеев）对列昂季耶夫斯基的这部词典评价甚高。他认为："即使能对充斥于手稿部（比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量未出版的汉俄和俄汉词典视而不见，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提及由勤奋的俄国汉学家列昂季耶夫斯基编写、现收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多卷本《汉满拉丁俄语词典》。""毫无疑问，这部词典如能出版（特别是在巴拉第辞典问世之前），对当时急需这种词典却又求之无门的俄国汉学家必然大有裨益。因为王西里编写的汉俄词典首先在问世时间上与这部词典不相吻合，而且在完整性方面也显逊色，而列昂季耶夫斯基词典在这方面必能有所弥补。"阿理克列举了列氏词

① Шубина С. 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XVIII-начало XX вв.).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Ярославль, 1998. С. 225.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135.

典的优点之后，认为其中的拉丁文部分可以使其成为国际通用本，比卫三畏(S. W. Williams)、翟理斯(H. A. Giles)等欧洲人编写的词典更加优秀。他认为列昂季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编写出这样优秀的词典，原因在于其汉语修养甚高，特别是文言文水平很好，他翻译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就是明证。“俄、英、美等国汉语词典编写者中还没有人具备这样的语言水平。”①

此外，列昂季耶夫斯基曾为俄国两部百科全书撰写过大量词条。一部为1837至1849年间由军人和文学家协会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军事百科辞典》，列昂季耶夫斯基撰写词条近百个。另外一部是俄国著名出版商普柳沙尔(A. A. Плюшар)于1834至1841年间出版的《百科辞典》，其中有大批词条出自列昂季耶夫斯基之手。他撰写的词条语言明快，浅显易懂，内容涉及中国的自然、气候、领土、行政区划、政治、国家管理机制、社会结构、民族关系、经济和国防等。

(二)俄书汉译

列昂季耶夫斯基的汉语修养甚高，这一点在北京时就得到了认可。俄罗斯馆监督曾对列昂季耶夫斯基的汉、满语水平大加赞赏。1823年理藩院邀请他为俄罗斯文馆教习舒敏讲授俄语，并帮助翻译公文。与同时代其他汉学家不同的是，列昂季耶夫斯基不仅仅将中国的典籍翻译成俄语，同时还从事俄罗斯名著的汉译工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他在北京时期把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译成了汉语，名曰《罗西亚国史》，首次试图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俄国历史。

1968年，苏联汉学家别什季奇(С. Л. Пештич)和齐一得(И. Э. Циперович)在《亚非民族》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拉姆津汉语版〈俄罗斯国家史〉》一文，详细介绍了在苏联各图书馆发现的译著手稿，其中一份为草稿，藏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另外三份誊清稿分别藏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草稿一共有九个本子，糊有黄纸封皮，装在中国式函套之中，上面写着：卡拉姆津历史一至三卷，列昂季耶夫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О роли русской китаистики XIX в. в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1956. № 18.

斯基译。与当时中国汉字行文方式不同的是,译文都标有标点符号,专有名词用红笔加了着重号。保存在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的一份手稿尺寸较其他都大出许多,黄色丝绸封皮,有红色的标签,上书金色大字:卡拉姆津历史一至三卷,列昂季耶夫斯基北京译。两位作者认为,这极有可能是献给道光皇帝的。①

列昂季耶夫斯基译稿并非对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进行全译,而是根据需要做了取舍。对于书中有关蒙古西征历史等中国人熟知的内容,列昂季耶夫斯基可能认为没有翻译的必要。列昂季耶夫斯基所译《罗西亚国史》是俄国汉学家为在中国传播俄国文化进行的可贵尝试。

(三)中国文学翻译及其他

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是列昂季耶夫斯基的另一汉学领域。继18世纪弗拉德金翻译《金云翘传》而首开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之后,俄国汉学家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微乎其微。1834年列昂季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满文诗歌散文体译文》。此书译自满语,由俄国诗人赫沃斯托夫(Д. И. Хвостов)伯爵加以润色。1835年,此作又在《传闻》杂志上发表。据列昂季耶夫斯基说,这部作品的原文是他在北京的一位杨姓朋友所赠,内容是对关外满人祖先功勋的赞颂。此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俄国人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最早尝试之一。1835年,他在圣彼得堡又发表了另外一部中国文学译作——《旅行者》,他自称译自一部汉语中篇小说。从题目上看,这似乎是一本中国游记,但实际上他所翻译的乃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但据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先生考证,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译时依据的本子并非剧本形式的《西厢记》,而更像是一部小说。虽然人物、内容和情节与《西厢记》极其相近,但文体却是小说。1836年,《读书文库》发表的书评写道,"这是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小说和创作","这部小说独具一格,使我们倾倒仰慕,赘述它的内容势将剥夺读者阅读时应得的兴趣……《旅行者》以他的观察向我们描绘一幅遥远异国人民的风情习尚的画面和思想观念;以及写景状物的绵密笔触都是精美绝伦、真实细腻的"。"能不能给我们多提供一点中国的中篇和长篇小说呢?它们确实

① Шубина С. 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XVIII-начало XX вв.). С. 226.

要比法国的小说更好。”① 当代俄罗斯学者舒碧娜(C. A. Шубина)说:“列昂季耶夫斯基的译作不仅思想传达准确,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②

19 世纪 20 年代,列昂季耶夫斯基编写了一本叫做《中国御前大臣简介》的书,介绍了当时清朝内阁中包括军机大臣曹振镛和穆彰阿、户部尚书王鼎和管理钦天监事务的工部尚书敬征等 21 位大臣的履历。这部手稿共 50 页,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书并非科学研究,而是列昂季耶夫斯基所收集到的情报。这个时期的中俄贸易获得快速发展,为俄罗斯商人服务成为汉学家的重要工作。在比丘林教授恰克图商人子弟学习汉语的同时,列昂季耶夫斯基于 1831 年受传教团监护官拉德仁斯基之命购买了《示我周行》一书,后又翻译成俄语。《示我周行》是一部由清代鹤和堂为商贾编著的路引类著作,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最早版本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富春堂本。列昂季耶夫斯基所依据的版本刊印于 1783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有藏。1834 年,列昂季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他翻译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书。这是俄国继列昂季耶夫和卡缅斯基之后的第三个景教碑译本,理解和表述更加准确,后来被维诺格拉多夫(A. H. Виноградов)收入其《东方圣经史》一书。③

四、服务中俄贸易的恰克图华文馆

由于与中国密切的贸易联系,西伯利亚成为俄国对中华语言人才需求最为迫切的地区。早在 1725 年,在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就建起了一所蒙古语学校,罗索欣曾在这里学习。随着恰克图互市的兴起和发展,培养汉语翻译,与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顺利沟通成为俄国商人和西伯利亚地方政府的共同愿望。1773 年伊尔库茨克省办公厅曾办过汉语和蒙古语培训班,1788 年甚至下令在伊尔库茨克省和科雷旺万省的学校必须开设华文课程。④ 但是,这些举措终因没有合格的教师和合适的教材而落空。

---

① [俄]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 年,第 260 页。

② Шубина С. 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XVIII-начало XX вв.). С. 249.

③ 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 История Библ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СПб., 1889-1895. С. 118-126.

④ Хохлов А. Н. Кяхтинское училищ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его роль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китаистов // XVI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Ч. 2. М., 1986.

与此相反，在恰克图对面的买卖城，中国店铺的伙计们虽都会讲蹩脚的、掺杂中文的俄语，但无法确保交易双方语言沟通的准确性。同时，中国人能讲俄语，而俄国人却不能讲汉语，这多少使得俄国商人感到在与中国人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比丘林1821年从北京归来途恰克图时，当地商人代表尼·伊古姆诺夫（Николай Игумнов）就曾经要求他在这里开办一所华文馆。1830年，比丘林随希林格科学考察团故地重游，俄国商人和恰克图海关再次请他办学培养汉语翻译人才。这也正合比丘林的心愿，因为他一直没有放弃在恰克图创建华文馆的念头，并将这件事情作为此次前来恰克图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1831年1月10日，恰克图华文馆开学，首批招收学生10名。教学之余，比丘林积极为华文馆编写急需的汉语教材和工具书。除了完善《汉文启蒙》外，他还将中国的满、汉、蒙语合璧辞书《三合便览》翻译成俄文。他在恰克图华文馆任教18个月后，因故回到圣彼得堡。1831年，第十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返俄途经恰克图，应当地商人要求，学员克雷姆斯基留下做翻译并在华文馆授课。1834年1月恰克图海关关长致信亚洲司，要求比丘林至少再来华文馆任教两年，以恢复华文馆的秩序，出版他编写的汉语语法著作。1835年2月初，外交部长通知恰克图，称沙皇已经同意任命比丘林和九级文官克雷姆斯基为恰克图华文馆教师。而后，比丘林又一次来到恰克图，随身携带了他刚刚出版的第二版《汉文启蒙》。5月18日，华文馆又一次隆重地举行了开学典礼。

这次比丘林为华文馆制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在教学内容上充分考虑了恰克图商人的实际需求，尤其重视汉语商务口语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方法上注意循序渐进、突出重点，注意温故而知新，通过俄汉语言的对比来认识汉语的语法特性。在比丘林之前，无论是舒哥、罗索欣，还是列昂季耶夫和弗拉德金的汉满语学校都没有制订过系统的教学计划。所以，比丘林的这一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教学计划无疑为俄国汉语教学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35年恰克图华文馆共招收了22名学生，来自商人和小市民家庭，年龄从7岁到21岁不等。1838年初，比丘林回到圣彼得堡，自比丘林离开恰克图后，克雷姆斯基一直负责华文馆的工作，每年都能培养一批汉语翻译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为恰克图地区对华贸易作出了贡献。他一生只出版过一部著作，但这本书足以使他在俄国儒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

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于1906年在北京出版的《孔学义解》。作者并未简单停留在对儒家著作的翻译上，而是经过细心的阅读和揣摩，全面总结了儒家的世界观。全书包括13部分，分别为孔子生平、孔子论天、神及心、孔子的道德学说、论勇敢、论欲望、论人的地位、夫妇责任、兄弟义务、论友情、论主仆义务、论教育、阐述儒家思想实质之文献。该作与比丘林的《儒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儒家学说的实质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基本上可以代表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孔学研究水平。1861年，克雷姆斯基去世，恰克图华文馆的教学从此中断。随着中俄关系的变化，俄有关部门认为可以直接派学生到中国去学习汉满语言，没有必要再在恰克图开办华文馆，而1855年在圣彼得堡大学又成立了汉语教研室，恰克图华文馆至此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遂于1867年下令关闭华文馆。

恰克图华文馆培养了一些优秀的汉语翻译人才，绝大多数毕业生都在毕业后成为俄国对华贸易商行的翻译，对促进俄国在恰克图贸易发挥了作用。

此外，恰克图华文馆在进行汉语教学的同时，积累了大量汉语图书。除比丘林外，尼·伊古姆诺夫、魏若明等先后赠书。同时，由于与买卖城鸡犬相闻，与中国商人关系密切，很容易获得中国刊印的各种图书。

总之，恰克图华文馆首次在俄国拟订了科学而详细的汉语教学计划，催生了俄国第一部优秀的汉语教科书《汉文启蒙》，积累了教学经验，对俄国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都产生长远影响。

五、欧洲第二所设立汉语专业的喀山大学

俄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所进行的汉满语教学都是为适应俄国外交或商业需要的权宜之计，时断时续，虽然为俄国培养了一些实用型人才，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教学质量难以保障。19世纪上半期，随着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俄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普通高等院校教授和学习东方语言成为18～19世纪初俄国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①] 汉语与其他东方语言学科一道进入大学课堂。除了境外的俄国东

① Валеев Р. М.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в Первой Казанской гимназии//Монголовед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я и наследие (1801-1878). Казань, 2004.

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俄国本土汉学研究基地也开始创立，其先锋便是俄国老牌知名学府——喀山大学。

（一）蒙古语专业

在清代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几种语言中，喀山大学最早进行了蒙古语教学的尝试。1833 年 7 月，俄国以及全欧洲第一个蒙古语教研室在喀山大学成立，科瓦列夫斯基成为首任主任。这位波兰人青年时代因参加由波兰诗人和革命家密茨凯维奇（A. Мицкевич）在维尔诺大学创立的秘密团体“道德社”而遭逮捕，于 1824 年 10 月被判流放喀山，在沙皇督学官的监管下进入喀山大学学习鞑靼语。此时，俄国政府出于商业和政治上的目的，计划在喀山大学培养蒙古语翻译，得到了致力于将喀山大学建设成为俄国东方学研究中心的洛巴切夫斯基校长的支持。1828 年，喀山大学派遣已经毕业的科瓦列夫斯基和正在完成最后一年大学学业的波波夫（A.-B. Попов）前往伊尔库茨克，师从著名的蒙古语翻译亚·伊古姆诺夫（A.-B. Игумнов）学习四年蒙语。科瓦列夫斯基广泛与当地的布里亚特人接触，学习蒙古口语，同时努力搜集蒙古文献，领悟蒙古历史文化精髓。1830 年 8 月，科瓦列夫斯基自愿作为秘书随第十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华完善自己的蒙古语知识。在北京期间，他除学习蒙古语外，还学习了当初未曾列入计划的藏语、汉语和满语。1831 年 6 月科瓦列夫斯基随第十届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离开北京。喀山大学决定将他和波波夫在后贝加尔的学习时间延长到 1832 年 12 月 1 日。[①]

1833 年 7 月，俄国国民教育部下令在喀山大学成立以科瓦列夫斯基为首的蒙古语教研室，他被聘为副教授。从此，对国际蒙古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界上第一个大学蒙古语教研室成立。1835 年喀山大学决定将阿拉伯语、土耳其语、鞑靼语、波斯语和蒙古语专业划归哲学系。科瓦列夫斯基积极地投入了蒙古语教研室的创办工作，制订蒙古语教学大纲，编写蒙古语教材。

1835 年科瓦列夫斯基编写的第一部教材《蒙语书面语简明语法》问世，立刻得到专家们的好评。伊·施密特（И. Я. Шмидт）称科瓦列夫斯基

---

① Шамов Г. Ф. Науч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ого//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ып. 2. М., 1956.

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向初学者提供了最基本的蒙语语法知识。该书一共202页,分导言、词法和句法等几部分,对许多蒙古语语言学问题提出了科学的阐释。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科瓦列夫斯基的《蒙语书面语简明语法》提出了这些问题,因而将蒙古语研究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即研究历史语音学、历史词法学、蒙古语与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印欧语言的相互影响。"①

科瓦列夫斯基编写的第二部教材就是著名的《蒙文文选》。该书的选材工作同样是在布里亚特蒙古完成的。1836年第一卷付梓,次年第二卷面世。第二卷共450页,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蒙语文章并根据难易程度进行了编排。首先是名言和格言,用于初学者阅读和进行语法分析,而后是十篇有关道德和宗教的风格明快、语言简练的小说和神话故事,最后是《蒙古律例》片段和嘉庆皇帝遗诏。在第二卷中收录了释迦牟尼故事以及有关佛教在西藏、蒙古和中原传播的文章。《蒙文文选》中所辑录的范文全部取自原文,未做任何更改,这也是科瓦列夫斯基编写该书时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对科瓦列夫斯基的《蒙文文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授予他杰米多夫奖金。

《蒙俄法语词典》是科瓦列夫斯基另一部重要的蒙古语言学著作,直到今天仍不失科学价值。1841年《蒙俄法语词典》开始排印,1844年出版第一卷,1849年出版最后的第三卷。科瓦列夫斯基极力要编写一部活的蒙古语词典,反映蒙古人生活中最积极的词汇。他从与蒙古人的交谈以及他们的谚语、故事、神话和民歌中捕捉具有活力的单词,同时也参考了大量内容各异的蒙、藏、满、梵文书籍以及老师亚·伊古姆诺夫所编词典的手稿。此外科瓦列夫斯基还参考了伊·施密特和匈牙利藏学家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编写的《藏英词典》以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诺沃肖洛夫和卡缅斯基编译的《三合便览》手稿。② 他的新作一问世便受到了俄国以及外国东方学家的高度评价。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授予该书全额的杰米多夫奖金。伊·施密特称这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自设立杰米多

---

① Кульганек И. В. Труды и учебные пособия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ого по монголь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Монголовед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я и наследие(1801-1878). Казань, 2004.

② Кульганек И. В. Труды и учебные пособия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ого по монголь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

夫奖金后获得全额奖金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在 1893 ~ 1895 年戈尔斯东斯基(К. Ф. Голстунский)的《蒙俄词典》问世之前,科瓦列夫斯基的词典一直是词汇量最大、编写最为成功的蒙语词典。1933 年《蒙俄法语词典》还曾在上海再版。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称"这部词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① 1982 年和 1993 年台湾南天出版社先后两次再版这部重要的工具书。

《蒙古历史》是科瓦列夫斯基在蒙古历史方面留存于世的最为重要的著作。第一卷的标题是《蒙古历史导论》,由作者亲自誊清的 17 个编了号的笔记本组成。前半部分论述了蒙古历史的分期问题,详细探讨了地理环境对古代蒙古人生活的影响。后半部分介绍了从远古到公元 3 世纪的中国历史。根据阿·彼得罗夫(А. А. Петров)的观点,此卷完成于 1843 年。第二卷讲述了自 1206 年至 19 世纪的蒙古历史,共由 33 个笔记本构成,完成于 1856 年。最后单独描述了蒙古在大清版图内的历史。书后附有蒙古大汗和王公世袭表。②

1855 年,俄国政府将喀山大学东方语言专业合并到新组建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因此时正好科氏被任命为喀山大学校长,所以未能前往帝京。1860 年 2 月,科瓦列夫斯基因未能及时防止喀山大学的学生运动而被解职。两年后他前往波兰华沙总校任世界通史教授,而后在华沙大学历史语言学系担任系主任,一直到 1878 年辞世。

由科瓦列夫斯基领导的喀山大学蒙古语教研室,为俄国培养了第一批学院派的蒙古学人才,为俄国蒙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 世纪俄国著名蒙古学家王西里、班扎罗夫(Д. Банзаров)、格姆鲍耶夫(Г. Гомбоев)和鲍博罗甫尼科夫(А. А. Бобровников)都出自其门下。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喀山大学蒙古语教研室和蒙古学家科瓦列夫斯基的遗产昭示了俄国以及欧洲大学蒙古学研究新阶段的到来。"③

---

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 1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65 页。

② Петров А. А. Рукописи п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ю и монголоведению,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рхиве АТССР и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 Вып. 10. 1936.

③ Тулисов Ежи, Валеев Р. М.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жизни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ого: Вильнюс, Казань, Варшава//Монголовед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я и наследие(1801-1878). Казань, 2004.

(二)汉满语专业

1837年5月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的建立是俄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说明俄国本土的汉语教学从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的学习班和学校转移到高等学府,开始有计划地培养汉语人才。随着后来满语课程的开设,喀山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东方学研究中心。

经喀山学区督学官穆辛—普希金(М. Мусин-Пушкин)推荐,西维洛夫成为喀山大学第一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和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汉语教授。他1798年出生,1818年入外科医学院学习。后又对医学失去兴趣,转而进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传教士学校学习。1819年剃度为僧,取法名丹尼尔。1820年参加俄国东正教第十届驻北京传教团,为修士司祭,1831年回国。在北京期间,西维洛夫曾编写过数部词典,主要有在道光十年(1830)完成并附有汉语译文的《拉丁词典》、《拉汉词典》、《华俄常用词词典》及《法汉满语词典》等。西维洛夫的译作主要为中国哲学和宗教著作。他完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道德经》译本,还译有《金刚经》、《明心宝鉴》、《大学》、《论语》、《诗经》、《尚书》等典籍。他还编写了《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中国通史》和《老子的道德哲学》等著作。

西维洛夫在其《汉语教学大纲》中提出应该重视汉语语法、声调、偏旁部首的学习,建议为汉语文献加注标点符号,规定使用比丘林的《汉文启蒙》作为教材,同时辅以欧洲汉学家的著作。西维洛夫编写的《汉语文选》得到了科瓦列夫斯基和比丘林的赞扬。这是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①] 西维洛夫汉语教学生涯不长,但却是俄国第一个高等汉语教学基地创始人,在俄国汉学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西维洛夫继任者沃伊采霍夫斯基1793年生于基辅省利波韦茨克县,由基辅神学院进入外科医学院,1819年毕业。1820年,沃伊采霍夫斯基自愿加入第十届传教团,担任医生职务,开始学习汉语和满语。

1831年沃伊采霍夫斯基回到俄国,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医生。西维洛夫辞职后,沃伊采霍夫斯基来到喀山大学。1844年汉语教研室改称汉满语教研室,他在讲授汉语的同时,为学生开设满语课程。因此,沃伊采

---

①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193-194;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 123.

霍夫斯基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满语教授。在汉语教学教学上，他延续西维洛夫的汉语教学方案，继续使用比丘林的《汉文启蒙》和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汉文启蒙》作为教材。在满语教学上，他编写了《满语语法规则初编》作为教材，阅读课则主要使用《清文启蒙》、满文本四书等材料，同时每周还为学生开设满族历史课程。此外，他还编写了《汉满语初学课文》、《语言实践用佳作辑录》等。还在北京的时候，沃伊采霍夫斯基就开始编写一本《满汉俄词典》，最终在喀山完成。该词典当时共有三卷，现在只有51页保存在喀山大学图书馆。[①] 后人评价"沃伊采霍夫斯基为俄国东方学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便是在喀山大学开创了满族语言和文学的教学。"[②]

除西维洛夫和沃伊采霍夫斯基之外，还有三位教师曾经在喀山大学教授汉语。索斯尼茨基曾是第十届传教团教堂差役，回国后进入外交部亚洲司工作，1840年起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口语会话教师。1843年索斯尼茨基去世，鲁什科（С. М. Рушко）接替其汉语口语课程，成为"喀山大学毕业生中最早做汉语教师的人。"[③] 他在学期间就编写了一部两卷本的《汉俄词典》，毕业后获得了汉语学士学位并被任命为讲师。但他在这里只工作了一年，沃伊采霍夫斯基到来后，他便因经济和健康原因离职了。沃伊采霍夫斯基请毕业生汉语学士拉杜辛（И. А. Ладухин）担任汉语讲师。[④] 拉杜辛于1841年在洛巴切夫斯基校长的协助下进入喀山大学哲学系东方语专业学习。1845年毕业后先在喀山第一中学教授汉语，1849年他为四至七年级学生制订了一份详细的满语学习计划，准备使用嘎伯冷兹（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32年出版的满语教材《满语基础》，得到了洛巴切夫斯基的支持。[⑤] 1852年他编写出了一部汉俄简明词典。该词典有个特点，即学生可以随着掌握汉字数量的增多而自己往其中加词。1855年他随同喀山大学东方语言专业调到圣彼得堡大学，做了图书馆管理员，次年获准随同第十四届传教团前往北京。途经恰克图时，拉杜辛利用传教团休整期间前往黑龙江考察当地情形并学习满语，不慎坠河身亡。

---

①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196-197.

②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С. 124.

③ Хохлов А. Н. Ладухин: судьба таланта в старой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 4.

④ Дацышен В. Г.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36.

⑤ Хохлов А. Н. Ладухин: судьба таланта в старой России.

1850 年 11 月，沃伊采霍夫斯基去世，校方决定聘请刚从北京学成归来的王西里为编外教授，代替沃氏的职位，教授汉语、满语、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课程，喀山大学汉满语教学自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西里在喀山大学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汉学教学实践。在 1851 ~ 1852 学年度，王西里为汉满语专业一年级学生讲授汉语语法和满语语法，翻译和分析四书，阅读浅显易懂的满语文章，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典籍、中国文学史和国家法令的翻译，同时讲授满语翻译。他在 1851 ~ 1852 学年度使用比丘林的《汉文启蒙》和雷慕沙的《汉文启蒙》作为汉语语法教材，1853 ~ 1854 学年度又补充了英国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通用汉言之法》。所使用的满语教材是德国满学家嘎伯冷兹的《满语基础》以及中国的《清文启蒙》。进入高年级之后，学生还要学习外交文书和清朝律例的翻译。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掌握汉满语言，王西里还锻炼学生将汉语《西厢记》中的片段译成满文。1853 ~ 1854 学年度，王西里首次在欧洲开设了满族文学史课程，1854 ~ 1855 学年度他又增开了中国历史课和满族历史。①

1853 年，王西里邀请能够进行汉语会话的阿布—卡里莫夫（И. Абу-Каримов）来喀山大学教授汉语口语。阿布—卡里莫夫原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穆斯林，后来到俄国，曾充任喀山第一中学学监并在那里教汉语。王西里认为，喀山大学学生“能够向土生中国人学习汉语实践知识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现象。”②

在喀山大学期间，王西里于 1851 年在《喀山通报》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苜蓿草》。1852 年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表了《中亚及中国版图内的山脉》一文，对中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由于他的论文以鲜为人知的汉语材料写成，立刻引起了俄国学术界的重视。同年 10 月，他被选举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

1853 年，王西里开始为喀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汉、满、藏文书籍编目。

---

① Хохлов А. Н.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и Казани//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 Под ред. Л. С. Васильева. М., 1974.

② Валеев Р. 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зряд восточ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807-1855) //Монголовед 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я и наследие(1801-1878). Казань, 2004.

这些书中的绝大部分(827 种)是王西里从北京带回来的。[①] 科瓦列夫斯基和波波夫在对这些书进行鉴定后指出:“王西里先生不只考虑自己的研究领域,还考虑了将要使用图书馆的几代人的研究。他带回的满文图书,加上图书馆原有的藏书,几乎囊括了可以在中国找到的所有满文书籍。藏文典籍中包括了一些稀世珍本,大部分不是在北京刊印的。所以,如果政府决定在喀山大学开设藏语教研室的话,未来的教师会在我们的图书馆为他们的著作找到珍贵的科研材料,足够他们使用许多年。王西里带回的蒙古语书籍相对较少,但也丰富了我们的图书馆。希望王西里能就我们现有的汉满藏文书籍进行系统的编目。出版这样的书目可以向国外的东方学家简要地介绍我校藏书,扩大学术联系。”[②]

1854 年,王西里被聘任为喀山大学汉满语教研室的编内教授。同年尼古拉一世给枢密院下令,除喀山大学保留鞑靼语专业外,对俄国其他所有院校的东方语言教学实施合并,成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这样,喀山大学的蒙汉满语教学停办,其教师、学生和部分图书也转到了圣彼得堡大学。

(三)教学效果与就业状况

喀山大学汉学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开创意义,而其教学规模基本上停留在低水平状态,学生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东方语言专业 1848 年有 42 名学生,1849 年有 35 名学生,1850 年有 33 名学生,1851 年有 29 名学生,1852 年为 16 名学生。而毕业人数仅相当于入学人数的 42%。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专业比较难学,学习时间长,一般需要四五年才能够毕业。二是难以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比如汉满蒙语专业,只有位于中俄边境的中俄贸易点需要为数不多的翻译,而在地处俄国欧洲部分的大中城市,使用这些语言人才的机构极少。此外,翻译薪酬偏低也是阻碍教学发展的原因。[③]

与此同时,喀山大学汉满语专业的毕业生中也不乏成绩优秀、立志汉学研究的人才,鲁什科、拉杜辛、佐梅尔(Н. Зоммер)、阿尔捷米耶夫

---

① 827 种中不包括蒙文图书。

② Хохлов А. Н.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и Казани.

③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198-199.

(A. Артемьев)和奥果罗德尼科夫(E. Огородников)是其中的佼佼者。

喀山大学蒙语教研室前后一共存在了22年,汉语教研室存在了18年,满语教学持续了11年。科瓦列夫斯基、波波夫、西维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索斯尼茨基、鲁什科、拉杜辛、王西里、阿布—卡里莫夫先后在这里任教,为俄国高等院校汉学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随着喀山大学汉满蒙语专业迁往圣彼得堡,俄国汉学教育进入了以王西里为代表的新阶段。

喀山大学开创了俄国高等院校汉学教育的先河,改变了俄国汉学教育主要局限在驻北京传教团的状况,实现了从单一僧侣汉学到僧侣与高等学校汉学并存的局面,在汉学人才培养、教材建设以及在创建作为19世纪下半期俄国汉学中心之一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政府机构和商界对汉满蒙语人才的需求相对较小,大批学生毕业后谋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汉学教育的发展。但其存在的历史证明了俄国大学开设中华语言专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推动了俄国汉学以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

第三章
俄国汉学的发展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俄国汉学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极盛、衰微、变革等几个不同阶段。1855年，俄国本土汉学基地从喀山大学迁移到位于首都的圣彼得堡大学，得到了俄国政府更加有力的指导和资助。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大汉学家王西里。他领导圣彼得堡大学汉学近半个世纪，不仅著作等身，而且桃李满天下，创立了俄国汉学史上的第一个汉学学派——圣彼得堡学派，并于1886年当选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俄国汉学家。巴拉第、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等人也以其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俄国汉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使俄国汉学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1899年，为适应《中俄密约》签订后对汉语实践人才的现实需求，俄国政府筹建了远东汉学基地海参崴东方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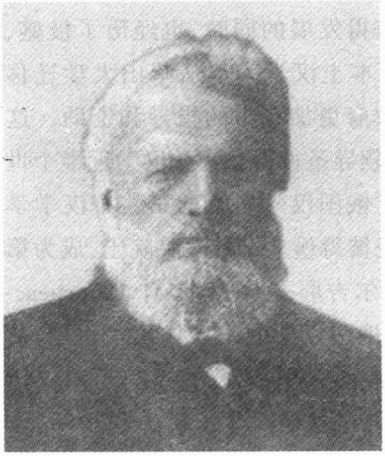
近代化是这一时期俄国汉学的最主要特征。“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① 世界科学的发展进程以及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学术研究方法在俄国汉学著作上打上了烙印。俄国汉学家在继续重视原典翻译和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以实地考察成果来进行学术补证。这与比丘林时代局限于中国文献编译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此外，俄国汉学家研究对象也从中国历史、儒学、地理和国家体制扩展到了宗教、经济、农业、人口、天文、医学等领域。无论在汉学家的著作中，还是在大学的汉学教育过程中，汉学学科的分化愈来愈明显。一些学者开始对俄国汉学的命运以及发展趋势进行反思。与比丘林对中国典章制度“理想化”的倾向相反，这一时期的汉学家有着更多的批判精神，这在王西里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总

①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之,19 世纪下半期,尽管俄国汉学遭遇到许多问题,但没有停止其近代化的步伐。

一、圣彼得堡汉学宗师王西里

对于 19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而言,王西里无疑是成就最大的汉学家。他以渊博的学识、浩繁的著述、执著的探索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俄国汉学教育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俄国汉学史上的第一个汉学学派。



王西里

王西里 1818 年生于俄罗斯历史名城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尉官家庭,1834 年进入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班,在新组建的蒙古语教研室学习蒙语和鞑靼语,成为喀山大学教授、蒙古学俄国学派奠基人科瓦列夫斯基的学生。1835 ~ 1839 年他跟随一位布里亚特蒙古喇嘛学习口语,与此同时,还开始学习藏语。1837 年王西里通过了题为《佛教文献之精髓》的学士论文答辩并留校工作。同年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成立,他开始跟随第一任教研室主任西维洛夫教授学习汉语。1839 年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一文通过答辩,获得蒙古语硕士学位。之后不久,又获得了鞑靼语硕士学位。喀山大学当时正计划创办藏语教研室,遂派王西里赴中国学习,将来主持藏语教研室的工作。1839 年 11 月王西里被编入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老师科瓦列夫斯基临别赠言,希望他在科学研究中时刻保持头脑冷静,公正无私,既不能做"中国的爱国者",也不能做"中国的仇视者。"① 老师的嘱托和提醒对王西里形成卓尔不群的汉学研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1840 年 10 月,王西里来到了中国。期间他广泛涉猎中国、印度以及藏传佛教的典籍,就许多汉学问题进行研究并收集了大批材料,从原来喀山

① Хохлов А. Н.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и Казани.

大学的蒙古学家和佛学家成长为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

1850 年，王西里返回俄国，接替不久前去世的汉学家沃伊采霍夫斯基出任喀山大学汉满语教研室编外教授，1854 年成为正式教授。1855 年喀山大学东方学专业被合并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王西里随即到圣彼得堡大学工作。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终其一生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他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大学者。1864 年王西里以一篇题为《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的论文顺利地通过答辩，获得东方语言博士学位。他是俄国第一个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汉学家。由于王西里的杰出成就以及在世界东方学界享有的崇高声誉，1866 年他当选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 年成为正式院士。1900 年 4 月，王西里在圣彼得堡去世，俄国汉学的一个时代随之结束。

王西里精通汉语、满语、蒙古语、鞑靼语、梵文、藏语、突厥语等东方语言。他博学多能，著述浩繁，在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等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

（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王西里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著作主要出版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研究经常是比丘林中国历史研究课题的延续或拓展。1859 年，他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方部著作》中刊出了《10 ~ 13 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1861 年该作又出版了单行本。作品正文由七部分组成，分别为“契丹历史”、“契丹历史补议”、“室韦补论”、“奚部补译”、“胡峤述旅”、“女真或金朝历史”、“金朝覆灭”，附录为《辽志》、《金志》和《蒙鞑备录》译稿。王西里认为比丘林在其著作中没有研究契丹人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女真人、满族人的历史，因而有必要弥补这一缺憾，对这 300 多年的历史进行概括性的介绍。在史料的选择上，王西里认为《辽史》、《金史》、《元史》等官修史书所反映的是契丹、女真和蒙古立国之后的历史，并且吸收了中原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只能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补充，不如私家史著更能反映这些民族的特点。[①] 王西里在这部著作中首先致

---

①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от X до XIII века,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перево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звестий о киданях, чжурчженях и монголо-татарах. СПб., 1861. С. 5.

力于拓展文献使用范围，以便对古代中国汉族以外民族历史进行客观生动的描述，尤其注重对比丘林遗漏历史阶段的考察。此外，王西里在该书中确立了契丹、女真和蒙古三个民族的历史联系，并强调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对于契丹历史而言，王西里是俄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者。王西里的研究目的也不似比丘林那样只是向俄罗斯学术界传递中国文献中的相关信息。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要进行总结历史，发现这些国家在游牧世界中出现的总体规律以及迅速战胜邻族的原因。”①

1863 年王西里出版了第二部满族研究专著——《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此作首次发表于 1858 年，而后在 1863 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再次出版。该书篇幅不大，只有 75 页，重点考察了元明两朝满族的历史。王西里在前言中高度评价了满族在人类历史上的突出地位：“亚洲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像满族那样的重要地位。从 12 世纪中期起，满族已经具备了世界历史意义，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从人类历史中删去。满人不仅拥有自己的国家，而且还统治着中国、蒙古、准噶尔、突厥斯坦和西藏。”②他认为中国的史书记载存在不实之处，而且多出于政治原因。用批评的态度去看待中国史书是唯一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王西里认为圣彼得堡大学收藏的明代徐日久的《五边典则》是一部揭示满人入关前历史的好书。他这种重视私家史著史料的研究方法，对于他完成《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西里还翻译了许多重要的中国历史文献，同样主要是围绕满族历史这个中心议题而展开。早在 1857 年，王西里就发表了两部重要译作，一是《满洲志》，译自清代官修地方志书《盛京通志》，二是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1883 年，王西里翻译了魏源的《圣武记》，俄文名曰《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此外，他还不同程度地翻译过《魏书》、《辽史》、《金史》、《元史》、《辽志》、《金志》、《蒙鞑备录》、《读史论略》、《如意宝树史》、《圣

① Кожин П. М.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и кочевник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этногеограф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Значение трудов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 XXI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Ч. 3. М., 1991.

②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Сведения о маньчжурах во времена династий Юань и Мин. СПб., 1863. С. 4.

武记》、《春秋》等。[①] 这些译作与王西里的历史研究论著一道构成了王西里满清王朝研究系列。

在地理研究方面，1852 年他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表了《中亚及中国版图内的山脉》，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充实。“在俄罗斯的科学文献中认为首先对中亚作如此描述的是李希霍芬，殊不知早在李希霍芬著作问世前 25 年王西里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描述。”[②] 1855 年，他写了《论满洲火山的存在》一文，描述了康熙六十年（1721）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喷发。1857 年至 1858 年间，王西里利用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齐召南撰写的、被称作“清代《水经》”的《水道提纲》编写了《流入阿穆尔河主要河流介绍》一文。他撰写了《中国地理概况》，作为 1868 年出版的《汉语文选》第一卷的补充。《中国地理概况》充分展示了王西里在中国地理研究上的造诣，不但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而且回顾了研究历史，同时收录了游记作品，内容翔实，形式生动，成为中国地理教科书的样板。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有一章为《中国人的科学发展——历史与地理著作》，王西里在这里论述了中国地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对中国的主要地理著作做了分析，介绍了古代徒步旅行者的游记作品。

在王西里的中国地理译著中，1881 年出版的《军机大臣马思哈出巡北部边疆日记》占有重要地位。此书译自马思哈的《塞北纪程》，记康熙二十九年（1690）马思哈随驾亲征准噶尔事，对沿途的地形、气候、植物和动物详加记录。王西里的另外一部地理译作是《西藏地理》。此书是被誉为西藏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驻京敏珠尔活佛于 1820 年完成的《世界广论》中西藏部分的俄文译本。

与比丘林不同的是，王西里除了重视私家史著以外，还非常善于运用碑铭等历史遗存实物作为历史文献的补充。1859 年王西里发表《中国千叟宴银牌》。王西里撰写此文，是为了回应列昂季耶夫斯基以及德国汉学家硕特（Wilhelm Schott），指出其在确定牌子年代和解释来历方面犯了错误。1877 年王西里发表《1877 年 8 月在保加尔村发现的 10 世纪末 11 世

---

① Смолин Г. Я. Академик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Восток-Запад: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альманах. М., 2002.

② Горбачева З. И., Пертов Н. А., Смыкалов Г. Ф.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ерия 2. М., 1956.

纪初中国精美钱币》,1896 年又发表《阿穆尔河特林碑[①]铭考》。

以上事实说明在王西里的研究中,实证主义史学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因此,不能将王西里对史料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对私家史著和其他所有能够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材料给予同样重视的原因仅仅归结个人性格所致。王西里研究中国史地的特点就是谨慎使用中国史书,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其中陈述的史实。他认为中国历代官方编写的史书有刻意美化本朝统治者的倾向,可能对有损本朝的事实闭口不谈或加以篡改,但他在下结论时有时不免草率和武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西里编写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札记》。在这篇札记当中,王西里对中国文献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着重介绍了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所收藏的重要蒙、藏、汉、满文献。正如斯莫林(Г. Я. Смолин)所言,这是对中国文献遗产的概述性分析,实际上反映了王西里以后文献研究的基本立场。他对圣彼得堡大学能拥有整个欧洲唯一的藏文版《丹珠尔》感到非常自豪。王西里详细介绍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分类方法及代表著作,尤其推崇司马迁的《史记》。他认为记录历史是中国文字的第一功能,在儒家的五经当中有三种属于史书。他称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和"东方的希罗多德(Herodotus)"。至于《资治通鉴纲目》,王西里认为其"对中国的主要意义在于对人物和事件进行了众所周知的等级次序分明的评价,因此对中国人而言,《资治通鉴纲目》就如同埃及人的死后审判一样。"[②]

(二)汉语研究

从 1837 年成立的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到 1855 年创建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俄国的汉语教育一直依靠比丘林的《汉文启蒙》。这本"速成"教材尽管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汉语语法教材之一,但对欧洲人如何快速记忆汉字仍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横亘在欧洲

---

① 即奴儿干永宁寺碑。1854 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调查团在元朝和明朝时期之奴儿干地区发现了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所立之《永宁寺记》碑。碑文记载明朝政府派遣太监亦失哈等人招抚奴儿干及东海苦夷(库页岛)之事,说明该地区很久以前便是中国领土——笔者注。

②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XI. 1857.

汉语学习者面前最大的顽石，“俄罗斯亦没有一本具备系统性的汉语教材。”① 王西里早在北京学习期间就已经立志要攻克这一难题。回国以后，王西里先成为喀山大学的汉语教授，而后又成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语专业的创始人。汉语教学的现实需要促使他必须要为俄国人乃至欧洲人制定出一套最有效、最科学的汉字学习方案。他认为，中国人可以依靠私塾先生的帮助笨拙而低效率地记忆汉字，而欧洲人必须具备独立、高效学习汉字的能力，否则汉语教育和中国研究将无从谈起。他对欧洲学者们试图从汉字部首中挖掘出掌握中文“钥匙”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因循守旧是导致其长期在此问题上徘徊不前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决定从汉字本身的特质入手，深入分析，创造一套更适合于逻辑记忆的新理论。为此，他付出了几乎一生的时光。他写道：“每年我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考虑汉字排列的各种方案，我觉得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好似在给汉字创立字母表一样。”②

1866 年，王西里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语语言学著作《汉字解析》，次年又推出与之配套的《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1898 年和 1884 年，这两部书由伊万诺夫斯基（A. O. Ивановский）编辑，以《汉字解析》为名分上下两册在圣彼得堡重新出版。《汉字解析》的出版标志着俄国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同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一直到 20 世纪初，《汉字解析》始终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无可替代的汉语教材，为俄国汉语教育以及俄国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西里在《汉字解析》中阐述了他对汉字特性的认识，论述了古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别。他强调，“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并不能认为我们这里论述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汉语书面语形成于口语，如果将二者分离得太远，书面语就失去了得以形成的条件。没有口语根本无法对书面语进行研究，而没有书面语口语也不能够得到发展。”③

---

① Горбачева З. И. , Пертов Н. А. , Смыкалов Г. Ф.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② Семенас А. Д. Значение трудов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XXI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Ч. 3. М. , 1991.

③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тудентов профессора СПб-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Пб. , 1866. С. 1.

相对于口语而言，他认为书面语最主要的特点在于用一个单音节词所表达的概念往往能够概括口语数个音节所构成的词。这一特征被王西里反复强调，他在形声字部分里举出“娶”、“驷”、“奔”，认为这几个字正是书面语与口语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突出体现，在口语里，表达“娶”这个概念时至少需要两个字——“取”和“女”，表达“四匹马”的概念时则需要“四”、“马”两个字，表达“大耳”这一意义也至少需要“大”和“耳”这两个字，而在书面语中则将字形融合并将语音简化。他由此得出结论：“形声字是口语的简化形式，或者说当某个字形已经以偏旁部首形式加入到形声字中后便不再有发音的必要。”① 显然，在简单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的传统看法之外，王西里注意到了汉语语音简约化的特征。

在该书中，王西里从未对汉语有语法这一问题产生过质疑。在王西里看来，汉语自然是有语法的，只不过是采取了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思维和逻辑模式而已。他写道，人类早先创造语言的时候，一个词或者说一个音节所包含的意义范畴可能会十分宽泛或者说不具体。“这种不具体既可能是语法上的，也可能是词汇上的。”而这种“语法上的不具体性”或者说是“抽象性”在汉语以外的语言中必须通过添加词缀而改变词性才能实现。他认为，“汉语的词性是抽象的，不具体的，只有所谓的‘词根’，就如同俄语词‘дело’（意为‘事情’，名词）、‘делать’（意为‘做’，动词）、‘дельный’（意为‘能干的’，形容词）、‘дельно’（意为‘能干地’，副词）中共同的词根‘де’一样”。但“这样并不妨碍理解，因为无论是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都存在确定性、数、格等的手段。”②

接下来王西里又对音韵、汉语方言、汉字笔画、独体字和合体字的区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西里认为形声字是汉字最有发展潜力的部分，因此它的数量最为庞大，并由此推断，向直接表音文字过渡是汉字发展的最终趋势。王西里在书中提出了“字根理论”：“只有对‘字根’进行深入研究，才可以最终确定汉语中语音间的亲缘和通转关系。”③

---

①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1866. С. 73.

②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1866. С. 70.

③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Ч. 1. 2-е изд. /Под ред. А. О. Ивановского. СПб. , 1898. С. 126.

《汉字解析》下册《汉字要素》1867 年首版时名为《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实际上是王西里依据他创造的汉字笔画系统编排的一部汉语词典。王西里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和欧洲流行的各类词典所依据的检索系统，认为最好的字典应该是与他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于 1841 年在澳门出版的根据语音系统编写的《字声总目》。当然，他也认为加略利字典的检字法还有不完备之处，比如仅以汉字声旁做检索字，大量的非形声字无法列入。但《字声总目》确实给了王西里很多启发，如“起笔归属原则”等。王西里在总结和克服其中不足的基础上开始构思自己的汉字排列体系，经过不断探索，最终提出了自己的汉语词典编写原则，即从笔画到独体字再到合体字。世界上第一部按笔画系统检索的汉俄词典由此而生。

王西里在《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中确定了基本笔画下各级附属笔画的排列顺序，并在前言的凡例中列出。其排列规则总的来说服从于视觉感受，尽量将看上去类似的结构（笔画、偏旁部首或字）放在一起。各派生笔画下的汉字按韵排列，先排与首字同音同调的字，而后按“平、上、去、入”排列同音不同调的字。同韵字按照声旁在内、右、下的顺序，与首字不同韵但类似的字排在最后。这样，同音字、音近字、形近字就被最大限度地排在了一起。这种排列方法不仅方便初学者检字，更有助于初学者记忆汉字。由此可见，王西里的笔画系统不仅仅是简单的汉字检索手段，而是直接服务于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所从事的汉语教学工作。这种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实际运用的特点在 1884 年出版的《汉字解析》下册——《汉字要素》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是一部“字典”，明确的教学目的促使编者尽收汉字“要素”，即构成汉字的“组件”，而不重收字数量，注重所收字的相互关系，在释义上尽可能解析汉字构成，帮助学习者进行联想记忆。

王西里对自己创造的笔画系统非常自信，他写道：“我们自己制定的体系，无论在查询汉字方面，还是在记忆汉字方面，都更加简单和方便。”① “对于我而言，汉字系统是我最珍视的成果。试想中国人至少研究了 2500 年自己的文字，现在欧洲人也在研究。这种文字之所以难学，就是因为缺

①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б. , 1880. С. 25.

乏一个体系。但是我也不敢保证它能被接受,因为这只是我的发明。"①的确,王西里系统不仅在检索方面克服了单纯按照语音体系或部首系统编纂汉外词典给使用者特别是欧洲汉语学习者造成的不便,将语音系统和笔画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又为汉语初学者提供了学习汉字的有效逻辑思维模式,不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根据王西里的笔画系统,孟第于1891年编写了《汉俄画法合璧字汇》,罗森贝尔格(O. O. Розенберг)于1916年在东京出版了《根据笔画系统编排的汉语词典》,郭质生(B. C. Колоколов)1935年于莫斯科出版了《简明汉俄词典》。在鄂山荫(И. М. Ошанин)教授的主持下于1983~1984年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四卷本《华俄大辞典》,依据的依然是王西里制定的汉字笔画系统。直到今天,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俄国人都会感受到词典中使用的"王西里系统"给他们带来的方便。苏联汉学奠基人阿理克充分肯定了王西里创造的汉字排列方法,认为该法对学习汉字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在中国和欧洲新的汉字排列法发明者'磁场'未形成之前,王西里的汉字笔画系统长期是帮助汉字记忆和逻辑判断的佼佼者。这一方法培养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年迈的笔者,并且促使了我们的青年至今还在使用的新词典的诞生。"② 但与此同时,他认为王西里的方法尽管对外国人学习汉字和检索汉字具有实践上的方便性,然而由于是凭空假设,闭门造车,因而缺乏科学基础,"不是科学体系。"③

(三)中国文学研究

王西里是俄国第一位中国文学史专家。早在北京时期,王西里就萌发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千方百计搜寻文学作品。回到俄罗斯以后,他首次于1851年在喀山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成为世界汉学史上将中国文学史引入大学课堂的第一人。1855年,他继续在圣彼得堡大学开设此课程,到1900年去世前一直没有中断。1857年,他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札记》一文中涉及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成为他后来编写中国文学史专著的前奏。他将中国小说分成四类。即志异型,如《水浒传》;历史型,

---

①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С. 323.

②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О роли русской китаистики XIX в. в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③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82. С. 60.

如《三国志》;戏剧型,如《西厢记》;表现人民内心生活、无情鞭挞社会罪恶的小说,如《红楼梦》和《金瓶梅》。他认为只有第四类才是真正的小说。他说,《红楼梦》的情节如此动人,"说实话,在欧洲也难以找到如此出色的作品。"① 他对圣彼得堡大学重视收藏中国文学作品并拥有其他图书馆无法望其项背的125种长、短篇小说感到高兴。

1880年王西里出版了在世界汉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俄国汉学赢得极大荣誉,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包括中国学者李明滨、郭延礼②以及俄罗斯学者艾德林(Л. З. Эйдлин)、李福清等人的认同。但是,长期以来国人并不知道王西里文学史的存在,公认翟理斯(A. Giles)为该领域的鼻祖。③

在《中国文学史纲要》前言中,王西里这样写道,"用欧洲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概论至今没有问世。我们仅仅知道伟烈亚力的那部干巴巴叙述④,而那只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简明,而非总目)中提到的书目清单。"⑤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将中国典籍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既没有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也未对其意义加以评价,算不得文学史。另据张国刚先生研究,德国汉学家硕特于1854年在柏林出版了《中国文学述稿》一书。⑥ 硕特的著作内容包括中国经典、道教文献、佛教文献、荀子等思想家、国家与民族学、统计资料、历史著作 、语言学著作、手工业技术书籍、文艺作品等13章。此作已经具备了中国文学史的架构,但在内容上更像是各种汉籍书目的罗列,缺乏对作品内容和意义的分析。而且,作者所参考的文献大多是欧洲汉学家的译作,而非中文原典。单就出版年代上讲,硕特的《中国文学述稿》应该被视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

①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② 郭延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

③ 郑振铎写道,"但文学史之成为'历史'的一个专支,究竟还是近代的事。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之事。翟理斯(A. 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自称为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在公元1901年。中国人自著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页。后来他又专门为翟氏著作写过书评。

④ 这里指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1867年于上海出版的《中国文献纪略》——笔者注。

⑤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24-25.

⑥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第24页。

著作。而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尽管出现在硕特之后，但却是第一部由精通汉语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就每个文学发展阶段的作品和作家进行科学评论的通史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西里的文学史应该被视作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纲要》是作为科尔什（В. Ф. Корш）与李克尔（К. Л. Риккер）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的一部分，与古埃及和古印度文学合编为第一卷，1880 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全书由 15 部分组成，主要是从分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影响着手，兼论其他宗教与哲学流派，将哲学、历史、宗教、自然科学、文学等领域的文献尽收其中，无一例外地纳入了文学的范畴。中国古代文献一般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其中只有“集”才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纲要》全书 163 页的篇幅中，只有 13 页（《中国人的美文学》和《民间文学——戏剧、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两部分）所论述的对象属于现代意义的文学作品。所以有学者认为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更像是一本文化典籍史。①

但是，这是王西里的文学史，反映了王西里的中国文学观，即将中国所有的文化典籍都视为文学作品。实际上，他对中国文学的基本观点早在该书问世前 20 多年就已经形成了。他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札记》一文中分析了儒、释、道、伊斯兰、历史、地理等文献之后写道：“这还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一词的所有含义，还应包括美文学，读者还想了解诗歌、辞赋、戏剧、小说。而且很多人也希望我们从头到尾都讲这些内容。但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极其深刻地受到中国人文学观念的影响。对于一个在东方历史中占据显著地位的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而言，如果仅仅研究其诗歌和小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②

作为俄国 19 世纪下半期古典汉学的代表人物，在汉学没有分科的时代，他无法将精力全部用于中国文学史这一个领域。科尔什与李克尔主持出版《世界文学史》给王西里提供了一次机遇，促使年迈的他调动记忆中的中国文学知识，匆匆完成了这部著作。对于这部作品，王西里本人也并不十分满意，并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有不止一本这样的著作问世，

---

① 李明滨：俄编首部文化典籍史——瓦西里耶夫院士著《中国文学史纲要》，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三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 年。

②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会有许多人从事中国文学研究。"① 事实上，在评价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时，要以历史的目光给予客观的评价，肯定它在国际汉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而不以现代人的视角求全责备。因为是"时代与作者的个性决定了世界汉学史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方向。"②

王西里是第一个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典籍注疏进行批评性研究的欧洲学者。他的著作在受到西方汉学家赞扬的同时，其间弥漫着的过分的怀疑主义色彩也受到了同行的质疑。德国学者顾鲁柏在其著《中国精神文化：文学、宗教、祭祀》中评论道："王西里用俄文撰写的著作（科尔什《世界文学史》，圣彼得堡，1880 年，第 426 ~ 588 页）以令人惊讶的独立思考见长。这位出色的汉学家博学多才，是同行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献的阐释方面，他的观点极其激进，由于其极端的怀疑和批判风格，有时又不免陷入批评无力的境地。"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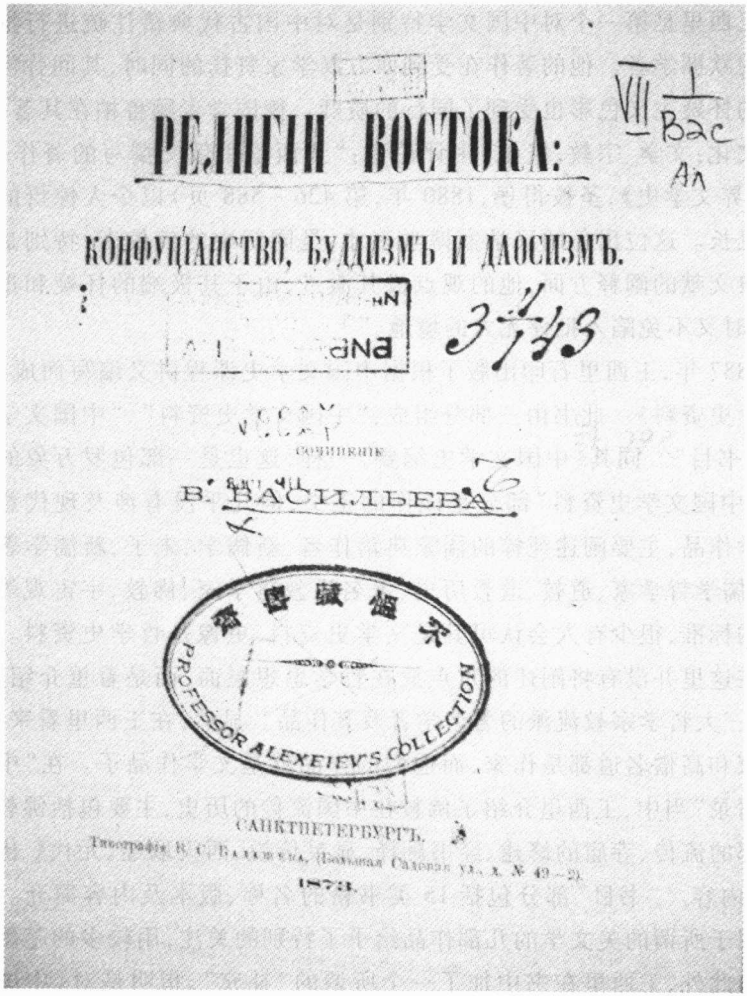
1887 年，王西里石印出版了根据中国文学史课程讲义编写而成的《中国文学史资料》。此书由三部分组成："中国文学史资料"、"中国文学史附录"、"书目"。同其《中国文学史纲要》一样，这也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资料"部分是该作的正文，但几乎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主要阐述纯粹的儒家典籍作者、新儒学、朱子、新儒学著作概述、非儒学哲学家、道教、道教历史、著名道教哲学家、佛教、宇宙观等。依现代的标准，很少有人会认可其是文学史资料，更像是哲学史资料。而王西里在这里并没有将阐述的重点放在哲学思想层面，而是着重介绍了儒、释、道三大哲学宗教流派的著名学者及其作品。显然，在王西里看来，那些哲学家和高僧名道都是作家，而他们的作品就是文学作品了。在"中国文学史附录"当中，王西里介绍了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主要包括佛教在中国南部的流传、寺庙的修建、经书翻译、显灵传说、西天取经、元代《佛祖通载》等内容。"书目"部分包括 15 类书籍的名称、版本及内容简介。王西里对属于所谓的美文学的几部作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用较多的笔墨加以评介。此外，王西里在书中加了一个所谓的"补充"，指明是对《中国文学

①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1-2.

② Эйдлин Л. З. К девяностолетию выхода в свет первого очерка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 Вып. 11. М. , 1971.

③ Грубе В.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елигия, культ/Пер. П. О. Эфрусси. СПб. , 1912. С. 79-80.

史纲要》的补充，内容主要涉及地理、中国律法、农书和自然科学书籍等内容。可以说，《中国文学史资料》进一步证明了王西里独特的中国文学观，即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宗教、哲学、历史和地理文献，而美文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始终受到前者的深刻影响。


РЕЛИГІ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І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Ъ И ДАОСИЗМЪ.

СОЧИНЕНІЕ

В. ВАСИЛЬЕВА.

PROFESSOR ALEXEIEV'S COLLECTION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1873.

王西里《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 年版

（四）中国宗教研究

王西里非常重视对宗教的研究，并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宗教那样

帮助我们认识人的本性。"① 王西里对于儒学的研究主要反映在1873年出版的《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一书中。他首先提出了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并认为这可能由于各人的判断标准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答案。他认为"儒学与其他宗教有很大不同,即使与东方的宗教相比也有差别,因为后者总是与西方的宗教有某些相似之处。"② 他从分析《春秋》、《尚书》等儒家典籍产生的过程入手,对儒学的起源以及孔子作为缔造者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儒家典籍当中,王西里先后完成了《论语》和《诗经》的翻译,前者刊登在《汉语文选第二卷释读》上,后者发表在《汉语文选第三卷释读》中。王西里视《论语》为汉学专业学生必读书,将其作为圣彼得堡大学汉学专业四年级的必修课。王西里认为,儒家经典十三经最终形成于11世纪,孔子的作用只是通过阅读当时宫廷收藏的典籍和档案获得了写字的本领,并且将之加以推广。他只编写过两部著作,一是《诗经》,二是《春秋》。儒家将历史给予了人民,并且从道德和礼仪出发对其中的某些史实进行了阐释。此外,《中庸》中的思想使儒学成为一种"比任何已知宗教更具宗教色彩"的宗教。"如果说佛教还将人与神加以区分的话,而儒家的圣人看上去就是我们所称的上帝或创世者,神天仙地赐福给人间与其活动直接相关。"在王西里看来,宋明理学是一种新的宗教,在使儒家学说更加系统化的同时,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他不承认中国存在具有形而上学特征或者严密逻辑的哲学体系。③

王西里是一位杰出的佛教研究者,以至于学术界公认其佛教研究的学术价值最高。④ 按照尼基福罗夫(В. Н. Никифоров)的说法,王西里"与所谓的南方佛教研究者相反,研究了北方宗教,为后来的学者指明了道路。"⑤ 王西里开始研究佛教问题主要是受到了老师科瓦列夫斯基的影响。学习蒙古语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佛教知识,否则就难以阅读充满佛教知识的蒙语文章。所以在王西里早期的科学活动中佛教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他的学士学位论文《佛教文献之精髓》就是利用老师在北京雍和宫获得的

---

①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 1.

②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 16.

③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 50.

④ Завадская Е. В. В. П. Васильев-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 буддологии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 Под ред. Л. С. Васильева. М., 1974.

⑤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1970. С. 12.

《金光明经》蒙古文本完成的。王西里介绍了《金光明经》在《甘珠尔》中的地位,并对其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分析。而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佛教的哲学原理》的研究对象为三部蒙古文本的佛教文典,同样是科瓦列夫斯基自北京购得。为了深刻参悟佛学思想,王西里重点对佛典中的概念加以分析和考证,这在欧洲佛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显得尤为必要。沙斯基娜写道:"假如王西里硕士学位论文当时能够出版,东方学界就能够提早 50 年了解佛教哲学的北方形态——喇嘛教。"① 后来,王西里利用在北京居留的近 10 年时间,掌握了对于佛教研究至关重要的藏、梵、汉、满等语言,得以阅读大量佛教文献,获得对这一庞大的宗教体系的深刻认识。他在北京期间就编著了多卷本的巨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他在 1857 年出版的《总论卷》的序言中写道:"面前的这本佛教总论只是我著作的一小部分,只是一个导论,这里简要介绍的内容在后面还要展开论述。这部书一共包括以下内容:《翻译名义大集》阐释的佛理、佛教文献述评、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玄奘印度游记。各部分间有机联系,囊括了几乎所有的佛教知识。"② 王西里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计划庞大,但当他 1850 年回国后才发现,俄国人对他的研究几乎没有兴趣,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愿意出版卷帙浩繁而又如此专业的著作。最后王西里只出版了《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的《总论卷》和《印度佛教史》(1869)。这两卷后被翻译成了德文和法文,并被视为欧洲佛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大大超越了之前所公认的佛学研究。③ 在《总论卷》中,王西里将包括世友的《异部宗轮论》、鸠摩罗什所译《龙树菩萨传》在内的许多佛典翻译成了俄文。《印度佛教史》为王西里从藏文翻译而来,原作者是藏族学者多罗那他。

但是,这一小部分发表的作品不能完全代表王西里在佛教研究领域的成就。他从中国带回的内容包括佛教文献译文、摘录、述评的数千页手稿最终也未能发表,有的已经散失。在王西里的佛教研究手稿中,规模最大的是《佛教术语词典》。该词典主要是王西里对梵藏合璧的《翻译名义大集》(《大分解辞汇》)的俄译。《翻译名义大集》是赤祖德赞普在位时期为

---

① Шастина Н. П.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как монголовед//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и филолог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СО АН СССР. Бурят. фил. Ред. Б. В. Семичов. Улан-Удэ, Вып. 4. 1970.

② Горбачева З. И. , Пертов Н. Н. , Смыкалов Г. Ф.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вед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③ Завадская Е. В. В. П. Васильев-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 буддологии в России.

厘定佛经译语而编写的一部规范梵藏翻译的工具书，完成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元代在原书词条后增添了蒙文，清代又补译了汉文，成为梵藏蒙汉对照的写本。[①] 王西里在1855年发表的《喀山大学图书馆藏部分佛教历史典籍》一文中叙述了他发现、研究并翻译《翻译名义大集》的过程。王西里参考了众多藏汉词典，比如宋僧法云编的《翻译名义集》、明代一如所编《三藏法数》等，为原本没有释义的词条进行了阐释。按照王西里的设想，他的《佛教术语词典》应收录9565个佛教词条。在王西里的档案中保留有该词典的两卷手稿，第一卷1205页，第二卷922页，但不是每一页都完成了，有些页的释意部分还空着，只有梵文术语及其藏、蒙、汉语译文。从已完成的数目非常庞大的词条看，大部分释义准确，内容丰富。王西里在去世前两周曾经建议圣彼得堡科学院出版这部词典，但没有被核准。

王西里遗留下来的另一部手稿名为《佛教文献述评》，共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佛教各流派文献述评》，主要参考了章嘉呼图克图的著作。这部分同样没有完成，只写了四章(小乘、有宗、空宗和律宗)，收录了大量译成藏语和汉语的梵文佛经。如此详细的佛教经典也许在高迪爱(Henri Cordier)的《西人论中国目录》中可以找到，但如此深刻的研究和详细的论述在19世纪的欧洲汉学家中恐怕只有王西里能够做到。在第二部分中翻译了1654年由智旭和尚编撰的《阅藏知津》。这部书对中国佛教典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是一本材料极为丰富的佛教著作。

《西藏佛教史》的手稿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该书主要记述了1746年以前西藏发生的政治与宗教事件，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学者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第二部分写成。书后附录了由王西里按照欧洲纪年方法翻译的松巴堪布编写的历史年表。作为西藏人撰写的西藏史，这是成书年代最晚的一部(1747)，对其进行翻译和研究不仅对俄罗斯佛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证明王西里是俄罗斯第一位研究西藏历史文献的人。

还有一部手稿叫《玄奘印度游记》，是王西里对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全文翻译。此外，他还翻译了印度佛教中观派的主要论著《百论》等大量

① 尹伟先：藏语文词书编纂简史，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1期。

佛教文献，现在都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①]

王西里的道教研究同样具有开拓意义。他对道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史资料》、《中国文学史纲要》以及《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中。在这些书中，王西里都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中国的道教思想，不仅介绍了作为一种哲学的道家学说，而且详细分析了后期作为宗教的道教基本教义。在俄国汉学史上，王西里是第一个对道教进行过深入思考的汉学家。

首先，他研究了道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按照陶奇夫（E. A. Торчинов）的观点，这在世界科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其次，王西里对早期道教文献版本进行了考证。第三，他所翻译的《道德经》片段，显示了他对道家哲学问题的深刻理解。但是，王西里对于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道教核心概念“道”的内涵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只在《中国文学史资料》中用了少量笔墨，而忽略了对《淮南子》、《抱扑子》等重要道教经典的研究。第四，王西里研究了“实用型”道教所宣扬的长生不老术，如炼丹、气功等。

王西里也是国际汉学史上最早对道教人物进行详细介绍的学者，在《中国文学史资料》和《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中，讲述了八仙、张道陵、东方朔等人的生平与故事。

作为一个出色的佛学专家，王西里详细探讨了佛教对道教的影响问题。他认为，佛教对于后期道教的祭祀方式、《道藏》的构成以及许多古代道教经典的内容与结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很久以来王西里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一个佛教研究者。而事实上，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型的汉学宗师，代表了那个时代汉学研究的特点。

二、国际汉学名家巴拉第

巴拉第1817年出生于地处今俄罗斯鞑靼斯坦的契斯托波耳市。1839年自愿参加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为助祭，取法号巴拉第，此后其所有著作均以这个法号署名。1840年10月传教团到达北京。从此，巴拉第开始跟随中国先生学习语言。1846年奉召回国担任下一届传教团的领班。1849年9月，巴拉第领导的第十三届传教团来到北京，一直到

① Гроховский П. Л. Буддолог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СПбФ Архива РАН）//Человек. Природа. Общество.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Пб.，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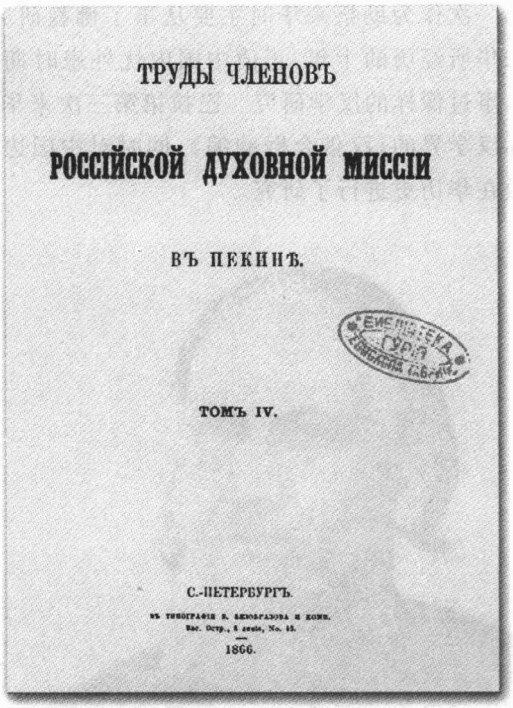
1859 年 5 月回国。1864 年俄国政府又派他担任第十五届传教团的领班。1878 年，因病去世。

巴拉第在中国长期居留，担任过两届传教团的领班。由于俄国传教团承担着宗教、外交等多重使命，所以巴拉第的在华活动一直同沙皇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着密切联系，他的汉学研究实际上只是其在完成政府指令后的次要行为。他第一次作为助祭来华时主要从事了佛教研究。第二次以传教团领班身份来华所经历的十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时期，巴拉第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从事过像样的汉学研究。巴拉第第三次来华期间，主要编写了使他蜚声国际汉学界的《汉俄合璧韵编》，同时对中国边疆史地、中国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华历史进行了研究。

巴拉第

(一)编辑出版《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

巴拉第担任教团领班时,倡议、组织并编辑出版了一部在国际汉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集刊——《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全书共四卷,


ТРУДЫ ЧЛЕНОВЪ

РОССІ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ІИ

ВЪ ПЕКИНѢ.

ТОМЪ IV.

С.-ПЕТЕРБУРГЪ.

1866.

《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
1866 年版

在圣彼得堡印行。第一卷出版于 1852 年,刊登了五篇文章,分别是:戈尔斯基(В. В. Горский)的《满洲王朝的肇始与最初业绩》和《当今中国清王朝始祖和满族民族名称的由来》、杂哈劳的《中国人口历史评述》、戈什克维奇(И. А. Гошкевич)的《中国人脂粉调制方法》、巴拉第的《佛陀传》。1855 年出版第二卷,所刊六篇文章为:杂哈劳的《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巴拉第的《古代佛教史略》、戈什克维奇的《论中国算盘》、固礼的《中国佛教徒的发愿受戒仪式》、明常(А. А. Татаринов)的《中医》、奥沃多夫(Илла-

рион Оводов)的《中国与西藏关系史概论》。第三卷于1857年出版,篇目有:晃明(М. Д. Храповицкий)的《明朝灭亡大事记》、茨维特科夫(Петр Цветков)的《中国制盐业之我见》、戈什克维奇的《山药(土豆)栽培》和《御膳用香(早熟)稻米》、明常的《中国麻醉术及水疗法评介》、茨维特科夫的《一个中国人关于长崎的札记》、《关于中国的基督教》、《7世纪景教碑》和《中国人的家庭礼仪》、巴拉第的《天津和上海间的海运》、戈什克维奇的《香港》和《养蚕》、茨维特科夫的《论道教》、叶夫拉姆比(Евлампий)的《军机处关于纸币的奏折》14篇。第四卷于1866年出版,所刊三篇文章全部出自巴拉第之笔,有《元朝秘史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中国的穆斯林》。

这部集刊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第一本汉学连续出版物,所刊文章极具科学价值。德国人卡尔·阿伯尔(Car Abel)和阿·梅克伦堡(F. A. Mecklenburg)将前三卷译成德文,编成两卷,一卷为文章,另一卷为插图,于1858年在柏林出版。

1866年5月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将《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进献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建议继续出版东方文献集刊,并将名称改为《亚洲丛刊》,获得批准。巴拉第在北京得知消息,称此举为"最近几十年来的desideratum(最迫切需要的——笔者注)"。他写道:"有多少有关我们与东方关系的文献在等见天日!前往东方国家的旅行者和公职人员留下的无数生动的描述将为集刊增色。"他甚至计划将俄国人的使华报告和游记都翻译成汉语,因为"总理衙门非常看重这类文献。"① 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二)中国宗教研究

第一次来华期间,巴拉第、王西里以及戈尔斯基共同潜心于佛教研究,从汉语、蒙古语和藏语翻译了大量佛教经籍。据王西里回忆,巴拉第在第一次来华期间总共阅读了750卷汉文佛藏。② 1843年,巴拉第完成了第一

---

① Хохлов А. Н.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эпистоля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 Отв. ред. и сост. А. Н. Хохлов. Ч. 2. М., 1979.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Академик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о П. И. Кафарове//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 4.

篇论文,题目是《中国佛教诸神及其造像概略》,介绍了佛教最重要的神及其标志物,配以亲自绘制的珍贵插图。1844 年,巴拉第完成了另外一部著作,名为《迦毗罗的学说》,该文译自汉语《丹珠儿》中的《金七十论》,共 120 页,没有发表,手稿现存莫斯科的外交部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

1852 年,他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一卷中发表了第一部佛教译作——《佛陀传》,所依据文献主要为《大藏经》中的资料。在 1855 年问世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二卷中发表了《古代佛教史略》。《佛陀传》发表后不久便被翻译成德文。巴拉第的这些佛教译作说明他的研究重点在佛教早期历史,致力于向俄国读者介绍中国佛教产生的历史、佛祖的生平和业绩以及佛教的各种仪式。

但是,在 1846 年奉召回国前,他彻底放弃了一度痴迷的佛教研究,而且再也没有回头。临行前,他将自己所有佛教译文手稿赠送给了王西里。

巴拉第在晚年对中国的汉语伊斯兰教文献产生了兴趣。他在该领域一共发表了三部著作。第一部名为《中国的穆斯林》,1866 年发表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上。文中概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发展历史,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和生活习俗,并对一些重要的民族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写道:"将中国的穆斯林称作鞑靼人是何其谬误,似乎所有的穆斯林都是鞑靼人。鞑靼人是突厥部落的一支,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语言方面,都跟中国的穆斯林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穆斯林即便从前曾经受到过突厥部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早已为中国大量的穆斯林居民所淹没,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①

第二部著作是《伊斯兰教汉文文献(对中国伊斯兰教教徒刘介廉编汉文伊斯兰教文集〈御览至圣实录〉的编译)》。在俄驻华使馆医生贝勒(Э. В. Бретшнейдер)的帮助下,1877 年发表在《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十七卷上。巴拉第的第三部伊斯兰教著作是他的遗稿,书名仍是《伊斯兰教汉文文献》,发表在《俄国皇家考古学会著作集》1887 年第十八卷上,共 334 页。其中只有《御览至圣实录》译文已经在 1877 年发表过。阿拉伯学家罗津(В. Р. Розен)和阿多拉茨基神父分别为该书撰写了前言和导论,回顾了这部书稿的历史并简要介绍了伊斯兰教文献,称巴拉

① 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 П. И.). О магометанах в Китае//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Т. 4. Пекин, 1910.

第利用了当时仅有的30种汉文伊斯兰教文献中的25种，其中包括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张时中的《四篇要道》，马注所撰《清真指南》，马伯良的《教款捷要》，伍遵契的《归真要道》，张忻的《清真教考》、《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和《天方三字经》，余浩洲的《真功发微》，金北高的《清真释疑》，舍起灵的《归真必要》和《研真最语》，蓝煦的《天方正学》，以及作者佚名的《天方尔雅》、《省迷真原》和《普批百条》等。1977年，潘斯卡娅(Ludmilla Panskaya)与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共同对巴拉第的中国伊斯兰教著作进行了研究，著成《巴拉第〈伊斯兰教汉文文献〉介绍》一书。作者介绍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和巴拉第生平，分析了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著述，翻译了罗津和阿多拉茨基所撰前言与导论，最后附有著作目录及注释。①

此外，巴拉第还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研究。1872年在《东方文集》第一卷发表《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他在文中提供了大量有关祆教、摩尼教和犹太教的资料信息。在撰写该文过程中，巴拉第不仅参考了西欧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利用了29种汉文书。但他仍然认为材料不足，无法就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伯希和在《中亚及远东基督教徒研究》一书中评价道："巴拉第大司祭发现了《至顺镇江志》，当时被认为是无名氏之作，其实这是俞希鲁的作品。《至顺镇江志》中的记载多次印证了马可·波罗的叙述。"② 1875年，巴拉第在《教务杂志》用英文发表了《13世纪蒙古与中国的基督教遗迹》，内容上与1872年《东方文集》的俄文稿子多有重复，后来维诺格拉多夫在其《东方圣经史》中将巴拉第英文版本翻译成俄文发表。

(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巴拉第同样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对蒙古历史的研究至今为历史学家们所看重。特别是他对《元朝秘史》的翻译和研究，使他成为俄国蒙古历史研究的大家。1866年，巴拉第在《俄国驻北京

① Panskaya, Ludmilla. Introduction to Palladii's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uslims. Canberr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Pr. , 1977. P. 32. 高桂莲：国外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概述，载《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Panskaya, Ludmilla. Introduction to Palladii's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uslims. P. 34.

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发表了《元朝秘史译注》(《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原文据《永乐大典》汉译本。巴拉第的译文准确、文笔优美,作了660条注释,并撰有前言,介绍了《元朝秘史》的成书历史以及万光泰、钱大昕、徐松、张穆和何秋涛等学者的校勘和研究工作。

巴拉第的第二部蒙古学译作是译自《皇元圣武亲征录》的《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1877年发表在《东方文集》上。巴拉第依据的原稿《皇元圣武亲征录》抄本原属于何秋涛,后者花十年时间进行研究,但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刊印。巴拉第从何秋涛处得到了这部抄本,翻译成俄语并加了注释。他写道:"何秋涛研究了数年,依然无法彻底解释清楚……他本来计划刊印校注过的《亲征录》,但作为一个穷书生,他积聚不到足够的印刷资金。在我行将离开北京之际,我从何秋涛处获得了他亲手抄录并校勘过的《亲征录》。"① 巴拉第将《元朝秘史》书名俄译为《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而将《皇元圣武亲征录》俄译为《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证明其对蒙古早期历史研究,特别是成吉思汗崛起问题的重视。

巴拉第的第三部蒙古学译作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发表于1866年《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在译本前言中,巴拉第介绍了全真教的起源和教义,叙述了丘处机拜见成吉思汗的缘由、《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成书历史以及文本的真伪问题。他所作的有150页之多的600条注释,反映了他对这部游记的研究心得。巴拉第也成为"第一个将这部重要的13世纪蒙古历史文献介绍到俄国和欧洲的学者。"② 据蒙库耶夫(Н. Ц. Мункуев)研究,"巴拉第的译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全译本。尽管需要根据最新的汉学和蒙古学研究成就加以修订和补充,但依然不失其价值"。③

巴拉第的另外一部蒙古学译作是《中国人张德辉在13世纪上半叶的蒙古游记》,发表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论丛》1867年第九、十卷上。巴拉第的这篇译文译自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了注释。

---

① Мункуев Н. Ц.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Тай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ов".

② Мункуев Н. Ц.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Тай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ов".

③ Мункуев Н. Ц.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Тай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ов".

1869年巴拉第奉命前往南乌苏里江地区进行民族学考察。他从北京出发，经过东北地区到达海兰泡，然后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又溯乌苏里江而上，到达南乌苏里地区。他在那里一共待了一年的时间，期间向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寄回了大量报告。1873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决定授予巴拉第小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学会出版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民俗与地理内容的文章。

1872年，巴拉第在《东方文集》第一卷上发表了《14世纪在中国的俄国俘虏》一文，介绍了元朝时期被蒙古大军从罗斯掳到中国的罗斯人的情况，追述了中俄两国的最初交往。1902年，《俄国皇家考古学会公报》第三十八卷上发表了巴拉第的文章《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评马可·波罗的华北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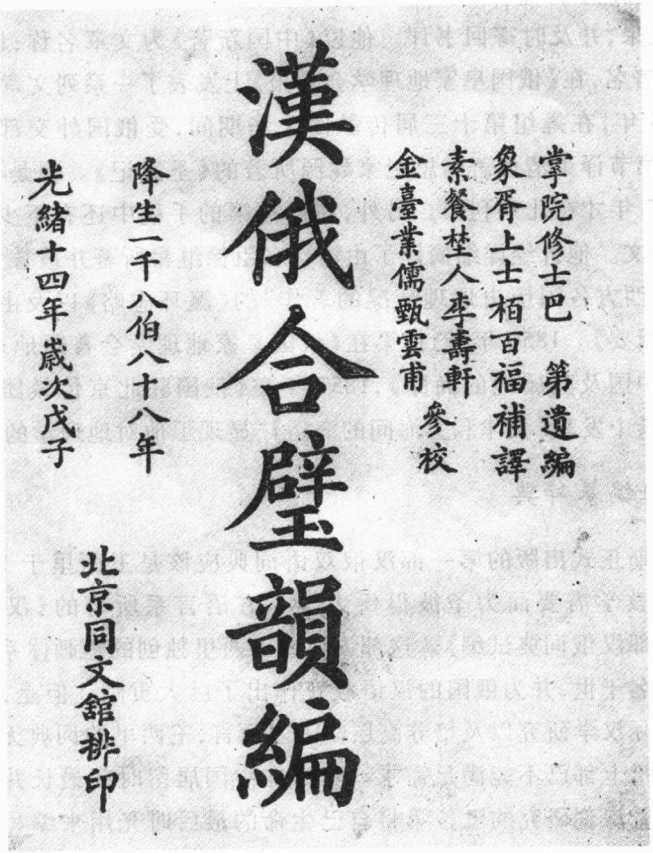
此外，作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巴拉第密切关注中国舆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及时寄回书评。他以《中国新著》为文章名称，以"北京通讯员"为署名，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1848年，在筹组第十三届传教团来华期间，受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指示，巴拉第节译了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所著的《圣武记》。但是，他的译本直到1907年才在北京刊印。另外，在巴拉第的手稿中还有不少清代学者著作的译文。他曾经详细摘译了由清代名臣徐继畬所著并被誉为"晚清第一部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情况的著作"的《瀛环志略》以及由壁昌所著之《守边辑要》。1850年，巴拉第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普通地理学论丛》上发表《中国及其属地的商路》，1857年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三卷中发表《天津和上海间的海运》，显现了他对地理学的兴趣。

（四）编纂辞典

俄罗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汉俄双语词典应该是王西里于19世纪60年代出于教学需要而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所著的《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这部词典以王西里独创的笔画体系以及语音体系而闻名于世，并为俄国的汉语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于日益深化的国际汉学研究以及培养高层次人才而言，王西里的词典无论在词汇量和信息量上都已不能满足需求。作为在中国居留时间最长并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研究的巴拉第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用来编写一部内容尽可能完备的大型汉俄辞书——《汉俄合璧韵编》。巴拉第从1871年开始编写，也就是他完成了所谓的南乌苏里地区考察回到北京后，并为此付出了七年多心血。在编写过程中，巴拉第参考了《康熙字典》、《正字通》、《诗

韵音义注》、《韵综》、《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谐声品字笺》和《字贯》等中国辞书，同时还使用了安文公（Д. С. Честной）和公神甫的字典手稿。可惜的是，他生前终究未能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就客死马赛了，手稿留在了北京。《汉俄合璧韵编》的手稿由法剌韦昂花了一年时间抄写誊录，最后由柏百福补编完成，1888 年由北京同文馆出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Ⅲ）为在北京出版《汉俄合璧韵编》拨了专款。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俄驻华公使倭良嘎哩（А. Е. Влангали）以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季诺维耶夫（И. А. Зиновьев）的鼎立协助。这是俄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正式出版辞典之一，同时也是俄国在中国境内印刷的第一部大型汉俄辞典。


漢俄合璧韻編

掌院修士巴 第遺編
象胥上士柏百福補譯
素餐埜人李壽軒
金臺業儒甄雲甫 參校

降生一千八伯八十八年
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

北京同文館排印

巴拉第、柏百福《汉俄合璧韵编》1888 年版

《汉俄合璧韵编》封面上写："汉俄合璧韵编。掌院修士巴第遗编，象胥上士柏百福补译。素餐尘人李寿轩、金台业儒甄云甫参校。北京同文馆排印。"分上、下两卷，1300 余页，由前言、正文和偏旁索引三部分组成。柏百福在前言中简要介绍了巴拉第的生平以及著作。正文收录 11868 个汉字，按照俄语字母表依韵排列，最后附有检字表、部首表以及繁难字检字表。

辞典中的词组搭配选例非常丰富，比如，在"天"字下包括 196 个词组，"道"字下列举了 105 个词组。此外，在词条的释义上，该辞典与普通词典有很大不同。巴拉第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将自己的辞典编写成一部普通的汉语学习工具书，而是竭力要使其成为一部"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他发平生之所学，尽可能地在词汇本义之外提供详尽的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的知识，以至于个别词条几乎就是一篇内容翔实、观点分明的学术论文。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对《汉俄合璧韵编》的编写构想。他希望自己的这部辞典能够表达他对中国各方面的看法，应该容纳有关中国的各种知识，重点解释中国哲学和宗教方面的问题，从而赋予其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的性质。

这部巨著的出版成为俄罗斯汉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的一件大事。时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著名汉学家丁韪良（W. A. Martin）不仅为在同文馆印刷辞典提供了积极协助，而且在 1889 年 8 月 10 日的《中国时报》发表书评《巴拉第和柏百福的辞典》。他写道："今年在俄罗斯汉学史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作品。该辞典的第一作者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将自己科学研究生命中的最后八年奉献给了它的编写……尽管辞典一般都有过时的时候，但这一部在短时间内不会被超越和遗忘。"① 这部辞典在 19 世纪末享誉欧洲，成为各国汉学家重要的研究工具书之一。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巴拉第·卡法罗夫编写的词典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中国的词典也不能提供帮助时，卡氏的词典经常是'最终的论据'。"② 阿理克在巴黎学习时发现，伯希和甚至要求法兰西学院的学生认真学习俄语，目的只是为了能够使用巴拉第的辞典。

---

① W. A. P. M. Palladius and Popoff's Dictionary, The Chinese Times, Aug. 10th, 1889.

② ［俄］阿列克谢耶夫著，阎国栋译：《1907 年中国纪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74 页。

巴拉第一方面在协助俄国政府侵华方面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北京外国侨民界以及俄罗斯佐领中享有不错的口碑。巴拉第与许多清朝舆地学家有个人交往，在翻译和研究过程中注意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他们的帮助。他从何秋涛处获得《元朝秘史》和《皇元圣武亲征录》，从徐松的后人手里获得了珍贵的西夏国地图。他也重视关注清代学者的论著，曾经翻译过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以及壁昌所著之《守边辑要》。与此同时，他与北京威妥玛（T. F. Wade）、卫三畏、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丁韪良等欧美汉学家过从甚密。远在欧洲的汉学家也经常寻求巴拉第的帮助，比如，儒莲请他找寻清代官修地方志《西域图志》和由张廷玉、鄂尔泰、汪由敦等奉敕编的《日讲礼记解义》。[①] 巴拉第去世以后，丁韪良于1889年8月6日在宝珠洞撰《巴拉第大司祭》一文，详细介绍了他的生平，列举了他的主要著述。[②] 据说巴拉第个人品行很好，行事稳重内敛，不但受到同行学者的赞扬，也赢得了俄罗斯佐领的“爱戴”。后者在获悉巴拉第去世后为其制作了一块匾，上书“恭纪遗爱，以永终誉”，悬挂于教堂之中。另有中国教徒赠送挽联多幅赞扬“巴大神父”的贡献，如“上帝居歆，以义制事，以礼事神，修身以道，皇天辅德，言坊行表，敷教宽平”[③]等。

三、笃信孔孟的格奥尔吉耶夫斯基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年出生，1868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毕业后在科斯特罗马实科中学做了两年俄语与历史教师，1875年来到俄国东方学教育的中心——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880年毕业后进入了莫斯科的一家叫做“波特金氏”的贸易公司。这是一家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俄国商行。因业务所需，他于次年被派到中国，1882年回国，期间他到过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张家口和福州等地。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回到俄国后再次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885年，他抱病完成

---

① Хохлов А. Н.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эпистоля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② W. A. P. M. The Archimandrite Palladius, Chinese Recorder, 1889, October.

③ 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 иером. 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г. Пекине или Бэй-Цзине (в Китае). СПб., 1889. С. Табл. II-я.

并答辩通过了题为《先秦史》的硕士学位论文。1889 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题为《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1890 年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在 39 岁时成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汉语教授。1893 年,他出国收集道教研究资料,遍访伦敦、巴黎和柏林各大图书馆。在回国途中,不幸因病于法国的梅茨猝然去世。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俄国汉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留给后世几部重要的汉学著作。

第一部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秦史》,1885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在书的内封面上作者工整地写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立志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将中国历史研究继续推向前进的决心。该书一共有六章,分别是:从创世至周朝之实用历史,从周朝至春秋之实用历史,从春秋至战国之实用历史,从战国至公元 221 年秦统一帝国之实用历史,中国历史文献之特点以及欧洲汉学家之中国古史观,中国古史之内容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华帝国之条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在前四章的标题中使用了"实用历史"一词,旨在说明其先秦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实用历史"这个概念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国家政治史,即以国家事务为主线;二是叙述方法以确立历史事件间相互联系及因果关系为主;三是指研究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现实的收获或启示。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首次将自己的罗马历史巨著《通史》称为 pragmatikh istoria(实用历史),意在表示其为一部以政治历史事件为主轴,注重探究其中原因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某种启示的著作。综观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先秦史》,作者很可能受到了波利比奥斯史学思想的影响。诚如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自己所说:"在前四章中,我们主要叙述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历史。"在欧洲汉学家中,他认为冯秉正、钱德明、韩国英、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理雅各、李希霍芬(B. Richthofen)、马若瑟和王西里等对中国古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在这里特别对王西里关于中国文字起源年代、儒家典籍产生、秦始皇焚书坑儒等问题提出的观点发出了质疑,并用很大的篇幅,提出了七条意见加以辩驳和论证。《先秦史》的第六章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探讨了秦始皇得以统一中国的原因和条件。通过对中国先秦历史的仔细梳理和认真分析,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在书的末尾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总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我们所研究的中国历史阶段内展开了两个进程:统一(民族的、语言的、物质文

化的、领土行政的、道德的、文字的、哲学思想的)演变为多样,多样又逐渐回归到统一(但内容已发生变化)。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华帝国的原因在于其恰好在统一进程行将完结时登上历史舞台。他不仅没有阻碍这一进程,而且利用前人遗留下来的所有手段予以推动。由于秦始皇的个人品格无法成为民众生活的核心(比如厌恶为精英人士所同情并符合人民志趣的儒学),因而秦王朝的政权无法得到巩固。"①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先秦史》是俄国汉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秦以前中国历史的力作,为世界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部是他于1888年出版的《中国的生活原则》,全书分为12章,分别为: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的原始信仰,祠堂,祠堂(续),婚姻,嫡长制、家长制、家族,多神教的发展以及对祖先祭祀的排挤,哲学对原始信仰及古老生活原则的破坏,儒学与孔子,儒家学说,经书中的儒家思想、经书对于统治帝国的意义,中国文献所体现的儒家学说发展,用法律将儒家原则纳入生活。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中国的灵魂不灭、祖先祭祀、长幼礼序、多神宗教、儒家学说等中国文化思想和现象上,其中儒家学说占五章的篇幅。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在前言中首先对"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他提醒西方人在对自己的进步沾沾自喜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也曾有过中世纪的黑暗、野蛮和愚昧,假如没有现在被他们视为东方的古希腊文明,何谈当今的西方文明。西方人确信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已经停止,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进步,而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而绵延不绝,难以发觉其前进的步伐。欧洲人之所以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已过时还在于他们习惯于将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欧洲中世纪社会形态进行对比,比如由中国的宫廷制度联想到《圣经》中的亚述王,由中国的祖先崇拜联想到希腊罗马的橄榄树崇拜,由中国的家长制联想到罗马的家长制(Paterfamilias),感到今天的中国简直就是欧洲的昨天。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给予了肯定,并在结语中通过具体的数据说明洋务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在军事、工业、通讯、交通、贸易等领域取得的明显进步,以此证明古老的帝国正在焕发生机,向光明的未来前进,而儒家学说并不是中

①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б. ,1885. С. 185-236,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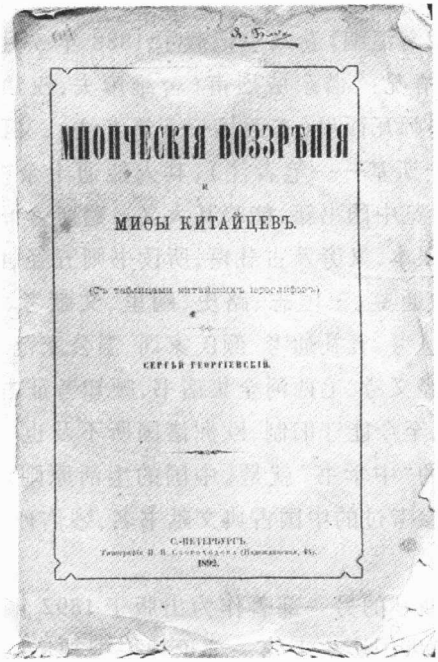
国进步的绊脚石。饶有意味的是，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不仅在俄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与意见相左者辩论，而且还向中国人发表自己的主张，告诫后者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1887 年，清朝户部主事缪佑孙出使俄国，在其回国后撰写的《俄游汇编》卷八中记载了 1888 年 3 月 27 日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向他赠书的情况："偕余威烈甫（舍维廖夫，汉语翻译，商人——笔者注）访俄之华文塾师瓦西里（王西里——笔者注），又同访格倭尔儿耶甫司克（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笔者注），其人能通十余国文字，曾游欧、亚二洲，在华数年。博览中国书籍，能晓其大义。赠所著译中学书一巨册，极称纲常大义为中国根本，又旁及古载籍，所读书则五经、四书、家语、老墨庄列、国策、国语、资治通鉴、三国志、路史、阙里、文献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渊鉴类函、陔余丛考、五礼通考、颜氏家训、温公家范、文公家礼、历代名臣奏议、古文渊鉴、经义考、毛西河全集诸书，颇知考证古事、笃信孔孟。谈次谓中国开辟最早，至今能守旧制，欧洲诸国所不及也。"①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赠送给缪佑孙的"中学书"就是《中国的生活原则》，格氏在书后汉字注释中列举了他所参考过的中国古典文献书名，缪佑孙日记所列书目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另一部著作为出版于 1892 年的《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该作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论述中国神话的著作，他也因此而成为国际汉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鼻祖。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神话观念以及神话人物进行思考。尤其是中国的上古史，经常是神人难分。可以说，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神话研究是其先秦史或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撰写此书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有《尚书》、《诗经》、《礼记》、《搜神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献通考》和《三才图会》等。按照李福清先生的研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在书中主要研究了中国人的神话观念及其演化过程，依次介绍了混沌开辟、阴阳理论、五行、自然的"天"概念演变为"天帝"等观念。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中国的星宿神话，分析了中国人关于天地之间事物对等存在的思想，分别介绍了太阳神话（羲和、后羿）和月亮神话（嫦娥、吴刚、玉兔、蟾蜍等）。在其他章节中还谈到了与自然现象（陨星、雷、虹等）及动植物相关的神话观念，介绍了中

①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 122 ~ 123 页。

国人崇奉的形形色色的守护神，如灶王爷、各种娘娘等。最后一章专论远古时期的帝王。①


МИѲИЧЕСКІЯ ВОЗЗРѢНІЯ
И
МИѲЫ КИТАЙЦЕВЪ.
СЕРГѢЙ ГЕОРГІЕВСКІЙ.
С.-ПЕТЕРБУРГЪ.
1892.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
1892 年版

在这部书中，作者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思想。他在前言中即提出把区分与分析神话观与神话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强调“必须考虑‘神话观’和‘神话’两者之间的差别：前者形成于广大民众中，而后者为个人及其集团所构造。”可以说，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神话观”概念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所谓神话观乃是某种宇宙观的基础，存在于神话故事产生之前。此外，他认为中国的神话非常丰富，有许多涉及神话典籍，但内容大都支离破碎，相互矛盾。② 与此同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还探讨了儒、释、道与神话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他

① ［苏］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6 ~ 7 页。

②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СПб. , 1892. С. V, XI.

认为尽管孔子对神话的基本态度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然而有文献显示,他同时相信部分神话传说,并加以宣传。在儒家反对神话的前提之下,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其后继者均致力于对某些神话进行“合理化”解释,直至将中国古神话历史化,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创立和维护儒家学说。[①]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提出了中国古代神话与较晚出现的道家神仙小说之间的关系。他发现道家文人常常对神话传说情节进行敷衍铺陈,写成小说,而后重入民间,丰富神话的内容,对民众的神话观产生影响。[②]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认为,佛教的传入同样起到了丰富中国神话观和神话的作用,为民间神话和道教神话创造提供了素材,而佛教神话本身也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神话宝库,比如道教中四海龙王形象就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也所有创新。首先,他对中国神话故事进行了分类。其次,他在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文本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方法。

《研究中国的重要性》是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汉学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是俄罗斯第一部中西文化比较巨著。该书具有明显的论战性质,旨在驳斥欧洲社会的中国认识模式,扭转欧洲人头脑中模糊、错误和片面的中国形象,为中国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化以及光明的未来进行辩护,激发俄国知识界抛弃陈念,重新审视被长期误读的中华帝国。全书包括前言、结语、附录和12个章节。全书论述围绕欧洲盛行的用以专指“落后”、“停滞”、“腐朽”、“保守”、“虚伪”的“中国形态”概念而展开。就欧洲人对中国的种种曲解和谬误一一进行了剖析和驳斥,其中也包括黑格尔和康德的观点。这两位德国哲学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低级阶段,其观点对欧洲中国观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很大影响。格奥尔吉耶夫斯基重点对盛行于欧洲的“‘中国等于停滞’这一公式加以批判,并通过最新的研究澄清正在被‘欧洲现象’迷们扼杀的‘中国形态’的真正含义,说明欧洲人,特别是俄罗斯人,应该如何对待中国。”[③]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分析了欧洲最重要的几部世界通史,认为这些著作中漠视中国历史的原因首先在于其

---

①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С. 116-117.

②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С. Ⅸ.

③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Пб. , 1890. Предисловие.

作者都是欧洲人，并且将欧洲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即使是早期汉学家，由于自身的学术修养缺陷以及研究领域局限，也无法将中国史籍中看上去枯燥的事件罗列加工成符合欧洲历史学家纂史标准并能为其所用的中国历史著作。即使是汉学家也从来没有对中国是落后代名词的思想进行过全面而深刻的研究。①

在这部书中，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对俄国汉学的学科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 世纪下半期，正是汉学分科开始的重要时期。他力图为汉学研究确定明确的目的。他指出，汉学家应该帮助社会树立对中国民众的新看法。他同时认为，无论是俄国的还是欧洲的汉学发展状况，都不能适应现实提出的任务。“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来说，汉学还不存在，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牢固的基础，也没有成熟的研究方法；汉学依然同单纯的翻译混为一谈，同将汉语译成某种欧洲语言的技巧视作一回事。”“汉学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科学，而应当看成是多种科学的综合。”② 他为汉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对汉学进行分科研究，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帝俄汉学。

此外，格氏在汉语研究上也颇有心得，除了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外，他还于 1888 年出版了《汉语字根构成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作者在序言中宣称论文主旨是要解释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如：“缘何汉语字典中有如此多的汉字？汉字中蕴涵着多少有关汉语本身的信息”，“希望通过分析汉语的字根来确定其成分，研究其性质”，“在语言学研究基础上得出几个有关中国人起源和民族学成分的结论。”③ 作者充分发挥其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并将之与汉语从语音上进行对比，以期确定其间的亲缘关系。阿利安语、拉丁语、俄语、梵文、教会斯拉夫语、希腊语、英语、法语、德语甚至哥特语都成为汉语的比较对象。此法从一开始便失却了科学基础。所以，该作例证牵强，结论武断，是一部不成功的著作。其实，这种方法其老师王西里已经使用过，他在 1872 年发表的《论汉语和中亚语言的关系》一文中试图解读汉、满、蒙古、

---

①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 1-9.

②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 8.

③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О корневом состав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вязи с вопросом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китайцев. СПб. , 1888. С. 4.

突厥语在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可见，在对汉字的某些认识上，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与老师是一脉相承的。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是俄国汉学史上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在俄国汉学发展的低潮时期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语专业注入了活力。他冷静思考俄国汉学的命运，首次在俄国提出汉学应是多学科总和的见解，为汉学的近代化指明了道路。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数部汉学专论，向俄国民众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象形文字、儒家学说、神话传说及神话观念，捍卫中国文化尊严，反对欧洲中心论，在俄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汉学重镇圣彼得堡大学

19 世纪中期，沙俄利用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局势，践踏中俄《尼布楚条约》，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先后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我国大片领土，获得了在中国境内通商、传教等方面的特权。随着东方在俄国对外关系天平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加强对东方的研究日显重要。从前小规模分散的东方学教学已经不能适应沙俄对外扩张政策对实用人才的需求，同时也不利于科学院和外交部对其教学情况进行直接管理和监督。因此，集中建立一个东方语言人才培养基地的计划在俄国逐渐形成。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 1855 年 8 月 27 日建立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俄国东方研究中心和东方语言人才培养基地。俄国汉学研究的主要据点也从喀山大学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转移到了圣彼得堡大学。

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包括九个教研室：阿拉伯语教研室、波斯语教研室、突厥鞑靼语教研室、蒙古—卡尔梅克语教研室、汉语教研室、犹太语教研室、亚美尼亚语教研室、格鲁吉亚语教研室和满语教研室等，建立了五个专业：阿拉伯—波斯—土耳其—鞑靼语专业、蒙古—卡尔梅克—鞑靼语专业、汉满语专业、犹太—阿拉伯语专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鞑靼语专业。王西里成为第一任汉、满语教研室主任，波波夫成为蒙古语教研室主任。①

---

① Куликова А. М.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актах (конец XVII в. - 1917г.). С. 47-48.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教师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经历了不断的改革和变化。1863 年,东方语言系奉命改组,将汉语教研室和满语教研室合并为汉满语教研室。1864 年,汉满语专业和蒙古—卡尔梅克—鞑靼语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名为汉满蒙卡语专业。1870 年,东方语言系开始讲授日语,并将其并入汉满蒙语专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898 年成立单独的日语教研室为止)。从 1878 年起,王西里教授担任东方语言系主任。他极力主张增加东方语言系专业数量,于 1882 年建议增开藏语、朝鲜语等新语种教学。

20 世纪初,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取得进一步发展。1908 年,汉满语专业分化成两个专业:汉满语专业及日汉语专业。1913 年,为适应形势需要,东方语言系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和考试规则,以取代 1884 年的旧规则。新计划的主要特点是细化了教师的专业分工,又一次调整了专业设置。这时的东方语言系一共有七个专业:阿拉伯—波斯—突厥—鞑靼语专业、汉满语专业、蒙满鞑靼语专业、日汉专业、犹太—阿拉伯—叙利亚语专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语专业、梵文专业。从专业设置可以看出当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规模以及汉、满、蒙等中华语言在教学中所占地位。到 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前,东方语言系一直是依据 1913 年的计划来从事教学及科活动的。

(一)汉学教育

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教研室随东方语言系一同成立,由王西里教授担任主任。从1855年到1900年,王西里一直在这里教书。汉语教研室建立伊始,王西里讲授四个年级的所有主要课程。1876年他从编内教授荣升功勋教授,仍继续担任汉语专业的教学工作,1893年退休后才由通常的每周六学时减少到每周两学时。在王西里去世的1900年,他依然在给学生上课。因此可以说,"汉满语教研室历史上的头45年是与王西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①

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教学方案是王西里在喀山大学汉语教学计划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趋于稳定,并一直维持到阿理克教学活动开始之前。与18世纪科学院和外务院开办的满汉语班、恰克图华文馆以及喀山大学相比,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教学方法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不再套用中国传统教学方式,试图确立具有俄国特色的大学汉语教学模式。总结起来,王西里制订的教学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汉语导论,也就是汉字和汉语语法教学。二是翻译,译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中俄关系等。三是专业课程,如文学历史等。四是口语和书法课程。

作为唯一的汉语教授,王西里编写了大量教材,以满足教学需要。为了解决长期困扰欧洲汉语教学的汉字识读问题,王西里在北京时期就已经开始构思自己的汉字解析方法。经过在圣彼得堡大学十余年的教学实践,终于编写出《汉字解析》和《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前者主要阐释汉字的特点和结构,后者介绍了他发明的汉字笔画体系。关于这两部教材的内容和特点,在前文中已有介绍。《汉字解析》"显著地减轻了汉字学习的难度,变死记硬背为有意识地掌握汉字的结构。"而《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则"被看作是革命前以及革命后大部分汉俄词典中最合理的体系。"② 认识汉字特点和掌握记忆方法是导论课程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王西里也讲授汉语语法。针对欧洲有学者提出的汉语

---

① Петров В. В.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Точность-поэзия науки: Памяти Виктора Васильевича Петрова: Сб. ст. СПб., 1992.

② Петров В. В.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中没有语法的观点，王西里表示反对，并相信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不可能没有语法规则，但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的论证。从他开始，主要使用比丘林的《汉文启蒙》教授汉语语法，同时辅以雷慕沙和马礼逊编写的语法教材《汉文启蒙》和《通用汉言之法》。

阅读课是圣彼得堡大学重要的汉语习得课程。王西里编写的《汉语文选》包括三卷。第一卷问世于1868年，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俗谚、生活原则、笑话、康熙家训、中国小说、本朝军事行动史。内容取自《增广贤文》、《庭训格言》、《聊斋志异》、《圣武记》、《论语》和《诗经》等。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收录了《论语》和《诗经》。与这三卷教材相配套，王西里编写了三卷《释读》，对文选中的文章逐字逐句加以解释和翻译。第二卷、第三卷《释读》实际上就是《论语》和《诗经》的译文与阐释。王西里编写的这套汉语文选在圣彼得堡东方语言系长期使用，对培养学生汉语阅读和理解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西里在圣彼得堡大学继续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此课程由王西里于1851年在喀山大学首创，具有概论性质，根据《文献通考》、《四库全书》以及自己的笔记对中国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①] 受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法影响，王西里将经、史、子集四类文献全部归入中国文学。他为此出版了两种教材，一是《中国文学史纲要》，二是《中国文学史资料》。这两本书在前文中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总之，前者具有研究性质，是王西里在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学史过程中的心得，而后者具有书目性质，为中国主要文化典籍的分析和介绍，其中儒释道内容占有绝大部分篇幅。

王西里非常重视中国历史教学。早在喀山大学期间他就已经开始讲授中国历史课程了，到达圣彼得堡之后，他对讲义又进行了更新和充实。他在历史和地理教学中始终使用自己在北京时期编写的12张中国各朝代历史地图，其中一幅至今直悬挂在他讲课的教室中。[②] 王西里为所有年级开设“中国文化史”课，主要讲授儒学和佛学。

圣彼得堡大学汉语教师分成两类，一类是基础课教师，一类是实践课教师。1917年以前，在这里主要担任基础课教学工作的教师除王西里外，还有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伊万诺夫斯基、孟第、柏百福、伊凤阁和阿理克。

---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 162.

②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С. 269.

实践课教师的构成比较复杂，既有俄罗斯人，也有中国人，到后期则主要是中国人。基础课程与实践课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圣彼得堡大学培养素质全面的汉语人才发挥了作用。

从19世纪80年代起，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开始接手汉语教学。他的教学内容也很丰富，但已经显现出与王西里的某些不同之处。他为一年级开设了两门从前没有的课程，一是“汉语语言和文字之主要特性”，二是“当代中国地理及政治结构”。前者属于语言导论课程，后者具有国情课程的色彩。他为二年级学生开设四书翻译，在学习语言的同时，阐释儒学的基本思想。在格氏的指导下，三年级学生主要练习翻译理学名著《性理精义》。与此同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还首次在俄国汉学教育史上将清代诗文集《古文渊鉴》引入大学课堂，使之成为四年级学生学习和练习翻译的教材。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去世之后，伊万诺夫斯基于1894年继续汉语教学。他主要根据王西里制订的方案实施汉语教学，部分结合了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经验。他为一年级开设“汉语学习导论”，内容主要为汉字、汉语语法以及浅文翻译。二年级学生翻译《论语》，三年级学生翻译《诗经》，四年级学生翻译《性理精义》。1894至1895学年度伊万诺夫斯基开设了“中国文学概论”。1895至1896学年度，伊万诺夫斯基为一、二年级开设了“中国政治结构概论”。他使用的教材主要为王西里编写的《汉字解析》与《汉语文选》等。

1900年是圣彼得堡大学汉语教学史上最为艰难的一年。是年4月27日王西里病逝，就在这一天，伊万诺夫斯基入院治疗。由于波兹德涅耶夫早在1899年就已调走，新留校任教的彼·施密特（П. П. Шмидт）和鲁达科夫（А. В. Рудаков）也被派到海参崴工作，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汉满语专业只剩了孟第和时有时无的中国先生。年近古稀的孟第担任了所有课程的教学。既教基础课，也教实践课。他为所有年级开设口语课程。同时，他还为一年级的学生开设汉语基础课，用的教材是比丘林的《汉文启蒙》、《清文启蒙》、《三字经》等。从《红楼梦》和《好逑传》中摘选材料给二年级学生阅读，同时讲授汉语白话语体的语法特色。高年级同学在他的指导下阅读历史文献、公文信札、中俄约章等，材料来自《史记》、《京报》和威妥玛的《文件自迩集》。

1902年，柏百福回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他为一年级学生讲

授“汉语学习导论”，并于1908年在讲义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汉语学习导论简编》。他为二年级学生讲授难度稍大的口语体裁文章翻译，同时使用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和王西里的《汉语文选》作为教材。自1905年起柏百福主要给三、四年级开课。他为三年级学生讲解古文阅读与翻译，使用资料主要有《孟子》、《圣武记》、《聊斋志异》、《红楼梦》以及日本刊印的《十八史略》。四年级学生学习内容主要为《论语》、《京报》、1881年彼得堡条约文本以及李鸿章的奏折。除《论语》外，其他内容均是柏百福从北京带回的鲜活资料，与中俄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显示出柏百福借鉴国际汉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尝试将圣彼得堡大学汉语教育更加贴近时局需要。他在教学之余致力于新教材的编写工作，先后出版了三册《汉语文选》。特别是在第二册文选当中，柏百福精心收录了21首唐诗，改变了圣彼得堡大学几十年来中国诗歌只学习《诗经》的传统。①

从1905年开始，伊凤阁接替柏百福担任一、二年级教学。伊凤阁为一年级学生开设汉语导论、官话语法、浅文读译课程。除了使用王西里编写的教材外，他也辅以其他材料，如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的第三部分《40课》。伊凤阁指导二年级学生阅读中国话本小说《今古奇观》，后来增加了历史、法律文学阅读。他还恢复了王西里曾经开设过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其授课内容与老师如出一辙，为中国文献典籍的全面概述，儒释道经典依然占有绝对比重。伊凤阁编写的汉语学习教材有《1906～1907学年度东方学班汉语读本》、《汉语初级读本》、《汉语草书学习指南》、《汉语初级读本词汇及用法》、《汉语俗话学习导论（北京官话文法）》和《法律文书选读》等。

而阿理克一改长期以来学生入学后必须从汉字偏旁部首学起的做法，而开设了汉语语音导论课程，并于1910年专门出版了教材《语音文选》。阿理克首次将中国文学课程作为汉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在他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即开设了“八家古文”、“唐诗绝句”、“北京口语语音”。这表明由王西里开创并由其弟子们传承下来的圣彼得堡大学汉学教育传统从1910年前后在阿理克的推动下已经发生了变革。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语口语教师中包括俄国汉学家，如孔

---

① 有关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伊万诺夫斯基、孟第、柏百福、伊凤阁在圣彼得堡大学的教学情况参见 Петров В. В.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气、孟第，同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如阿布—卡里莫夫（任教时间：1856～1865年）、贵荣（任教时间：1884～1885）、苏忠（任教时间：1885～1888）、高英齐（任教时间：1891～1892）、邵恒浚（任教时间：1897～1898）、桂芳（任教时间：1898～1904）、孟僖绍（任教时间：1904～1905）、程先生（任教时间：1907～1909）、朱武（任教时间：1911年上半年）、权世恩（任教时间：1912～1913）和张英（任教时间：1914～1915）。[①] 在库利科娃的《俄国法律文书中的东方学（17世纪末至1917年）》一书中收录了俄国民教育部和圣彼得堡大学就贵荣、苏忠、高英齐、邵恒浚、桂芳和孟僖绍等在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汉语口语教师一职的批示。早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就有如此之多的中国人在遥远的俄国帝京教授汉学知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二）满学与蒙古学教育

从东方语言系成立之初，王西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这里唯一的满语教授。他用自己编写的满语教材，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满语翻译和教学人才，为俄国的满语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王西里还编写了两部重要的满语教材。1863年他编写了《满语入门文选》，是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满语教材，内容主要包括常用口语句型以及一系列中俄关系史文件等。教材中的57条对话中有40条来自《清文启蒙》，17条来自《壹百条》，中俄关系文件主要为斯帕法里（Н. Г. Спафарий）出使中国，戈洛文、萨瓦（Савва Лукич Владиславич-Рагузинский）、克罗波托夫（И. И. Кропотов）、穆拉维约夫和普提雅廷等与清朝政府的交涉过程和相关文献。1866年他石印出版的《满俄词典》篇幅不大，但很实用。他在前言中写道："我将辞书中至今未曾遇到的句子编入了词典，有的地方我指出了与汉语词的亲缘关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人关注过。"[②]

1868年秋，杂哈劳应王西里邀请来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

---

① 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的中国教师名字因档案失载，除少数可考之外，大都为俄文音译。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册，第107页；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240-241；Петров В. В.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② Сорокин Ю. А. Академик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как маньчжуровед//Восточная филология. Характер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1971.

担任满语教学工作。他为一年级学生讲授满语语法时使用《清文启蒙》和自己在北京时所做的笔记。二年级时则从王西里编写的《满语入门文选》中选择稍难一些的文章锻炼学生的俄满翻译能力。到了三年级和四年级，杂哈劳就从满文的《西厢记》、《大清会典》、《御制盛京赋》和《资治通鉴纲目》中选一些文章片段进行翻译练习，同时锻炼学生翻译俄文外交文书。1875 年，他出版了为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满俄大辞典》。在长达 20 余年的编写过程中，杂哈劳除了参考以往的满俄辞书以外，还利用了大量满文刊本与抄本，借鉴了罗佐夫和王西里等人的成果。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决定不经答辩授予杂哈劳满语博士学位。1879 年，杂哈劳的另一部满学力作《满语语法》出版。他所依据的资料是《清文启蒙》、《清书指南》、《三合便览》和《清文备考》等，所遵循的目标是“教会人们准确地理解和翻译满语”。杂哈劳努力从满语中发现符合拉丁语法的语法范畴，依照拉丁语言的语法规则和术语为满语构造了这部语法。

1885 年，教授满语达 17 年之久的杂哈劳患病突然去世，使满语教学一度陷入困境，王西里当即决定留伊万诺夫斯基任教，以补杂哈劳之缺。1890 年伊万诺夫斯基前往中国考察，于途中记了 10 大本日记，其中包括索伦族和达斡尔族的语言材料。回国后担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讲授汉语、满语和满洲历史等课程。伊万诺夫斯基在汉学和满学领域都有不凡的建树，他的满学著述主要有《满洲史概要》(1887)、《满洲的铜币》(1893)、《满语文选》(1893、1895)、《满语文学史概论》(1893)、《满洲学之一：索伦语和达斡尔语范例》(1894)和《满语转写的西藏经文》(1895)等。

进入 20 世纪以后，随着王西里和伊万诺夫斯基的去世，圣彼得堡大学终止了满语教学。直到海参崴东方学院成立之后，俄国满语教学才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圣彼得堡大学蒙古语专业的第一位掌舵人是来自喀山大学的波波夫。此外，1917 年前在这里任教的蒙古语教师还有戈尔斯东斯基、波兹德涅耶夫、鲁德涅夫(А. Д. Руднев)、科特维奇(В. Л. Котвич)和扎姆察拉诺(Ц. Ж. Жамцарано)等。

戈尔斯东斯基 1853 年毕业于喀山大学，从 1855 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1899 年去世，主要研究卡尔梅克人历史。1880 年他出版了《1640 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噶尔丹洪台吉补充敕令及卡尔梅克汗敦都克达什治下的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制定的法规》，1893 ~ 1895 年间出版了《蒙俄

词典》,其中收录了许多卡尔梅克语和佛教词汇。波兹德涅耶夫是戈尔斯东斯基教授的弟子,1876 年毕业,1879 年开始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的教学生涯。1881 年以《蒙古部落民间文学范例》为题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1883 年又以《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译注》一文获蒙古语博士学位。1896 ~ 1898 年间出版的两卷本《蒙古及蒙古人》是其最著名的蒙古学著作。他一生多次去蒙古进行科学考察,搜集到大批珍贵资料,为现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波兹德涅耶夫藏品"奠定了基础。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持续到被任命为海参崴东方学院院长的 1899 年。作为波兹德涅耶夫的高足,鲁德涅夫主要研究蒙语语言学,出版有《蒙古书面语语法讲义》(1905)和《东蒙古方言材料》(1911)等著作。科特维奇 1895 年从东方语言系毕业留校任教。他在东方语言系讲授的第一节课的题目是"蒙古以外的蒙语和蒙古文学研究"。其蒙古学成就主要有《蒙古语语法讲义》(1902)和《卡尔梅克谜语与谚语》(1905)等。扎姆察拉诺 1902 ~ 1906 年间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著有游记《1909 ~ 1910 年南蒙古纪行》,先后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和伊尔库茨克大学执教,是伊尔库茨克大学蒙古学的奠基人。最早的作品是他与鲁德涅夫于 1908 年共同发表的《蒙古民间文学范例》,而后又分别于 1913 年、1914 年和 1918 年出版三辑《蒙古部落民间文献范例》。

圣彼得堡大学是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最重要的中华语言人才培养基地。这里汇集了俄国几乎所有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在教学、教材编写以及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大都得到了后人的肯定,结束了俄国汉学家以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为主体的阶段,推动俄国学院汉学获得长足发展。

圣彼得堡大学尽管师资雄厚,可相对于其几十年的历史而言,所培养的人才不能算多。以汉语专业为例,从 1855 年至 1917 年的 60 余年当中,东方语言系所培养的毕业生不足百名,有的年份招生人数只有寥寥数人。当然,这与中俄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此专业过于难学有一定关系。到了 19 世纪末期,由于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翻译人才需求倍增,东方语言系汉满蒙语专业一度炙手可热。但是这里的人才培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以培养实践型人才为宗旨的海参崴东方学院随之应运而生。

五、远东汉学基地海参崴东方学院

19 世纪末俄国加快了对中国东北侵略的步伐。1896 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沙俄政府由此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从而使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一段到达海参崴,为把中国东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打开了方便之门。1898 年,清帝国与俄国签订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将旅大地区租予俄国 25 年,俄国多年来在东方拥有不冻港的梦想终于实现。1900 年,俄国以镇压义和团为由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随着俄国对中国侵略步伐的加快,两国在经济、外交、军事上的接触日益频繁。中俄关系的这种情势对俄国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政府于 1899 年在海参崴建立起一所东方语言高等学府——东方学院。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这所学院利用其位置与中、日、朝相邻的条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为俄国政府部门、军事机构、商业领域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成为俄国汉学的又一个基地。

1899 年 7 月 9 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建立东方学院的法令,任命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蒙古语和卡尔梅克语教授,东方学院章程制定者之一的波兹德涅耶夫担任第一任院长。10 月 21 日,东方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波兹德涅耶夫在讲话中指出,东方学院将完全遵循实用目的,为俄国"在东方的行政及工商活动培养人才。"①

在俄国政府的授意下,东方学院开学伊始,波兹德涅耶夫就根据学院的宗旨制定了学生培养方案。该方案包括以下内容:由教师编写新的教材;学生不只掌握一门语言,而要学习两三种东方语言;由俄国教师和外国讲师分别教授语言理论及实践知识;经常性地派遣教师和学生出国搜集资料或进行语言实践。他的这一思想成为东方学院制订教学计划的基准。东方学院的学制为四年。汉语为必修课,第一年全体学生都只学习汉语,每周由教授授课六次,与中国先生练习口语四次。从二年级起,学生被分成四个专业:汉日专业、汉朝专业、汉蒙专业以及汉满专业。学生在汉语之外再加学一门语言,每周由教授授课三次,中国先生授课三次。此外,学生们还要学习神学、英语、地理及民族学、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日朝当代史、

①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С. 49.

东亚商务地理、政治经济、国际法、俄国及主要欧洲国家政体、会计学和商品学。[①] 从东方学院最初的教学计划中至少可以看出如下特点：第一，在所有课程中，汉语被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由于俄国远东的利益主要在中国，对汉语人才的需求量也最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与东亚日本、朝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所以学习日语和朝鲜语必须同时学习汉语；此外，学习汉语也是学好满语或蒙古语的前提。第二，东方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完全将教学中心放在了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现状上。第三，加入了技能性课程，如会计学和商品学等。这些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不同之处说明了东方学院创办者基本上实现了当初对这所学校的设想。

学院的教学管理由校务委员会进行。校务委员会独立安排各年级课程，授予学生奖章，确定学生的奖学金和补助数额，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讨论课程改进措施，研究教师的教学方案，为出国考察及实习人员制定任务等。

东方学院的师资骨干几乎全部来自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在这里任教的有汉语教师鲁达科夫与彼·施密特，满语教师鲁达科夫、彼·施密特、波兹德涅耶夫与格列比翁希科夫（А. В. Гребенщиков），蒙古语教师波兹德涅耶夫与齐比科夫（Г. Ц. Цыбиков），藏语老师齐比科夫。远东历史和地理课则由屈纳（Н. В. Кюнер）讲授。日语和朝鲜语教师分别是斯帕尔文（Е. Г. Спальвин）和波兹塔文（Г. В. Подставин）。这些教师遵循东方学院全新的办学宗旨，白手起家，在教学、编写教材以及科学著述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为俄国远东汉学基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鲁达科夫 1896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蒙语专业。1899 年到海参崴东方学院任教，1905 年鲁达科夫被任命代行院长之职。从 1906～1917 年，鲁达科夫一直担任东方学院院长一职。他为学生开设过的课程有东方历史、地理及民族学、汉语、满语、中朝日三国现代历史、满洲社会、经济及文化历史等。他还编写了许多汉语学习教材。他对汉语语言学理论问题关注不多，比较重视提高言语实践能力，同时发掘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主要教材有《官话指南》、《中国皇家海关公文》、《中国戏剧及小说》、《汉语公文范例》、《汉语草书指南》、《文案汇编》、《中文官

①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 254.

方商务会话》、《威妥玛官话学习体系指导》和《最新汉语公文及法令范例》等。[①] 其中《威妥玛官话学习体系指导》是鲁达科夫根据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改编而成的。1902 年,在波兹德涅耶夫建议下,学院决定请鲁达科夫讲授满学课程。他编写的教材有《汉译满语会话》和《满语官话范例》等。

彼·施密特于 1869 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后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汉、满、蒙、卡尔梅克语言。毕业后同鲁达科夫一道被派往中国进修。1899 年回到俄国,投入了东方学院汉满语教学工作。从 1920 年起转至拉脱维亚大学任教。1902 年,他以《官话语法试编》一书而获得圣彼得堡大学硕士学位。《官话语法试编》是彼·施密特影响最大的一部汉语语言学著作。彼·施密特在东方学院工作期间还出版了大量汉满语教材,包括《中国古籍》、《汉语学习语言学导论》、《初级汉语文选》、《汉语入门阅读》、《官话语法文例》、《彼·施密特教授 1907 ~ 1908 学年度汉满语语法讲座概述》、《中国政治组织讲义》、《满语课本》、《满语入门讲义》等。他的著作结合了汉语学习理论与实践,为俄国汉学实践学派的创立作出了贡献。

格列比翁希科夫 1907 年从海参崴东方学院毕业,而后被派往中国学习了三年。在中国期间,他研究了中国的民俗、方言以及满洲地区居民的风俗习惯,对清朝学堂中的满语教学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次考察的成果反映在他撰写的《满语文献范文概论》(1909)和《中国满语学习概述》(1913)两本书中。1911 年格列比翁希科夫因东方学院满语教授职位空缺而来到海参崴,担任满语教研室主任。考虑到满人已经被汉人严重同化,其语言逐渐衰微,他建议在东方学院建立实验语音学研究室,记录满语语音。1912 年,格列比翁希科夫再次来到满洲地区,进一步了解满族人的生活及习俗。格列比翁希科夫在东方学院以及后来成立的国立远东大学工作到 1931 年。[②]

作为东方学院缔造者之一和第一任院长,波兹德涅耶夫在俄国远东地区汉学发展史上,甚至在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原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蒙古语教研室教师。1899 至 1903 年间担任

---

① Дацышен В. Г.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107-108.

②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С. 67.

新组建的海参崴东方学院院长。波兹德涅耶夫从1899年到1903年间在教授蒙语的同时也教满语，所用教材为王西里编写的《满语入门文选》，1904年，他编写出版了《满文文选试编》。

齐比科夫1895年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1899年齐比科夫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派，伪装成去拉萨的朝圣者前往西藏考察。1902年，经波兹德涅耶夫力邀，来到海参崴东方学院工作，教授蒙古语。1905年他提出在东方学院开设藏语课的建议。从1907年至1908学年度起，齐比科夫开始教授藏语，1914年建立了藏语教研室。他在东方学院一直工作到1917年，期间出版了一些蒙古语教材，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蒙古语学习实用手册》。①

屈纳1896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02年，经圣彼得堡大学维谢洛夫斯基（Н. И. Веселовский）教授推荐到海参崴东方学院工作，讲授远东历史地理。屈纳是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和东亚历史学家，一生著述浩繁，共400多种，代表作有《西藏全志》、《远东国家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政治史概述》。

为了加强学生的口语训练，东方学院从一开始就聘请外籍教师从事实践课教学。来自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教师陆续来校任教。中国教师的加盟保证了东方学院的教学质量。但是由于中国教师工资很低，每月只有50卢布，所以大部分由于生计所迫而无法安心工作，更换频繁。从1899年至1911年先后有19位中国人在这里任教，有的只待了几个月便另谋生路了。②

从1899年至1909年，东方学院一直为俄国军事部门培养东方语人才，为沙皇政府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扩张提供直接服务。有时军官在学生人数中占很高的比例，如1904年110名学生中有34名军官，1908年175名学生中有军官89名，在1909年的168名学生中有83名军官。他们按照军队设定的科目学习，接受单独的考试，而且也出国实习，回国后同样要交实习报告。特别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大部分东方学院学生都被分配到军事机关服务。1909年以后，由于为部队培养的汉语翻译过剩，军事部门停止

---

①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Савицкий Л. С. Тибетоведение//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М., 1972.

② Дацышен В. Г.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71.

向东方学院输送生源。[①]

1899 至 1916 年期间，学院共培训了 300 多名学生和 200 多名军官。学习汉语的学生毕业后一般比较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大部分学生在中东铁路沿线、俄国行政机关、军事部门和商行工作，一部分人成为俄国在中国天津、汉口和齐齐哈尔等地开办的汉语学校的俄语教师，还有一部分人成为哈尔滨俄语学校的汉语教师。哈尔滨出版的《远东报》的编辑几乎都是东方学院的毕业生。许多学生在俄国汉学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作品大都刊登在《亚细亚时报》、《满洲新闻》、《经济通报》以及在哈尔滨、上海等城市出版的其他俄文报刊。另有几位毕业生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如潘克福、越特金（Р. В. Вяткин）、希奥宁（А. П. Хионин）、巴拉诺夫（И. Г. Баранов）、什库尔金（П. В. Шкуркин）和马佐金（Н. П. Мацокин）等。

东方学院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在远东建立的又一个东方学教学基地。东方学院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配合俄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俄国实践东方学的中心，为俄国远东地区的东方学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尽管东方学院的教授大都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毕业生，但他们显然从一开始就试图不仅从教学内容上，而且从方法上摆脱王西里教学学派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都是反其道而行。如果说圣彼得堡大学以中国古典文献为主要教学材料，那么这里的教学重点是现代汉语，即所谓的官话。如果说圣彼得堡大学注重训练学生的文本阅读能力，东方学院则极力增加学生语言实践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机会，采取各种措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对现实中国的全面认识和思考取代圣彼得堡大学对王西里文选的死记硬背。教师们在为俄国行政、商业和军事机关培养实践型翻译人才的同时，编写了大量符合时代要求的教科书，出版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他们频繁出国考察，广泛收集资料，展开以中国现代语言、历史、文化为对象的研究。他们的教学及科研活动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遥相呼应，互为补充，为俄国汉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

---

① Серов В. 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1899-1909)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4. №1.

第四章
阿理克与苏联汉学的创建

1917 年，俄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十月革命的洗礼。在列宁温和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之下，帝俄时期的东方学家除少数移居国外之外，大多数逐渐适应了社会现实，并开始与苏维埃政府合作。革命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也彻底改造了俄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东方学家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调整甚至放弃原有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建设全新的苏联东方学。而实现从俄国旧汉学到苏联新汉学转变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一位天才的年轻学者身上，他就是被郭沫若呼作“阿翰林”的阿理克院士。

阿理克

阿理克 1881 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家境贫寒的职员家庭。1893 年作为公费生入读喀琅施塔得男子寄宿学校。1898 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蒙语专业，主要跟随伊万诺夫斯基学习汉语，从波兹德涅耶夫和科特维奇学习蒙古语，同时得到了孟第和柏百福的指导。1902 年大学毕业，而后在艾尔米塔日博物馆研究馆藏的中国钱币，为亚洲博物馆编写中文书目，并整理了贝勒医生赠送给亚洲博物馆的《钦定图书集成》等图书以及古德津科（A. H. - Гудзенко）的赠书。1904 至 1906 年间，阿理克被派到英国、法国和德国进修。在法国得到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院士的亲自指导,学习了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鲁斯洛(Jean-Pierre Rousselot)等知名学者的课程,在鲁斯洛的语言实验室里从事汉语语音、语调标注方法研究。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拓印钱币部收藏的钱币型护身符,阅读欧洲的相关文献,同时访问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考察那里的中国研究机构。在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柏林民俗博物馆及其他博物馆中研究中国瓷器。1906 年来华,在中国先生的指导下继续汉语学习。1907 年与沙畹结伴在华北地区进行民俗文化考察,1908 年应中东铁路中俄学校的邀请担任俄语教师。1909 年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汉语。同年赴华东和华中地区(汉口、武昌、上海等地)旅行。在国外求学期间,阿理克始终得到了俄国东方学的领袖人物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的大力协助。1910 年 1 月,阿理克被聘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编内副教授,2 月在系里作公开报告,题为《中国教育的现代改革》,由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1911 年赴巴黎和伦敦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调研,继续在法兰西学院受教于汉学大师沙畹。1912 年夏天受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和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委派,携带照相机和用以购买与民族学有关物品的资金,前往中国南部沿海城市上海、澳门、汕头、福州、广州等地进行民族学考察。从南京和上海为圣彼得堡大学带回了十册内容丰富的中国汉语教科书以及其他文选类书籍,同时还带回了在福州和广州收集到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出版物、传单和牌匾等。1916 年以《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为题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获硕士学位。1919 年成为由高尔基(А. М. Горький)领导的"世界文学"出版社专家编辑委员会成员和东方部秘书,与奥登堡院士一同参与《东方》杂志编辑委员会的工作。1923 年,由奥登堡、马尔(Н. Я. Марр)和巴尔托尔德等院士提名,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 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当选为院士。一生大部分时间任教于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从 1930 年起兼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1951 年,阿理克去世。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勤于耕耘,成就非凡,共发表汉学著作 260 余种,是 20 世纪上半期苏联汉学界执牛耳之人物。他在汉学的许多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特别是在中国文学、中国民间文化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①

---

①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ка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 1972. С. 147-193;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 ст.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 1983. С. 176-187.

一、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中国文学始终是阿理克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他之前，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非常薄弱。王西里于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论著《中国文学史纲要》，然其中探讨的主要对象并非文学作品。可以说，俄罗斯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始于阿理克。他以宽博的中国文化知识为依托，运用科学的方法，从中国诗学著作的翻译与研究着手，进而完成了大量的古代小说、诗歌及散文译作，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经验，并在此过程中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及世界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由他培养的学生成为苏联中国文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翻译与研究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阿理克放弃了王西里的疑古倾向，重视中国历代注疏家和文艺理论家的作品，并将其视为彻底认识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途径。他选择了中国素享盛名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为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期望以此叩开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门。实际上，阿理克最初的研究兴趣在中国民俗方面，无论是在欧洲游学，还是在中国进修，护符、年画和纸马等一直是他最为关注和收集的对象。但当他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却改变了以中国年画为题的论文构想，转而研究中国古典诗学。他称选择研究司空图的目的是为了“摈除业余爱好式态度，而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诗歌”，为当代汉学家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①]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把诗歌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品，辨析各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揭示了唐代诗歌的艺术魅力。《二十四诗品》以诗论诗，语言深奥，意境悠远，对于一个年轻的外国人而言，要想彻底领悟着实不易。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每品仅48行字，全文不过千余字，而阿理克却写了一部780页的巨著《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除司空图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 (837-908). Перевод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6. С.

《诗品》的译文外,注释就达155页。这部著作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总标题是"《诗品》及其作者与研究条件",下设四编十九章。第一编为概述编,包括四章,介绍了《诗品》的创作历史、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别关注了诗人的主观修养对诗歌创作的作用。这也是阿理克将这部著作称为《论诗人的长诗》的意旨所在。第二编为文献编,由五章构成,重点梳理了《诗品》的版本、注疏家、仿作及英译本。第三编为生平编,分五章,研究了司空图生平和作品。第四编为方法论编,包括五章,旨在确立翻译与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第二部分是翻译和注释,共分两编:第一编为译注编,包括《诗品》的翻译和注释,先对每一品进行分析,而后进行直译、意译,最后是注释。第二编为《诗品》仿作、续作编,摘译并研究了三部仿《诗品》的作品,即黄钺的《画品》、杨景曾的《书品》和袁枚的《续诗品》。最后是各种索引和注释。该论文于1916年通过答辩,答辩词于1917年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以《关于中国文学的定义和中国文学史家的当前任务》为题发表。《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是阿理克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部力作,不仅奠定了其在苏联汉学史上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而且为苏联以后的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提供了范例,具有方法论意义。[①]

(二)《聊斋志异》翻译与研究

阿理克早在1907年与沙畹在华北旅行时所作的日记中就记录下他对蒲松龄小说的浓厚兴趣。他亲眼目睹了《聊斋志异》在中国的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聊斋志异》是中国最流行的书籍之一。在任何书店、任何街头地摊和货摊上都能够看到此书。可以在不同地位和状况、各个阶层、各种年龄的人手中见到这本书。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首先会阅读此书,为精美的文学形象而兴奋和感动。而对于那些不是特别有知识的人,即不具备那种文学修养和不认识那么多字的中国人来说,《聊斋志异》是一块真正的磁铁。"[②] 1910年他在立陶宛出版的白俄罗斯语刊物《我们的田野》上发表了《崂山道士》与《汪士秀》两个聊斋故事,标志着他翻译

① 李明滨:阿翰林的学术成就——纪念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诞辰110周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

②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г. М., 1958. С. 298.

《聊斋志异》的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为阿理克发表《聊斋志异》译文提供了方便。1922 年，他的第一个聊斋故事译集《狐妖集》出版，其中包括了 29 篇有关狐仙的故事。译文在付印前得到了高尔基的审读。高尔基没有理解阿理克为保持原作语言风格所做的努力，对那些不符合俄罗斯大众阅读习惯的词汇和语句大加修改。阿理克对此非常痛心并据理力争，因为当时的校稿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无法确定最终的结果。①

次年另一个集子《神僧集》问世，选译了 43 篇有关和尚和道士的奇闻逸事。另外两个集子《志怪集》和《异人集》直至 1928 年和 1937 年才分别由思想出版社和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前者收录聊斋怪异故事 22 篇，后者收录奇人奇事 62 篇。这些译本随后多次再版，总印数超过百万册，创造了东方文学作品在俄罗斯传播的奇迹。2000 年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将所有阿理克译聊斋故事结集出版，共收录 160 篇故事。阿理克翻译《聊斋志异》所用的版本主要是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同文书局的石印本及后来的重印本，如上海三槐书屋以同文书局的石印本为底本的校印本。② 阿理克的译本同时也成为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翻译《聊斋志异》的蓝本，如爱沙尼亚、塔吉克、吉尔吉斯和乌克兰文译本均译自俄译本。

对于中国文学作品，阿理克向来都采取译研结合的方式，对于《聊斋志异》也不例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除了比较著名的《论中国古典文学中民主化的历史》和《聊斋故事中的儒生悲剧与为官思想》等文章外，阿理克还在其出版的四个聊斋故事集的序言中对蒲松龄的创作进行了清晰而准确的评价，尤以出版时间最晚的《异人集》序言中的论述最为详尽深刻。

（三）中国诗歌散文翻译

阿理克 1911 年发表了《李白咏景赋》，其中包括了李白《惜馀春赋》、《愁阳春赋》、《非清秋赋》、《春夜宴桃李园序》和《古风》等作品的译文，由此开始其翻译中国古代诗歌的历程。对他自己而言，这些译作对培养兴趣和积累经验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

① ［俄］班科夫斯卡娅著，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聊斋的朋友与冤家，载《蒲松龄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② ［俄］李福清：《聊斋志异》在俄国，载《聊斋学研究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年。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阿理克被疏散到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他在物资供给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在烟盒和糙纸上翻译了865篇古汉语精品,编成两个文集——《中国古典散文》和《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散文》在阿理克逝世后于1958年出版,但所收入的译文仅是阿理克原作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古典诗歌》却至今未能出版。《中国古典散文》全书387页,收入了22位中国古代著名辞赋散文大家的作品,如屈原的《卜居》和《渔父》,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和《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汉武帝的《秋风辞》,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屈原列传》[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孔子世家》和《五帝本纪》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和《闲情赋》,谢庄的《月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刘禹锡的《陋室铭》,仲长统的《昌言·下》,韩愈的《杂说》、《获麟解》、《祭鳄鱼文》、《进学解》和《柳子厚墓志铭》以及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作品。阿理克在卫国战争期间的唐诗译稿此前只是零星发表过,生前也只对15首诗的译文进行过润色和注释。直到2003年阿理克的部分译文才由俄罗斯著名中国诗词翻译专家斯米尔诺夫(И. С. Смирнов)编辑,以《常道:唐诗选》为书名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收录阿理克唐诗译文最多的集子,但并不是全部。尽管在疏散地没有任何工具书可资利用,然阿理克的中国古典散文与诗歌译文无论语言或是韵律都处理得非常精湛。

(四)中国文学研究

除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翻译外,阿理克还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定义和中国文学史家的当前任务》一文外,1920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标题均为《中国文学》的文章。1926年,他应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法国汉学家邀请,在法兰西学院和吉美博物馆就中国文学问题用法文做了六次学术讲座。1937年,这六次讲座被结集在法国出版,题为《中国文学》。在这些文章及讲演稿中阿理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有关中国文学的各种问题,比如中国文学的概念(传统与现代的观点)、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步骤以及应该使用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些文

① 是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部分。

章题目相同,内容却少有重复,而且互为补充。他认为,撰写中国文学史,首先要翻译一批中国文学代表作品,撰写 200 ~ 250 篇专题文章。他心中的《中国文学史》是一本范文与概论相结合、翻译与研究并重的中国文学百科。事实上阿理克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发表了一些专题研究文章,如《中国诗人论中国音乐》(1934)、《王维绘画探密》(1934)、《谀词与铭文中的孔子》(1935)。而后又陆续发表《中国山水诗人谈创作灵感与风景》(1945)、《反侵略斗争在中国历史及文学中的体现》(1945)、《空想一元论和苏洵文中的中国礼仪》(1945)、《13 世纪中国爱国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1946)和《书法家和诗人论书法的秘诀》(1947)等。这些专题论文探讨了经典作品的创作过程、艺术特征、思想内涵以及俄译本在体现原作特色方面所采取的办法。

阿理克尝试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他认为这种"比较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种说法是该当结束的时候了!"① 在《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中阿理克就将中国的诗学理论与西方诗艺加以对比。1944 年他又发表《罗马人贺拉斯与中国诗人陆机论诗艺》,1947 年发表《法国人布瓦洛及其同时代中国人论诗艺》。在这两篇论文之中,阿理克将中国文论作品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ftius Flaccus)的《诗艺》和法国诗人布瓦洛(Boileau-Despreaux Nicolas)的《诗的艺术》进行了对比研究,首开中外比较文学之先河。他认为:如果"论及真正的诗人发自内心的独白及其灵感,那么,他们对于世界的最初感受,区别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他们彼此之间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明朝诗人宋濂总的面貌合乎逻辑地接近陆机的理想,而奉行理性主义的布瓦洛与贺拉斯则有显而易见的依承关系。"② 他甚至认为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最好模式就是使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填平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鸿沟,让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世界文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因为在法国出版《中国文学》一书,阿理克在苏联大清洗时期差一点被"清洗"。诬告者指责阿理克在著作中偏重于分析中国作家及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进行阐释。一篇揭露阿理克所谓罪

---

① [俄]班科夫斯卡娅著,谷羽译:前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论"东西方问题",载常耀信主编《多种视角—— 文化及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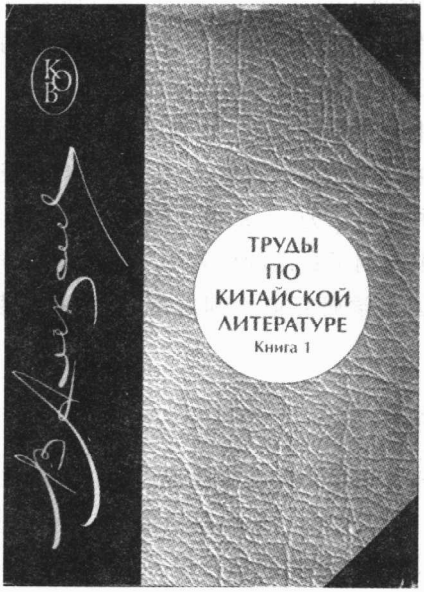
② [俄]班科夫斯卡娅著:前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论"东西方问题"。

行的文章《披着苏联院士外衣的伪学者》在《真理报》发表。在极度恐怖的气氛中,阿理克向苏联科学院提交了对《中国文学》一书的《自评书》,对无中生有的指责予以驳斥。他甚至还曾写信给斯大林,说明自己的立场。20世纪60年代末,阿理克的遗孀阿列克谢耶娃(Н. М. Алексеева)女士将法文版《中国文学》译成俄文,使这部作品首次与俄罗斯读者见面。①

阿理克身后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除了少部分发表之外,大都在他生前未曾面世。1978年出版了主要由阿理克之女班科夫斯卡娅(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和阿理克弟子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维·彼得罗夫(В. В. Петров)、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及艾德林编辑的《中国文学研究选集》,收录阿理克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如论文、笔记和序言等,内容包括六大部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诗学三部曲(诗书画大师论灵感与风格)、比较专论、中国幻想小说、中国古典文学中论及的中国历史、翻译原则。2003年,阿理克的《中国文学论集》出齐,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中国驻俄大使馆举行了该书的首发式。《中国文学论集》分上下两卷,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担任主编和注释工作,班科夫斯卡娅撰写了前言、后记以及各章的编者按。上卷主要包括"中国文学导论"、"儒家经典翻译"、"诗歌"、"比较诗学"、"怪诞小说"以及"中国经典文学中的中国历史"六章。下卷同样由六章组成,分别是"《诗品》、《书品》和《画品》"、"中国文学与佛教"、"翻译问题"、"我的构想"、"新中国等于旧中国加新中国"和"参考资料"。《中国文学论集》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文学、翻译、哲学、宗教和艺术等许多领域。"中国文学导论"一章收录了阿理克的中国文学史概述及其在法兰西学院和吉美博物馆的学术报告。在这些讲座的后面,编者特意收录了马伯乐就阿理克的法文版《中国文学》写的书评。马伯乐非常赞赏阿理克没有将那六次讲座变成中国文学作品的罗列,而是就中国文学的全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称阿理克的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诗学的论著"。

长期以来,世人以为阿理克只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不关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这甚至成了阿理克的一大"罪状"。殊不知,阿理克非常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撰写了大量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付梓。《中国文学论集》首次将阿理克的中国现代文学论著整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М.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2 кн. М., Кн. 1. 2002. С. 144-145.



阿理克《中国文学论集》2002～2003年版

理出版，成为该书另一大亮点。这一章的标题是“新中国等于旧中国加新中国”。第一部分为“中国文化的衰落与革新”，收录了1935年阿理克在苏联科学院纪念无产阶级革命成功18周年大会上的报告《革命、战争与庸俗》，批判中国知识界在扬弃旧文化过程中的庸俗倾向。阿理克翻译的《归国杂感》是胡适作品在俄罗斯的首次俄译。阿理克一方面对胡适等文化界领袖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发动破旧立新运动表示赞赏，同时又警告“旧中国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新中国完全照搬”，强调“新中国等于旧中国加新中国”[①]，二者关系只能是共生，不可能决裂。第二部分题目为“中国诗歌语言的改革——评胡适的《尝试集》”，是阿理克1924年撰写的一篇文章，未曾发表过，但其中主旨在他1926年于法国所做的中国文学演讲中有所体现。他在肯定胡适革命精神的同时，认为胡适的白话诗在韵律和用词方面有很大缺陷，反对过多使用西方诗歌的形式和形象。这部分还附录了阿理克的两篇短文《论新诗》(1922)和《你研究新诗否?》(1925年曾在《东方》杂志发表)。正如加拿大学者多列热罗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М.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2 кн. М., Кн. 2. 2003. С. 270-271.

娃—维林戈洛娃(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所言,阿理克确乎是欧洲第一个介绍胡适新诗的人。[①] 此外,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蔡元培的序言,阿理克在1923年于《东方》杂志发表长文《中国儒学》加以评介,这次也收入了《中国文学论集》。在前一年,阿理克还就胡适的逻辑学著作《先秦名学史》撰写了书评,曾收入了1982年出版的《东方研究》,所以这次没有收录。阿理克认为,正是由于胡适等人的功绩,"儒家学说才首次在哲学和逻辑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②]《中国文学论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阿理克的中国文学研究成就和思想,很值得中俄两国学术界仔细研究。

(五)翻译理论研究

阿理克一生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尤以中国文论、诗词和《聊斋志异》最为著名。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实践者,同时也是翻译理论家,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俄译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无论翻译什么作品,阿理克一般都要写下一段文字,说明他的翻译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阿理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汉俄翻译原则,并在《中国作品之文艺翻译原则》一文中进行了凝练。他认为自己的翻译实践经历了从直译到直译加意译,再到充分考虑韵脚和乐感的诗化翻译三个阶段。阿理克认为将汉语译成俄语的最大难点在于前者是象形文字,后者是拼音文字。象形文字除本来的词义外,还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寓意深刻等特点。他强调,除了准确传达原文意思之外,还要努力保持原作风格,甚至连节奏、诗步和韵律都要在译文中有所体现。他善于使用一些古词、旧词、外来词、自造词以及某些句法手段,努力体现古汉语的"文雅"和"无声";尽量避免使用复合句和人称代词,突出动词的地位,使句子短小精悍,寓意深刻,以体现古汉语的句法特点。对于自己的译本,阿理克精益求精,不断修改完善,争取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他努力使自己的译本成为年轻汉学家用来与汉文本进行对比阅读的参考书,不使原著遭到玷污。阿理克译文最终达

---

① Dolezolova-Velingerova, M. "Europea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Ming Wilson and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European Sinology. London, 1995. PP. 368-391.

② Алексеев В. М.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н. 2. С. 321.

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即“只是为汉语披上了一层薄薄的俄语外衣。”①

阿理克的《聊斋志异》译本水平极高，已成为中国文学作品俄译的典范。1930年我国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在看完阿理克的《聊斋志异》俄文译稿后赞叹道：“译书是似易而实难的一件事，第一要‘信’，第二要‘达’，第三要‘雅’。平常能做到第一、二种功夫已属难能可贵，而在先生译文中这三层难关均迎刃而破，更是在翻译界仅见的了！”② 阿理克曾将自己翻译的《书品》寄给素以严格闻名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申格力（Г. А. Шенгели）征求意见。申格力读完之后非常兴奋，即兴赋诗一首，赞赏不已，评价阿理克的译文“美妙、厚重、精准。”③ 事实上，他的译本之所以能到达如此高的水平，除了汉语修养和俄文造诣之外，其中还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阿理克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俄译理论上颇有心得，而且非常关注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状况，多次撰写文章进行评论，如《俄罗斯文学汉译》、《俄罗斯作家在当代中国》和《普希金在中国》等。

二、中国民间文化研究

阿理克院士一生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但他从未忽视过对中国民间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他曾讲过：“我想告诉知识界的是，中国文化不单是文人创造的，同时也是大众创造的。”④ 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他的兴趣也非常广泛，在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下他在中国年画、民俗和戏剧等方面的研究情况。

俄罗斯的中国年画收藏量居世界（除中国外）首位，这是俄罗斯几代汉学家辛勤收集所得，体现了俄罗斯重视民间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俄罗斯历史上出现过两位杰出的年画收藏家。第一位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В. Л. Комаров），他于1896年和1897年来中国考察时在东北购得300幅

---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1978 г. С. 503.

② 李明滨、李淑卿：俄国蒲松龄研究巡礼，载《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Постоянство пути：Избранные танск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В переводах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СПб.，2003. С. 11.

④ Поршнева Е. Б.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о культуре Китая//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Сб. ст.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1983.

画带回国。第二位便是阿理克，他于1906年、1907年和1912年几次游历中国，足迹遍布我国大部分省区，对中国民间文化现象作了详尽的考察，同时收集到4000～5000幅年画，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在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年画中，绝大部分是阿理克千方百计搜集的。阿理克对中国年画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因子极感兴趣，一度曾想以中国年画为题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称他为"年画狂人。"①

阿理克研究中国年画的主要代表作是在他去世后于1966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年画——民间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由艾德林、班科夫斯卡娅、鲁多娃（М. Л. Рудова）、孟列夫、费什曼和李福清等编辑注释。主要章节包括"中国民间年画及其研究前景"、"中国民间戏曲与中国民间年画"、"民间年画所反映的旧中国宗教与信仰"、"财神身边的和合二仙与戏蟾道士"、"中国民间信仰与年画中的驱邪"、"文史学家司马迁以及对他的祭祀"，另收录了105幅年画插图。阿理克从各类年画形象入手，发掘背后蕴涵的中国历史文化积淀。他认为反映儒家思想题材的年画数量庞大，而忠、信、孝、义品质广受弘扬，尤以关羽、刘备、祢衡形象最为普遍。而在道教题材年画中，观音菩萨和送子娘娘的形象最受欢迎，其他还有福禄寿三星、八仙、和合二仙、刘海儿、玉帝等。通过年画题材分析，作者特别论述了中国三教合一的独特宗教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对和合二仙的起源与象征意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阿理克非常重视戏出年画，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2000幅年画藏品中，大约有500幅为戏出年画。阿理克认为，戏剧题材丰富、广受欢迎，画工们钟情于此类作品，是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阿理克还对反帝、反传教士题材年画给予了特别关注，对基督教传播在中国受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阿理克对雅俗文化的特性、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号召树立科学的中国民俗观。他认为，中国民间年画反映了中国文化中质朴的一面，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质朴的表现手法并不代表其思想的粗浅。阐释民间绘画要比解释名画家的作品更难，研究俗文化的难度丝毫不亚于研究高雅文化，从俗文化中同样可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真谛，把

① 冯骥才：《倾听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高雅艺术与民间艺术分割开来是不合适的。[①] 中国年画将一个多姿多彩、活生生的中国展示在世人面前，把中国文学、历史、神话传说变成大众都能理解的东西，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换言之，年画符合普通劳动人民的审美追求，保留了千百年来的艺术传统。同时，年画还成为人民反映其生活状态的手段。他认为旧中国的落榜读书人由于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社会地位上又接近普通大众，从而成为高雅文化向民间文化传播的桥梁。民间年画的设计大都出自这个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文人群体之手。他以为，神像题材的中国民间年画的主要特点是将不同时代、不同宗教的人物同时置于一个画面上。这类画一般按内容分成几层，上面是观音菩萨及其各种形象的化身，下方大都画财神和聚宝盆，此外还会题上"万寿无疆"等字。[②] 阿理克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农民总是希望用最少的钱将最多数量的他们所熟知和亲近的神仙"请进"自己狭小的居住空间。尽管设计年画的那些"先生"们都是儒生，也不得不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把农民心中想要的东西一股脑地印在一张画上。在研究视角上，阿理克显然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去研究年画创作的，而"是为了在中国文化的总体架构下深刻研究这种体裁，因为年画也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③]

此外，他首次将中国民间年画与俄国民间版画进行了比较研究。阿理克对中国神话故事也很感兴趣，1928 年他用英文出版了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演讲稿《中国财神》。在 1907 年旅行日记中，阿理克对诸如送子娘娘等中国民间崇奉的神仙故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阿理克将中国称为"戏剧之乡"，在日记中生动描写了演戏的热闹场面。他同时认为，外国人要理解中国的戏剧和音乐需要"首先同自己作一番斗争，也就是说要克服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和习以为常的审美习惯"。[④] 他说，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戏剧如此着迷，戏剧成了每个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无疑是最懂戏剧的民族，中

---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артина.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старого Китая в народ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ях. М. , 1966. С. 24.

②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артина.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старого Китая в народ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ях. С. 41.

③ ［俄］班科夫斯卡娅、李福清著，阎国栋译：《1907 年中国纪行》中文版前言，载《1907 年中国纪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④ ［俄］阿列克谢耶夫著：《1907 年中国纪行》，第 215 页。

国戏剧在民间的传播和普及程度丝毫不比民歌逊色。在这个国度，所有的人都喜爱看戏，而且还会哼唱。中国戏剧的社会作用不仅是“娱乐”，同时还是中国文化的展示和传播手段。大部分戏曲剧目反映的都是历史事件、民间传说和神话，所以中国戏剧可以起到向文盲或半文盲民众传授中国历史和文学知识的作用，比如历史题材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情节就与同名小说一样。他认为中国戏剧的另一个特点是能满足社会所有阶层的要求，无论是皇帝还是庶民，无论是文人还是武士，都能在戏曲中获得精神满足。

谈到阿理克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笔者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阿理克1907年的旅华日记集《在旧中国》。1907年，正在中国学习的阿理克同沙畹结伴沿中国东部和北部进行了一次学术考察。沙畹主要进行考古工作，而阿理克的任务是收集民俗材料，重点收集中国民间年画，因为他当时想以此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这本书在阿理克去世后于1958年出版。全书共分六章：京郊碧云寺、乘舟沿大运河南下、游历山东、满眼黄土的河南、前往考察最远地点西安府、经山西北上。该书以1907年4月的一篇日记开始，结尾的一篇记于1907年10月11日，配有阿理克在旅行途中拍的照片。出版这些日记是阿理克很早就有的一个愿望。1940年他在苏联地理学会所作的报告中写道：“这些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即将获得新生的旧中国的唯一见证。这是俄国第一位懂汉语、对有4000年历史的伟大的中国文化怀有深深敬意的旅行者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旅行日记。”① 但阿理克本人生前只完成了第一章和第二章日记的整理，其余章节是他去世后由其妻子阿列克谢耶娃和女儿班科夫斯卡娅完成的。阿理克日记的整理工作比较复杂，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汉语写成的，需要译成俄语（汉语原件后来遗失）。苏联汉学家费什曼、韦利古斯（В. А. Вельгус）、孟列夫等都参与了翻译工作，苏联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斯特鲁维（В. В. Струве）和施泰因（В. М. Штейн）为该书写了序言。

此书虽然在形式上是一本日记，在内容上更像是一部中国文化随想录。所到之处，阿理克总是能捕捉到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人、事、物，进而用一种尊重和景仰的态度，以世界文化的视野，记录下所见所思。

---

① ［苏］斯特鲁维、施泰因著，阎国栋译：《1907年中国纪行》前言，载《1907年中国纪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俄罗斯汉学界一直没有将其看作是普通的游记作品，而视为异常珍贵的学术著作，作为汉学家认识中国文化的门径或指引。阿理克在日记中表现出的尊重中国文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强烈情感足以触动每一个读者的神经。他相信东方和西方这一对"'孪生儿'一定能相遇并且将为全人类开辟广阔的前景。西方精神对东方精神的反应将创造出新的生活、新的人、新的文化"。[①] 1989 年莱比锡出版了该书的德文本[②]，所有插图均选自阿理克旅行期间拍摄的照片。2001 年这部日记由阎国栋翻译为汉语，以《1907 年中国纪行》为名出版。1997 年，在阿理克写下这些珍贵日记的 90 年后，两位德国人拿着他的日记，循着他当年的旅行线路，亲身感受中国的巨大变化，仿效阿理克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令他们激动和回味的中国文化景观，发表文章《中国的 1907 和 1997——沿着阿理克的足迹》，并在上海举办专题画展。[③]

三、建构苏联汉学研究方法论

作为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阿理克非常善于总结俄罗斯汉学和世界汉学的历史经验，试图解决涉及苏联汉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他对汉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汉学分科、汉学研究方法等问题所进行的思考集中体现于 1982 年结集出版的《东方研究》。

关于汉学这一概念，阿理克认为，汉学是以汉语为基础的各学科的综合体，既包括人文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将汉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局限于利用语言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狭窄范畴。他认为"把汉学同汉语语文学等同起来是对科学不公正的禁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果断地摆脱西方以及旧汉学的影响，反对不将非语言学的研究纳入汉学范畴的做法。"[④] 维·彼得罗夫认为，阿理克有关汉学的定义包含两层最为重要的意思：第一，汉学是关于中国、中国文

---

① ［俄］阿列克谢耶夫：《1907 年中国纪行》，第 298 页。

② Alekseev, V. M, China im Jahre 1907. Ein Reisetagebuch. Mit Farbholzschnitten und historischen Fotos. Kiepenheuer. 1989.

③ 2005 年，两人合著的记录这次旅行的《到了》一书用英、德、中文版同时出版，意大利文版本也即将问世。

④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 119.

化和汉语的综合性学问;第二,各种研究中国的科学只有在以汉语为依托时,才能够成为汉学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汉学家研究中国,首先要以汉语典籍资料为基础。①

随着20世纪初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设置细化的趋势,阿理克对汉学的未来命运进行了深刻思考。他深知汉学分科是不可避免的,承认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视之为汉学发展史上的"最重大的成就"。然而,分科后汉学家知识修养和研究水平的下降引起了他的担忧。一些人只把眼光局限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忽视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了解,而且"用欧洲的思想解释中国的现象,生搬硬套,其研究成果多在半成品阶段就进了印刷车间……"②,好似"在用小学生的知识和大脑去认识中国如此伟大的文化"。对于汉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问题,阿理克虽曾有过动摇,但最终还是确信,"在中国文化尚未完全融入世界文化以前,汉学的存在是必要的。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也未见得不需要用'汉学'一词来诠释历史遗产。"③ 在《苏联汉学》一文中,阿理克进一步论证了汉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领域存在的必要性:"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学'都可以也应当成为一个长久的科学术语,因为中国文化是在丰富多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并以汉语为载体记录下来的。哪怕是对一个局部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必须首先要从总体上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现象。"④

阿理克始终将汉语看作唯一可靠的研究工具,认为只有那些精通汉语的学者才可称之为汉学家,反对将其他中国题材作家也归入汉学家之列。他认为"要研究中国文化,必须要掌握汉语,熟练阅读汉文典籍,不受译文等其他形式的二手信息的干扰……,只有在此基础上确定并研究的问题才可纳入汉学的范畴……"阿理克在一次论文答辩会上指出:"汉语文字对于汉学家来说是一门非常特殊的专业。对文字的理解程度要达到像几何定理与代数计算那样清晰明了。要把汉语文字通过翻译、研究、综合分析

---

① Петров В. В.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о предмете,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и проблемах синологии//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 Ст.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 1983.

② Петров В. В.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о предмете,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и проблемах синологии.

③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 305,159.

④ Петров В. В.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о предмете,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и проблемах синологии.

最终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汉学家应该遵循的汉学研究方法。"①阿理克在自己的科研活动中一丝不苟地遵循了这些原则，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便是最好的例子。这篇论文在对汉语语言的理解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阿理克进行研究与综合分析的成果。阿理克的"翻译—研究—综合研究"三步汉学研究方法论同样体现在他对《论语》、陆机的《文赋》、黄钺《画品》、杨景曾《书品》等中国古典著作的研究中。

阿理克强调关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动态，重视对其研究成果的分析与批评，倡导"同中国的现代科学探索同步前进。"② 阿理克认为，国际汉学研究同中国学者的研究始终存在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研究中的猎奇心理，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屑一顾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他写道："中国人的研究和世界汉学的脱节是由于欧洲人和中国人相互间极其有害的轻视所致。"③阿理克告诫苏联汉学家不可"小心翼翼地尾随中国学者"，而要"走在他们的前面"。比如，他曾发表文章批评过与他同时代的胡适的著作。在提倡科学批评的同时，阿理克坚决反对学术压制，如法国汉学家卜铁（M. G. Pauthier）与儒莲的冲突、傅舍（Alfred Foucher）对沙畹的攻击、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与伟烈亚力的争吵等。他赞赏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著名汉学家们不会引起个人间的敌意的讲究原则的批评。之所以能够如此，阿理克认为是由于"这些人拥有真正的知识，在科学上最重要的是真理，绝不能徇私、讲情面。伯希和一直都在纠正其老师和朋友（沙畹、高迪爱）的观点，却没有引起后者的丝毫痛苦和被冒犯的感觉。这应该成为所有人在科学上的榜样。"④

四、阿理克学派

阿理克院士是继比丘林、王西里之后的一位汉学大家，是苏联汉学的

①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 120-121,265.

②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 103.

③ Петров В. В.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о предмете,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и проблемах синологии.

④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 368-369.

奠基人。阿理克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了苏联汉学的面貌。他为俄国汉学确定了新的任务,制定并实施了新的研究方法。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汉学人才。他们继承了老师的汉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成为阿理克学派的代表人物。

楚紫气和阿·彼得罗夫是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前者翻译的《易经》成为20世纪俄国汉学界最重要的译著之一,1979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后者对王弼、杨朱、王充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存在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施图金(A. A. Штукин)、费德林、艾德林、李福清、费什曼、齐一得、维·彼得罗夫、孟列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E. A. Серебряков)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施图金首次全文翻译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费德林是文学家、东方语言学家、外交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发表著作200余种,特别是对《诗经》和屈原诗歌的研究成就更为突出;艾德林是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他的翻译和研究对象主要是白居易、陶渊明等诗人,出版有这些诗人作品的译作和研究论著,同时对中国现代作家也有研究;李福清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其主要著作已在中国出版;费什曼主要从事比较文化以及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研究,她最有名的译著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齐一得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有《今古奇观》等作品;维·彼得罗夫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对鲁迅、老舍、巴金、曹禺、郁达夫和瞿秋白等作家均有研究;孟列夫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曾翻译《红楼梦》中的诗歌部分,此外他还是国际上知名的敦煌学家,在佛教文献研究领域有很高造诣;谢列布里亚科夫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诗歌,重点翻译和研究宋代诗人陆游的诗作。

龙果夫(A. A. Драгунов)、鄂山荫、史萍青(A. Г. Шпринцин)和雅洪托夫(C. E. Яхонтов)以研究汉语著称。龙果夫重点研究汉语语法和词汇,他曾发现汉语中龙湘语的存在;鄂山荫主编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华俄大辞典》;史萍青和雅洪托夫对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都有深刻的研究。

弗鲁格(K. K. Флуг)和布纳科夫(Ю. B. Бунаков)是阿理克学派中的文化学家和图书学家。前者主要研究中国图书版本学,写有中国古代印刷史著作,首次对俄藏敦煌文献进行编目,后者主要研究甲骨文,重点研究河南安阳的出土文物。

卡京（В. Н. Казин）和拉祖莫夫斯基（К. И. Разумовский）是艺术学家。前者主要研究中国艺术文化史，后者重点研究中国肖像画理论。

杜曼和齐赫文（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是中国历史专家。前者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著述颇丰，后者既是中国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还是外交家，主要研究对象为19世纪末期中国的改良运动以及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同时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在阿理克的弟子中还出现了几个日本学家，或可称之为日本—中国学家，如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蒙泽勒（Г. О. Монзелер）等。

阿理克学派汉学研究的对象主要以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思想为主。在研究方法上有效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沙畹等法国汉学家开创的微观研究方法，强调汉语修养，重视文本翻译和研究，资料丰富、考据精细、注释详尽。直到今天，圣彼得堡的汉学家们依然保持着这些优良的传统，与以当代问题研究为主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形成鲜明对照。

对于俄国汉学而言，阿理克的主要意义在于他的“继往开来”。在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时，王西里已经垂垂老矣，他在伊万诺夫斯基、孟第和柏百福等老师的教导下接受了最基本的汉学训练。在欧洲国家的游学经历使他不仅深刻了解了欧洲的汉学发展进程，同时学习到了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在对俄国汉学、特别是王西里学派汉学教学与研究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汉学发展大势，顺应苏联新的社会形势，对汉学研究的内涵和方法提出新的理念。在苏联汉学发展史上，无论主要研究对象如何变化，研究机构如何调整，阿理克的汉学观始终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

第五章
苏联及当代俄罗斯汉学的繁荣

苏联汉学70余年的发展历史并非一帆风顺，大致可以分成几个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苏联完成了对帝俄旧汉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在创建苏联新汉学的过程中，阿理克在汉学人才培养以及汉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苏两国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以及中苏关系的变化对苏联汉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明显影响。二三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退居次要位置，中国革命成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视角受到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言论与思想的深刻影响。在1937年至1938年大清洗运动期间，大批优秀的汉学家被以各种反苏维埃的罪名镇压，苏联汉学研究队伍遭受重创，阿理克院士也受到《真理报》的严厉批评。此后，德国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一批汉学家走上前线，苏联汉学研究中心列宁格勒遭到德国军队的长期围困，留在城中的一部分汉学家在饥寒交迫中离开人世，汉学研究几乎陷入停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汉语人才需求激增，培养规模迅速扩大，多种中国问题研究刊物问世，苏联汉学出现繁荣局面。苏联在约十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支总数近千人的汉学研究队伍，出版了千余种与中国相关的书籍。

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不仅影响了苏联汉学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对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产生了影响。有相当一部分苏联汉学家成为苏共与中共论战的先锋，其著述中大量充斥反华言论，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苏联汉学研究面貌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令那些为俄罗斯前途担忧的俄罗斯人看到了希望。随着中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日渐密切，俄罗

斯人汉语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俄罗斯汉学研究重现生机，汉学著作学术价值不断提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由于篇幅所限，本章仅对俄罗斯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和汉语研究领域的成就做一粗线条归纳，同时选取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加以重点介绍。

一、 中国文学研究

（一）成就概述

就苏联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言，阿理克不仅扮演了奠基人的角色，而且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后继者，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科学研究范式，缔造了苏联中国文学研究学派。苏联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始于阿理克，并在他的弟子手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早在19世纪下半期，王西里就视《诗经》为中国文学的瑰宝，不仅翻译为俄文，还将其作为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材。他是世界上最早将《诗经》作为民间创作加以审视的学者之一。1957年，阿理克的弟子施图金出版了《诗经》的俄文全译本，由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院士和费德林通讯院士分别撰写序跋。后来又有多位汉学家对《诗经》进行专门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如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瓦赫京（К. Б. Вахтин）的《论〈诗经〉中的诗句重复》、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儒家注疏者笔下的抒情诗歌〈诗经〉》、李谢维奇（И. С. Лисевич）的《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诗经〉大序》和《古代和中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思想》等。20世纪90年代圣彼得堡大学克拉芙佐娃（М. Е. Кравцова）开始关注《诗经》，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学试析》一书中辟专章论述。近年来，俄罗斯《诗经》研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诗经学”概念，扩大研究视野，探索作品的多方面价值。

楚辞的翻译和研究在苏联备受重视。阿理克翻译了《楚辞》中的《卜居》、《渔父》以及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在屈原的作品当中，《离骚》不仅是为汉学家所关注，而且还令三位俄罗斯著名诗人倾注了很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费德林将《离骚》逐字逐句翻译为俄文，而后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А. Ахматова）对译稿进行修改和润色，从而使该译本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与此同时，另

一位苏联诗人和翻译家吉托维奇(А. И. Гитович)也得到了费德林的初译稿,并为这部伟大的作品所折服,拒绝了国家文艺出版社请他将《离骚》"让给"阿赫玛托娃的要求,废寝忘食地咀嚼修改,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译文。他曾为翻译《离骚》之事专门致信阿赫玛托娃表达自己的歉意。阿赫玛托娃接到吉托维奇的译稿,宽容地夸赞吉托维奇的译文非常出色。[①] 就在费德林的译本问世五年之后,又有一位汉学家巴林(А. И. Балин)在康拉德主编的《中国文选(古代、中世纪及近代)》一书中发表了另一个《离骚》译本。除此之外,《离骚》还有一个俄译本,1975 年在德国出版,译者为流亡巴西的俄侨诗人夏云清(Валерий Перелешин)。此公才情卓越,经历坎坷,对《离骚》情有独钟。与其他译者不同的是,夏云清在翻译手法上更加灵活,原作中大量难为俄语读者理解的用以比兴的植物名称省去未译,然而却充分考虑了俄语诗歌的节奏要求,使译文的总体韵味大有提高。2000 年圣彼得堡出版了《离骚》一书,其中收录了吉托维奇、阿理克、艾德林、巴林、阿达利斯(А. Е. Адалис)、阿赫玛托娃及德涅普罗娃(Г. О. Днеп-рова)的译本。在屈原的研究方面,当数费德林最有心得,他撰有不少文章,如《屈原问题》、《屈原之诗》和《不朽屈原》等。费德林在《屈原问题》一文中对胡适、廖季平的观点加以评介,对屈原的历史真实性及作品的真伪阐述了自己的看法。1986 年费德林出版专著《屈原:时代与创作》,总结了自己对屈原及其诗歌的研究成果。此外,1969 年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屈原与楚辞》中首次分析了《离骚》的形象体系。

苏联的汉赋及散文翻译同样始于阿理克院士。他先后翻译有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和《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和《上林赋》、张衡的《归田》等。《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散文的巅峰之作,阿理克视其为文学巨著,从中翻译了很多名篇,如《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管晏列传》、《 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孔子世家》和《五帝本纪》等。最早对汉朝"乐府"进行研究的是楚紫气,他在 1935 年将《孔雀东南飞》翻译成俄文发表。1958 年瓦赫京在《苏联东方学》杂志发表《乐府的产生》一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生剧烈变化并趋向张扬作者个性的时代,涌

---

①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в Комарове/http://www. akhmatova. org/letters/gitovich-akhm. htm (2006-02-02).

现出大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建安文学作品当中，苏联对曹植的诗歌翻译和研究最多。阿理克译有《洛神赋》，但直到2000年才发表。车连义（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的汉学研究就是从翻译曹植诗歌开始的，1963年出版有《曹植之诗》，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几十首诗和赋，如《白马篇》、《名都篇》、《泰山梁甫行》、《吁嗟篇》、《野田黄雀行》、《送应氏诗二首》、《杂诗六首》、《离友诗二首》、《朔风诗》、《白鹤赋》、《七步诗》、《七哀诗》、《美女篇》、《蒲生行浮萍篇》、《弃妇篇》、《赠徐干》、《赠丁仪》、《赠王粲》、《赠白马王彪》、《又赠丁仪王桀》、《升天行二首》、《游仙诗》、《飞龙篇》、《平陵东》和《箜篌引》等。译者在前言中对曹植的生平和创作思想做了详细介绍。此书的出版奠定了车连义在苏联汉学史上的地位，使其成为国际知名的建安文学研究专家。此外，车连义继承阿理克之传统，尝试将曹植与罗马放逐诗人奥维德（Ovidius Publius Naso）进行对比研究，于1967年发表了《罗马放逐者与魏国漂泊者：奥维德与曹植》。1973年车连义以《七哀诗》为名再次出版曹植诗选。此外，如拉舍夫（В. А. Журашев）、阿达利斯、吉托维奇和李谢维奇也都翻译过曹植的诗赋，其译作连同阿理克的《洛神赋》和车连义所译于2000年由圣彼得堡的一家出版社以《洛神赋》为名结集出版，俄罗斯读者由此得窥曹植诗之全貌。马良文（В. В. Малявин）曾在上世纪70年代致力于“竹林七贤”之一阮籍诗歌的翻译，于1978年出版《阮籍》一书。

20世纪上半期阿理克首译陆机之《文赋》、潘岳的《秋兴赋》和《闲居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鲍照之《芜城赋》和《舞鹤赋》，开启南北朝文学翻译之先河。在该时期的所有文学家当中，陶渊明最为苏联汉学家所重视。阿理克曾经翻译过《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等诗歌，楚紫气亦曾于1935年在《东方》杂志发表过自己的《桃花源记》译文。与其他汉学家相比，阿理克的学生艾德林对陶渊明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出版有《陶渊明及其诗歌》一书。近年来克拉芙佐娃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和研究方面新作不断，特别是她对永明体新诗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出版了专著《中国永明体诗歌》。东晋志怪小说代表作——干宝的《搜神记》和清代袁枚的《新齐谐》一起于1977年由季什科夫（А. А. Тишков）和费什曼以《搜神记——唐代前小说集》及《〈新齐谐〉或〈子不语〉》为名翻译出版，1994年孟列夫出版了《搜神记》的第二个俄译本。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也有俄文译本，译者为苏霍鲁科夫（В. Т. Сухоруков），1980年出版。郭黎贞

(К. И. Голыгина)在1983年出版的《中世纪前中国散文——3~4世纪神话及情节起源问题》一书中对"志怪小说"做了详尽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勃兴,涌现出如钟嵘、刘勰这样的文学评论家。阿理克曾在《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一书中发表了他所翻译的钟嵘《诗品》,而后又节译了刘勰的《文心雕龙》。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唐代文学翻译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阿理克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位大量翻译唐诗的学者,并在翻译思想和技巧上独具匠心。他全文翻译了李攀龙所辑的《唐诗选》。然而,这些译诗在生前只有少数在杂志上零星发表,直到1978年后人才结集出版了一部分。楚紫气1923年出版了《7~9世纪中国抒情诗选》,阿理克作序,对后来苏联汉学家翻译唐诗在翻译理念和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1956年出版的由费德林编选的《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一书收录王绩、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贺知章、崔国辅、李颀、孟浩然、王湾、王翰、韦应物、王昌龄、王维、李白、高适、常建、钱起、张继、顾况、戴叔伦、杜甫、杜牧、李贺和孟郊等58位诗人的181首作品,由亚历山大罗夫、马尔科娃(С. Д. Маркова)和巴斯马诺夫(М. И. Басманов)等共同翻译。次年,费德林与郭沫若共同选定篇目,组织翻译出版《中国诗选》四卷,其中第二卷为唐诗,收录了62位诗人的202首诗,规模宏大。在唐朝诗人中,李白、杜甫、白居易和王维等人作品都有俄译专辑出版。1955年和1956年首次出版的由吉托维奇翻译的《杜甫抒情诗集》和《李白抒情诗选》已被视为经典之笔,以后又多次以各种形式再版重印。同时,吉托维奇在1959年还出版了《王维诗集》。吉托维奇尽管不懂汉语,但在翻译中国诗歌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此外,苏霍鲁科夫也在1979年出版了自己翻译的《王维诗集》。翻译白居易诗歌的主要是艾德林,他于1949年、1951年、1958年、1965年、1972年和1978年出版了多种白居易诗选。韩愈、柳宗元作品的译者索科洛娃(И. И. Соколова)于1979年出版有《韩愈柳宗元选集》。当今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托洛普采夫(С. А. Торопцев)专事李白诗歌翻译,2005年出版有译诗集《心灵山水:李白》。

在唐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艾德林的《白居易诗歌中的对仗》、费什曼的《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达格丹诺夫(Г. Б. Дагданов)的《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别仁(Л. Е. Бежин)的《谢灵运》、托洛普采夫的《李白古风》以及斯托罗如克(А. Г. Сторо-

жук)的《唐代元稹生平及创作》等。

曾经被当作现实主义小说的《唐代传奇》在苏联时期引起汉学家的高度关注。费什曼1955年出版的《唐代传奇》是该领域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索科洛娃在其1969年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小说》中反对费什曼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读传奇。1970年由索科洛娃、费什曼和艾德林等翻译的《浪子与术士》出版。郭黎贞1980年出版的《中世纪中国传奇——题材渊源及其演变》一书对民间传说母题的演变进行了考察。梅列京斯基(Е. М. Мелетинский)在《传奇小说历史诗学》一书中,利用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与欧洲中世纪小说加以对比,指出中国中世纪小说已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苏联学者还利用所藏敦煌文献,对唐代俗讲变文进行了研究,其中尤以孟列夫成就最为突出。他在1963年翻译、注释并出版了《维摩诘经变文与十吉祥变文》,1972年出版《报恩经变文(双恩记)研究》第一卷,佐格拉芙(И. Т. Зограф)在同年出版的第二卷中对该变文的语法和词汇特点进行了研究。

至于宋代文学,苏联汉学家主要集中于著名词人、话本小说和笔记小说的翻译和研究上。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诗选》和《宋代诗歌》中就已经收录了大量宋代名词人的作品。2000年圣彼得堡出版了《云居:宋代诗词》一书,由斯米尔诺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作序跋,书中收录了孟列夫翻译的南唐后主李煜的《清平乐》和《望江南》、范仲淹的《梅花》、韩琦的《长安府舍竹径》,斯米尔诺夫翻译的李觏的《忆钱塘江》、《送春》和《登越山》,谢尔盖耶夫(А. Сергеев)翻译的王安石之《元日》和《明妃曲》,维特科夫斯基(Е. В. Витковский)翻译的苏轼诗词36首,孟列夫等译黄庭坚诗词九首以及众多汉学家翻译的张耒、叶梦得、李清照、刘子翚、陆游、周必大、杨万里、辛弃疾、徐玑、元好问和文天祥的诗词。在宋代词人中间,陆游、李清照、辛弃疾和苏东坡最受关注,都有专门译集出版。最早翻译陆游诗词的是格鲁别夫(И. С. Голубев),他在1960年出版了《陆游》一书。另外一位宋词翻译者为巴斯马诺夫。这位行伍出身,半路出家,后在苏驻华使馆长期工作的汉学家将宋词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出版了大量译作。在《宋代诗歌》一书中收录了他翻译的柳永、李清照和辛弃疾的词作。1961年,他出版了《辛弃疾》一书,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数十首辛弃疾词。1970年他又翻译出版了李清照的词集《漱玉词》,1970年出版《花间词》,收录20位唐宋词人作品。1988年他出版《玉笛声声》,选译中国古代诗人作品

多种。在1986年出版的《爱情与幽怨》一书中，巴斯马诺夫所译全部为中国古代女诗人作品。200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相逢与别离——1～20世纪中国女诗人作品》，再次出版了巴译20世纪前中国女诗人作品。目前，致力于翻译苏轼作品翻译的还有维特科夫斯基。苏联和当今俄罗斯最著名的陆游研究专家为谢列布里亚科夫教授。苏轼作品最初的主要译者和研究者为格鲁别夫，他在1973年发表《苏轼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两年后年出版了《苏东坡诗词》。

圣彼得堡汉学家阿利莫夫（И. А. Алимов）近年来在宋代笔记小说翻译和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于1996年出版了《宋代笔记研究与翻译》第一卷，内容包括宋祁的《宋景文公笔记》、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欧阳修的《归田录》、刘斧的《青琐高议》、朱彧的《萍洲可谈》、曾敏行的《独醒杂志》。译者对笔记小说作者生平进行了考察，选译了部分故事，并做了注释。2000年阿利莫夫再以《玉露》为书名发表了他新翻译的《北梦琐言》、《归田录》、《青琐高议》及《萍洲可谈》中的故事。2004年他推出了《宋代笔记研究与翻译》的第二卷，收录了他与谢列布里亚科夫关于欧阳修《六一诗话》、沈括《梦溪笔谈》、陈师道《后山诗话》、龚明之《中吴纪闻》、范成大《吴船录》、《桂海虞衡志》及元好问《续夷坚志》等笔记小说的译文与研究心得。

俄罗斯汉学界一度称宋代话本小说为“中篇小说”，近来郭黎贞提出采用“机巧小说”这一术语界定“话本”概念。[①] 最早对话本小说进行全面研究的是热洛霍夫采夫（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所著《中国中世纪的城市小说——话本》，作者在书中将话本与俄罗斯17世纪的中篇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1962年佐格拉芙曾以《十五贯》为书名翻译出版《京本通俗小说》，但多有删节。1984年巴甫洛芙斯卡娅（Л. К. Павловская）出版宋刊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俄文译本。1995年佐格拉芙与孟列夫合译出版《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和《冯玉梅团圆》七篇小说全文连同其中诗词被尽数译出。

元杂剧是苏联元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孟列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① ［俄］郭黎贞著，阎国栋等译：俄罗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概览，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九集，中华书局，2006年。

始于其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兴趣。他的第一篇汉学研究论文为1951年在大学时代发表的《中国戏剧的民间因素》。1959年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改革》问世，这部书的核心内容乃是讨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戏曲改革，只是零星涉及了诸如《临江驿潇湘夜雨》等元代剧目。后来，孟列夫陆续翻译出版了《西厢记》、《张生煮海》、《倩女离魂》和《牡丹亭》等戏剧经典。20世纪70年代谢列布里亚科夫、索罗金（В. Ф. Сорокин）、马里诺夫斯卡娅（Т. А. Малиновская）翻译的一些戏剧作品被收入《东方古典戏剧》一书，于1976年出版，书中收录了关汉卿、王实甫、朱庭玉、马致远、汤显祖、洪升和孔尚任等历代名剧作家的佳作。盖达（И. В. Гайда）1971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戏剧》全面地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了中国戏剧。索罗金1979年出版的《13～14世纪中国古典戏剧：起源、结构、形象、情节》，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元杂剧的论著。

明代四大奇书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帕纳秀克（В. А. Панасюк）翻译了《三国演义》，罗高寿（А. П. Рогачев）译有《水浒传》和《西游记》（与郭质生合译），马努辛（В. С. Манухин）译有《金瓶梅》。与西方汉学界有时为迎合读者阅读兴趣而对原作进行删改不同，苏联汉学家翻译的中国长篇小说全部是足本。但由于翻译速度快，翻译量大，难免也有误译的地方。无论如何，四部明代巨著的出版是苏联汉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纳秀克一生将全部的精力用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翻译，很少对其进行研究，这与其他出自阿理克门下的汉学家形成鲜明对照。继1954年出版《三国演义》译本之后，他又攻克了《红楼梦》的翻译（其中诗词由孟列夫承担），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欧洲文字全译本。此外，他还在1963年出版了他翻译的钱彩的《说岳全传》，1974年他又翻译出版了石玉昆的《三侠五义》，1983年他的最后一部译作《平妖传》问世。对于第一位大规模从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翻译的帕纳秀克而言，显然需要克服很多前人未遇的问题，如原文理解、译语选择、风格表现等。他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却有相当重的分量。中国学者在研究汉籍外译过程中都无法绕过帕纳秀克的译作，尤其是《红楼梦》译本。对于明代这四部小说，俄罗斯有大量研究论著发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李福清先生。他从上世纪60年代起研究《三国演义》，先后著有《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从神话到章回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李福清先生将《三国演义》与有关三国的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进行

比较研究，方法独特，观点鲜明。

明代话本小说早在20世纪初就有伊凤阁等人零星翻译发表过。集中对其进行翻译的是列宁格勒大学的维尔古斯（B. A. Вельгус）和齐一得夫妇。1962年他们翻译的《今古奇观》出版，内容包括《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宋金郎团圆破毡笠》、《夸妙术丹客提金》、《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羊角哀舍命全交》、《卖油郎独占花魁》、《老门生三世报恩》、《滕大尹鬼断家私》、《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和《女秀才移花接木》。1999年二人翻译的《三言两拍》在圣彼得堡出版，俄文名称为《珍珠衫——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书前有齐一得所撰长篇序言《从话本到拟话本》，正文除重刊1962年《今古奇观》中的篇目外，增加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裴晋公义还原配》、《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唐解元一笑姻缘》、《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李讲公穷邸遇侠客》、《苏小妹三难新郎》、《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和《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等 。另外，华克生（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也翻译了许多明代话本小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出版了四部译文集：《懒龙手段》、《两度离世女》、《道人神咒》和《还银》。

斯米尔诺夫主要从事明代诗歌的翻译和研究。他选中了被誉为“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作为主攻对象。1978年他以《高启的生平与创作》为题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发表《高启与中国传统中的“诗人与诗论”问题》。他翻译的高启诗零散发表在某些东方文集以及1978年出版的《8～14世纪中国抒情诗》中。他效仿当年阿理克全文翻译李攀龙的《唐诗选》，完成了清沈德潜所编《明诗别裁》的翻译。1989年他选编了一部分，以《玉阶》为名出版，其中收录了高启、宋濂和杨基等六位诗人作品。后来，在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的支持下，他接连出版了两本明代诗歌选集：《清影：明代诗歌》（2000）、《天桥：高启之诗》（2000）。

小说创作的繁荣代表了清代文学的主要成就，自然也成为苏联和俄罗斯汉学家翻译研究的重点。在明清长篇小说翻译方面，帕纳秀克功莫大焉，四大古典小说中的《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全译本都出自他的译笔。与帕纳秀克同时还有几位汉学家也进行清代小说的翻译，维尔古斯1953年完成了李汝珍《镜花缘》的翻译，华克生1959年出版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的俄文译本，谢马诺夫（В. И. Семанов）1960年翻译出版了曾朴的《孽

海花》。

费什曼对清代两部著名的笔记体小说——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进行了翻译和研究。1974 年她出版了《阅微草堂笔记》俄译本，三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子不语》。1980 年费什曼出版了专著《17～18 世纪中国的三位小说家：蒲松龄、纪昀、袁枚》，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三位短篇小说家作品的情节进行了比较研究。

清代戏剧的典范作品《长生殿》和《桃花扇》在俄罗斯只有节译本，发表于 1976 年的《东方古典戏剧：印度、中国 、日本》一书。在清代戏曲研究方面，当首推谢罗娃（C. A. Серова）。她对清黄幡绰等著的戏曲表演论著《明心鉴》进行了研究，于 1979 年出版有《黄幡绰〈明心鉴〉与中国传统戏剧美学》一书。1990 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中国戏剧研究专著《中国戏剧与 16～17 世纪中国社会》。1999 年她更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戏剧与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戏剧传统进行比较，出版了自己的第三部专著《白银时代戏剧文化与东方的文艺传统》。2005 年，她再接再厉，推出了第四部中国戏剧理论著作《中国戏剧——世界美学形象》，内容包括导言以及戏剧的形而上学、作为文化现象的木偶戏、天地人合一的感受、舞台艺术是世界的美学形象四章。

明清情色小说在当今俄罗斯书市上颇受欢迎，汉学家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作品。郭黎贞在继 1988 年出版《剪灯新话》之后，1992 年又出版了《杏花天》。由马努辛翻译的《金瓶梅》一版再版。华克生专门从事李渔作品的翻译和研究，1985 年翻译出版了《十二楼》，2000 年又出版《肉蒲团》俄译本。

阿理克的学术兴趣实际上不只限于中国古典文学，他同时也非常关注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可以说，他是苏联乃至欧洲第一个研究胡适的汉学家，并且在鲁迅去世之后要求他的学生认真研究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培养了几位出色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和研究者。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理克同时也是苏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

鲁迅是苏联汉学家最早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之一。在国外，除了日本，最早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和研究的就要数苏联了。最早被翻译成俄文的是鲁迅的《阿 Q 正传》。这部著名的短篇小说发表于 1925 年的《语丝》，当时正在中国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苏联顾问团翻译的王希礼（Б. А. Васильев）便立刻开始翻译，同时致信曹靖华，请他向鲁迅先生索要

小传和照片。[①] 1929 年，王希礼的《阿 Q 正传》俄译本出版，其中包括了鲁迅专门为苏联读者写的《著者自叙传略》。第二位对苏联鲁迅研究有开创之功的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担任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的罗果夫（B. H Рогов）。他社交非常活跃，与鲁迅、郭沫若等都有私交。在 1939 年于重庆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他发言介绍了鲁迅在国外的影响。他倾力进行鲁迅著作的翻译，于 1945 年出版了《鲁迅选集》，收录了《呐喊》、《彷徨》和《野草》，1952 年再版时增加了费德林的序言。1949 年他又在上海出版了自己的鲁迅作品译本《鲁迅小说杂文书信》。1949 年和 1950 年，他翻译的《阿 Q 正传》在大连和北京以中俄文对照的方式出版，1955 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俄文单行本。与此同时，他还编选了鲁迅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言论，于 1949 年在上海出版了《鲁迅论俄罗斯文学》一书。回国以后，他同其他苏联鲁迅研究者一道，在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4 ~ 1956 年间，在苏联鲁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四卷本的《鲁迅选集》在苏联问世。第一卷 1954 年出版，译者为郭质生和罗果夫，由费德林作序，其中收录了《著者自叙传略》、《呐喊》、《野草》、《彷徨》。第二卷出版于 1955 年，由波兹德涅耶娃（Л. З. Позднеева）译出，收录《热风》、《坟》、《华盖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淮月风谈》、《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等。第三卷也出版于 1955 年，译者为波兹德涅耶娃、郭质生和费德林，内容为《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的选译。第四卷出版于 1956 年，主要收录《两地书》等鲁迅书信。1971 年《鲁迅小说》在苏联出版，译者为索罗金、罗果夫、罗高寿、维·彼得罗夫、艾德林、苏霍鲁科夫、费德林和谢马诺夫，其中收录了《伤逝》、《呐喊》、《彷徨》、《野草》及《故事新编》。1981 年和 1989 年还出版了两种《鲁迅选集》，内容与 1971 年版大同小异。

在鲁迅研究方面，苏联时期出版了几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波兹德涅耶娃、索罗金均将鲁迅作为自己副博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波兹德涅耶娃自 1933 年开始研究鲁迅，1956 年以《鲁迅的创作历程》一文获得博士学位，1959 年扩写为《鲁迅生平与创作》一书出版。波兹德涅耶娃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曹靖华、李霁野等鲁迅生前友人的指导和帮助，对鲁迅文

① 张杰：《鲁迅：域外接近与接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57 页。

学创作道路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特点分析。索罗金在其1958年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呐喊〉与鲁迅创作道路之开始》中对鲁迅早年的文学活动进行了透视，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专著《鲁迅世界观之形成》。此后，维·彼得罗夫于1960年出版《鲁迅生平与创作》一书，着力对鲁迅的重要作品加以分析。七年之后，谢马诺夫的《鲁迅及其前驱》问世，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该著虽然篇幅不大，但论证严密，在观点上颇有创新。谢马诺夫从题材、体裁、人物、思想、风格、结构、语言等诸多方面同清代讽刺小说加以比较，试图阐明鲁迅作品的历史继承性。李明滨先生将此书翻译为汉语，198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老舍作品最早的俄译本是1944年在由罗果夫主编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发表的《人同此心》，译者为波兹德涅耶娃。[①] 季什科夫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作品短篇小说集》中发表了《月牙儿》，同时发表的还有其他译者翻译的《听来的故事》和《且说屋里》。1954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季什科夫翻译的《龙须沟》。罗高寿1958年翻译出版了《无名高地有了名》。1966年，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Е.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和霍赫洛娃（С. Хохлова）翻译的《小坡的生日》与《牛天赐传》由莫斯科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再版。1967年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翻译的《离婚》出版。此外，谢马诺夫1969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猫城记》，同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同时收录了《阳光》、《大悲寺外》、《热包子》和《开市大吉》。1977年此书再版，增加了《月牙儿》、《邻居们》、《毛毛虫》、《老字号》和《马裤先生》。华克生翻译的《正红旗下》被编入1981年的《老舍选集》中。

俄罗斯曾出版过多种老舍作品选集，继1954年季什科夫的《老舍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老舍的八篇小说：《月牙儿》、《上任》、《善人》、《也是三角》、《微神》、《黑白李》、《邻居们》和《马裤先生》）之后，1956年费德林主编出版了《老舍小说戏剧杂文》，内容包括《牺牲》、《一封家信》、《听来的故事》、《大悲寺外》、《歪毛儿》、《黑白李》、《月牙儿》、《善人》、《邻居们》、《微神》、《龙须沟》和《方珍珠》及杂文三种。1957年费德林又主编了《老舍选集》两卷，其中收录了《骆驼祥子》以及若干种短篇小说和戏剧，印数达到三万册。1965年由法因加尔（А. А. Файнгар）翻译的老舍短篇小说集《末一块钱》出版，其中包括《末一块钱》、《断魂枪》、《“火”车》、《老字

① 乌兰汗：老舍先生和俄译者，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1期。

号》、《不成问题的问题》、《同盟》和《马裤先生》。1991 年的《老舍选集》由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主编，索罗金作序，内容包括《离婚》、《猫城记》、《骆驼祥子》、《茶馆》、《月牙儿》、《阳光》、《微神》、《大悲寺外》和《一封家信》等，印数竟有十万册之多。此后，还有多种老舍作品集问世，大多是原译文的再版。1996 年圣彼得堡大学的司格林（Н. А. Спешнев）教授出版有《老舍幽默文集》。

苏联时期就有几部老舍的研究专著出版。1967 年出版的安季波夫斯基（А. А. Антиповский）的《老舍的早期创作》主要研究了老舍自 1926 年至 1936 年的创作活动，即从《老张的哲学》到《骆驼祥子》这一时间段。博洛季娜（О. П. Болотина）1983 年出版的《老舍战时创作》在时间上与安季波夫斯基的研究相衔接。2001 年在司格林指导下，罗流沙（А. А. Родионов）的副博士学位论文《老舍作品中的中国人民族性格》通过答辩。

苏联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开始翻译茅盾的作品。1935 年，茅盾的《动摇》被译成俄文在列宁格勒出版，译者为辛（С. Син），王希礼和鲁德曼（В. Г. Рудман）编辑，王希礼作序。1937 年火夫（Хо Фу）和鲁德曼翻译的《子夜》出版，书前有萧三的《论长篇小说〈子夜〉》和译者的《茅盾的创作道路》两篇序言。1952 年鲁德曼再版了《子夜》俄译本，1959 年再次出版。1954 年他翻译出版了《茅盾短篇小说》，收录《春蚕》、《林家铺子》、《赵先生想不通》、《微波》、《夏夜一点钟》、《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儿子开会去了》和《列那和吉地》等。1955 年鲁德曼所译《林家铺子》再版，费德林作序，其中还收录了他翻译的《赵先生想不通》、《微波》、《夏夜一点钟》、《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及《儿子开会去了》。1959 年长篇小说《虹》由莉希查（Б. Лисица）和穆德洛夫（Б. Г. Мудров）翻译成俄文出版。1960 年乌利茨卡娅（Л. Улицкая）翻译出版《茅盾短篇小说》，收录了四篇小说。1968 年伊万科（С. Иванько）翻译了《腐蚀》。1972 年索罗金重译《腐蚀》，同名书还收录了索译《春蚕》、《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

1955 年费德林编辑出版了一部《茅盾选集》，内容包括《子夜》、《春蚕》、《秋收》、《林家铺子》、《赵先生想不通》、《微波》、《夏夜一点钟》、《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和《儿子开会去了》等。1956 年费德林主编出版三卷本的《茅盾选集》，收录了长篇小说《动摇》、《虹》、《子夜》以及中篇小说《路》和《三人行》。在 1991 年由索罗金主编的《茅盾选集》中包括了《腐蚀》、《动摇》、《我走过的道路》、《林家铺子》、《春蚕》、《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和

《水藻行》等。

在茅盾的研究方面，除有大量论文发表外，还有两部专著。1956 年费德林曾经出版了一本叫《茅盾》的小册子。最重要的茅盾研究成果当数索罗金 1962 年出版的《茅盾的创作道路》一书。

费德林 20 世纪 40 年代在重庆工作期间与郭沫若有密切交往。他从那时开始翻译郭沫若的作品，并亲自向郭沫若请教。1951 年费德林翻译的《屈原》出版，郭沫若亲为作序。1960 年郭沫若的诗集《百花齐放》俄文版问世。在郭沫若研究方面，除费德林 1956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外，还有两部专著，即马尔科娃的《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和齐宾娜（E. A. Цыбина）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郭沫若戏剧》。

此外，在现代作家当中，巴金、曹禺、郁达夫的作品自苏联时期以来也备受重视，均有汉学家专门从事翻译和研究。

俄罗斯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关注程度明显逊于古代和现代作家。冯骥才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较早被介绍到苏联的。1983 年他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由李福清翻译，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1987 年由李福清编辑出版了《冯骥才小说集》，其中包括《铺花的歧路》、《啊》、《感谢生活》、《神鞭》、《在早春的日子里》、《意大利小提琴》、《三十七度正常》、《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我不是右派，是左派》和《老夫老妻》等作品。2003 年司格林翻译出版了冯骥才的《俗世奇人》。

1988 年远东研究所的托洛普采夫编辑出版了《王蒙选集》，除自己的译作外，还收录了华克生翻译的《活动变人形》。此外，苏联时期还出版过几部中国当代作家文集。1983 年热洛霍夫采夫翻译出版了《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内容包括刘宾雁《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刘心武的《如意》、王蒙的《蝴蝶》和陈淼的《稀有作家庄重别传》四部中篇小说。1984 年索罗金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小说》，其中收录了王蒙的《春之声》和《海的梦》、谌容的《人到中年》、冯骥才的《啊》和《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1985 年李福清主编出版《人到中年》，收录了冯骥才的《啊》、王蒙的《杂色》、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以及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88 年莫斯科彩虹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收录了丛维熙、韶华、李准、韩少功、叶蔚林、李陀、王蒙和张抗抗的小说。同年，该出版社还推出了一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阿城、王安忆、王蒙、高晓声、古华、邓友梅、陆文夫、刘心武、刘绍棠和冯骥才

等人的作品。

（二）主要研究者

费德林

1912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39年进入苏联外交部，一直工作到1968年，先后担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驻日本大使、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58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7年起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1970～1988年间担任苏联《外国文学》主编，2000年在莫斯科逝世。

大学毕业后，费德林随阿理克修习研究生课程，主要从事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于1939年翻译发表《药》与《一件小事》。在重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期间，费德林发表有《鲁迅文学创作的特点》等文章。1953年他在莫斯科出版了《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一书。他的兴趣非常广泛，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都有译著和专论发表。就古代文学而言，费德林从一开始便同时从事了几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是费德林的最早的研究重点。1943年，他以《屈原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创作》一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文章于1944年和1946年以《屈原生平与创作研究》为名发表在中国的《中原》和《中国学术》杂志上。1954年，由费德林和阿赫玛托娃合作翻译的《离骚》问世，文学界盛赞译文的高超水平。1986年费德林出版了《屈原：时代与创作》。其次便是对《诗经》的研究，1958年出版有《〈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书，系统论述了《诗经》的创作历史、艺术特色及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1987年他为施图金所译《诗经》第二版作了长篇序言。再次是唐代诗歌翻译，代表作品为《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以及与郭沫若共同编辑出版的四卷本《中国诗选》。他还与茅盾、老舍、赵树理交往密切，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和创作道路进行了初步研究。1953年出版的由其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概论》是苏联第一部研究中国抗战文学的论著，而195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略》则是苏联对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的第一次系统研究。

宽广的研究范围使费德林具备了从宏观上认识中国文学特质的能力。费德林主要利用外交工作间隙进行汉学研究，因而在其发表的200余种论著中多为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各种中国文学论著而写的序言。这

些文章尽管篇幅不一，但材料丰富，观点独到，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文学的精深研究。1974 年和 1981 年他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问题》和《中国文学遗产与现代性》两部文集，收录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论文。前者对中国文学史分期及对历代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后者对中国诗学遗产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诗经》、《易经》和《尚书》在中国文学、哲学和历史学史上的地位，对屈原、关汉卿等作家进行了专题研究。1987 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将这两部著作以《费德林选集》为书名合集再版。①

艾德林

1909（或 1910）年出生，1937 年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与费德林是大学同学，又同为阿理克的研究生。1942 年以《白居易绝句》一文通过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969 年被授予博士学位。艾德林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军事外语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共发表作品 250 余种，1985 年去世。

艾德林被认为是阿理克学术旨趣和方法最忠实的继承者，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古典文学，尤以诗歌翻译与研究最为突出。1949 年他出版了白居易的《四言绝句》，1951 年再版。1958 年他出版了另一部白居易诗集《白居易诗歌》，其中包括《亲王破阵乐》、《新民谣》、《四言绝句》等章节，郭沫若作序。1965 年艾德林出版《抒情诗》，收录了他翻译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1972 年再版。1978 年出版《白居易诗选》，内容与 1958 年的《白居易诗歌》相同。1964 年艾德林翻译出版《陶渊明抒情诗》，收录《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责子》、《归园田居》、《归鸟》、《挽歌》、《桃花源记》等。1967 年出版了《陶渊明及其诗歌》一书，对陶渊明其人其诗进行了研究。艾德林按照阿理克开创的译、释、研同步进行的方式，在苏联读者面前树立起这位中世纪中国诗人的形象。1972 年，艾德林的陶渊明诗歌译作增订再版。《古诗十九首》为 19 篇抒情短诗，最早著录于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中，历史上备受推崇，流传甚广。1958 年艾德林将之翻译为俄文，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名出版，后多次再版。1987 年他出版《唐诗》，其中收录了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贺知章、陈子昂、寒山、

① Эйдлин Л. З. О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ах Николая Трофимовича Федоренко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ССР: Сб. ст. К 60-летию чл. -корр. АН СССР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М., 1973.

张说、张九龄和崔国辅等人的作品。1999 年,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再次以《枯苇》为名精选出版了艾德林翻译的唐诗,2000 年以《秋菊》为名结集出版了艾译陶渊明诗歌。

艾德林也曾关注并翻译过几部当代文学作品。早在 1955 年他就出版有《论中国当代文学》一书,对周立波、赵树理等崭露头角的作家进行了介绍。1956 年他与马尔沙克(С. Маршак)、苏尔科夫(А. Сурков)、格鲁别夫、阿谢耶夫(Н. Асеев)和巴斯马诺夫合作完成了毛泽东 18 首诗词的翻译,出版《毛泽东诗词十八首》一书。此外,1973 年他还主编出版过《苏联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总结了苏联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

孟列夫

1926 年出生在列宁格勒,上中学时因偶然看到了蒙古学家科津(С. А. Козин)翻译的《元朝秘史》而决意从事东方学研究。1947 年中学毕业后孟列夫为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满语专业免试录取,后在阿理克院士建议下转入汉语专业,1952 年毕业后进入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在艾德林教授指导下进行中国古典戏剧研究。1955 年孟列夫提前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被分配到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并在这里工作到 2005 年去世。作为阿理克最后一批亲传弟子之一,孟列夫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二是俄藏汉文写本的校勘和研究。他生前一共发表汉学研究作品 200 余种,其中包括 15 部论著和译著。

在孟列夫的学术生涯中,有两个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位是阿理克院士,另一位是艾德林。前者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师,而后者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从孟列夫的学术兴趣以及研究方法上都不难看出其中的师承关系。阿理克、艾德林译唐诗,孟列夫也译唐诗。他对中国戏剧题材中蕴涵的民间因素以及对敦煌变文的研究都与阿理克重视中国俗文学不无关系。

孟列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始于其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兴趣。他的第一篇汉学研究论文为 1951 年在大学时代发表的《中国戏剧的民间因素》,1959 年其副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改革》一书问世。此后,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西厢记》、《张生煮海》、《倩女离魂》和《牡丹亭》等中国戏剧经典。

古典诗词是孟列夫最重要的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对象。20 世纪 50 年代他先后翻译发表了王维、高适、岑参、韦应物和孟郊等众多唐代诗人的佳作。1958 年他与帕纳秀克合作共同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红楼梦》欧洲语言(俄语)全译本,其中的诗词译文全部出自他的妙笔。此外,他还译有于宝《搜神记》(1994 年初版,2001 年再版)、《京本通俗小说》(承担其中诗词翻译与注释)(1995)、《清流:唐代诗歌》(2001)等。据初步统计,即使不算《红楼梦》诗词,他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也已达到一万行。1962 年李福清先生在列宁格勒分所发现了前所未见的《石头记》抄本,于 1964 年与时任古代文献部主任的孟列夫合作撰文公布于世,被定名为"列藏本",由中华书局于 1986 年影印出版,一时成为轰动国际红学界的大事。

1957 年孟列夫领导列宁格勒分所的几个年轻学者投身于俄藏敦煌文献的研究,并于 1963 年和 1967 年主编出版《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孟列夫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方面于 2001 年合作整理出齐了十七卷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使长期与世隔绝的俄藏敦煌文献得见天日。与此同时,他在敦煌变文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先后出版了《维摩诘经变文与十吉祥变文》(1963)、《中国敦煌写本——佛教俗文学文献》(1963)、《报恩经变文(双恩记)研究》第一卷(1972 年出版,1976 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和《法华经变文叙录》(1984)等。与此同时,孟列夫在俄藏西夏文书研究上也颇有成绩,1984 年苏联出版有《黑水城科兹洛夫藏品汉文文献叙录》。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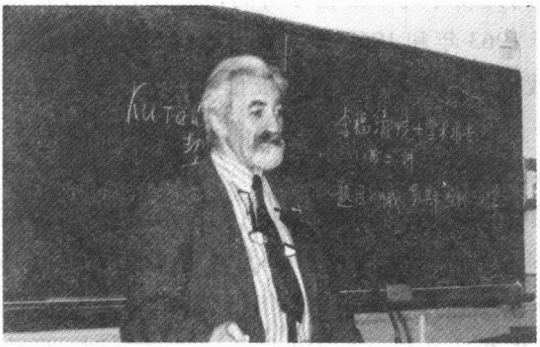
李福清

1932 年李福清出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职员家庭,1951 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 。1965 ~ 1966 年,李福清在北京大学进修,进一步充实了中国文学知识。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迄今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 200 余种。1987 年,他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

① Попова И. Ф.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 (1926-2005)/ http://www. orientalstudies. ru/rus/index. php? option = com_ content&task = view&id = 170&Itemid = 49(2006-03-19).

中国民间文学是李福清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万里长城的故事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 年出版。作者提出了两个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问题。一是故事演变问题,他发现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框架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都没有发生过变化。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特点,他认为,同一个中国民间故事存在许多不同的体裁,既有传说,还有民歌、地方戏、宝卷、弹词等。同时,他还研究了一个情节在不同体裁中的差别。比如,宝卷中的孟姜女故事就有很强的佛教色彩,而在戏曲中,孟姜女前去送寒衣的情节被描写得非常细腻。1988 年他利用在哈萨克东干族人中收集到的民间故事出版了《东干人民间故事与传说》,用俄文字母记录了这些故事的东干语发音。



李福清

李福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独具匠心,将中国民间传说融入其中,有关著述大都已在大陆和台湾出版。1962 年他开始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岳飞传》三部小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关系。1965 年他在北京大学进修时发现图书馆有许多有关《三国演义》的研究资料,于是将研究对象固定在这部小说上。1970 年,他在苏联出版了俄文版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9 年又出版了《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9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增订中文版,后来台湾又出版了他的《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李福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特色鲜明。他利用俄罗斯的文学理论,从作品思想、人物描写、叙述结构三个层次上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李福清第一次将“母题”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他称在这方面是继续了苏联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的研究。后者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篇研究世界叙事诗的长文,探讨各族叙事诗的母题,分析了西方民族(如德国、法国、西班牙)和东方(蒙古、突厥诸族)民间故事中的母题问题。

此外,李福清先生在研究中非常重视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注意凸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地位。一方面从世界文学史看中国文学,另一方面努力把历史诗学观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

李福清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海外孤本的搜寻和出版。除与孟列夫发现"列藏本"《石头记》外,1966年他在苏联列宁图书馆俄国汉学家孔气档案中发现清代曹去晶所著艳情小说《姑妄言》。1997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在《思无邪汇宝》第36~45册中刊出了《姑妄言》。至此,一部在中国失传已久的小说又重见天日。20世纪80年代,李福清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两种,后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结集出版了《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

1928年出生,195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4年谢列布里亚科夫以《8世纪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性》一文获副博士学位,1973年以《陆游的生平与创作》一文获博士学位。他终身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曾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研究杜甫、宋代诗歌和笔记等,发表作品百余种。

1958年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副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杜甫评传》一书。他在博士学位论文《陆游的生平与创作》中,对这位著名的宋代文人进行了深入探索。1979年谢列布里亚科夫出版《10~11世纪中国诗歌:诗与词》,以李煜、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和欧阳修等词人的作品为例,首次在苏联汉学史上对诗与词两种文学体裁的艺术特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1994年,他完成了《老学庵笔记》的翻译和注释,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第一卷和第五卷上发表。2000年他将自己的宋词译作以《悲伤与欢乐》为名结

① 阎国栋:莫斯科的中国文化知音,载《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3期。

集出版,其中收录了12位宋代词人作品。2004年他与阿利莫夫合作出版《宋代笔记研究与翻译》的第二卷,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范成大的《吴船录》以及对这部宋代笔记的研究成果。

2005年谢列布里亚科夫与罗流沙合编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手册(公元前7世纪至21世纪初)》,辑录了历代中国文学家的姓名、年谱、作品人物、文艺理论术语等,为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索罗金

1927年出生,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8年以鲁迅研究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1979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57年入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1961年入亚洲民族研究所,自1967年起在远东研究所工作,发表作品近200种。

索罗金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现代文学,二是中国古典戏剧,三是中国当代文学。索罗金的中国现代文学始于鲁迅研究。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呐喊〉与鲁迅创作道路之开始》回顾了鲁迅的童年、青年生活历程和社会背景,分析了鲁迅的老师和先辈对其人生观形成的影响,对鲁迅早年在东京创作的作品进行了研究。1958年,他以该论文为基础出版了《鲁迅世界观之形成》。与此同时,他对茅盾作品进行了翻译和研究。他曾多次与茅盾会面,向他请教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对其作品的认识和翻译问题。1956年,费德林主编出版了三卷本的《茅盾选集》,将茅盾的作品介绍给了苏联读者。1962年索罗金出版《茅盾的创作道路》,是为俄罗斯汉学史上首部茅盾专论。作者在书中详细探索了茅盾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创作活动,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欧洲文学对茅盾创作特色形成所发挥的影响给予了特别关注。他翻译的《腐蚀》、《春蚕》、《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于1972年出版。在现代作家当中,他还翻译过老舍、郁达夫、艾芜和杨绛等人的作品。此外,他还与艾德林合撰过《中国文学》,主编有《20~40年代中国文化与现代》(1993)等论文集。

索罗金对元杂剧研究用功甚勤,成就突出。1979年推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元杂剧的论著——《13~14世纪中国古典戏剧:起源、结构、形象、情节》,书中对现存的162种剧本逐一做了详细介绍,分析

了杂剧的形成过程，并对其结构、形象、语言以及剧作家的创作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此后，索罗金又对中国伤痕文学发生了兴趣，1989 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与艺术（1976～1985）》，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创作进行了思考。他先后翻译有王蒙、刘心武、冯骥才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另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化》（1983）、《90 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与艺术》（1995）等著作。①

维·彼得罗夫

1929 年出生，195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而后留校任教，直至 1987 年去世。维·彼得罗夫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发表著述 100 余种。

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广受同行和学生敬佩，但却至死没有教授职衔的汉学家。上世纪 50 年代，由于他以当时被宣布为反党分子的诗人艾青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所以没有通过答辩。然而，这并没有影响维·彼得罗夫对汉学的热情。他先后对鲁迅、老舍、巴金、曹禺、郁达夫和瞿秋白等著名现代作家进行研究，著有《艾青简评》（1954）、《鲁迅生平与创作》（1960）两部专著，发表有《老舍及其创作》（1956）、《巴金的创作》（1957）、《鲁迅与中国诗歌》（1958）、《巴金的创作道路》（1959）、《论曹禺的创作》（1960）、《鲁迅与郁达夫》（1967）、《朝花社的历史》（1971）、《郁达夫的创作道路》（1972）、《鲁迅与瞿秋白》（1975）等文章。在这些论著和文章中，维·彼得罗夫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思想，受到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视。例如，他认为巴金曾受到俄国无政府主义影响，但主要是其中对社会不公、沙皇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剥削毫不妥协的那一部分内容。他在圣彼得堡大学开设的“中国哲学导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等课程令许多学生终生难忘。

维·彼得罗夫与他所研究的许多中国作家都有书信联系，保存了他们的许多书信和手稿，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具有很高价值。比如，巴金在 1957

① Рифтин Б. Л. Знато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и популяризат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 70-летию В. Ф. Сорокин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7. №5.

年9月27日给维·彼得罗夫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笔名的来历作了详细说明。[①]

华克生

1926年出生,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1956年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他曾在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等处工作。自1960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发表著作120余种。

华克生早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和明代话本小说的翻译。1959年他翻译出版了吴敬梓《儒林外史》,同年发表《18世纪吴敬梓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一文,1963年以《18世纪中国讽刺作家吴敬梓及其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为题通过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从《三言两拍》中翻译了许多明代话本小说,先后出版过四种话本小说集:《懒龙手段》(书名来自《二刻拍案惊奇》中"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1966)、《两度离世女》(书名来自《醒世恒言》中"闹樊楼多情周胜仙")(1978)、《道人神咒》(书名来自《二刻拍案惊奇》中"田舍翁时时经理,牧童儿夜夜尊荣")(1982)、《还银》(书名来自《初刻拍案惊奇》中"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1982)。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克生致力于清前期剧作家和小说家李渔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先后翻译出版了《十二楼》(1985)、《肉蒲团》(2000)。2004年,俄罗斯的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中国色情小说》一书,除《肉蒲团》和《十二楼》外,还收录了华克生新节译《闲情偶寄》中的《声容部》和《颐养部》,前面附有译者撰写的长篇序言《李渔:生平与时代》。与此同时,华克生也翻译了一些现当代文学作品,主要有许地山的《萤灯》(1961)、老舍的《正红旗下》(1981)、王蒙的《活动变人形》(1988)。

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其译文为基础,讨论包括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等问题,尤其关注佛道思想对文学进程的影响。

---

① 刘福泉:巴金笔名中的"巴"字来源巴恩波何许人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郭黎贞

出生于1935年,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6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83年获博士学位,自1966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其研究领域一为古代中国文艺理论,二为传奇、话本小说。

郭黎贞是俄罗斯当代最著名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之一。1966年她以《19~20世纪初中国主要文艺思潮》一文通过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于1971年出版专著《20世纪初中国美文学理论》,对桐城派、常州词派、清末其他流派及其古文体裁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1995年他出版了《太极——1~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一书,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文学创作与原始宗教意识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揭示中国艺术所普遍具有的先验的象征意蕴性质,以及造成这种性质的哲学根源。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对文学形式因素的研究何以成为刘勰时代文论家们关注的热点,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哲学本体论层面的解释。[①]

1973年郭黎贞出版《古代东方诗歌与散文》,其中收录了她翻译的汉伶玄撰《飞燕外传》、汉赵晔撰《吴女紫玉传》、无名氏著《燕丹子》。1979年翻译出版清沈复的《浮生六记》。1980年郭黎贞将自己翻译的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结集,以《紫玉:1~7世纪中国话本小说》为书名出版,原典主要来自晋葛洪《神仙传》、晋干宝《搜神记》和南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自上世纪80年代起郭黎贞陆续翻译了一些古代情色小说,如《剪灯新话》(1988)和《杏花天》(1992)。

郭黎贞以译著为基础,对六朝志怪小说的文化渊源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于1980年出版《中国中世纪传奇——题材渊源及其演变》一书。作者在书中通过对娶仙妻、偷新妇、入地府等情节的分析,试图确立志怪小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决这种小说题材的起源问题。在1983年出版的《中世纪前中国散文——3~4世纪神话及情节起源问题》一书中,郭黎贞分析了神话、宗教、婚丧仪式等因素在小说题材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对六朝传奇的人物构成、情节特征进行了梳理。

---

① 李逸津:戈雷金娜对《文心雕龙》的宇宙本体论解读,载《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4期。

克拉芙佐娃

1953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83年获副博士学位，1999年获博士学位，长期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工作。2003年调入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现任东方哲学与文化学教研室主任。克拉芙佐娃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化史。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克拉芙佐娃以其独特视角、方法及成果颇受到学术界瞩目。她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以南朝文学为对象，题目为《沈约的诗歌创作》。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学试析》一书中，克拉英佐娃重新翻译了包括《诗经》、《楚辞》在内的经典作品，力求使译文从内容到形式尽量接近原作，尽可能传达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味。同时，她试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求中国诗学传统的起源及特点。1999年克拉芙佐娃以《中国传统诗歌文艺美学经典之形成》一文在圣彼得堡大学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永明体诗歌》一书中，她通过分析沈约、谢朓、王融、萧衍及"竟陵八友"的作品，对永明诗歌的思想、题材、主题、形象等方面进行了精深的探讨。①

2003年，克拉芙佐娃出版了《中国文学选读》一书。这是俄罗斯汉学史上内容最为完整的中国文选。她按照自己的判断标准选辑了俄译本，对自己不满意的译本则重新翻译。因此，这里收录了克拉芙佐娃近年来大部分古典诗歌译文，如《诗经》、《楚辞》、《乐府》、王延寿的《梦赋》、汉武帝的《秋风赋》、张衡的《同声歌》以及曹操、曹丕、曹植、陆机、张华、左思、孙绰、庾阐、郭璞、沈约、谢朓、王融、萧衍和杨万里等诗人的作品。

克拉芙佐娃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同样卓有成效。1999年圣彼得堡出版了由她所著的俄罗斯第一部中国文化史教材——《中国文化史》。她在诸如关于中华文明史的分期问题、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神话体系、个人信仰的多样性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2004年，克拉芙佐娃再版《中国艺术史》一书，参考世界汉学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最新考古发现，内容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发展史。

---

① 李逸津：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汉学——文学研究，载《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5期。

二、中国历史研究

（一）成就概述

中国历史研究在苏联汉学中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研究规模最大，研究人员最多，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汉学家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努力建构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中国历史学。如同在其他学科领域一样，苏联汉学家在中国历史研究上也有明确的分工，从先秦史到清史，再到近现代史都有人进行长期而专门的断代史研究。同时，另有一部分学者专门从事中国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以及中俄关系史的研究。

苏联的中国先秦史研究是从翻译中国历史学家著作开始的。1956 年嵇辽拉（Л. С. Переломов）等将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翻译为俄文发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1958 年由越特金翻译出版，俄文版名称为《中国古代史：从原始社会到集权封建国家之建立》。此后，郭沫若所著《青铜器时代》也由波格丹诺夫（Г. А. Богданов）翻译成俄文。1959 年，因主张魏晋封建论曾遭到批判的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在苏联出版。1965 年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由鲁伯—列斯尼琴科（Е. И. 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普济茨基（Е. В. Пузицкий）和索罗金共同译出。这几部中国先秦史研究名著的翻译出版对苏联汉学家的研究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中苏两国当时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重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努力论证奴隶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20 世纪中期以后，苏联在该研究领域出版了几部专著，即嵇辽拉的《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国》（1962），刘克甫（М. В. Крюков）的《中国人氏族制的进化与规律》（1972），杨希娜（Э. М. Яншина）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神话》（1965）、《山海经》译本（1977）以及专著《古代中国神话的形成与发展》（1984）。

翻译司马迁《史记》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对于俄罗斯的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越特金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翻译、注释《史记》。自 1972 年出版第一卷以来，到 2002 年已出版了八大卷。此外，他还译有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尽管越特金

1995年事未竟而身先去，但同为汉学家的儿子小越特金（А. Р. Вяткин）已立志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最终完成世界上第一个《史记》欧洲语言全译本。

然而，苏联专门从事秦汉历史研究的人并不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克罗尔（Ю. Л. Кроль）的《历史学家司马迁》（1970）、西尼岑（Е. П. Синицын）的《班固》（1975）及马良文的《古老帝国的覆灭》（1983）等。而就学术价值和影响而言，首屈一指的当数突厥学家古米廖夫（Л. Н. Гумилев）出版的《中国匈奴》（1974）一书，书中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对匈奴与中原政权的战争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研究。此外，早在1968年，塔斯金（В. С. Таскин）还从中国史书中翻译了有关匈奴的文字，编辑出版了《匈奴史料》。

现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的波波娃女士是俄罗斯著名的唐史专家，1988年以论文《7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史文献〈帝范〉》获得副博士学位，而后又翻译过《贞观政要》。她于1999年出版《唐初治国之要术与思想》，依据中国历史典籍，对唐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2000年波波娃以《初唐治国理论》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外，她还就唐朝政治历史发表论文几十篇。而雷巴科夫（В. М. Рыбаков）在著名西夏学家克恰诺夫的指导下将《唐代官僚的法律地位》作为自己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并同时翻译《唐律疏议》。从1999年开始到2005年，他已经出版了《唐律疏议》译文三卷，并就唐代社会、政治、法律发表论文40余篇。圣彼得堡大学教授斯莫林也研究唐代历史，但重点主要放在农民起义上，1997年出版《吁天：847～901年中国农民起义》第一卷，2000年出版第二卷。1961年著有《湖南湖北1130～1135年农民起义》，1974年再版《10至12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反封建起义》。在中国宋代历史典籍翻译方面，有塔斯金1979年翻译出版的叶隆礼《契丹国志》。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缘关系，俄罗斯历来重视蒙元历史的研究。蒙古学家弗拉基米尔措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无疑是苏联蒙元历史研究的奠基人。1934年，他出版了著名的《蒙古人的社会制度（蒙古的游牧封建主义）》一书，对蒙古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关系进行了剖析。此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有多种译本问世，早在1939年我国就有了第一个汉译本，1980年我国出版了第二个译本。科津的最大成就在于将《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1941年出版。

梁赞诺夫斯基(B. A. Рязановский)专门研究蒙古的法律制度,其代表作为1923~1924年发表的《蒙古诸部习惯法》。蒙库耶夫的蒙元史研究始于研究宋人的两部使节报告《黑鞑事略》和《蒙鞑备录》,1965年他出版了《汉籍中有关蒙古最初几位大汗的记载》。与中国学者不同的是,苏联学者多沿袭旧俄东方学传统,研究多侧重于金帐汗国史以及蒙古早期历史。沙斯基娜以研究17世纪俄蒙关系史而闻名于世,曾校勘、翻译并出版了《黄史》和《黄金史》。

在明史研究方面,当以博克夏宁(A. A. Бокщанин)的成就最为突出,共出版过三部专著:《14~16世纪的中国与南洋》、《15世纪初的中华帝国(内政)》以及《中世纪晚期中国的分封制度(明代)》。斯维斯图诺娃(Н. П. Свистунова)则以研究明朝的农业政策为主,1961年出版有《明代农业政策》一书。在研究过程中,苏联汉学家尤其关注明代对外贸易、农业、手工业及货币关系等问题,以澄清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间和性质。在中国明史研究著作的翻译方面,1980年出版了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代表作《朱元璋传》俄文版,由热洛霍夫采夫等人翻译。

由于清代中国与俄罗斯有密切而频繁的外交、经济和文化联系,所以清史研究一直在俄罗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清代中俄关系最受重视,出版著作也最多。在这一领域,俄罗斯以其丰富的档案文献收藏以及出色的研究专家颇受瞩目。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杰米多娃(Н. Ф. Демидова)等合作完成了清代俄藏中俄关系文献的整理工作,陆续出版了《17世纪俄中关系文献》、《18世纪俄中关系文献》、《19世纪俄中关系文献》和《20世纪俄中关系文献》。米亚斯尼科夫另出版有专著《17世纪的清帝国与俄国》、《俄中界约斠注》以及《中国边疆》。1974年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出版《俄中贸易经济关系史》,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霍赫洛夫也就清代中俄经贸关系发表有大量文章。在清代中俄文化关系领域,斯卡奇科夫和霍赫洛夫的俄国汉学史研究,伊雅达(А. С. Ипатова)、舒碧娜、波兹德尼亚耶夫(Дионисий Поздняев)和安德烈耶娃(С. Г. Андреева)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研究具有很高水平。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苏联汉学家尤其关注五大问题研究,一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二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特点以及失败原因,三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

成，四是义和团运动，五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①] 这种研究趋向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有所改变。齐赫文从孙中山以及中国革命研究开始，继而研究康有为及清末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出版有大量著述，其中包括《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孙中山外交政策观与实践》、《孙中山是苏联的朋友》和《中国革命者遗嘱》等。尼基福罗夫著有《中国最早的革命者》以及《亚洲觉醒年月里的中国》。

斯拉德科夫斯基著有两部中国现代史论著：《中国现代史〈1917～1927年〉》及《中国现代史〈1928～1949年〉》。梅利克谢多夫（A. B. Меликсетов）1977年出版了《中国国民党的社会经济政策》。乌索夫（B. H. Усов）近年来研究民国时期苏联在中国的情报活动，2002年出版有《苏联军事间谍在中国》。

关于苏联的中国历史研究状况，如果从时间上进行考察，则20世纪20～40年代是集中研究中国革命的时期。苏联汉学家与在苏联工作的王稼祥、瞿秋白、郭绍棠等中国学者配合，努力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革命做出科学评价，具体问题包括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阶级属性等。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库丘莫夫（B. H. Кучумов）的《中国革命史概论》，康托罗维奇（A. Я. Канторович）的《美国争夺中国》，卡拉—穆尔扎（Г. С. Кара-Мурза）的《中国近代史概论》等。

20世纪下半期以来，苏联汉学界对诸如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拉比娜（З. Г. Лабина）的《中国中世纪政治斗争》（1970）、《中国中世纪的国家统治学说》（1999），嵇辽拉的《中国政治史上的儒家与法家》（1981）等。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出版有刘克甫的《古代中国社会形态》（1967）、涅波姆宁（О. Е. Непомни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1980）等。相比较而言，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最多，其中以列·瓦西里耶夫（Л. С. Васильев）、马良文、刘克甫、克拉芙佐娃的著作较有代表性。列·瓦西里耶夫著有《中国的祭祀、宗教与传统》（1970）和《中国思想起源》（1980）等，马良文出版有《中华文明》（2001）等，刘克甫撰有《古代中国的礼仪交际》（1997）等，克拉芙佐娃著有《中国文化史》（1999）。此外，刘克甫、马良文和苏敏（M. B. Соф-

① ［苏］阿斯塔菲耶夫：苏联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载《新华月报》，1955年第10期。

ронов)共同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合作出版《中世纪前的中华民族》(1979)、《中世纪中华民族》(1984)和《中世纪近代之交的中华民族》(1987)。

以上提到的只是苏联及当代俄罗斯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由于篇幅所限,还有大量的成果未能提及。

(二)主要研究者

齐赫文

1918年出生,1938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随后即被分配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5年获副博士学位,1953年获博士学位,1968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81年升为院士。他长期在苏联驻华外交机构工作,历任秘书、参赞、大使等职。现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任研究员。

齐赫文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改革以及中俄关系史。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原则及其对外政策》,主要研究"三民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实质。该论文于1964年以《孙中山外交政策观与实践》为书名出版。而后他选择清末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于1953年以《19世纪末中国改良运动》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该论文经增补修改于1959年正式出版,书名为《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62年在中国出版汉语本《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齐赫文充分利用了他在中国工作的便利,在收集相关文献之余,与中国学术界的专家广泛交流,甚至得到了康有为后人的帮助。这些因素对保障论文史实的准确性和观点的权威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960年齐赫文兼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开始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史》一书。编写工作历经十年,终在1972年出版,197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汉译出版。1986年齐赫文出版了《中国革命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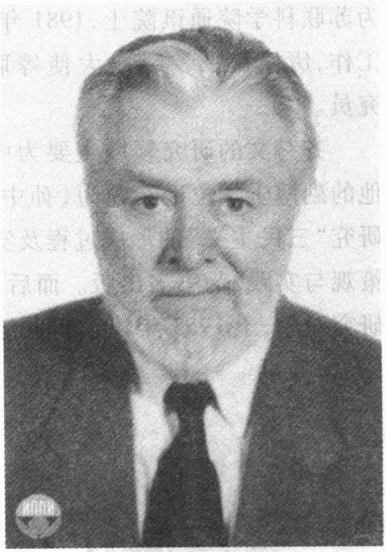
齐赫文

遗嘱——孙中山生平、斗争及政治观点演变》。上世纪末，齐赫文开始研究周恩来，并于1996年出版了《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一书，2000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汉译本。①

进入晚年之后，齐赫文开始撰写回忆录，将他记忆中的中俄关系大事诉诸文字。1992年他出版了《我的一生与中国》，两年后出版了中文版。200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的《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

米亚斯尼科夫

1931年出生，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4年获副博士学位，1978年获博士学位，1990年起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97年被选为院士。自1966年起在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后调入东方学研究所。



米亚斯尼科夫

发掘整理中俄关系史料以及中俄关系史研究是米亚斯尼科夫最主要的学术活动。大学毕业当年他即参加了准备归还中国的满洲档案的整理工作，随后在斯卡奇科夫指导下从事孔气太平天国日记的辨读和出版。这两件事情对他科研方向和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明显影响。1958年他与斯卡奇科夫合作编辑出版了《俄中关系文件(1689～1916)》。而后，他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俄藏俄中关系史料，其中包括双边条约、政府文件、书信札记等，为中俄关系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米亚斯尼科夫重点研究早期中俄关系，最大特点在于发掘和利用俄藏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Ипатова А. С. Видн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ученый, дипломат,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деятель (К 70-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АН СССР С. Л. Тихвинского)//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8. №4.

中俄关系档案史料，对中俄边界问题尤为重视。1956 年他与杰米多娃合著出版了《最早使华的俄国外交官》，对彼特林（И. Ф. Петлин）使华的背景、过程以及使节报告《一览》的版本和内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传统外交以及清帝国对俄战略计划之实施》，1980 年以《17 世纪的清帝国与俄国》为名出版。而后，他分别于 1996 年和 2001 年出版了《俄中界约斠注》和《中国边疆》两部著作，对中俄边界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条约内容进行了分析。作为这方面的专家，米亚斯尼科夫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被苏联外交部聘为与中国划界谈判的专家。

此外，斯卡奇科夫去世以后，米亚斯尼科夫整理出版了老师的遗著——《俄国汉学史纲》。此后，俄国汉学史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内容之一，发表有关比丘林等俄国汉学家的论文多种。

尼基福罗夫

1920 年出生，1947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50 年获副博士学位，1967 年获博士学位。1950 年至 1970 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1970 年任远东研究所历史文献学及国外汉学研究室主任，1984 年重回东方学研究所，1990 年去世。1953 年至 1956 年间曾来华在中央高级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尼基福罗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史、苏联及欧美中国历史研究史。

在中国现当代史领域，尼基福罗夫主要成就有副博士论文《1937 ~ 1945 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背叛政策》，1953 年以《中国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为名出版。此书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不抵抗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他先后出版有《中国首批革命者》和《亚洲觉醒时的中国》等书。此外，他还就中国现当代史发表有大量论文。在苏联中国历史研究史领域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他的博士论文《苏联历史学家与中国历史问题——苏联中国历史研究趋向（1917 ~ 1949）》。此文于 1970 年以《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为名出版。这是尼基福罗夫最著名的史学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苏联汉学史名著。他对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中国历史学家的成就进行了梳理，对其在某些重大学术问题上的探索和争论加以评介和分析。1975 年尼基福罗夫出版了《东方与世界历史》一书，对东方国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详加考察，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方法。在欧美汉学史研究方面，尼基福罗夫在 1977 年与他人合著《英国汉

学》一书，总结了英国汉学的发展历史和成就。

霍赫洛夫

生于1929年，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72年获副博士学位，自1961年开始一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霍赫洛夫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俄国汉学史和中俄经济关系史。

霍赫洛夫是继斯卡奇科夫之后又一位专门从事俄国汉学史研究的学者。他发扬了斯卡奇科夫重视发掘档案材料的传统，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和不懈的努力解决和澄清了斯卡奇科夫未及解决的问题。他先后主编出版了关于比丘林、巴拉第和王西里等著名汉学家的研究论文集。他的最终成果在1990年出版的《19世纪中叶前俄国东方学史》和1997年出版的《19世纪中叶至1917年俄国东方学史》两部姊妹书中得到了体现。霍赫洛夫先生提供的丰富档案资料已经成为俄罗斯以及中国学者从事俄罗斯汉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来源。

在中俄经济关系史领域，霍赫洛夫发表有大量论著。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为《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中国农业历史文献〈大清会典〉》，但后来未见正式出版。其中的主要观点反映在后来发表的几篇有关清代中国农业问题的论文之中。霍赫洛夫对中俄恰克图贸易进行了长期研究，发表有《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中期的中俄恰克图贸易》、《恰克图与恰克图贸易》、《恰克图贸易及其在俄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等。

博克夏宁

生于1935年，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1958年获副博士学位，1985年获博士学位，自1961年起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1990年起任中国研究室主任。现兼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博克夏宁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明代社会与国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及政治制度。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14～16世纪中国与南洋的对外联系》研究了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发达的经济联系，探讨了郑和下西洋的过程和意义，于1968年以《14～16世纪的中国与南洋》为书名出版。由于地缘原因，在博克夏宁之前，郑和下西洋问题一直未引起俄罗斯汉学家的重视。他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俄罗斯在该领域的空白。此外，他还就明朝靖难之役、流民等问题发表有专题论文。

中国政治制度演变是博克夏宁的第三个研究领域。1976 年他出版了《15 世纪初的中华帝国(内政)》一书,认为 15 世纪前期中国内部政治的稳定没有对国家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进程产生促进作用,从 15 世纪下半期开始明朝陷入社会政治危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4 世纪末 15 世纪初中国分封制度的演变》于 1986 年以《中世纪晚期中国的分封制度(明代)》为书名出版。作者在书中对明朝诸王分封制产生的原因以及朱棣削弱藩王权力的过程和效果进行了分析。1998 年,博克夏宁将中国学者对封建制度的研究成果翻译辑录成册,出版了《中国当代历史学家论中国封建制度》一书。

马良文

出生于 1950 年,1972 年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毕业,曾在新加坡、日本和中国进修。1977 年马良文以《公元 3 世纪中国的豪族与思想斗争》一文获得副博士学位,1988 年以《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思想之形成》一文获得博士学位。1985 年起在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而后调入远东研究所。在莫斯科大学任教的 14 年中马良文积累了大量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讲稿,并以此为基础连续出版著作十余部。现在台湾淡江大学兼任俄罗斯研究所所长。

在当今的俄罗斯汉学家当中,马良文可谓声名显赫,有俄罗斯媒体称其为"俄罗斯最大的汉学家"。他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出版,很受俄罗斯读者欢迎。尽管他的教育背景是历史学,但其著述涵盖了中国哲学、艺术以及人类文明史等多个领域。

在他已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中,有 4 种中华民族历史著作:《中世纪前的中华民族》(合著,1979)、《中世纪中华民族》(合著,1984)、《中世纪近代之交的中华民族》(合著,1987)、《19 ~ 20 世纪的中华民族》(1989)。此外,他还出版有《阮籍》(1978)、《古老帝国的覆灭》(1983)、《庄子》(1985)、《远东国家传统美学》(1987)、《旧中国格言》(1988)、《中国黄历风俗与礼仪》(二卷,1985、1988)、《孔子》(1992)、《中国智慧之花》(1993)、《武术内功传统》(1993)、《道家哲学文选》(1994)、《16 ~ 17 世纪中国的时代、日常生活有艺术》(1996)、《悟道》(1996)、《八卦掌》(1996)、《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1996)、《三十六计》(1997)、《心中的闪电——中国传统中的精神顿悟》(1997)、《快乐智慧书》(1998)、《中国纵横家》

(1999)和《中华文明》(2001)等。

刘克甫

1932年出生,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2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6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71年获博士学位,自1962起在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兼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教研室教师,现在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中国社会史、民族学和甲骨文是刘克甫最主要的研究领域。

在中国社会史领域,刘克甫1967年出版有《古代中国社会形态》,这是一部著名的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著作,1972年出版《中国人的亲缘体系》,1983年他的《中央集权帝国时期的古代中国人》问世。

在中国民族学领域,1978年他与苏敏和切博克萨罗夫(Н. Н. Чебоксаров)合作出版《古代中国人:民族起源问题》,运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及历史学文献,分析了中国古代族群的形成规律,对华夏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文化语言特征及自我意识变化进行了考察。而后,1979年与马良文合著《中世纪前的中华民族》,1986年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学研究》问世,1987年与马良文及苏敏合著《中世纪近代之交的中华民族》,剖析了各个历史时期对汉民族形成发生影响的精神与物质、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

甲骨文是刘克甫的第三个研究领域,1973年出版有《卜辞语言》一书。此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刘克甫发表有大量甲骨文研究论著,如《关于组大字类卜辞年代问题的探讨》、《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殷墟卜辞语句的形式结构与信息结构》、《殷墟甲骨刻辞句研究》和《论殷墟卜辞文法词位研究法》等论文。特别是他提出组大字类卜辞并非殷墟最早的卜辞的观点,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此外,他还在中国发表有一些学术价值很高的考古学论文,如《北赵晋国墓地性质问题管见》等。2000年刘克甫又出版了《文本与仪式:殷周金文试解》一书。

克恰诺夫

1932年出生,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0年获副博士学位,1964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70年获博士学位,自1958年起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工作,任所长多年。

克恰诺夫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夏学、中国与中亚中世纪历史及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他从1959年开始整理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于20世纪初掠至俄国的黑水城西夏文献,几十年来发表大量著作和论文,内容涉及西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是国际著名的西夏学家。他的第一部西夏学著作是其副博士学位论文《西夏国》,此后陆续出版的著作有《西夏文语音学研究》(与苏敏合著,1964)、《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的西夏文本》(与郭质生合著,1966)、《西夏史纲》(1968)、《文海》(与克平(К. Б. Кепинг)、郭质生、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А. 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合著,1969)、《新集锦合辞》(1974)、《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1988~1989)、《11~13世纪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与德国傅海博(Gauting Herbert Franke)合译,1990)、《大夏皇帝》(1991)、《只有文字在述说:西夏文明研究者论略》(2002)等,2005年发表了《伯颜宗道传》的译文。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克恰诺夫开始研究蒙古和西藏历史,继1995年出版《意欲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之后,以后又推出了《从匈奴到满人的游牧国家》(1997)、《亚洲统治者》(2004)和《西藏古今史》(2005)等著作。

克罗尔

1931年出生,195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而后直接修读研究生课程,1963年获副博士学位,1992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员。

克罗尔的主要学术领域为秦汉历史、文化及政治法律制度,大部分论文以司马迁《史记》和桓宽的《盐铁论》为主要文献。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秦朝灭亡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于1970年以《历史学家司马迁》为名发表,着重对司马迁的哲学观点及《史记》文献来源进行了考察。在司马迁及《史记》研究方面,克罗尔还发表有大量文章,如《陆贾与〈楚汉春秋〉》、《司马迁评陆贾的〈楚汉春秋〉》、《司马迁〈史记〉文献利用特点略述》、《历史人物是司马迁杜撰的吗》、《司马迁历史观与作为现实批判者的某种联系》、《〈史记〉文艺学分析》、《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和《司马迁论六艺》等。

克罗尔翻译的《盐铁论》是世界上继日文本之后的第二个全译本。在

翻译的同时，他对译文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读，1997 年出版第一卷，2001 年出版第二卷。克罗尔以《盐铁论》为基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汉代思想家论争中的空间概念（据〈盐铁论〉）》、《古代中国人的“朝体”观》、《汉代思想家论争中的时间概念（据〈盐铁论〉）》、《汉代思想家论争中的人性概念（据〈盐铁论〉）》等。

列·瓦西里耶夫

出生于 1930 年，1953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58 年获副博士学位，1976 年获博士学位，自 1956 年起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并兼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列·瓦西里耶夫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与他人不同的是，列·瓦西里耶夫的著作在考察中国问题时多兼顾其他东方国家，以期通过比较发现规律。他的中华文明起源系列著作在俄罗斯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享有较高评价。这些著作大都完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包括副博士学位论文《公元前一千年初中国的农业关系与村社》（1961）、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上古史问题：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物质文化与民族形成基础》（1976 年以《中华文明的起源：物质文化与民族形成基础》为书名正式出版）、《中国的祭祀、宗教与传统》（1970）及《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基本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之形成》（1983）。1989 年《中华文明的起源：物质文化与民族形成基础》一书在中国出版汉译本《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书中提出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尽管证据有欠充分，但其独到的思考方式给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提供了启示。

列·瓦西里耶夫编写了几部高校教材，影响较大的有《东方宗教史》（1983）、《东方历史》（1993～1994）、《古代中国》（1995 年出版第一卷，第二卷正在排印中）、《中国历史》（与梅利克谢多夫合著，2004）。

杰柳欣

1923 年出生，1950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1 年获副博士学位，1971 年获博士学位，曾任《真理报》驻华记者及《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人员，1967 年起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

杰柳欣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土改时期华南地区农民土地问题》及博士

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政策》都以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为研究对象，后分别又以《耕者有其田》(1961)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政策(1921～1928)》(1972)为名出版。杰柳欣出版有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如《1957年中国的反右斗争》(1961)、《社会主义和平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1962)、《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斗争》(1964)、《中国的文化革命》(1967)、《中国的政治危机：事件与缘由》(1968)、《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思想》(1970)、《中国传统与现代》(1976)、《毛主义和社会政治实质》(1976)、《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1978)等。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杰柳欣新的研究重点。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半个世纪经历两个时代》一书中，作者对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中国政治改革、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儒学与社会主义等问题，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003年杰柳欣出版《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一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制定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理论阐释方面的重大贡献。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寻求发展之路》一书中，作者回顾并总结了自孙中山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介绍了各个时期政治活动家为国家富强而做出的努力。

波波娃

1961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历史专业，后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生班，结业后留所工作至今。1988年获副博士学位，2000年获博士学位。历任研究生部主任、学术秘书、论文答辩委员会学术秘书等职，2003年起接替克恰诺夫成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自1996年起，波波娃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汉语科学文献阅读课程。

波波娃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唐史，尤以“贞观之治”为重点，迄今用俄、英、汉等语言发表论著50余种。其副博士学位论文选取唐太宗所撰之《帝范》为研究对象，题目为《7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史文献〈帝范〉》。1999年波波娃出版《唐初治国之要术与思想》，书中从李世民太原起兵开始，依次对初唐政治生活、唐太宗政治遗嘱《帝范》、皇权与贵族之关系、君民关系、军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2000年波波娃以《初唐治国理论》一文获得

博士学位。该文详细探讨了初唐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变迁,将导致变化的原因视为两股政治派别的角力结果。在进行研究的同时,波波娃还从事历史文献的翻译工作,如《帝范》、吴竞的《贞观政要》、武后的《臣规》和马融的《忠经》等。

三、中国哲学宗教研究

(一)成就概述

相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学而言,苏联的中国哲学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取得标志性研究成果。曾经担任苏联驻华大使的汉学家阿·彼得罗夫于1936年出版了《王弼与中国哲学史》,探索了王弼这位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从"好老氏,通辩能言"发展到唯心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历程。阿理克的得意门生楚紫气将《易经》翻译为俄文,并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也因此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当作"无政府主义反革命神秘恐怖组织成员"遭到镇压,其遗稿直到1960年才发表。四五十年代的苏联中国哲学研究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更加明显,并且出现了以哲学家阶层属性来确定其学说属性的倾向,所有中国古代哲学家均被简单地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是苏籍华人杨兴顺,他认为老子学说属唯物主义性质。他于1950年出版《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附录了《道德经》译文,1957年出版汉译本。嵇辽拉1968年翻译出版了《商君书》,波兹德涅耶娃1967年出版了研究杨朱、列子和庄子的专著《古代中国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以及辩证主义者》。70年代以后,苏联的中国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得到扩展,诸子百家和佛教学说都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出现了众多的优秀研究者。

从俄罗斯中国哲学宗教研究的各个方面来看,儒学研究在当代俄罗斯受到高度重视,儒家经典译本和儒家思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以《论语》为例,尽管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了王西里和柏百福两位汉学大家的译本,但阿理克院士认为其难以反映中国人所理解的儒家精髓,着手连同朱熹的注疏一同翻译出来。遗憾的是,因为20世纪上半期的苏联出版社对出版《论语》没有兴趣,他不得不中断了翻译。俄罗斯人对《论语》的热情在苏联解体之后迸发出来,有很多优秀学者继续对其进行翻译和解读。到目前为

止，俄罗斯至少还有 14 个译本，译者为康拉德、克立朝（В. Н. Кривцов）、果洛瓦切娃（Л. И. Головачева）、谢缅年科（И. И. Семененко）、嵇辽拉、卢基阳（А. Е. Лукьянов）、马良文、马丁诺夫（А. С. Мартынов）、佐格拉芙、高辟天（А. 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科布泽夫、苏霍鲁科夫等。2001 年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将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论语》俄译本结成一集出版，以方便读者通过比较译者对文本的不同理解来领会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孟子》的第一个俄译本出自柏百福之手，苏联时期由中国历史学家杜曼出版了第二个译本。此后郭质生、佐格拉芙和卢基阳等也出版有《孟子》译本。《尚书》译本出版于 1972 年，译者为库切拉（С. Кучера）。在当今俄罗斯儒学研究方面，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俄罗斯分会主席的嵇辽拉无疑是权威。他翻译有《论语》，并且出版有《中国政治史上的儒家与法家》（1981）等著作。此外，卢基阳、谢缅年科和马丁诺夫等人也都从事《论语》的翻译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工作，出版了自己的译本和研究成果。1998 年卢基阳主编出版《中庸》一书，收录了小西增太郎、布罗夫（В. Г. Буров）、卢基阳和尤盖（В. Б. Югай）的译本及注释。

自上世纪下半期以来，道教研究成为苏联和当代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新宠，光是《道德经》便有 20 多个译本。杨兴顺的译本因为出版最早，也是唯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以阐释的译本，因此在苏联时期非常流行。1971 年在巴西问世的由俄罗斯侨民诗人夏云清翻译的《道德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理解翻译准确，而且再现了原作的文学特性，是唯一保留了原作诗歌韵味的译本。苏霍鲁科夫 1987 年出版的译本与杨兴顺的风格相似，采用散文体，明白晓畅。1993 年出版的古夫申诺夫（А. Кувшинов）的译本也采取了诗体翻译的方法，但影响似乎不及夏云清。而萨夫鲁辛（А. П. Саврухин）、维诺格罗茨基（Б. Виногродский）的译本则不拘泥于原文文字，采取了一种重在阐释老子思想精髓的方式，看上去不像是译文，联想和发挥的色彩太浓。谢缅年科、卢基阳、马良文和李谢维奇都采取了精确的逐字翻译方法，并附有详细的注释，散发出较强的学术气息。陶奇夫秉承圣彼得堡汉学学派的风格，采取忠实翻译与注释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其译本受到汉学界的肯定。除了上述译本之外，康德拉舍娃（Л. И. Кондрашева）、马斯洛夫（А. А. Маслов）等也出版了自己的译本。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或中国文化爱好者将《道德经》由西文译本转译为俄文，甚至有人像翻译圣经那样将《道德经》翻译为古斯拉夫文。《道德经》艰深的文字

与思想给汉学家及中国文化迷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思维空间，促使他们通过推出自己的译本来表达对这部中国哲学经典的理解。在道教研究方面，卢基阳出版了数部著作，如《道之本源：中国古代世界》(1992)、《老子与早期道家哲学》(1991)和《老子与孔子：道学》(2000)；陶奇夫著有《道教：历史宗教描述》(1998)和《道家术士》(2001)；马斯洛夫著有《神秘之道：〈道德经〉的世界》(2005)。《庄子》以1985年出版的马良文的译本最为有名，以后又多次再版。马良文对译文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同时在书后附录了一篇论述《庄子》翻译问题的文章。库切拉的译本在风格上与马良文相似，但只是节译本。波兹德涅耶娃的译本很有特色，由于译者对原文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个别名词或概念的处理上与上述译本有明显差异，很受学术界重视。此外，波缅兰采娃(Л. Е. Померанцева)翻译出版了刘安所著《淮南子》一书。

现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季塔连科(М. Л. Титаренко)院士是研究墨家学说的专家。他在1985年就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墨翟及其学派与学说》一书，同时还发表过《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墨家早期流派》等论文。费奥克基斯托夫(В. Ф. Феоктистов)专门研究荀子，1976年出版了《荀子的哲学、社会、政治观点》。科布泽夫1983年著有《王阳明学说与中国古典哲学》。布罗夫曾师从侯外庐和任继愈，重点研究中国明清哲学，著有《17世纪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康拉德院士研究孙子和吴起，1958年出版有《军事艺术经典〈孙子〉》和《军事艺术经典〈吴子〉》，而施泰因则在1959年就翻译了《管子》，出版有《管子研究与翻译》一书。由此可以看到，苏联及当代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不仅内容丰富、全面，而且是从原典翻译和注释开始，并逐渐将研究引向深入。

佛教早在帝俄时期就成为汉学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王西里和米纳耶夫(И. П. Минаев)等学者的研究为苏联乃至当今俄罗斯的佛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谢尔巴茨科伊(Ф. И. Щербатской)院士曾在奥地利、德国和印度深造，1897年起与奥登堡组织世界名家出版著名的“佛学文库”。他一生致力于梵藏文佛典的刊布、研究和注释工作，在佛学研究中广泛利用了藏文典籍，擅长在印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佛教哲学，同时详细比较同一部佛经的梵文和藏文文本及注释，发现其中异同。1904年他翻译了古印度学者法称的佛教逻辑著作《正理滴论》，同时发表了梵文和藏

文两个文本。其主要佛学成就有《佛教中心概念和“法”词义》(1923)、《佛教涅槃概念》(1927)、《佛教因明》(二卷)(1903～1909)、梵文《辩中边论》英译本(1930～1932)。他还校刊了《阿毗达摩俱舍论》、《集量论》等佛典。谢尔巴茨科伊成为苏联佛学研究的奠基人。与谢尔巴茨科伊同时代的罗森别格(O. O. Розенберг)也为苏联佛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在1918年出版的《佛教哲学问题》一书内容非常丰富,对佛教研究中一系列术语的实质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对日本和中国的佛教研究进行了总结。

但从总体上说,佛学研究在苏联时期没有受到重视,苏联解体之后才逐渐复兴。在当今俄罗斯,有几位出色的佛教研究者值得特别关注。阿巴耶夫(H. B. Абаев)来自俄罗斯佛教中心之一的图瓦共和国,从远东大学毕业后,1974年起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一直致力于禅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1983年出版的《中世纪中国禅宗与文化心理传统》一书中探讨了禅宗心理活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他于1991年出版《中世纪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禅宗传统》,次年以《禅宗理论与实践之关系——以〈临济录〉为素材》为题的论文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圣彼得堡分所的叶尔马科夫(M. E. Ермаков)从研究慧皎《高僧传》入手,于1983年完成了副博士学位论文《文学典籍〈高僧传〉》。而后,他全文译出了《高僧传》,1991年出版第一卷,2005年去世前出版了第二卷。1993年他翻译出版了六朝时期王琰所著佛教故事集《冥祥记》,1998年又出版《感应传等四种》,辑录了他所翻译的王延秀《感应传》、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侯白《旌异记》以及唐临《冥报记》中的佛教故事200余个。2001年叶尔马科夫在美国出版《中国佛学》一书,介绍了慧皎、慧远等著名中国佛教人物。1999年与波波夫采夫(Д. В. Поповцев)及索罗宁合作翻译出版《佛教经典》一书,包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出小无量寿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和《观无量寿佛经》等。2001年他与陶奇夫、克拉芙佐娃和索罗宁编写了一部《中国宗教文选》,收录大量中国佛、道文献译文,其中属于道教内容的有《道德经》、《阴符经》、《游天台山赋》和《太平广记》,佛教部分包括《中阿含经》、《佛说文陀竭王经》、《佛说顶生王故事经》、《佛说轮王七宝经》、《无量经》、《原人论》、《宗本义》和《妙法莲花经》等。陶奇夫2000年出版的《佛学导论》是近年来俄罗斯最优秀的佛学著作之一。他采取讲座形式,系统介绍了大乘、小乘、中观派、瑜伽行派、藏传佛

教等流派及其学说。

季塔连科主编的《中国哲学》
1994 年版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部分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如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1957)、郭沫若的《十批判书》(1961年，俄文本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由上海师范大学等九所院校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稿》1989 年在莫斯科出版，译者是塔斯金，由季塔连科主编并撰写了跋文。1998 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被从英文翻译为俄文。1994 年，莫斯科出版了一套《古代中国哲学史》，概述了中国哲学从诞生到逐步繁荣的过程，尤其对“百家争鸣”作了深入的介绍。同年由季塔连科主编出版的《中国哲学》百科辞典应该被视为苏联及当代俄罗斯中国哲学研究的总结，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哲学的汉学家都参与了该辞典的编写工作。与其他辞典不同的是，词条撰写者在阐释哲学概念的同时，重点展示了苏联及俄罗斯汉学家在相关问题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

20 世纪后半期，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让世界刮目相看，而中国渐进有序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更令俄罗斯人惊叹。他们认为，这些东方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思想存在某种联系。现在，俄罗斯汉学家们比任何时候都重视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以期从中汲取对俄罗斯社会发展有益的思想。

(二)主要研究者

阿·彼得罗夫

1907 年出生，1930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语文学系，1939 年获副博士学位，曾在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1 年起在苏联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过驻

重庆大使馆参赞和大使，1949 年去世。

阿·彼得罗夫的研究范围主要为古代哲学，尤以唯物主义代表人物为主。1936 年他出版了《王弼与中国哲学史》，后面附录了《周易·略例》的俄译本。他在书中探讨了王弼从道学拥护者，进而成为唯心主义一元论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家的过程。1941 年阿·彼得罗夫在《苏联东方学》发表《杨朱——中国古代自由思想者》，认为杨朱反对儒家，其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在彼得罗夫去世后的 1954 年出版的《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的启蒙思想家》(1956 年中译本出版)中，作者通过翻译和研究《论衡》发现王充不认为世间有超自然力量存在，因而可以被归入唯物主义哲学家行列。通过这些著述，阿·彼得罗夫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存在，对苏联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①

在研究中国哲学之前，阿·彼得罗夫曾研究过中国中世纪农民战争，发表有《中国蒙元时期的阶级属性》等文章。此外，他也是一位俄罗斯汉学史研究者，在 1935 年发表的《俄国资产阶级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文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了帝俄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历史、成就与不足。

楚紫气

1897 年出生，1922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在阿理克和康拉德两位院士的指导下学习中国文学。1935 年未经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同年晋升为教授。楚紫气 1937 年以《中国经典〈易经〉——语言学试析并俄译》一文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经典〈易经〉——哲学研究与翻译》。楚紫气曾在列宁格勒东方活语言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列宁格勒大学、爱尔米塔日博物馆、亚洲博物馆工作，于 1938 年去世。

楚紫气是阿理克非常器重的弟子。他不仅勤奋，而且非常有才华，除汉语以外，他还懂得多种欧洲和东方语言。他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道教经典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两个方面，一共发表作品 30 余种。

在道教研究领域，他在 1922 年前曾完成了葛洪《抱朴子》的翻译，现在

---

① ［俄］布罗夫：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17 世纪末～20 世纪末(中)，载《汉学研究通讯》，总 57 期。

仅存一篇题为《葛洪道的信仰》的手稿，其中有《抱朴子》第一章的译文，经过了阿理克的注释。楚紫气在1937年完成了《易经》的翻译，受到阿理克和康拉德的高度评价。在老师的鼓励下，楚紫气计划继续研究《老子》、《列子》和《庄子》等作。不幸的是，两个月之后他惨遭不测。楚紫气的《中国古代经典〈易经〉——哲学研究与翻译》直到1960年才正式出版，被视为20世纪国际汉学的重要成就。他按照阿理克开创的古文翻译原则，提供了直译和意译两个范本。楚紫气译本不仅在俄罗斯非常流行，而且成为某些欧洲国家汉学家翻译《易经》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道教研究论文，如《佛教中的道士》(1927)等。

楚紫气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领域同样成就卓著，深得阿理克嘉许。1923年他翻译的《7至9世纪中国抒情诗选》由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孟列夫称这部译诗集是"俄罗斯中国诗歌研究与翻译的新阶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转折"。[①] 阿理克在序言中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和翻译要求，对后来苏联汉学家翻译唐诗在翻译理念和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由于篇幅所限，楚紫气收录的诗作不多，但按题材进行了分类，如自然与我、遁世、交友、异乡、失宠、妇人、寺院、述古、晚年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季塔连科

1934年出生，1957年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而后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进修，196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79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苏联外交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驻中国大使馆以及苏共中央工作，1985年起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1997年他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2003年升为院士。其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思想与政治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

季塔连科的本行专业是哲学。在复旦大学期间，他在潘富恩教授的指导下研读《墨子间诂》，并通过了题为《墨子思想研究》的论文答辩。回国以后，他对自己的论文加以完善，完成了在俄罗斯汉学史上具有补白作用

---

① Дальнее эхо: Антолог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рики (VII-IX вв.)/В переводах Ю. К. Щуцкого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Редактор-составитель И. С. Смирнов. СПб., 2000. С. 7.

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墨家及其学说》。该论文在1985年以《中国古代哲学家墨翟及其学派与学说》为书名正式出版。围绕墨子学说，季塔连科还发表了《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墨家早期流派》（1965）、《〈墨子〉摘译》（1973）、《墨翟及其学派对中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1988）等文章。

季塔连科

在中国当代思想与政治领域，季塔连科著有《中国：文明与改革》（1999）、《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1999）以及与嵇辽拉合著的《中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传统》（1994）等。

近年来季塔连科提出了新欧亚主义理念，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加以阐释和充实。从保障俄罗斯民族利益出发，季塔连科就处理东亚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提出了原则性建议。这些观点体现在他最近20年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当中，如《亚太及远东地区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1989）、《俄罗斯和东亚：国家与文明间关系》（1994）、《俄罗斯面向亚洲》（1998）、《俄罗斯：安全源于合作——东亚矢量》（2003）等。

杨兴顺

苏籍华人，1904年生于中国浙江，1933年毕业于社会科学教师共产主义大学，1948年获副博士学位，1968年获博士学位，1948年起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员，1989年逝世。

杨兴顺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1950年出版，1957年中国出版了中文版，这是一部在中国哲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老子的阶级属性及《道德经》的哲学属性进行了全新的分析，认为老子是没落公社农民的代表，其学说具有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性质，书中附录的《道德经》译文在苏联时期非常流行。杨兴顺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他在文中

重点研究了古代中国朴素唯物主义观念对儒学、道学和墨学形成所产生的影响。1956年他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略》,汉译本《关于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于次年在北京问世。1984年杨兴顺出版《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一书,对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无论后人对杨兴顺的译本和研究方法如何评价,都不可否认其著作在俄罗斯中国哲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嵇辽拉

嵇辽拉是贝列罗莫夫的中文名字,1928年出生,父亲是早期中国革命者嵇直,贝列罗莫夫是他随母亲的姓氏。嵇辽拉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4年以《秦帝国之建立与覆亡》一文获副博士学位,1962年出版《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国》。而后他以法家为切入点,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政治传统关系的研究。他曾经来北京留学,得到过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点拨。1968年翻译了《商君书》,在前言中称孔子为世界上最卓越的思想家,其《论语》是伦理政治之典范之作,反对法家及秦始皇对教育和文化的摧残。1970年他以《法家与中国第一个集权国家之形成》一文获博士学位。1973年,嵇辽拉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调至远东研究所,专事儒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儒家与法家》(1981)、《孔子金言》(1992)、《孔子生平、学说与命运》(1993)和《论语译解》(1998)等一系列著作以及文章当中,嵇辽拉不断表达着他对儒学的新思考。

嵇辽拉在研究中对儒家与传统文化及现代社会的关系极为重视。他认为儒学不是哲学,而是伦理,其功能是为了协调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儒学又有国家儒学与民间儒学之分。国家儒学就是贵族儒学,用来统治国家,其中融合了法家思想。而民间儒学表现为来自于儒家经典并用以维持人伦礼序的行为规则。

布罗夫

1931年出生于哈尔滨,1954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后在北京大学留学,得到任继愈教授的指导。他1963年获副博士学位,1986年获博士学位,1959年起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

布罗夫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是《17 世纪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1976 年正式出版。他在分析周敦颐、张载、二程、陆九渊、朱熹等前人对王夫子影响的基础上,对其哲学体系的形成和本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并且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但他反对费什曼等人视王船山为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阶段及发展趋势(50 ~ 70 年代)》,1985 年以《中国现代哲学》为名出版,其中对胡适、冯友兰、梁漱溟、郭沫若、张岱年和钱穆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作用进行了剖析,同时对毛泽东、蒋介石、陈立夫等的哲学观点进行了概括。[①] 此外,他还发表有《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某些趋势》(1971)、《中国古代哲学》(与季塔连科合著,1972)、《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思想研究》(与克立朝合著,1973)、《中国哲学史研究若干问题》(1983)、《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哲学遗产及思想斗争》(1983)等。布罗夫非常注意对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进行总结。他在 1968 年就发表了《苏联的中国哲学研究》一文,上世纪末又在台湾发表了长文《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17 世纪末 ~ 20 世纪末》。

科布泽夫

1953 年出生,197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79 年获副博士学位,1989 年获博士学位,他自 1978 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末起任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主任。

科布泽夫是近年来在俄罗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年青一代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和比较文化学。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题为《王阳明哲学》,于 1983 年以《王阳明学说与中国古典哲学》为名出版。书中回顾和总结了中国、日本和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王阳明哲学的产生、发展、实质以及与佛道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新意的观点,对于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如"气"、"良知"等,科布泽夫都采取了新的译法。他反对将王阳明学说视为唯心主义思想,认为

① [俄]布罗夫:俄罗斯学者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五卷第二期。

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事实上具有自然主义性质。[①] 与此同时，他还发表有《早期儒家的认识论立场》(1976)、《王阳明：良知的认识论与美学》(1977)、《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1977)、《论比丘林的"儒教"术语以及儒学的实质》(1977)、《术语"无"与王阳明哲学》(1978)、《中国与欧洲对个性的认识》(1978)、《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分析方法的作用》(1978)、《谈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与运用》(1979)、《中国传统哲学范畴问题》(1981)、《王阳明哲学中的认识论与行为学思想》(1981)、《王阳明与道家哲学》(1982)(被翻译为汉语，发表于1988年的《哲学译丛》)、《新儒学文本问题的理论创新(王阳明与围绕〈大学〉的思想斗争)》(1982)等数十篇文章。科布泽夫的新著《中国新儒家哲学》是俄罗斯第一部集中论述宋明理学的著作，出版于2002年，书中对理学的形成、发展、流派、代表人物及其思想都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科布泽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象数之学，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参伍"文本结构及"参伍"概念》(1980)、《五行与〈易经〉中的魔幻图形》(1981)、《五行的分类体系》(1982)、《中国古典哲学数字占卜方法》(1983)等。以这些论文为基础，科布泽夫1994年出版了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部中国象数之学的专著——《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象数之学》，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历史、内容、形式、实质以及象数之学的精神基础、类别、形式的分析，试图发掘中国古代逻辑学及辩证法的形成机制。

在研究之余，科布泽夫为俄国汉学家的中国哲学研究新著写了很多书评。1993年他主持修订了楚紫气的《易经》译本，出版了第二版，由原来的423页增至606页，印数达一万册。另外，他还为《中国哲学》等辞书撰写中国哲学词条数十个。近年来，他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房中术，同样出版了很多著作。

陶奇夫

1956年出生，1978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8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81～1994年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工作，1994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工作，1998年任哲学系宗教哲

① [俄]布罗夫：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17世纪末～20世纪末(下)，载《汉学研究通讯》，总58期。

学与宗教学教研室主任，次年任东方哲学与文化学教研室主任。2003 年，陶奇夫不幸早逝。

陶奇夫是一位天才而勤奋的学者，尽管人生短暂，但他在道教、佛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他的学术道路从研究东晋葛洪所著道家经典《抱朴子》开始，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历史民族学文献——葛洪〈抱朴子〉》，导师为孟列夫教授。他将这部经典中的《内篇》翻译为俄文，并且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这篇论文于 1999 年以《葛洪〈抱朴子〉》为书名正式出版。此后，陶奇夫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道教：历史宗教描述》一文中对道教的历史、实质、教义、演变以及与道家学说和佛教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和总结。这部著作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道教历史研究专著。1994 年他翻译、注释的北宋张伯端所著的《悟真篇》出版。1999 年，他推出了自己的《道德经》译本。该译本因为对原文理解透彻，翻译准确，颇受学术界的认可。2001 年陶奇夫的《道家术士》出版。这是一部专门介绍“道术”的著作，内容涉及武术、气功、炼丹、房中术等，书后收录了他翻译的《十问》和《天下至道谈》。同年他还出版了《道家丹客》一书。

陶奇夫在研究道教的同时也研究佛教，而且担任圣彼得堡“佛光”协会主席。1992 年他主编出版了《佛学译辑》，发表大量汉文佛经译文。1998 年与索罗宁合作翻译了宗密的《原人论》和《禅源诸诠集都序》，以《禅宗秘要》为书名出版。同年，星云大师所著的《星云禅话》也由陶奇夫翻译为俄文出版。2000 年陶奇夫将其 1994 ~ 1999 年间在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的佛学课程教案整理成卷，以《佛学导论》为书名出版。书中阐述了佛教的流派及其形成、发展以及在中国内地、西藏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传播情况。2002 年出版的《大乘佛教》是陶奇夫的另一部力作。作者对流传于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大乘佛教教义及流派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且与某些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加以对比，回顾了俄罗斯佛教研究的历史。同年，陶奇夫还编写出版了一部《佛教辞典》，内容涉及佛教历史、教义、现状、研究等很多方面。

在研究中国宗教的同时，陶奇夫努力对这一世界文化现象进行全新的阐释。2001 年他与科尔涅耶夫（М. Я. Корнеев）合著《海德格尔与东方哲学》一书，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与东方哲学传统进行了类比。同年他推出了自己的新著《世界宗教—超现实经验—超个人状态与应

用心理学》。这是俄罗斯第一部试将宗教作为心理学现象而详加考察的著作,作者在研究中运用了葛罗夫(Stanislav Grof)超个人心理学学派的思想,重点研究了宗教的特殊心理现实意义以及中国哲学史上具有超个人心理状态的代表人物。此书由于研究角度和观点新颖,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欢迎,初版后已经多次修订重印。2005 年出版的《东西方哲学之路:超现实认知》是陶奇夫的遗稿,在内容上是对《世界宗教—超现实经验—超个人状态与应用心理学》的继续和深化,研究重点为意识的本体论地位、形而上学以及超个人经验认识论。

斯皮林

1929 年出生,1947 年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满语专业,1949 年转入汉语专业,1952 年毕业,1970 年获副博士学位。1956 年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工作,2002 年去世。斯皮林虽然也研究中国哲学,但重点却在研究方法上。

斯皮林是从《韩非子》开始自己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在苏联及当今俄罗斯汉学史上有相当的影响,原因在于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即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文本的结构来解读蕴涵其中的逻辑脉络。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逻辑学中的"参伍"概念》自问世之日即引起学界同行的瞩目。1970 年斯皮林将其所著《中国古代文本之结构》一书作为副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1976 年正式出版,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古代文本的结构进行了解析。从理论基础上看,斯皮林将符号学理论引入了中国哲学文本研究。而后,他将世人多以为是秦汉以后伪作的《邓析》和《尹文子》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结构分析,确定《邓析》中晦涩难解的两章是《庄子》章节的简述。斯皮林用了 30 年的时间研究《易经》结构,留下 70 多页手稿。在这个领域,斯皮林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如《中国古代思想文献结构分析方法》(1969)、《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某些方法论问题》(1970)、《〈墨子〉中的"爱"和数学》(1974)和《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五行》(1975)等。[①] 尽管他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时常引起争论,但已经被视为俄罗斯中国文化研究中结构主义方法的奠基人。

---

① Меньшиков Л. Н. Памяти Владимира Семеновича Спирина (5 мая 1929-17 мая 2002)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Выпуск 10. СПб. , 2002.

卢基阳

1948 年生，197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79 年获副博士学位，1991 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长期工作，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亚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卢基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道教和儒学，发表成果近百种。在 1989 年出版的《东方哲学之形成：古代中国与印度》一书中卢基阳通过分析中国、印度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以现代历史哲学视角，探讨了东方哲学形成的规律以及其间的共性与差异，阐释了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道与德：早期道教哲学（皇帝、老子、庄子）》，1991 年出版了《老子与早期道家哲学》一书。1992 年卢基阳出版的《道之本源：中国古代世界》将中国的“道”与古印度的“梵”以及古希腊的“罗各斯”概念加以对比分析，试图发掘中国道家哲学的文化根源，他认为“道”是一个鲜活的肌体，是自然、神祖与人在身体、精神和思想上的三位统一。在 1993 年出版的《〈易经〉之道》一书中，他对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分析，极力探求道的原始形态。同时，卢基阳将《易经》中的序卦传、说卦传、杂卦传、系辞传翻译为俄文，附录于书后。2000 年出版的《老子与孔子：道学》是卢基阳儒道思想研究的总结之作。此书最大特点在于将老子、孔子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哲学进行对比，同时附录了卢基阳的《道德经》与《论语》的译文。卢基阳发表有大量儒学研究论文，如《中国古代哲学的形成》（1978）、《道—理—法：中国古代哲学形成问题》（1983）、《早期儒学——礼仪交际文化》（1984）、《古代中国人世界观中“帝”、“神”概念的哲学宗教学分析》（1986）、《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与“成人”世界》（1986）等。

四、汉语语言学研究

（一）成就概述

俄罗斯的汉语研究与教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比丘林于 19 世纪上半期推出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论《汉文启蒙》之后，王西里在几十年之后又发明了一种基于笔画拆分的高效记忆汉字手段。此后，伊万诺夫

斯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施密特等人也在汉字理论和汉语语法方面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然而,就总体而言,受时代及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汉语研究缺乏足够的科学性,更多地强调其对于汉语学习的实用价值。

苏联时期的汉语研究可以以1950年的语言学大讨论以及斯大林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研究汉语历史和汉语语音学,这与当时苏联政府拟为苏联少数民族以及华侨创建基里尔字母拼音文字有关。与此同时,部分中国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曾倡导汉字简化或拉丁化,对苏联汉语研究者研究重点的确定也造成了某种影响。后一个阶段,受苏联汉语教学以及中国语文文字规范需要的促进,苏联汉学家将研究重点转向汉语词汇学和语法学。经过一批优秀学者的努力,苏联在汉语语法、汉语语音、汉俄双语辞书编纂以及汉语教科书编写几个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推动本国汉学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联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由伊凤阁和波利瓦诺夫(Е. Д. Поливанов)合著的苏联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汉语科学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出版。此书套用屈折语语法,介绍了汉语名词、代词、动词、副词、形容词、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象声词等词类,讲解了有关汉语语音、注音字母以及词法规则,但对句法涉及不多。此书虽然已问世70余年,但仍然很受汉语学习者欢迎,至今一版再版。

1950年,苏联爆发了一场语言学大讨论。按照苏联语言学权威马尔的观点,汉语是世界上形态最原始、最古老的语言,同时也是发展水平最低的语言。同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明确指出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既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也不具有阶级性,终结了马尔理论对苏联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但是,在当时形势下,苏联的汉语研究对中国汉语研究的影响非常深刻。"结果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苏联的语言学说和苏联汉学家对汉语的观点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必须毫不犹豫地加以接受和坚持;另一方面,所有西方的语言理论和学说都被贴上'反动'和'资产阶级'的标签,必须加以抨击和批判。当时被攻击得最厉害的有两种观点,一是关于汉语是单音节语的观点,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诬蔑;二是关于汉语是无形态的观点,认为这种主张实际就是主张汉语是'低级'的语言。结果,语言学家纷纷致力于寻找汉

语中属于'高级'语言的特点。于是,寻找汉语中的形态变化和讨论汉语中的词头、词尾等在50年代就成了非常时髦的东西。"① 1952年,康拉德院士在《语言学问题》杂志发表《论汉语》一文,批驳了马尔的理论,认为汉语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多音节词汇,而且有复杂的语法结构存在,并且按照欧洲语言语法概念举出大量例证。康拉德的这篇文章对后来苏联汉学家的汉语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宋采娃(Н. В. Сонлцева)以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汉学家汉语语法研究主要围绕三大问题而展开。一是汉语词汇单位的属性,汉语词的特点、界定以及形态结构,还有汉语构词问题;二是词类体系以及划分标准;三是句法单位的属性,句子和句子成分的分类原则。② 为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学者首先试图探明汉语的历史形成过程,尽量摆脱欧洲语言语法规则的干扰,深入认识汉语词汇与语法的独特本质。

1946年鄂山荫出版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汉语中的词与词类(汉语历史分期)》,提出汉语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远古双音节时期、单音节时期、重复双音节时期以及后缀发展时期。同年,郭路特(Н. Н. Коротков)在其副博士论文《汉语句子发展的阶段性与动词的划分方法》中,通过研究动词意义以及宾词表达方式确定了汉语句子的三个发展阶段:统一而完整独词句中主词与宾词的不分解表述阶段、独词句的分解与可分解句子的形成阶段以及在新基础上重建统一而完整的句子阶段。③

龙果夫是阿理克的弟子,也是苏联语言学理论大家谢尔巴(Л. В. Щерба)院士的门生。然而,龙果夫并不是将谢尔巴的俄语词类划分理论生搬硬套到汉语中来,而是充分地考虑了汉语特点,尽量避免前人在这方面的认识不足。他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词类)》一书中指出汉语虽然缺乏如印欧语言那样明显的形态标志,但依靠其在句子中所担负的功能以及同其他词类的搭配等因素依然可以对其进行词类划分,肯定词汇的句法特征在词类划分中同样具有决定意义。就当时而言,龙果夫的这部著作运用了更加多样而翔实的语言实例,论证了汉语词类的存在并且确定了科学的划分

① 潘文国等:《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② Солнцева Н. В.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Совет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за 50 лет. М. 1967.

③ Горелов В. И. Вопросы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аботах совет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ов (1945-1959 гг.) //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60. Т. XIX. Вып. 4.

原则，同时提出了诸如词汇与语法范畴等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将苏联的汉语语法研究引领到科学的轨道上来。其中部分章节被汉译连载于1955～1956年间的《中国语文》杂志上，后来又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主编出版了汉文全译本，对中国的汉语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国际汉学界也非常看重这部著作，先后有日文版本和德文版本问世。1956年，宋采夫（В. М. Солнцев）发表《汉语词类问题》一文，提出了与龙果夫不同的观点，承认汉语中存在词根和词素等成分，强调汉语词的结构和形素在词类划分中的作用，确认汉语既非"词根语"，也非"无形态语"。

在汉语词类划分理论得到一定研究之后，对于个别词类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内容既涉及实词，也有专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雅洪托夫1957年出版的《汉语的动词范畴》堪称力作。作为龙果夫的学生，他在老师奠基性研究基础上又将苏联的汉语研究推进了一步，引起了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广泛关注。此书论述了动词在汉语词类中的地位、动词的特征、按照支配关系所进行的分类等问题，提出了"表示强求意义动词"和"表示被动意义动词"等一系列概念。

在汉语句法方面，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句子结构与形态问题。如龙果夫的《现代汉语简单句的分类问题》（1957）、宋采娃的《汉语动词性句子主语的确定标准》（1957）、斯米尔诺夫的《汉语语句主语及起始点》（1958）、雅洪托夫的《汉语句子成分》（1958）、尼基季娜（Т. Н. Никитина）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古汉语复合句构成方式》（1958）、舒托娃（Е. И. Шутова）的《汉语词序的语法作用》（1959）、郭俊儒（В. И. Горелов）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标准语复合句连接词》（1963）、科托娃（А. Ф. Котова）的《现代汉语疑问句》（1963）、宋采夫的《汉语中词与句子的关系》（1963）、郭路特和潘费洛夫（В. З. Панфилов）的《汉语范畴类型》（1965）等。另外，郭路特和雅洪托夫为古汉语语法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前者先后发表有《汉语词类问题以及带"然"后缀副词的起源》（1946）、《文言基础语法》（1948）等文章和著作，归纳了古汉语句子的基本结构特征，后者在1965年出版有《古代汉语》一书。

五六十年代还有罗日捷斯温斯基（Ю. В.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罗日捷斯温斯卡娅（Е. И.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杨基韦尔（С. Б. Янкивер）、苏敏、司格林、楚卡诺夫（А. М. Цуканов）、鲁勉斋（М. К. Румянцев）等学者对汉语词法和句法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汉语语法研究是在与中国学者的紧密合作与交流中展开的。早在1954年，王力的《汉语语法纲要》就被翻译为俄文，并由龙果夫和华裔汉学家周松源校订在莫斯科出版。高名凯于1953年发表于《中国语文》的《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一文被翻译为俄文，于1955年在苏联的《语言学问题》杂志刊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两卷本于1961年和1965年在苏联出版。此外，吴玉章、罗常培、文炼、胡附等学者的著述也相继在苏联发表。与此同时，《中国语文》杂志一共发表鄂山荫、龙果夫、郭俊儒、鲁勉斋、郭路特、宋采夫、穆德洛夫、舒托娃等人的论著数十种，穆德洛夫甚至还与高名凯就汉语词类问题进行了公开论争。[①] 王力和罗常培先生都曾发表文章，号召学习苏联汉学家的汉语语言学研究成果。[②] 此外，中国政府还于1953年派出南开大学的邢公畹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叶丁易两位教授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任教。

20世纪中期是俄罗斯汉语语法研究史上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20世纪下半期，苏联汉语语法研究在对象和方法上进行了拓展。如从60年代开始，苏联汉学家将汉语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联系起来，将汉语与同类或非同类语言进行对比研究，尤其关注汉语的孤立性、凝聚性和分析性特征。如罗日捷斯温斯基的《曲折与孤立的几个条件》(1964)、宋采夫和宋采娃的《论现代汉语凝聚性问题》(1962)和《分析与分析方法》(1965)。仅1965年一年就出版了《语言类型学与东方语言》、《汉语结构争议问题》和《词法类型学与语言分类问题》三部论文集。

70年代以后，苏联汉学家依托几十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开始编写“汉语科学语法”。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为的是与旧俄汉学家出于纯粹的实用目的而总结缺乏科学基础的汉语使用规律有所区别。郭俊儒1974年出版《汉语语法》和《汉语修辞学》，1989年又出版了《汉语理论语法》等。古汉语语法论著主要有古列维奇(И. С. Гуревич)的《3～5世纪汉语语法纲要(以汉译佛经为例)》(1974)、佐格拉芙的《中古汉语》(1979)、尼基季娜的《古文语法》(1982)等。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中俄经济

---

① [苏]穆德洛夫：汉语是有词类分别的(对高名凯教授的文章提一些意见)，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29期。

② 罗常培：语文工作者应加紧学习先进的苏联语言科学，载《中国语文》，1952年第5期；王力：关于暂拟的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问题——并谈语法工作中向苏联学习的意义，载《语文学习》，1957年第11期。

贸易联系的日益紧密,社会对汉语语法著作需求趋旺,不仅原有的汉语语法著作不断重印,而且出现了一些融入新观点和新材料的语法书,如莫斯科大学谭傲霜的《潜在语法问题:孤立语言的句法学、语义学及语用学(以汉语为例)》(2002)、库尔久莫夫(В. А. Курдюмов)的《汉语理论语法教程》(2005)等。

对于阿理克院士而言,汉语语音学尽管不是他的学术主攻方向,但其发表的相关著述却对后来者发挥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作用。阿理克曾于法兰西学院在著名语言学家鲁斯洛的语言实验室里中从事汉语语音语调准确标注方法研究,于1910年发表《对北京方言的语音观察结果(1906~1909)》一文,并出版《汉语语音读本》一书,为后来苏联的汉学语音实验研究方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汉学家的汉语语音学研究成果就传到了中国,龙果夫的相关论文就曾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①] 另外,阿理克1930年曾出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汉字拉丁化委员会主任,1928年在其《汉字及其拉丁化》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汉字拉丁化体系,而后又发表过《汉字拉丁化的前提》(1932)及《汉语声调与俄文语调》(1947)等文章。阿理克、龙果夫和郭质生还与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和萧三等中国学者合作开展过汉字拉丁化的可能性研究。

波利瓦诺夫和龙果夫无疑是早期苏联汉语语音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作为第一个将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Baudouin de Courtenay)的音位理论运用于汉语研究的苏联学者,波利瓦诺夫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他最早对汉语音节进行了音位分析,所提出的汉语四音节结构被学术界称为"波利瓦诺夫公式"。波利瓦诺夫在其语法著作中率先提出汉语基本语言单位(音素、词汇、句子)在质量和数量上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观点,认为汉语是具有单音节音位的多音节语言,而词的音节划分又多与其形态划分相一致。[②] 与此同时,龙果夫则通过对比汉、藏、西夏等语对古代汉语语音体系进行研究。他与夫人龙果娃(Е. Н. Драгунова)一同发现了

---

① [苏]龙果夫著,唐虞译:对于中国古音重订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1931年(另一译本《灰韵之古读及其相关诸问题》由蒂若译,载《中法大学月刊》第五卷第二期);古藏语的浊塞音和塞擦音(英文),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1936年。

② Солнцева Н. В.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中国前所未知的方言——老湘语。

1956年加里切夫(И. Н. Гальцев)在其副博士论文《汉语音位结构》中运用实验方法对汉语的音节结构进行了描述,研究了汉语语音的声学特征。他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最终确定汉语最小的语义区分单位。1958年扎多延科(Т. Н. Задоенко)在《中国语文》发表了《汉语弱读音节和轻声的实验研究》。此外鲁勉斋和伊三克(Б. С. Исаенко)等在自己的论著中涉及了汉语语音学问题。司格林也从事汉语语音学实验研究,早在1959年就在《中国语文》发表有《现代汉语音节重音的声学本质》一文,1980年又完成了《汉语语音学》一书,首次对苏联时期汉语语音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将其运用于汉语入门教学之中。

在工具书编写方面,1927年郭质生石印出版过一部《简明汉俄词典》,1935年增补后正式出版。该词典有两个特点,一是采用了王西里发明的笔画检索系统,方便汉字记忆;二是偏重于军事词汇,这与他当时在军事学院任教有关。阿理克院士从30年代起就开始组织苏联汉学家从事汉俄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后由于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不得不停顿了下来。然而,从1948年苏联科学院印行的词典样本中可以看出,阿理克已经为词典编写确定了原则,领导其他汉学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卡片。1951年阿理克病逝,主编工作由被阿理克称为"文言、口语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术语最出色的专家"①的鄂山荫担纲。经过苏联汉学家的集体努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汉俄双语词典《华俄大辞典》最终于1983~1984年间出版。另外,1957年,伊三克编写的《拼音汉俄辞典试编》出版。这是俄罗斯第一部按照现代汉语拼音排列汉字而编写的汉俄词典,所收多为常用白话词汇,但篇幅不大,仅收录了5500个词。编者在词典后面所附的一篇论述汉语词汇界定问题的文章很有价值,后被全文翻译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随着中俄交往的密切,社会对汉俄词典的需求上升,陆续又出版了许多篇幅各异的词典。比较著名的有巴拉诺娃(З. И. Баранова)主编的《大俄汉词典》(1999)、孔德拉舍夫斯基(А. Ф. Кондрашевский)主编的《现代汉俄词典》(2003)。

---

①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робный макет словаря)/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коллективом китаист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кадемика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 1948. С. 12.

在汉语教科书编写方面，伊三克、郭路特和苏维托夫—陈（И. И. Советов-Чен）于1953年编写出版的《华语课本》是比较早的一部。作为俄罗斯最大的两个汉语教学基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汉语教师一直致力于汉语教科书的编写。目前比较常用的现代汉语教材有扎多延科和黄淑英的《基础汉语读本》、谭傲霜的《现代汉语口语教科书》、谭傲霜和高辟天合编的《实用汉语新编》、苏敏的《汉语入门》、斯托罗如克的《汉字学入门》以及孔德拉舍夫斯基等人编写的《实用汉语教科书》等。在古代汉语教材方面，比较著名的有雅洪托夫的《古代汉语》、高辟天与谭傲霜合编的《文言文教材》及谢缅纳斯的《汉语词汇》等。

（二）主要研究者

龙果夫

1900年生于圣彼得堡，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1937年获语言学副博士学位，先后在托尔马切夫军事科学院和列宁格勒大学等地任教，自1928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一直到1955年去世。

龙果夫在汉语语言学领域的影响可谓深远，不仅对苏联如此，对中国也一样。他共发表著作50余种，主要集中于汉语音韵学、汉语词法和汉语句法等几个方面。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善于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在汉语古音构拟上多有贡献。早年发表的几篇音韵学研究论文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当时和以后相关问题研究乃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1929年他在国际知名的汉学刊物《通报》上发表《对于中国古音重订的贡献》一文，延续当年钢和泰（Александр фон Сталь-Гольстейн）的学术路数，开始致力于汉语古音的构拟工作。1930年他在《苏联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八思巴文和元代官话》一文，对元代碑文所见的八思巴文字的声母和韵母加以考察，意欲构拟古代官话的音韵体系，促进八思巴文字的研究。1932年，他与夫人龙果娃通过研究留苏的中国湖南学生的方言，合作发表《湖南湘潭湘乡的方言》，从此又发现了一种中国方言——老湘语。在汉语词法研究上，龙果夫的代表作品是195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词类）》。他在书中对汉语词类划分原则以及语法特征进行了考察，用了相当的笔墨来研究动词体与时范畴。此外，他在汉语拉丁化、东干语句法等研究领域都有所创见。

宋采夫

1928年生，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3年以《汉语的词与词根》一文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1年以论著《作为系统结构构成的语言》一文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先后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副所长、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共发表著作200余种，于2000年去世。宋采夫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汉语词法、句法、普通语言学理论多个方面。除汉语外，他还将东南亚其他孤立语言也纳入研究视野，尤在语言类型学上造诣颇深。

1956年宋采夫在《汉语词类问题》一文中指出汉语不是"词根语"或"无形态语"，肯定汉语词的结构及其形素在划分词类时的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系统结构构成的语言》中，他以汉语材料为主，研究了语言学普遍理论。作者在书中对作为符号系统结构构成的人类语言的本体论本质和重要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诸如"系统"、"结构"、"实体"等概念详加剖析，考察了语言系统中的组合、聚合和层次关系，分析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可论证性、语言的变异和非变异概念、言语及语言单位问题。

1995年出版的《孤立语理论导言》是宋采夫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语言学理论著作。全书分孤立语理论基础、孤立语语言单位、语法范畴以及句法四部分内容。借助一生深厚的学术积淀，作者运用普通语言学理论，对汉语、越南语及其他东南亚孤立语言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主张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孤立语"和"非孤立语"两大类型，两大类型之下再分为黏着语和屈折语。他将孤立性视为区分人类语言类型最重要的特征，论证了孤立语言研究对于普通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宋采夫是龙果夫、鄂山荫和郭路特等老一辈汉学家的出色后继者，作为苏联语言学研究的长期组织者，其学说在苏联语言学界拥有广泛影响。

雅洪托夫

1926年出生，195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4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是《汉语的动词范畴》。60年代和7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和新加坡南洋大学进修，一直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发表作品百余种。雅洪托夫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汉语语法、汉语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和普通语言学等，其主要思想和研究方法基本上为龙果夫的

延续。

在汉语语法领域，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汉语的动词范畴》了。这是苏联汉学界就汉语中动词这一最重要的词类进行的最为系统的研究。但书中提出的汉语动词分类方法被指根据不足，个别结论似有匆忙和武断之嫌。[①] 1958 年和 1959 年，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分别以《汉语动词范畴》和《汉语的动词范畴》为名出版了他的这部著作。在汉语句法方面，他先后发表有《汉语定语范畴》(1955)、《汉语句子成分》(1958)等文章。另外，古代汉语语法也是雅洪托夫的研究重点，先后发表有《古汉语词类》(1960)、《12～13 世纪的书面与口头汉语》(1969)等论文。在汉语古音构拟方面发表有《公元前 10 世纪的汉语语音》(1960)、《11 世纪的北京语音》(1980)等论文。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著有《瑶族语言中韵母的一致性》(1981)、《华南少数民族语言分类》(1982)、《台语族中响辅音》(1985)等文章。

80 年代以后，雅洪托夫的一些论文陆续在中国发表，如《普通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研究》(1985)、《加岱诸语言在原始分类中的地位》(1987)、《侗—水语言词首辅音的构拟》(1988)、《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98)等。

鲁勉斋

1922 年出生，1951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4 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现代汉语的句子形式主语》，1968 年又以《现代汉语声调与语调：实验研究》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发表著作几十种，尤长现代汉语语法和音韵学研究。

鲁勉斋的副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的句子形式主语》是他的第一种汉语语言学研究专著，其中利用实验数据，探讨了汉语中非常独特的主语句语法现象，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此书于 1961 年作为“中国语文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现代汉语声调与语调：实验研究》于 1971 年正式出版，是当时苏联对汉语句子语调最全面的研究。从鲁勉斋以后发表的著述看，他始终将汉语语法与声调结合起来研究，力图探询其

① 舒托娃：评雅洪托夫著《汉语的动词范畴》，《中国语文》，1960 年第 1～6 期。

间的各种联系。他至今领导着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语音实验室，将实验结果运用于汉语语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自195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现代汉语句子语调的某些实验数据》后，又陆续发表了《现代汉语中带第二个重叠词素的形容词》(1958)、《现代汉语中的从属句与独立句》(1960)、《现代汉语中虚词"所"结构》(1963)、《句法结构与语调》(1964)、《谓语与限定语段的语调》(1965)、《语句完成意义与未完成意义的语调表达》(1965)、《声调语言中音节的发声时间》(1967)、《句子语调对声调的影响》(1970)、《汉语音节合成(声母与韵母音)》(1978)、《汉语中的儿化现象》(1980)、《汉语言语节奏结构》(1981)、《自然言语与人工言语：语言学、控制论》(1986)、《汉语双音节词模拟》(1987)、《汉语声调合成》(1988)等。1990年鲁勉斋出版专著《言语单位的机器模拟》，对自己多年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

郭俊儒

1911年出生，1931至1935年间在中东铁路担任翻译，1941年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1960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现代汉语标准语复合句连接词》，1963年正式出版。1968年，他又以《汉语句法研究》(1968年出版)一书而获得博士学位。郭俊儒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语法学、词汇学和修辞学，出版有多部专著，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工作，于1991年逝世。

郭俊儒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发表语言学论著。早在1957年郭俊儒就出版过一本《汉语实用语法》，60年代发表有一系列专题论文，如《论"便"、"就"、"才"》(1960)、《苏联语言学家著作中的汉语问题》(1960)、《论汉语中的几个同音异义前置词和连接词》(1963)、《论现代汉语句子中的次要成分》(1963)、《汉语中的句法重复》(1963)、《复合句类型学的几个问题》(1964)、《论汉语复合句中的一个结构语义类型》(1965)、《关于汉语从属复合句的分类方法》(1965)、《汉译俄的修辞语法问题》(1967)、《汉语修辞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9)等。

在对具体问题进行扎实研究的基础上，郭俊儒不仅于60年代通过了副博士和博士论文答辩，出版了相关著述，而且在1974年一年中出版了《汉语语法》和《汉语修辞学》两部研究论著。《汉语语法》本为中学八年级至十年级学生所编，于1982年再版，后又经过修改和补充，1989年以《汉

语理论语法》为名重新出版，成为大学教材。他以中苏两国汉语语法研究者的成果为基础，对各层次语法单位的结构、语义和功能特点进行了分析，对于目前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全书包括导言、词法和句法三个部分。词法部分主要论述了词类问题，句法部分介绍了汉语词组、简单句和复合句的特点，尤其注意对句法单位的结构和语义加以分析。《汉语修辞学》作为首部汉语修辞学专著，一俟问世就引起了中国语言学家的重视。著名语言学家、中国修辞学会会长王德春教授亲译全书，先在《修辞学习》分16次在杂志上连载，从1982年一直连载到1986年，后又于1987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以《现代汉语修辞学》为名结集出版。全书包括引论、修辞词汇学、修辞句法学和语体体系几个部分，例证丰富，语言浅易，论述充分，填补了当时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空白。1984年郭俊儒又出版了《汉语词汇学》一书，作为苏联高等师范院校汉语教材，其中包括引言和五章，分别论述了汉语构词学、语义学、词类、成语和词典学等问题。

苏敏

1929年出生，195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他以《水浒传》中的语言素材为基础，于1958年完成并通过了题为《长篇小说〈水浒传〉语言中的合成动词》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970年再以《西夏语语法》一书被授予博士学位。他曾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工作，现为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苏敏继承了圣彼得堡的汉学传统，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始终以中国古典文献为基础，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汉语、西夏文、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

在古代汉语研究领域，苏敏既关注语法问题，也重视音韵和文献版本问题。在1957年发表于《苏联东方学》的《长篇小说〈水浒传〉语言中的动词构成原则》长文中，苏敏研究了《水浒传》中由两个词根合并而成的复合动词，如拣选、欢喜、惧怕、绑缚、等候等，对其构成方法以及语法意义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在以后的几年中，他还发表有《〈新编五代史平话〉的素材与编撰时间》(1960)、《中古汉语中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1963)等文章。在1979年出版的《汉语与中国社会》一书中，他依次探讨了汉语形成历史及方言的成因、采用普通话的历史必然性、汉语文字及其改革以及汉字拼音化等问题。这既是一部社会语言学论著，也是一部汉民族形成史著作。

论在中国的影响，则当推苏敏在西夏语文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他的研究重点与聂历山一脉相承，专以探讨西夏语音和语法为宗旨，充分发挥了苏联学者在该领域的优势，研究成果深得中国学者肯定。1964 年与克恰诺夫合著出版的《西夏文语音学研究》是苏敏的第一部西夏学论著。他在前言中称这项工作是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研究的继续，旨在探寻西夏语的内部规律，以达构拟所有西夏文字古音之目的。除前言外，全书包括西夏文语音重构文献及声调问题、西夏语辅音、零辅音和西夏文元音四章。在此书撰写过程中，苏敏负责语言学层面的分析，而克恰诺夫则负责古文字学研究。此外，他还于 1968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西夏语语法》。

在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苏敏与刘克甫、切博克萨罗夫和马良文合作，先后出版有《古代中国人：民族起源问题》(1978)、《中世纪前的中华民族》(1979)、《中世纪中华民族》(1984)、《中世纪近代之交的中华民族》(1987)系列著作。几位汉学家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语言学文献和研究方法，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意识变化轨迹进行了深入剖析。

第六章
当代俄罗斯汉学研究基地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俄罗斯青年人学习汉语的热情空前高涨。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营教学机构，都开办了许多汉语培训班，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与此同时，俄罗斯汉学家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情，新著不断问世。近年来，除了俄罗斯汉学的传统基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以外，具有特殊地缘优势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伊尔库茨克、伯力和海参崴的汉学家在大量培养汉语翻译人才的同时，充分利用本地文化资源，形成了以俄罗斯华侨、中俄关系以及藏传佛教为研究重点的学术特色，大有自成一派的趋势。由于篇幅所限，本章仅对俄罗斯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四家汉学教育与研究机构进行概略介绍。

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在远东研究所成立之前，苏联科学院已经有东方研究所存在。苏联政府之所以决定在1966年成立远东研究所，是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加强对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苏关系变化的研究。尽管当时冠名叫远东研究所，但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后来才逐渐增加了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研究。在中俄（苏）关系史上，远东研究所一直扮演着俄罗斯（苏联）政府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智囊角色。

远东研究所现有在编人员约200人，集结了俄罗斯主要的汉学研究力量，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汉学研究中心。当今俄罗斯三位汉学院士中的两位齐赫文和季塔连科至今仍在该所工作，而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也只是在不

久前才从这里调到东方学研究所。这里还有俄罗斯的哲学研究权威嵇辽拉和卢基阳，中国文学专家索罗金，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专家康德拉绍娃（Л. И. Кондрашова）和科尔库诺夫（И. Н. Коркунов），中国当代政治与外交研究专家加列诺维奇（Ю. М. Галенович），中国历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专家刘克甫、乌索夫、拉林（А. Г. Ларин）和伊雅达，中国军事战略研究专家波尔季亚科夫（В. Я. Портяков）和克利门科（А. Ф. Клименко）等。这里汉学家人数众多，而且学术研究组织严密，无论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还是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或军事，都有专人研究。除了行政领导机制以外，研究所内成立了若干研究中心，有效地整合了力量，便于制订和实施各种研究计划，开展国内国际学术合作。这些研究中心可依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调整或撤销。远东研究所目前一共有八个研究中心，其中有五个以中国为研究对象：

1. 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中心

主要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东亚地区经济全球化进程。

2. 俄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

主要研究课题：系统研究俄中关系现状并对其未来走向做出科学预测，具体内容包括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与美、日、欧、印等世界力量中心的关系、中国的中亚和东亚政策、台湾问题、中国因素对于俄罗斯复兴的作用、俄中经济互动、苏中关系的现代评价、俄中关系史等。

3. 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安全研究中心

主要研究课题：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俄中在中亚地区的协同关系，俄罗斯东亚及西太平洋安全保障。具体内容包括中亚、东亚及西太平洋地缘政治形势、中亚及东亚地区对于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意义、外部因素对上海合作组织形成与发展进程的影响、上海合作组织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前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俄中关系、中亚东亚全球化、中亚东亚军事政治形势等。

4. 中国当代历史与政治中心

主要研究课题：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以及共产国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整理刊布了大量俄藏共产国际历史文献，出版研究成果多种。近年来，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政治法律建设问题也成为该中心的重要研究内容。

5. 东亚文明比较研究中心

主要研究课题:新欧亚主义,儒学、道教、佛教、《易经》,中国传统预测方法及实践,现代及古代汉语,中国文化史,养生学。

远东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国际汉学交流中心。每年都有不少外国学者在这里进修或研究。研究所经常举办各种专题国际性学术会议,邀请世界同行开展学术交流。一些知名的学者在这里被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中国学者高莽、郝建恒、李明滨也在其中。与此同时,远东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关系史学会等中国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远东研究所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汉学人才培养中心。这里具有硕士、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攻读者不仅限于俄罗斯学生,而且还有中、日、韩等国的学生。

远东研究所图书馆又称汉学图书馆,始建于1958年,初为汉学研究所的附设机构。当年为了将汉学研究所建设成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苏联科学院将原东方研究所的藏书、北京俄罗斯馆中外书房以及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藏书都集中于一处,使这里一跃而成为另一个汉学图书中心。与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不同,这里主要收藏研究著作,而不收藏档案和手稿等物。在这些藏书当中,阿理克捐赠的汉语和西文汉学著作学术价值最高,俄国传教团的著作和出版物已成为研究中俄文化关系的珍贵文献。此外,该图书馆每年都出版一辑俄罗斯汉学家当年著作目录。

远东研究所出版的《远东问题》杂志1972年创刊,以俄、英两种文字同时出版,是俄罗斯唯一的以中国为研究重点的定期出版物。通过这本杂志,国际学术界可以及时了解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重点和成果。

作为俄罗斯的汉学研究重镇,远东研究所成功经受了苏联解体给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带来的负面冲击,重新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中俄努力构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今天,俄罗斯政府越来越重视该机构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俄中关系战略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随着中国俄罗斯汉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远东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为我国学术界所了解、借鉴和回应。[①]

---

① 有关远东研究所的部分内容参考了该所网站信息。参见 http://www.ifes-ras.ru/index.html(2006-04-08).

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193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将亚洲博物馆、东方学家委员会、佛教文化研究所和突厥研究室四家机构合并，在列宁格勒成立东方学研究所，由奥登堡担任所长。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指示，东方学研究所按照国别划分研究室，其中有中国研究室，由阿理克院士担任主任。应当时形势之需，东方学研究所的首要任务乃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东方国家进行研究。

阿理克担任中国研究室主任一直到去世。在他的领导之下，苏联新汉学不仅建立了起来，而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整体上说，东方研究所的工作并不能适应苏联政府对当代东方问题研究的需求。1951年，即在阿理克逝世的当年，东方学研究所迁往莫斯科，只有手稿部（原亚洲博物馆）留在列宁格勒。1956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在手稿部基础上成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为圣彼得堡分所）。至此，东方学研究所内便有了两个汉学研究机构，一个是莫斯科的中国研究室，另一个是列宁格勒分所。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费德林通讯院士和艾德林教授曾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

现在莫斯科的中国研究室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研究，中国历史、俄罗斯汉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在中国典籍翻译上面，越特金父子即将完成司马迁《史记》的俄译和注释工程。同时，《周礼》、《大明律》等也在翻译之中。霍赫洛夫深入发掘档案，钩沉俄国汉学历史，发表了大量论著。杰柳欣曾担任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博克夏宁的明朝与南洋关系研究使俄罗斯汉学重北轻南的局面有所改观。列·瓦西里耶夫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卓有成效。郭黎贞在古代中国文艺理论和古代小说领域多有著述。科布泽夫的中国哲学研究和谢罗娃的中国戏剧研究也有很大影响。

自1970年起，中国研究室每年举办一届“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至2006年已经召开了36届。科学院东方文献出版社为每一届讨论会都出版论文集。这是俄国汉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出版论文最多的学术会议，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①]继承了亚洲博物馆丰富的汉学文献收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学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该所即致力于对所藏汉、满、蒙、藏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相继出版了瓦赫京等人编写的汉籍目录、沃尔科娃（М. П. Волкова）和庞晓梅（Т. А. Пан）编写的满文图书目录以及沙碛金（А. Г. Сазыкин）编写的蒙文抄本和刻本目录。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的藏文藏书目录也即将问世。这些目录不仅有利于藏书的保存和利用，也为世界汉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由弗鲁格开创的俄罗斯敦煌学，经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Л. И. Чугуевский）等人的发展，在世界敦煌学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由伊凤阁和聂历山肇始，又经克恰诺夫、克平和孟列夫等人努力，圣彼得堡分所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西夏学研究中心之一。孟列夫于1963年、1967年主编出版了《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1992～2001年，圣彼得堡分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写出版了十七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首次使长期与世隔绝的俄藏敦煌文献得见天日。孟列夫1984年出版有《黑水城科兹洛夫藏品汉文文献叙录》。1996年，中俄学者再度合作开始整理出版20世纪初由科兹洛夫掠到俄国的黑水城西夏文书，书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

该所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阿理克通过其翻译的《聊斋志异》和《唐诗选》显示了他尊重中国文化的思想主旨。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阿理克确立了汉籍翻译原则和研究方法。后来圣彼得堡的汉学家基本上是按照阿理克开创的传统而进行汉籍翻译的。他们翻译的典籍涉及中国历史、文学、宗教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如楚紫气的《易经》（1960），古列维奇的《百喻经》（孟列夫译诗，1986）和《临济录》（2001），司徒洛娃（Э. С. Стулова）的《普明宝卷》（1979），孟列夫的《维摩诘经变文与十吉祥变文》（1963）和《搜神记》（2000）（1994年初版，2001年再版），叶尔马科夫的《高僧传》（1991、2005）、《冥祥记》（1993）、《感应传》（1998）、《宣验记》（1998）、《旌异记》（1998）和《冥报记》（1993、1998），吉·瓦西里耶夫（К. В. Васильев）的《战国策》（1968），巴甫洛芙斯卡娅的《新编五代史平

① 2007年6月19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发布决议，将该机构从东方学研究所中分离，成立独立的东方写本研究所，所长为波波娃教授。

话》(1984),克罗尔的《汉书》(2005)和《盐铁论》(1997、2001),雷巴科夫的《唐律疏议》(1999、2001、2005),郭质生的《孟子》(1999),陶奇夫的《抱朴子》(1999)、《道德经》(1999)和《悟真篇》(1994),费什曼的《阅微草堂笔记》(1974)和《新齐谐》(1977),齐一得的《今古奇观》(1962),马丁诺夫的《论语》(2006),佐格拉芙的《京本通俗小说》(1995)、《孟子》(2000)和《荀子》(2000),克平的西夏文俄译《孙子》(1979)等。

三、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正式成立于1855年8月27日,从一开始便集聚了俄国最优秀的东方语言学者。王西里、杂哈劳、孔气、孟第、柏百福和伊凤阁等都曾在这里任教。十月革命以前,这里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汉学人才培养和研究中心。1917年以后,东方语言系经历了一系列组织改造,加之大清洗运动以及卫国战争的影响,东方学家数量锐减,学术研究陷入低潮。1919年,根据马尔院士的建议,在东方语言系和历史语言系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彼得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1925年社会科学系又被改造为语言与物质文化系,1929年更名为历史语言系。1930年列宁格勒大学实行学院制,东方学专业被并入新成立的历史语言学院。1934年,该学院又更名为哲学、文学、历史学与语言学学院。与此同时,1920年彼得格勒活东方语言中心学院建立,1927年改称列宁格勒东方学院。这样,培养汉语人才的任务便主要转移到了这座新成立的学院中了。相比之下,列宁格勒大学的汉学教育开始萎缩,招生失去连贯性。

自1934年起,列宁格勒大学汉语专业隶属哲学、文学、历史学与语言学学院语言学系。教师主要为阿理克及其弟子,如翻译《易经》的楚紫气、翻译《诗经》的施图金、翻译《阿Q正传》的王希礼、发现老湘语的龙果夫、研究西夏文的聂历山、首开中国艺术研究的拉祖莫夫斯基等。三年后,该学院被撤销,其中的语文系和文学系合组成语文系。然而,新学期刚开始就赶上了大清洗运动,楚紫气被逮捕并被枪杀。1938年施图金和史萍青被捕。阿理克院士也遭到了《真理报》的点名批判,一度被校方解除了工作。当时龙果夫、斯梅卡洛夫(Г. Ф. Смыкалов)和潘克福等汉学家在培养汉语人才和延续学术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分别承担了各种类型的汉语教学课程。与此同时,杜曼、叶非莫夫(Г. В. Ефимов)和阿·彼

得罗夫分别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 。1941 年,汉语专业停止招生,教师被疏散到后方。在这样艰难的情势下,列宁格勒大学汉学家在阿理克院士的领导之下,还是培养出了几名优秀的汉学家,如谢列布里亚科夫、费什曼和齐一得等。①

1944 年,列宁格勒大学重建了东方系,成立了多个教研室,汉学家主要在中国、朝鲜及东南亚语言学教研室和远东国家历史教研室工作。中国、朝鲜及东南亚语言学教研室的汉学家主要以汉语语言学和文学为研究对象。在远东国家历史教研室,先后有擅长研究远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叶非莫夫、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别列兹内 (Л. А. Березны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斯莫林、史学史研究者多罗宁(Б. Г. Доронин)、秘密宗教研究者鲍·诺维科夫(Б. М. Новиков)等学者任教。

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期,阿理克无疑都是列宁格勒大学汉学学科无可替代的领袖。他通过思考帝俄汉学的成就得失,分析世界汉学的历史与现实,为列宁格勒大学汉学专业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阿理克学派倡导的重视汉语,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传统在如今的圣彼得堡大学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目前,圣彼得堡大学汉学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是谢列布里亚科夫、斯莫林、雅洪托夫、司格林、庞英、尼基季娜、斯托罗如克、罗流沙和萨莫伊洛夫(Н. А. Самойлов)等。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前文中已有介绍。斯莫林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著有《10 ~ 12 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反封建起义》(1974)等专著。雅洪托夫的研究领域为汉语语法,1954 年就以《汉语的动词范畴》一文获副博士学位。司格林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其副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汉字韵母声学分析》(1968),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中国俗文学:说唱体裁》(1987),近年来他在冯骥才小说翻译、侯宝林以及中国相声研究方面颇有心得。庞英主要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尤长《红楼梦》列藏本研究。尼基季娜多年钻研汉语文言语法,出版有《古文语法》(1982)。斯托罗如克研究唐朝诗人元稹,编有《汉字学入门》(2002)教材。罗流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2001 年以《老舍作品中的中国人民族性格》获副博士

---

① Решетов А. М.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на ФИЛФАКЕ в 1937-1944 гг. //Материалы XXX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ып. 5. Секция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СПб. , 2003.

学位。萨莫伊洛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近年来其俄罗斯中国形象演变研究令人瞩目。当然，由陶奇夫创建的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与文化学教研室还有两位汉学家索罗宁和克拉芙佐娃。前者研究佛教和西夏学，后者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史。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具有学士、硕士、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著名汉学家大都在这里兼职任教，参与研究生培养和答辩。

2005 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刚刚度过了自己 150 岁的生日。这个经历过无数风雨沧桑的汉学重镇继承了阿理克汉学学派的传统，并能够适应时代要求不断推陈出新。与此同时，该系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南北呼应，继续代表着俄罗斯汉语教育的最高水平。①

四、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莫斯科大学自 1755 年成立时就有东方语言教育，然而却一直没有教授过汉语。直到 1944 年才在历史系成立了远东历史教研室，1949 年在语文系成立了汉语教研室。1956 年 6 月 24 日，莫斯科大学将历史系和语文系东方学学科合并成立了东方语言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后改称亚洲非洲国家学院，简称亚非学院。由于亚非学院的人员来自历史和语文两系，因此，这里的汉学研究从一开始便有两个方向，一是汉语语言学、文学及哲学，二是中国历史。

首个汉语教研室主任由波兹德涅耶娃副教授担任，一直到 1959 年。从 1959 年到 1963 年，汉语教研室由罗高寿领导。从 1963 年一直到 1993 年，该教研室主任一直由鲁勉斋担任。自 1993 年起，高辟天继任教研室主任。现任主任为苏敏。

从鲁勉斋起，亚非学院的现代汉语语言学研究便独树一帜。俄罗斯汉学史上的许多位汉语语言学专家都曾在这里任教。鲁勉斋是著名的汉语语言学专家，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的句子形式主语》1961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8 年他以《现代汉语声调与语调：实验研究》一文获得

① 有关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部分内容参考了该系网站信息。参见 http://www.orient.pu.ru/(2006-04-08).

博士学位。科托娃 1954 年获副博士学位毕业留校，著有《现代汉语疑问句》(1963)。高辟天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于 1969 年，题目为《汉语流时间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于 1992 年，题目为《汉语基本成分形态》。苏敏自 1970 年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调入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主要研究汉语和西夏文语法及语音，出版有两卷本《西夏语语法》(1968)。此外，汉语教材编写也是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这显然与它作为莫斯科汉语人才培养中心的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在这方面，谭傲霜做了很多工作，她与高辟天合作编写出版的《实用汉语新编》受到俄罗斯汉语教育界的欢迎。

波兹德涅耶娃无疑是莫斯科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创始人。她是著名满学家宝至德(Д. М. Позднеев)的女儿，继承父志，投身汉学研究。她翻译了鲁迅、老舍等众多现代作家的作品，其专著《鲁迅生平与创作》已被翻译为中文，以《鲁迅评传》为书名出版。罗高寿是著名的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两部——《水浒传》和《西游记》，同时还译有《吕梁英雄传》等现代作品。谢马诺夫自 1973 年在这里任教，他不仅翻译鲁迅作品，其鲁迅研究在中国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已经出版了两种汉译本。此外，他还译有曾朴的《孽海花》及老舍的《猫城记》。华克生自 1960 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译有吴敬梓《儒林外史》，李渔的《肉蒲团》、《闲情偶寄》，《三言两拍》，许地山的《萤灯》，老舍的《正红旗下》以及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

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这里的汉学家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波兹德涅耶娃曾翻译《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著有《古代中国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辩证主义者》(1967)。波缅兰采娃译有《淮南子》，著有《晚期道家论自然、社会和艺术》(1979)。谢缅年科 1973 年起在亚非学院工作，早期从事嵇康研究，近年来其《论语》和《道德经》译本也颇受学术界的肯定。

西蒙诺芙斯卡娅(Л. В. Симоновская)1956 年成为亚非学院历史教研室第一位主任。1972 年，主任一职由尤里耶夫(М. Ф. Юрьев)接任。拉比娜从 1990 年起成为历史教研室的第三任主任，两年后由梅利克谢多夫接任。历史教研室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学者。西蒙诺芙斯卡娅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侧重农民起义问题。刘克甫在中国社会史、民族学和甲骨文等研究领域均有不凡建树。马良文曾在这里长期工作，完成了一系列中国

历史文化论著。此外，齐赫文和米亚斯尼科院士也曾在这里从事过教学和研究工作。目前该教研室有九名成员，研究范围比过去有显著扩大。梅利克谢多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近年来还从事台湾历史研究。1998年他主编出版了历史教研室集体撰写的《中国历史》一书。列·瓦西里耶夫是俄罗斯著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专家，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中俄学术界备受瞩目。拉比娜主要研究宋代政治改革，是俄罗斯的范仲淹和欧阳修问题专家。博克夏宁本为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明史研究，长期在亚非学院兼职。近年来，随着莫斯科与台湾地区交流的增多，亚非学院的台湾历史与社会研究发展很快。皮萨列夫（A. A. Писарев）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同时，也关注两岸关系问题，曾任台湾淡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所长。马良文现在兼任淡江大学俄国语文学系主任和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刘克甫也曾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捷尔吉茨基（K. M. Тертицкий）本从事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近年来将台湾民间宗教纳入研究视野。

目前，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可以培养学士、硕士、副博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可以在语言学、历史学和社会经济三个方向上完成。近年来，这里又成为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海外考点，进一步提高了其作为莫斯科汉语教学中心的地位。①

① 有关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部分内容参考了该院网站信息。参见 http://www.iaas.msu.ru（2006-04-08）.

参考文献

一、中文

1. [俄]阿列克谢耶夫著,阎国栋译:《1907年中国纪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俄]布罗夫: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17世纪末~20世纪末,载《汉学研究通讯》,总56、57、58期。
3. [俄]布罗夫:俄罗斯学者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五卷第二期。
4. [俄]李福清:前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概况,载《国际汉学》,第一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5. [俄]李福清: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及研究),载《汉学研究》,第一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
6.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7. [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
8. [苏]李福清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9. [英]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
10.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 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12. 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

1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华书局,1979 年。
14. 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5. 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 年。
16. 黄定天:《中俄经贸与文化交流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7.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18. 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 年。
19. 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新华出版社,1993 年。
20. 李明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21. 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 ~ 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
22. 林军:《中苏关系(1689 ~ 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年。
23.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 年。
24.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25. 宿丰林:《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26. 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下),人民出版社,1986 年。
27. 孙成木:《俄罗斯文化一千年》,东方出版社,1995 年。
28. 汪剑钊:《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漓江出版社,1999 年。
29. 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年。
30. 王丽娜编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 年。
31. 王晓平等:《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2.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 年。
33. 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34.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35.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 年。
36. 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 1 ~ 4 卷,人民出版

社,1978～1990年。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二、外文

1. E. Stuart Kirby, Russian studies of China: 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Soviet Sinolog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1975.

2. Lundbaek, Knud. T. 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Curzon Press, 1986.

3. Riftin, Boris L.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Russia. Reprinted from Asian Research Trends: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 № 12(2002).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kyo Bunko, Tokyo.

4. Widmer, E.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6.

5.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М., 1972.

6.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1978.

7.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 (837-908). Перевод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6.

8.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82.

9.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Письма к Эдуарду Шаванну и Полю Пеллио.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сост., пер. с франц. и примеч. И. Э. Циперович. СПб., 1998.

10.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в России: Лекции. 2-е изд. Л., 1925.

11. Беседы и суждения Конфуция. СПб., 2001.

12. Бичурин Н. Я. Китай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М., 2002.

13. Бичурин Н. Я. Сань-цзы-цзин, или троесловие с китайским текстом/ Пер. с кит.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Пекин, 1908.
14. Бичурин Н. Я.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Ч. 1-3. М. -Л. , 1950-1953.
15. Бичурин Н. Я.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 2002.
16. Бичурин Н. Я. Хань-вынь ци-мын.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чиненная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Пекин,1908.
17.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 / Сост. И. Г. Бебих, О. Е. Сакоян. М. , 1991.
18.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от X до XIII века. СПб. , 1861.
19.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заслуженным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С.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П. Васильевым. СПб. , 1887.
20.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Пб. , 1873.
21.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Сведения о маньчжурах во времена династий Юань и Минь. СПб. , 1863.
22.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Ч. 1. 2-е изд. /Под ред. А. О. Ивановского. СПб. , 1898.
23.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Ч. 2. Элементы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СПб. , 1884.
24.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Опыт первого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Составлен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тудентов. СПб. , 1867.
25.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б. , 1880.
26.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Примечания на второй выпуск китайской хрестоматии. Перевод и толковании Лунь-юй я. СПб. , 1884.
27.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Примечания на первый выпуск китайской хрестоматии. СПб. , 1868.
28.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Примечания на третий выпуск китайской хрестома-

тии. Перевод и толкования Шицзина. СПб. ,1882.

29.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 Н. Перевод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1. №4.
30.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СПб. , 1892.
31.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СПб. , 1888.
32. Голыгина К. И.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остока. М. , 2002.
33. Дацышен В. Г.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расноярск, 2002.
34. Демидова Н. Ф. ,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Роспись" И. Петлина и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Ф. И. Байкова. М. , 1966.
35.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П. Е. Скачкова: Сб. статей. М. , 1993.
36.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 Под ред. Л. С. Васильева. М. , 1974.
37.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М. , 1990.
38.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 1997.
39.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Гл. ред.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 1994.
40. Кузнецова Н. А. Из исто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1917-1967). М. , 1970.
41. Куликова А. М.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актах (конец XVII в. -1917 г.). СПб. , 1994.
42. Куликова А. М. 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XIX века в лицах. СПб. , 2001.
43. Лисевич И. Л. 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 и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М. , 1968.
44.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ка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 , 1972.

45. Люди и судьбы. 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1917-1991). СПб. , 2003.
46. Милибанд С. Д. 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с 1917 г. : В 2 кн. 2-е изд. ,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М. , 1995.
47. Н. Я. Бичурин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рус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2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 Сост. А. Н. Хохлов. Ч. 1-2. М. , 1977.
48.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 1970.
49.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 1956.
50.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 Отв. ред. и сост. А. Н. Хохлов. Ч. 1-3. М. , 1979.
51. 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П. И.) и Попов П. С.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2. Пекин, 1888.
52. Петров А. А. Философ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ом буржуазном китаеведени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 Вып. 7. 1934.
53. Скачков К. А. Пекин в дни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Из записок очевидца. М. , 1958.
54. Скачков П. 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 1960.
55.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 1977.
56. Точность-поэзия науки: Памяти Виктора Васильевича Петрова: Сб. ст. СПб. , 1992.
57.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 ст.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 , 1983.
58.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Пекин, Тип. Успе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при Рус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2-е изд. Т. 1-4. Пекин, 1909-1910.
59. Федоренко Н. 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переводы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ССР//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7. №1.
60. Фишман О. Л. Китай в Европе: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XIII-XVIII вв.). СПб. , 2003.
61. Шубина С. 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XVIII-начало

XX вв.).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Ярославль, 1998.

62. Эйдлин Л. З.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71-1981)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82. №5.

63. Яхонтов К. С. Китайские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книги в Иркутске. СПб. , 1994.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印章篆刻：郑怀宝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ISBN 978-7-5077-2908-5

9 787507 729085 >

定价：35.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作者=阎国栋著
页数=220
出版社=北京市：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8
SS号=11856829
DX号=000006269282
简介=本书为“列国汉学史书系”之一。介绍俄罗斯汉学发展历程，沿历史脉络介绍了重要的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269282&d=2A5FB07238049270EFE9D04C6A9D3D8C&fenlei=1103010601&sw=%B6%ED%C2%DE%CB%B9%BA%BA%D1%A7%C8%FD%B0%D9%C4%EA#ctop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俄国汉学的创立
　　一、俄国汉学摇篮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
　　二、拜耶尔与欧洲早期汉学的引入
　　三、吹生俄国汉学的“中国风”
　　四、罗索欣与俄国汉学肇端
　　五、18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列昂季耶夫
第二章　俄国汉学的崛起
　　一、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
　　二、汉学人才培养的出色组织者卡缅斯基
　　三、俄书汉译第一人列昂季耶夫斯基
　　四、服务中俄贸易的恰克图华文馆
　　五、欧洲第二所设立汉语专业的喀山大学
第三章　俄国汉学的发展
　　一、圣彼得堡汉学宗师王西里
　　二、国际汉学名家巴拉第
　　三、笃信孔孟的格奥尔吉耶夫斯基
　　四、汉学重镇圣彼得堡大学
　　五、远东汉学基地海参崴东方学院
第四章　阿理克与苏联汉学的创建
　　一、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二、中国民间文化研究
　　三、建构苏联汉学研究方法论
　　四、阿理克学派
第五章　苏联及当代俄罗斯汉学的繁荣
　　一、中国文学研究
　　二、中国历史研究
　　三、中国哲学宗教研究
　　四、汉语语言学研究
第六章　当代俄罗斯汉学研究基地
　　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三、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四、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参考文献
封底